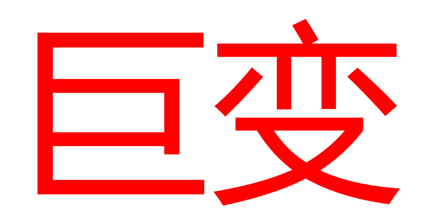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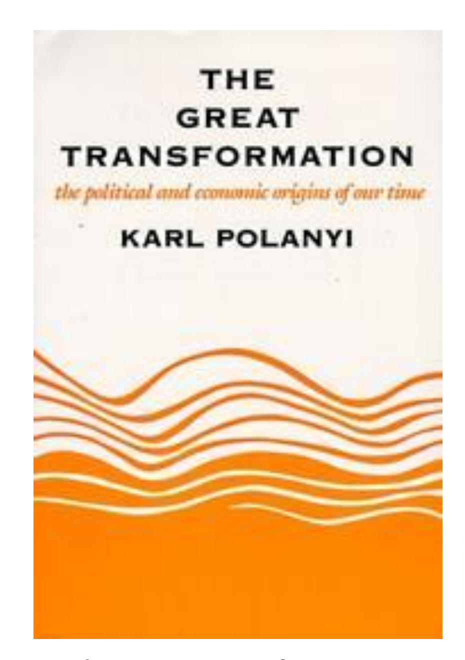
巨变

近代西欧的政治

和经济的源头

（共享版权中译本）

自学书院　马景文　2013 年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Karl Polanyi[1], 1944

[1] Polanyi 中译有「波兰尼」,「博兰尼」。原文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68 年第八版）。

目　录



译言

Karl Polanyi 的大作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名气远不及 Smith 的《国富论》、Keynes 的《通论》和马克思的著作。

随着这几年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连连出事，学者少不免要从先人智慧中找寻指引。Polanyi 有些观点确实点出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主义的弊端。蒙尘多年，*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于 2001 年再版发行(Beacon Press)，加上 Joseph E. Stiglitz 和 Fred Block 大力推荐，逐渐为人注意，是许多大学课程的指定读物，尤其这几年来特别受到中国内地学者的关注。

据查中译有正、简体各两本：

(1) 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远流出版社，1957 年；
(2) 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合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远流出版社，2007 年；
(3) 刘阳、冯钢合译《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07 年 5 月）；
(4) 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随带一提，我没有看过这些译本，但曾参考英国马克斯主义中心 http://www.marxists.org 以 Creative Commons 条款发表的中译本（译者没有具名），可惜译文错漏不少，我零星借用了大概十份之一。

既然坊间有现成译本，何苦还要发表新版本？上文提到的译本是现有版权制度的产品，读者购买书本后，享有阅读和有限度引述译文（按学术标准）的权利。这无疑，也实属必要，保护了作者、译者和出版社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却在某程度上窒碍了信息流通和文化知识的发展。

Creative Commons[2]这民间「保留部份版权」制度既尊重作者权利（保留署名权和指定衍生作品不得作商业用途），又方便流通（不限制非商业形式分发）和鼓励创作（可允许二次创作的衍生作品）。传统版权制度和 Creative Commons 的最大距离当然是金钱收益。创作人个人情况不同，无谓以金钱衡量作者对文化文明的贡献。但一般而言，教学资材方面更注重广为传播，为民所用而不是金钱收益，所以 Creative Commons 在教育范畴的发展最快最广。

[2] 一词四译：（中国内地）知识共享、（香港）共享创意、（澳门）创意共享和（台湾）创用 CC。

这个《**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源头**[3]》译本以 Creative Commons 的条款发表：保留署名权，欢迎各位分发但不得作商业用途，允许衍生作品（必须以相同的分发和禁止商业用途条款发表）。

为方便读者欣赏这本有独特之见的好书，建议依次先看斯蒂格利茨：为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序，继而是本译本的 Fred Block〈导读〉；然后看正文。译本也选译了几篇书评和文章供读者参考（见附录一）。

Karl Polanyi 被誉为「经济人类学[4]」大师。大家往往视之为是「人类学」的流派，极少在经济学范畴占显著地位。Polanyi 点题的《巨变》是指没有市场的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过渡到 19 世纪的谓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为前所未见的「巨变」。

《巨变》重见天日，网上搜到的中文评论几乎全是以本书的论述引证中国经济改革后的下一步：社会改革。在网上搜证，汇集了一些数据。为方便各位先看原文，中文论述全放在书后的〈附录三〉。

马景文
自学书院
2013 年 11 月



[3] 选用这书目，并非要刻意与其他译本有区别，而是考虑到一些关键词词的确切意思。原题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的 *Our Time* 当然可译为「当代」，但这是 1944 年的作品，译为「近代」更能标示年代之不同。点明「西欧」是特显本书的论述只是集中讨论西欧各国的情况。

[4] economic anthropology

《巨变》导读[5]

Fred Block

引言

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评论《巨变》的影响时提到:「有些著作拒绝离场。」说得好。Polanyi 的杰作虽然是在 1940 年代初期书成，其相关性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当今书海茫茫，只有少数的保质期是多于几个月或几年；几十年来，《巨变》仍然新鲜夺目。要了解全球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面临的困境，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

《巨变》恒久如新，有很好的解释。本书大力批判市场自由主义，即是国家社会和全球经济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组织。

1980 年代以来，尤其冷战在 1990 年代初结束之后，市场自由主义学说已主宰全球政治；学说有不同标签:〔英国〕戴卓尔[6]主义、〔美国〕列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等。原著于 1944 年首次出版，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加剧，模糊了 Polanyi 论点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捍卫者之间的高度两极化辩论，没有多少空间留给 Polanyi 的细致和复杂论述。 因此，要随着冷战时代结束，Polanyi 的大作才开始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是迟来的正义。

后冷战时期的核心辩论是关于「全球化」议题。新自由主义者坚持通讯和运输的新科技无可避免促使世界经济紧密集成，途径是通过扩大贸易和资本流动以及接受英美模式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运动和理论家从不同的政治观点攻击这样的全球化视野；有人基于种族、宗教、国家或区域认同而抵制，有人坚持以全球协调与合作作为替代愿景。辩论双方可以从《巨变》学到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和批评者会更深入把握市场自由主义的历史和了解经济全球化早期项目造成的悲惨后果。

Polanyi 的人生

Karl Polaniyi（1946-96）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出生和长大，一家满门俊杰。他的兄弟 Michael 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著作仍广为传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Karl 一直是匈牙利学界和知识界有影响力的人物。

---

[5] Block, Fred “*Introduction”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vi* , June 2000。原文颇多脚注，大多是引文出处，译文只保留解释性批注。译本略有删节。

[6] Thatcher，各地有不同中译；本文选用港译「戴卓尔」，既优美又隆重。英国统治香港期间，重要人物都有官方中译名字，一般都选得很雅。本文特多人名，除几位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译文依循约定俗成的常见译名，其他的一概不译。



1920 年，Karl 在维也纳任职中欧畅销经济金融周刊 *Der Oesterreichishe Volkswirt* 高级编辑，初次接触 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和他更有名气的学生 Frierich Hayek（哈耶克）的论说。当时市场自由主义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严重动摇，两人试图恢复市场自由主义在知识领域的正统地位。短期而言，他们的影响不大。

从 193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凯恩斯经济思想为政府积极管理经济正名，主宰西方国家的政策。[7]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Mises 和 Hayek 在美国和英国孜孜不倦支持市场自由主义，直接启发了 Milton Friedman 等有影响力的追随者。Hayek 在 1992 年去世，目睹苏联崩溃，应为他的观点得到平反而告慰。他离世时被广泛赞颂是新自由主义之父，启发了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和美国列根总统奉行的政策：放松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早在 1920 年代，Polanyi 已直接挑战 Mises 的观点，他的核心理论始终是批评市场自由主义。

Polanyi 任职财经刊物时，目睹美国股市在 1929 年崩溃，维也纳的信贷机构于 1931 年倒闭，导致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希特勒在 1933 年掌权，Polanyi 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受欢迎，被要求辞职。他去了英格兰，在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担任讲师。为了筹划课程，Polanyi 沉浸英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材料。他的《巨变》融合了这些史料，结合他对 Mises 和 Hayek 当时已颇具影响力观点的批评。

Polanyi 在 1940 年代初期〔以英语〕撰写《巨变》，当时他是美国佛蒙特州 Bennington 学院的访问学者，有赞助支持，可以全情投入。视野角度的变化有助 Polanyi 综合不同流派的论点。本书的持久贡献是把重点放在调节全球经济的制度，这与 Polanyi 多次流亡有直接关系。他从布达佩斯流亡到维也纳，然后是英国和美国；这些经历结合他的浓浓道德责任，使 Polanyi 成为世界公民。晚年时他写信给老朋友：『我的生活是「世界」生活，我过着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非洲，为新人类而写。』

他对匈牙利家乡依然有很深的感情，他的「世界」生活有助他超越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把握全球经济措施的一套特定手段所培育和支持的急进形式民族主义。

[7] 原注(iv)：巧合的是《巨变》初版当年，Hayek 也发表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前书庆祝美国「新政」限制了市场力量的影响，后者坚持「新政」改革导致美国走下坡，势将导致经济崩溃和极权政权。

二战之后，Polanyi 任教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从事资本主义之前社会的货币、贸易和市场的人类学研究。他连同 Conrad Arensberg 和 Harry Pearson 在 1957 年发表了《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其后，他的学生把他这时期的作品编录为纪念文集[8]。

Polanyi 的论点：结构和理论

《巨变》分为三部份。第一和第三部份集中于催生当时世界大事的情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美国「新政」以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Polanyi 在这几章提出一个谜团：为何欧洲在 1815 至 1914 年这相对和平与繁荣时期之后，突然经济崩溃和陷入两次野蛮的世界大战。第二部份是本书的核心；Polanyi 提出解决方案。他回顾十九世纪最初几年的英格兰[9]工业革命，指出英格兰思想家如何发展市场自由主义理论以响应早期工业化的破坏，其核心信念是人类社会不应服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因为英格兰成为领头的「世界工厂」，这些信念顺而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

在第二部分的下半部（第十一至十九章），Polanyi 强调市场自由主义产生的必然反应：各方致力保护社会，减少市场的影响。这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无法正常发挥，而管治全球经济的制度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内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平崩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秩序崩溃导致大萧条；他指出这全是试图以市场自由主义组织全球经济的直接后果。

第二项「巨变」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兴起。《巨变》对十五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都有重要观点，也提出一些原创观点，例如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的作用，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以及「大自然」商品化的危险。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 Polanyi 的论点得到理论灵感，有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文章是以《巨变》的关键引言为框架。

这本书非常丰富，尝试总结本书只是徒劳，本文能做到最好的只是阐述一些 Polanyi 的主要观点，这先要理解他的理论定位是独创的。很难把 Polanyi 配对政治景观的标准地图。他同意凯恩斯批评市场自由主义的许多观点，但他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一生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但与经济决定论所有流派有深刻分歧，包

[8] 这段略有删节。

[9] 野人献曝，不厌其烦提出中译常见的笔误。Britain 才是「英国」，England 是「英格兰」。英国正名是「United Kingdom of …联合王国」，包括 England（英格兰）, Scotland（苏格兰）, Wales（韦尔斯）和 Northern Ireland（北爱尔兰），各自有管治机构和语言；苏格兰甚至有本身的税制，发钞银行和货币，近年有地方议会。噢，苏格兰足球队有本身的联赛，不参加英超！在一般情况下，以最大份额的英格兰作为「英国」未尝不可，但本书特多提到 England 的历史事件，不应当作是影响全国的「英国」事件。

括主流的马克思主义[10]。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非常定义与我们对这些概念的习惯理解迥然不同。

Polanyi 的「镶嵌」概念

解释 Polanyi 的思想，逻辑起点是他的「镶嵌[11]」概念，这也许是他对社会思想最为人熟知的贡献，也为理解他的论点引起巨大混乱。Polanyi 首先强调迄今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是建基于经济体系是由各市场组成这概念，而各市场的联锁系统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

即使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要求助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但他们仍然借助经济是总合市场的平衡系统这概念。Polanyi 的意图是指出这概念不同于整个人类历史记录的人类社会现实。他坚持在十九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必然是镶嵌在社会。

「镶嵌」这术语表达的想法：经济不是如经济理论声言的自主，而是服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12] Polanyi 引用这术语，其意义是大于现在熟悉的意义：即是市场交易取决于信任，相互理解和依法执行合约。他利用这概念以突出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 Malthus 和 Ricardo，与以往的思想家激烈决裂。历史的正常模式是经济服从社会，但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要求社会服从市场逻辑。

> 「最终，这也是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有极其重要后果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运作是附属于市场。社会关系镶嵌在经济体系之内，不是经济被镶嵌在社会关系。」“（61 页）

然而，这段落和类似的段落令人误解 Polanyi 的观点。人人往往以为 Polanyi 的说法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经济成功从社会脱嵌[13]，反过来主宰社会。

然而，这误读掩盖了 Polariyi 论点的独创性和丰富。Polanyi 确有说法：传统经济学家希望建立经济已实际脱嵌的社会，鼓励政治家追求这目标。然而，Polanyi 也坚持政治家没有而且无法实现这目标。事实上，他多次说明完全自发调节又已脱嵌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目标是理想国的任务，不可能存在。他在《巨变》开笔写道：

[10] 原注(ix)：Polanyi 与马克斯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是多本专著的主题。
[11] embeddedness
[12] 原注(x)：当代学者每多引用和阐释 Polanyi 的「镶嵌」概念。不清楚他为何选用这术语，似乎借用采煤的比喻。他研究英国经济史，广泛阅读英国煤矿史；采煤是开采镶嵌在矿井四壁的煤块。
[13] disembedded

「我们的观点：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意味着鲜明的理想国想法。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存在而不会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只会摧毁人类和把周围环境变成荒野。」（22 页）

为何「脱嵌」不能成功

Polanyi 认为建立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人类和自然环境要变成纯粹商品，这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自然环境。在他看来，自发调节市场的理论家和盟友都在不断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缘。但随着市场不受控制的后果显现，人们抵制和拒绝像旅鼠那样走向毁灭自身的悬崖。相反，他们脱离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以挽救社会和自然环境免受破坏。在这意义上说，市场脱嵌是类似拉开巨大的橡皮圈。

争取市场有更大自主权，增加了紧张程度。再进一步拉开橡皮圈，后果或是橡皮圈断开（代表社会解体），或是经济恢复到更为镶嵌的位置。

这论点背后的逻辑在于 Polanyi 对真实和**虚拟商品**[14]的区别。Polanyi 认为商品的定义是在市场出售的产品。依据这定义，土地、劳动力和金钱都是虚拟商品，因为最初不是为了在市场出售而生产。劳动力只是人类的活动；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环境；而现代社会的金钱和信贷供应必然是由政府政策塑造。现代经济学一开始就假设这些虚拟商品的行为是和真正的商品一样，但 Polanyi 坚持这花招有致命后果，意味着经济理论是基于谎言，而这谎言使人类社会陷入风险。

Polanyi 的说法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错误把自然环境和人类当作是价格将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对象，这是完全错误的道德论点，违反了管治社会数百年的原则：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几乎一直被认为是有神圣的维度，不可能与劳动力和自然环境服从市场的概念调和。Polanyi 反对把自然环境视为商品，预示了许多当代环保份子的论据。

Polanyi 论据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15] 虽然经济应该是自发调节，但国家必须发挥持续作用，调节货币和信贷供应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国家要管理工人不断改变的要求：在失业时提供救济，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劳工以及影响人口流动。在土地方面，各国政府要维持粮食生产的连续性，就要利用多种措施以保护免受收成和价格波动的压力。在城市地区，政府管理现有土地，是利用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简而言之，管理虚拟商品的角

[14] fictitious commodities

[15] 原注(xiii)：Polanyi 的观点隐含着对市场作为自发调节机制的更具体批评。制造的商品如因产量多而价格下降，可以鼓励增加消费和抑制新生产以恢复平衡。价格机制对虚拟商品的有效影响会降低，因为不能假设会自动增加或减少供应。

色把政府放置在三个最重要的市场，市场自由主义终而完全不可能维持原来的观点，即国家是在经济体系之「外」。[16]

「虚拟商品」说明经济体系不可能脱嵌。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积极管理市场，这需要政治决策，不能降低为某种技术或行政职务。[17] 当国家政策朝向脱嵌的方向，更大程度依赖市场自发调节，老百姓被迫承担较高成本。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更容易失业，农民面临来自进口的更大竞争；两个群体的救济福利减少，要捱日子了。政府要花更大力气以确保这些群体能够承受成本的增加，不致参加破坏性的政治行动。这是 Polanyi 声言：「自由放任是规划的…」的部份意思；要有治国之道和镇压力量把市场逻辑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加诸老百姓。[18]

缘木求鱼的后果

利伯维尔场理论家寻求在社会思想中脱嵌经济，最终失败。但市场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是非凡智慧应变能力的源泉。「现代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没有保护，市场会摧毁亲儿：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168 页）

由于社会不约而同从全面实验市场自发调节退缩，理论家总可以不把任何失败归咎于设计，而是实施时没有政治意愿。因此历史经验不能抹黑市场自律的信条，倡导者为失败找到滴水不漏的借口。这最近发生在前苏联，试图以「休克疗法[19]」强行推动市场资本主义。最后的失败众人皆见。但「休克疗法」的捍卫者依然归咎政治家太快屈服于政治压力；如坚持到底，是可以落实向市场迅速转向的好处。

Polanyi 怀疑经济能否脱嵌，也是他的「**双向动力**[20]」有力论据的源头。由于社会要脱嵌经济不可避免会遇到阻力，Polanyi 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对立动力组成：自由放任动力以扩大市场范围以及抗拒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动力。虽然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Polariyi 明确指出所有社会群体都参与其事。例如，当周期性经济衰退破坏银行系统，企业集团坚持加强中央银行以保护国内信贷供应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简而言之，甚至资本家也时不时抗拒市场自发调节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参与各种形式的保护措施以增加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

[16] 原注(xiv)：对于许多其他商品，政府参与也是市场竞争的先决条件。

[17] 原注[xv]：货币主义曾多次试图建立固定规则管理货币供应增长以消除央行行长的酌情权，但全归于失败。没有这样的公式，退而思其次是赋予央行行长半宗教和神谕式权威以掩盖其政治作用。

[18] 原注[xvi]：这是 Polanyi 解释英格兰〈新济贫法〉的核心论点；建立劳动力市场，国家要大幅度提高镇压的力量。他的解释得到后来学者的支持，但他对史宾汉兰制度的多个观点受到质疑。

[19] shock therapy

[20] double movement

Polanyi 坚持「自由放任是被规划；规划没有被规划。」他明确攻击市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指责「集体主义阴谋」针对全球市场架设防护屏障。Polanyi 持反调，认为架设屏障是社会所有组群面对自发调节市场体系难以承受的压力时的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只有保护性反向运动才可以防止经济脱嵌的灾难。
Polanyi 认为，放任经济的走向要有反向动力才可以保持稳定。例如，在 1920 年代（或 1990 年代），自由放任运动在美国横行无阻，势不可挡，过度投机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破坏了持续繁荣的基础。Polanyi 同情一般的保护性反向动力，但也承认有时会导致危险的政治经济僵局。他分析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承认双向动力任一都不能解决危机，紧张增加，直至法西斯主义势力日增，夺取政权，击败了放任政策和民主。

Polanyi 的双向动力论点，与市场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可能范围形成强烈对比。市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有两个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虽然各自有南辕北辙的喜好，但都同意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

相反，Polanyi 坚持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选择，只是理想国的愿景。此外，他定义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社会的内在倾向，自觉服从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193 页）这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发挥作用。Polanyi 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不同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嵌入。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形式更有效扩大产出并促进创新；有些会更为「社会主义」，市场要服从民主方向；Polanyi 暗喻十九和二十世纪都有既高效又民主的替代方案。[21]

全球体制的核心

然而，Polanyi 是成熟的思想家，不会天真的以为各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调和双向动力的特殊方法。相反，Polanyi 的观点与我们目前的情况相关，正是因为他把管理全球经济的规则作为他的框架核心。他对法西斯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论点，核心是国际金本位制限制了各国的政治选择。要理解 Polanyi 这部份说法，先要简短介绍金本位制的逻辑；这不是题外话，因为国际资本自由和自主流动的逻辑继续对当代市场自由主义发挥强大影响力。Polanyi 认为金本位制是非凡的智力成果；这是创新的体制，把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旦落实有能力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看来是自然出现。

市场自由主义想创造一个世界，争取最大机会扩大国际市场的范围，但先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有不同货币的各国人民可以自由与对方交易。他们想到：如各国符合

[21] 原注(xx)：Polanyi 直接启发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学术思潮，分析「资本主义的品种」，发现各国的市场镶嵌情况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三个简单规则，全球经济将有完善的全球自律机制。首先，每个国家将其货币价值订定在固定的黄金数量，并承诺依照这价格买卖黄金。第二，各国的国内货币供应量都依据持有的黄金储备数量，流通货币有黄金支持。第三，每个国家致力使人民有最大自由参与国际经济交易。

金本位制落实了全球自律的梦幻般机制。英格兰企业可以出口商品和在世界各地投资，有信心他们赚取的货币「等同黄金」。从理论上说，如某国某年处于逆差，因为国民在国外花的比赚的多，黄金流出该国储备支付欠下外国人的债务。[22] 国内货币和信贷供应自动收缩，利率上升，价格和工资下降，进口需求下降，出口竞争力增强。因此，该国的赤字自动偿还。没有政府重手干预，各国的国际账户将达致均衡。

无需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或全球性金融机构，全球将统一成为单一市场；各民族国家各自享有主权，为了自身利益而导致他们自愿遵守金本位制规则。

金本位制的后果

金本位制目的是要减少国家单位和国家政府的作用，建立一体化全球市场，但后果是完全相反。[23]

Polanyi 指出，金本位制在 1870 年代被广泛采用，讽刺的效果是反而强化了国家作为统一实体的重要性。虽然市场自由派梦寐以求的和平世界的唯一国际斗争只是个人和企业超越对手的竞争，他们努力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梦想反而产生了两起恐怖的世界大战。

现实情况是简单的金本位制规则为人们带来无法承受的经济成本。当国内的内部价格结构偏离国际价格水平，国家面对黄金储备流失的唯一合法手段是通缩，意味着经济会持续收缩，工资下降导致消费减少，直至恢复外部平衡。

这意味工资和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企业和银行倒闭急剧增加。不仅只是工人和农民发现这类型调整的成本极高，商界本身也不能忍受伴随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此，金本位制一到位，整个社会开始串通试图抵消其影响。第一招是各国更多利用农业和制成品的保护关税。 贸易流量对价格变动较不敏感，各国一定程度上能较准确预测国际交易，较少受突然和意外的黄金流出影响。

[22] 原注[xxii]：黄金流出的机制同样巧妙，无需政府采取行动。由于逆差国人民在国外花的比赚的多，他们的货币有更大供应，其价值相对于其他货币将下降。当币值低于一定水平（称为黄金点 gold point），国际银行家就有利可图：把货币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在另国以较高价格出售。黄金就是这样从逆差国流向顺差国。

[23] 原注(xxiii)：Polanyi 知道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与理论有很大差异。

进一步权宜之计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匆匆建立正式的殖民地，自由贸易的逻辑一直强烈反对殖民，因为如所有生意人都有相同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帝国的成本不能抵消相应的好处。但随着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兴起，这笔计算要倒过来。新征服的殖民地会受到帝国势力的关税保护，殖民国商人有特权取得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这时期的「帝国互争」加剧了英格兰和德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竞争，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24]

对 Polanyi 而言，各国的遗传密码没有帝国主义的冲动，而是随着各国在金本位制的无情压力下为了保护自身而萌生。资源从利润丰厚的殖民地流入，可能挽救国家免陷于黄金突然流出造成痛苦的危机，剥削殖民地的海外人群可能有助保持国内阶级关系不致变得更具爆发力。

Polanyi 认为市场自由派的理想主义导致他们发明金本位机制以带来日益繁荣的无国界世界。金本位制的无情冲击反而迫使各国巩固自身的国家，然后是帝国的边界。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发挥纪律的压力，但其有效运作受阻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例如关税壁垒和帝国崛起。但即使这全面矛盾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轰然倒塌，人们是如此接受金本位制致使政治家要努力恢复。惨剧再次在 1920 和 1930 年代发生，国家被迫选择保护汇率或保护本国人民。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僵局出现。Polanyi 的看法是法西斯的冲动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市场影响而牺牲个人自由；这种冲动是普世的，但当地的突发情况决定法西斯能否成功夺取政权。

与当代局势相关

Polanyi 的观点对当代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十分重要，因为的新自由主义拥抱着启发金本位制的相同理想。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被告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国界已经过时，全球和平新时代已奠定基础。一旦各国理解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开放经济，商品和资本得以自由流动，良性竞争将取代国际冲突，产生更多更精彩的货物和服务。一如他们的前辈，新自由主义者坚持所有国家只需要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有效性。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差异。汇率和各国货币不再固定于黄金价格，大多数货币的价值在外汇市场波动。强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全球系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重要差异的背后有基本的共同信念：如个人和企业有最大自由追求本身的经济利益，全球市

[24] 原注[xxv]：Polanyi 的说法完全不同列宁的论断；后者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金融资本增长的产物。Polanyi 不厌其烦指出金融资本家可以是防止战争的主要力量。

场会让人人得益。正是这基本信念在背后支持新自由主义者有系统拆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减少政府在组织经济生活的「干扰」。

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化捍卫者写道：

 [25]  [26]  [27]

>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当国家承认…利伯维尔场的规则并决定遵从，穿上我称之为「黄金紧身衣」。「黄金紧身衣」是这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政治—经济服装。冷战时代有毛装（中山装），尼赫鲁夹克，俄罗斯毛皮。全球化只有黄金紧身衣。如　贵国还没有量裁定做，很快就轮到了。』[28]

作者接着解释黄金紧身衣要求国家收缩，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他还乐呵呵描述外汇和金融市场的国际贸易商这群「电子游牧族」如何执行这紧身衣的制约。Polanyi 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教导我们，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层次市场自发调节的观念是危险的幻想。正如各国经济体系依赖政府的积极作用，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包括最后贷款人。没有这些机构，一些经济体系，或许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会受到沉重经济危机影响。但 Polanyi 教诲更根本的一点，是市场自由主义加诸老百姓的负担是根本不可持续。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绝不会容忍经济组织模式令他们日常经济情况受到周期性剧烈波动，不论时间长短。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无国界又和平的理想国要求全球数十亿老百姓有无限耐性，也许每五或十年有一段长时间他们的收入只及之前的一半或更少。Polanyi 认为，指望老百姓要这样忍耐是道德错误和极不现实。对他来说，老百姓无可避免会动员保护本身免受这些经济冲击影响。

此外，最近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目睹了世界各地人民广泛抗议，试图抵制全球化的经济混乱。[29] 随着人们日益不满，更难维持社会治安，增加了政治领

[25] http://kolahun.typepad.com/.a/6a00e009968c0a8833013481780c2c970c-320wi
[26] http://luxurionworld.com/image/data/prod/Sahiba/AW-102-11.JPG
[27] http://www.photo-dictionary.com/photofiles/list/10950/14932Russian_fur_hat.jpg
[28] 原注[xxvi] :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1999), p. 96. 中译《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车与橄榄树》蔡继光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原注[xxvii]: 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导为疏导不满情绪而指责内部或外部敌人作为代罪羔羊的危险。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愿景就是这样导致不和平，加剧冲突。

例如，在非洲许多地方，结构性调整政策[30]的破坏已导致社会解体、饥荒和内战。在冷战时期之后，其他地方出现了激进民族主义政权，对邻国和国内少数民族有不轨意图。在全球每一角落，激进运动往往结合宗教原教旨主义，准备利用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如 Polanyi 是正确的，这些紊乱迹象预示着未来更危险的情况。

民主是替代品

虽然 Polanyi 是在二战期间撰写《巨变》，他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打破国际冲突的循环。关键的一步是推翻社会生活要服从市场机制的信念。

一旦不再受这「过时的市场心态」[31]束缚，就可以走向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服务民主政治的坦途。Polanyi 认为罗斯福的「新政」是这些未来可能性的模型。罗斯福的改革意味着美国经济将继续围绕市场和市场活动组织，但有一套新监管机制作为人和大自然与市场力量的压力之间的缓冲。[32]

通过民主政治，人民决定老有所养，应受到社会保障的保护。同样，民主政治通过〈国家劳动关系法[33]〉扩大了劳动人民组织有效工会的权利。Polanyi 认为这些措施是第一步，让社会可以决定通过民主手段来保护个人和自然环境免受一些经济危险的威胁。

在全球层面，Polanyi 期望国际经济秩序有高层次的国际贸易和合作。他没有一套蓝图，但写下清楚原则：

> 「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自动机制消失，各国政府可以放下绝对国家主权最具阻碍作用的特点，即是拒绝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而同时较为容忍其他国家依照各自意愿来设计其国内机制，从而超越了十九世纪要求在世界经济轨道内的各国政权必要一致的有害教义。」（206 页）

[30] 1970 年代以来，西方银行向第三世界借出大批贷款。第三世界债务从 1980 年的 5,670 亿美元急增至 1992 年 14,190 亿。这期间的利息偿还达 7,710 亿，本金偿还有 8,910 亿。在支付大笔利息后依然债台高筑，是因为第三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要求下借新债还旧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 1982 年的 51%急增至 1992 年的 100%。第三世界向 IMF 借钱，就要满足 IMF 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有三大手段：实现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和削减预算赤字与经常帐户逆差。

[31] 原注[xxix]：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是 Polanyi 在 1947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的题目。

[32] 原注[xxx]：「新政」没有怎样保护环境，但环保份子参照「新政」的监管模式取得政治权力和赢得改革，成立环保署这些机构。

[33]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换句话说，各国政府协调一套方便高层次国际贸易的协议，但各社会有多种手段缓冲全球经济体系的压力。再者，没有追求单一经济模式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改善人民的福祉。这愿景也假设有一套全球监管结构以限制市场力量。

Polanyi 的愿景取决于扩大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作用，他挑战现在流行的看法认为更多政府参与会无可避免导致糟糕的经济业绩和国家过度控制社会生活。Polanyi 认为管理虚拟商品要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真对待市场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在定义上是没有效率的说法，他也明确驳斥扩大政府必然采取压迫形式的说法。相反，他认为：

> 「市场经济逝去，可能是史无前例自由时代的开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范围更广阔和更普遍；监管和控制不应只赋予少数人享有自由，应该是人人自由。」（207 页）

但他概述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公义，他还呼吁要扩大公民自由，强调：

> 「在已建立的社会，不墨守成规的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受到保护。个人必须自由凭良心做事，无惧正好在社会生活一些领域中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务的权势。」（207 页）

他在《巨变》的结语是：

> 「只要人类确实致力为所有人创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权力或规划会对他不利和破坏他以这两者为手段建立的自由。这就是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给予我们所需的全部确定性。」[34]（210 页）

当然，Polanyi 对二战后时代的乐观看法是事与愿违。冷战到来，意味着「新政」是美国改革的结束，不是开始。有计划的全球经济合作让位于相对迅速拓展市场的全球作用的新措施。

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 1940 年代至 1990 年代取得颇大成就，这些具体证据表明 Polanyi 的愿景是既强大又现实。但较大规模的国家依然忽视 Polanyi 的愿景，Hayek 等人鼓吹的市场自由主义持续取得上风，在 1990 年代占据领导地位。

[34]原注[xxxii]：Polariyi 相信复杂社会要求国家垄断暴力。「权力和强迫是那现实的部份；禁止社会有权力和强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209 页）。

冷战至今已经过去，Polanyi 最初的乐观态度可能最终得到平反。市场自由主义产生不可持续的经济危机和专制又具侵略性的政权，这些熟悉的场景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全球人民协力把经济服从民主政治，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重建全球经济。事实上，1990 年代最后几年有明显迹象，以这样的跨国社会运动重塑全球经济已经不只是纸上谈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活跃份子激烈抗议执行新自由主义规则的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世界各地团体已开始激烈的全球对话以重建全球金融秩序。这种新兴运动面临巨大的障碍，要建立持久的联盟以协调往往有相互冲突利益的全球南北人民是艰巨的任务。

再者，这种运动越是成功，面临的策略挑战越是强大。能否从下而上改革全球秩序而又不致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和投资者恐慌，事态仍然是极度不确定，其重大意义在于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在史上第一次成为跨国社会运动活动的中心目标。

这种跨国运动引证着 Polanyi 愿景的持续活力和实用性。对 Polanyi 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是迫使人类目的服务非人性的市场机制的逻辑。相反，他认为人应该利用民主管治的工具控制和指导经济，以满足我们的个人和集体需求。Polanyi 指出上世纪人类蒙受巨大痛苦，正是因为未能接受这挑战。他对新世纪的预言再清楚不过。



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35]

谨以拙作献给内子 Ilona Duczynska

[35]原文：*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Beacon Press, Ninth printing, June 1968*

〈序〉R. M. Maciver

这本杰作使该领域的大多数其他著作显得过时或陈腐。很少见到有一些事件是一个时代的征兆。但在这关键时刻出现了对人类事务的形式和意义有了新的理解。Polanyi 没有自称在写历史 - 他是重写。他不是带来烛光照亮阴暗的角落，也不是振振有词公开他的私人信仰经文；他以洞察力和知识重新照亮了整个时代无可比拟改变的革命过程。

Polanyi 的直接目标是以非凡洞察力揭露深远影响社会的特定经济制度，即是在十九世纪已充分发挥的市场经济。是时候以回顾性智慧来评估这一切，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等到瓜熟蒂落，才可以学会任何事物的本质。有新的视角看待事件和过程，理论和行动。肤浅历史作家笔下的偶发事件有了更深的意义，似乎只是奇怪的琐事有了更公正的评估。市场经济的冲击把人贬低为劳工，自然环境沦为农地；这促使现代历史极富戏剧性：被锁住的社会终于挣脱枷锁。

其他著作之前有提出但没有开发这新方向，这方向对人和概念赋予新的比例。举例来说，1838-48 年英国的宪章运动[36]和 Robert Owen 的先知精神，或是稍后的史宾汉兰[37]制度的建议，Polanyi 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入剖析！养尊处优的司法界和乡绅以及当代最开明之士对他们不认识的〔社会〕力量贴上一些原则。我们有了新的认识，见证了经济无情增长时意识形态之争：一些盲目反对，一些寻求抑制其对社会结构的无情推力，一些是一心一意或头脑简单地欢呼经济的每一进步。我们目睹旧社会权势之士力挽狂澜，被传统束缚的耶教拥护者显得无能和尴尬，正统经济学家沾沾自喜简要地解释这一切。但前进的力量把这一切摧毁，仓促兴建的防御崩溃瓦解。我们看到新的解放赶走了新的奴役，同时我们面临这时代的挑战。

Polanyi 远离马克思的教条和对这反应的辩论。他关注现代文明的经济过程，但没有提出经济决定论的任何说法。他精辟分析特定的历史转型：一个经济体系被另一体系替代，并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因为经济关系始终是原始的，不是因为在这情况下，也仅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的「理想体系」要求无情唾弃人类的社会地位。他巧妙地分析殖民地和工业入侵原始人社会的景况，以显示这「理想」的意思以及为英国进口了什么。「血汗工厂」只顾及人类的一项需求而不顾其他，无情地粉碎社会本身。因此人们要发现社会。对 Polanyi 而言，最后的字词就是「社会」。伴随工业革命的大悲剧，不是源于逐利资本家的无情和贪婪（尽管不乏不人道记录），而是市场经济这不受控制的体系破坏了社会。

[36] Chartist Movement
[37] Speenhamland

人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凝聚力的意思。人们的心灵殿堂被掠夺和侵犯。人们不理解革命性变化的社会控制带来的巨大问题；乐观的理念含糊其辞，短视的慈善事业与权力利益合谋掩盖问题；认清问题的智慧还没有浮现。

Polanyi 在提出这论点时，没有以渴望眼神审视一些快乐的往事，也不是为反应的成因辩解。不能走回头路，即使寻找解决办法也不可能必然找得到。为了自身的情况和需要，我们这时代要重新确认人类生命的核心价值。传统已然失败，若然相信传统，传统会背叛我们。我们决不能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则，但必须重新建立。我们不能恢复过去的社会，即使历史阴霾隐藏其罪恶，我们必须为自己重建社会，从过去中学习我们能够学习的教训和警告。也许我们也应牢记人类事务的因果关系是如此深深纠结，即使最聪明的头脑也不能完全揭开。总要有一刻我们必须以行动为我们的价值观作证，让目前世界的迫切力量能够释放，迈向新的目标。

这本书是如此刺激和发人深省，有些论点势必激发争议和质疑。有些人可能怀疑市场经济的作用是否那么绝对，体系本身的逻辑是否严谨和令人信服。他们可能质疑作者的说法：「国家和人民仅仅是表演的木偶，不能自控。」有些人可能会希望对自发调节市场不同形式的「保护」有不同的评价，对促进关税和社会立法者连手可能感到有点不安等等。但他们必须肯定清楚认识整体论点的说服力。在地震后，在我们珍视的神庙被破坏后，我们站在新的制高点向下看，看到基础暴露的弱点；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以及在哪里重建体制结构，以更好抵御变化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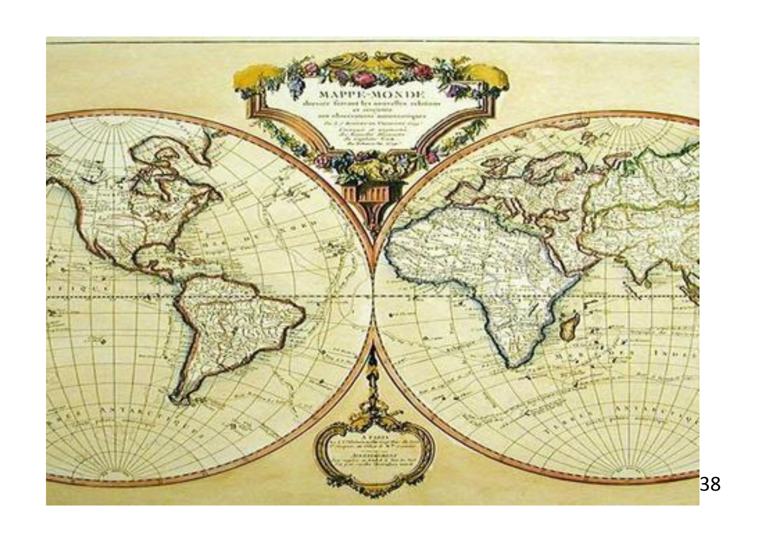
今天，最重要的是这对在未来制定国际组织的教训。其一是这表明「通过世界贸易达致世界和平」这样的自由公式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公式，我们受害于简化了危险和欺骗。国家或国际体系不可以依靠自动调节。平衡预算，自由企业，世界贸易，国际交流和维持货币面值，都不能保证国际秩序。只有社会可以保证；也必须发现国际社会，也必须维持体制结构和控制经济的计划事项。

所以这本书信息的对象不仅是经济学家（尽管有强力的信息），不仅是史学家（虽然打开了新路径），不仅是社会学家（但有传达对社会的深层意思），不仅是政治学家（但有助重申老问题和评价老教条）；任何有头脑的人想超越本人对社会教育的认识，任何人想了解生活其中的社会，以往和现在的危机，这本书是木铎金声，从中读者可瞥见更深层次的信念，学习超越一般现有的不足替代品：迄今未能向前进一步的自由主义，全有或全无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纯粹否定；因为这些主义往往希望组成一些经济体制；只有当我们发现社会的首要重要性是作为人类相互依存的连贯效用，我们可以希望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和矛盾。



第一部

国际体系



[38]

第一章
百年和平

十九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本书关注的是这事件的政治和经济源起以及迎来的伟大变革。

十九世纪的文明取决于四个机制。首先是势力均衡体系，一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的任何长期和毁灭性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39]，标志着世界经济的独特组织。第三是自发调节的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第四是自由国家。视乎分类方式，这些机制可以划分为经济两项，政治两项；以另一种方式分类，可划分为国家两项，国际两项。这些机制的特性决定了我们文明史的轮廓。



这四项机制之中，金本位制至为关键，这项机制的衰败是惨剧的直接原因。金本位制衰败之时，已牺牲了试图挽救金本位制但徒劳无功的其他机制。

但这体系的源头和矩阵是自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种创新导致了一种特定的文

[38] http://modelunsummer.wikispaces.com/file/view/international-relations9.jpg/239504387/471x338/international-relations9.jpg

[39] gold standard

明。金本位制只是试图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至国际领域；〔国际〕势力均衡是部份建基于金本位制的超级体系；自由国家是建立于自发调节的市场。十九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

我们的观点：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意味着鲜明的理想国想法。这样的机制不可能存在而不会消灭人类和社会的自然物质，只会摧毁人类和把周围环境变成荒野。社会无可避免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但任何措施会防碍自发调节的市场，打乱了工业生活的组织，因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及社会。正是这种困境驱动了市场体系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明确的状态，最终扰乱了建基于市场体系的社会组织。

要理解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危机，这样的解释似乎太简单。试图把文明及其内涵和精神气质归纳为一成不变的机制，简直是缘木求鱼；选择其中一个机制，然后以这机制的一些技术质量来争论文明不可避免会自我毁灭，也只会徒劳无功。文明就像生活本身，是萌生于大量独立因素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一般不能还原为受限的机制。要追踪文明衰败的体制，可能似乎是徒劳无功。

但这正是本书要开展的工作。为此，本书刻意致力调整目标以切合极端独特的主题。十九世纪的文明独一无二，正是因为这集中在一个明确组织机制。

没有任何解释可以完满解释大灾难突然而来。似乎变革的力量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突发事件如洪流倾泻而下冲击人类。在超大范围的社会转型之上还有前所未见的战争类型，摧毁了多个国家，新帝国的轮廓浮现在一片血海。但这魔鬼般的暴力其实只是迭建在迅速而沉默的变化潜流，这潜流吞噬了过去，而往往不带一丝涟漪！对大灾难的合理分析必须考虑汹涌的行动和静默的分解。

本书不是历史著作，不是为突出事件寻找令人信服的时序，而是以人类机制来解释事件的趋势。本书自由选用过去的场景，唯一目的是要解释眼前事件；本书详细分析关键时期，几乎完全忽略了之间的时段；本书涉及多个领域以追求这单一目标。

本书首先讨论国际体系的崩溃，试图说明一旦建基于国际势力均衡体系的全球经济崩溃，国际势力均衡体系不能确保和平。这解释了这体系的突然中断以及不可思议的迅速分解。

但如世界经济崩溃是依随着文明衰败，肯定前者不是由后者引发。世界经济崩溃的源头可追溯百年前社会和科技的巨变，因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在西欧崛起。这段冒险旅程来到我们这年代走到终点，结束了工业文明历史的独特阶段。

本书最后部份讨论支配我们这年代的社会和国家变化的机制。从广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类目前的状况应以这危机的机制源头来定义。

十九世纪的现象是西方文明史上前所未闻：从 1815 至 1914 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或多或少殖民性质的克里米亚战争；在这期间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罗斯总共只有十八个月曾彼此开战。在这之前的两个世纪，相比数字是每百年平均有六十至七十多年是战火弥漫。十九世纪最激烈的战争是 1870-71 年的普法战争，不到一年就结束，战败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而没有影响本国的货币金融。

这种务实的和平主义占上风，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导致严重冲突的成因。强国和伟大帝国之间的内外状况几乎时刻有变，伴随着这和平的盛会。在这世纪上半叶，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干预措施无日无之。在西班牙，Duc d'Angouleme 挥军进攻 Cadiz；在匈牙利，革命军几乎打败了国皇亲临指挥的军队，最终被俄罗斯援军击败。德系国家，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都有武装干预，标志着神圣同盟[40]无处不在。世纪下半叶释放了进步的动力；鄂图曼帝国，埃及帝国和中东酋长帝国相继解体，中国被外国军队入侵，被迫对外开放，非洲大陆被列强瓜分。同时，美国和俄罗斯乘时崛起，成为世上两个大国。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民族团结；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成为欧洲地图的主权国家。工业文明迈进，公然入侵陈腐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俄罗斯军事征服中亚，英国赢得印度和非洲战争，法国侵占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暹罗，引起列强之间的冲突，一般只能以武力解决。然而，这些冲突都是局部性，而无数剧烈变化的情况都被联合军事行动或列强平靖而妥协。不管是什么方法，结果都是相同。在这世纪上半叶，神圣同盟以自由之名压制自由，禁止宪政主义；到了下半世纪，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家又是以和平之名把宪制强加于动荡的独裁政制。因此，在不同形式和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之下（有时以进步和自由为名，有时由于皇位和祭坛的权威，有时受惠于股市和支票簿，有时因为腐败和贿赂，有时因为道德和开明的呼吁，有时被刺刀所迫），但殊途同归：和平得以维持。

这几乎是奇迹的事态是势力均衡无意中产生的不寻常结果。就本质而言，均衡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是各势力单位的存活；事实上，这只是假设三个或更多有势力的单位总会与较弱势单位连手抗衡最强者增强势力。在世界历史的范畴，势力均衡关注的是国家得以保持独立。但是，为了达到这目的，各国持续开战，不断改变合作伙伴。古希腊或意大利北部城邦是这情况的实例；战斗团体不断转换成员，借着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这些城邦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行动维护了

[40] Holy Alliance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41](1648)划分的欧洲国家主权长达两百年。七十五年后，乌得勒支和约[42]的签约国正式宣告遵从这原则，从而以体制落实并建立相互保证，以战争保障强国弱国同时存在。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是同样的机制导致和平，不是战争；对史学家来说，这是富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提出这是因为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即是因而衍生的和平权益。传统上，这种权益被视为在国家体系范围之外。和平以及附属的工艺和艺术只是日常生活的装饰。教会可能为和平祈祷，一如为丰收祈祷，但国家行动领域是主张动武；政府把和平置于安全和主权之下，即是为求实现意图，不惜采取最终手段。若是社会有和平权益的组织存在，这是极为不妥当。十八世纪后期，鲁索[43]指责商人不爱国，怀疑他们喜欢和平不爱自由。

1815 年以后，这种变化是突然和整体。法国大革命增强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和平成为普遍关注的权益。德国政治家 Metternich 声称欧洲人想要的是和平，不是自由。德国人 Gentz 也指责爱国者是新蛮人。教会和皇室开始提出欧洲非国家化的论点，其论据得到支持，因为凶猛的战争新形式和新兴经济体系大大增强了和平的价值。

像往常一样，鼓吹新「和平权益」的人主要是权益的受惠者，即是世袭职位被席卷欧洲大陆革命浪潮的爱国主义威胁的君主和封建主义者。因此，在这数十年间，神圣同盟是积极和平政策的威慑力量和思想动力，同盟军队在欧洲四处镇压少数民族和抑制多数民族。1846 年至 1871 年是「欧洲历史上最混乱和拥挤的四份一世纪」[44]：和平的基础不稳，应对力量消减而工业主义的实力不断增长。在普法战争之后的四份之一世纪，和平权益复苏，其载体是新成立的强大欧洲协同体[45]机制。

但权益一如意图，除非通过一些社会媒介转化为政治手段，否则只会是理想的空谈。从表面上看，没有这种实现的载体；说到底，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只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而受到势力均衡及其战争机制的影响。那么如何维持和平？

诚然，任何势力均衡体系往往会防止因为某国未能预见其试图改变现状所引起势力调整带来的战争。著名的情况是德国首相卑斯麦在 1875 年因为俄罗斯和英国的干预（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当作是必然的）而取消对法国的新闻宣传；这一次，

[41] Treaty of Munster and Westphalia
[42] Treaty of Utrecht
[43] J. J. Rousseau
[44] 原注 1：Sontag, R. J.,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1933.
[45] Concert of Europe，中译有：欧洲协调

欧洲协同体针对德国，德国被孤立。在 1877-78 年，德国无法阻止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但借着英国嫉妒俄罗斯可能进占土耳其内海的达达内尔海峡[46]，成功把战事局限为地方战事；德国和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从而挽救了和平。1878 年的柏林会议推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资产的长期计划，尽管这随后改变了现状，但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各路人马实际上预先知道如开战会面对什么军力。在这情况下，和平是势力均衡体系受大众欢迎的副产品。

此外，如只涉及小国的命运，有时刻意消除战争成因是可以避免开战。小国受到劝阻，以避免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和可能引发战争。荷兰在 1831 年入侵比利时，最终导致该国宣告中立。挪威在 1855 年宣告中立。在 1867 年，荷兰向法国出售卢森堡，德国提出抗议，卢森堡宣告中立。在 1856 年，欧洲协同体宣称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对欧洲的均衡至关重要，并致力维持该帝国；1878 年之后反过来认为奥斯曼帝国解体是势力均衡之必需，该帝国的解体得以有序进行，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决定关乎几个小民族的生死存亡。丹麦在 1852 至 1863 年间，以及德国在 1851 至 1856 年间都威胁扰乱均衡体系，每次都是列强迫使小国屈从。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利用体系提供的自由行动的权力以实现共同权益；这共同权益正好是和平。

偶尔及时澄清势力情况或胁迫小国可以避免战争，但远远不足以维持百年和平。国际情况失去均衡，可能有无数理由：从皇室恋情到河口淤积，从神学争议到科技发明。仅仅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减势必导致政治势力失衡，外部情况势必影响内部。即使有组织的势力均衡体系能够确保和平，永无战争威胁，但先要能够直接处理内部因素，在萌芽阶段防止可能出现的失衡。一旦失衡有了势头，只有动武才可以解决。老生常谈的是：要确保和平，必先要消除战祸成因，但一般没有认识这先要在源头控制生活的流程。

为此，神圣同盟有特有工具。欧洲的皇室贵族组成了国际化的亲属关系，而罗马教会在南欧和中欧为他们提供自愿的民间体制，包含从最高到最低的的社会阶梯。血统和恩赐交织成有效的当地管治工具，只须辅之以武力，就可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但继承的欧洲协同体没有神圣同盟的封建和神职触须，至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与 Metternich 的紧凑杰作毫不连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召开列强会议；列强之间的嫉妒滋生了阴谋，反对意见和外交破坏；联合军事行动变得罕见。神圣同盟有完整统一的思想和目的，但依然依靠频繁的武装干预才可以维持欧洲和平；欧洲协同体较少使用武力，但可以维持世界范围的和平。要解释这惊人壮举，我们必须寻求一些在新环境中运作，又未被公开的强大社会媒介，这媒介发挥着

[46] the Dardanelles

昔日皇朝和主教的作用，让和平权益有效发挥。这个不为人知的因素是**国际金融集团**[47]。

迄今没有人全面研究十九世纪国际银行的性质；这个神秘体制萌生于政治-经济神话的明暗对比。[48] 有些人争辩它仅仅是政府的工具，有人反驳政府是这贪得无厌体系的工具，有人指责它是国际纷争的根源，有人认为它是柔弱世界主义的载体，削弱了刚强国家的实力。谁都不是大错特错。国际金融集团是自成一格的体系，特见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初三十年，其功能是联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工具；和平体系得助于列强，但列强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和平体系。欧洲协同体偶尔有所行动，而国际金融集团是极具弹性的常设机构。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任何政府，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但与各方有联系。国际金融集团独立于中央银行，即使是英伦银行（英国央行），但彼此紧密相连。金融和外交之间有亲密接触；任何一方考虑任何长远计划，无论是和平或好战，必要确定对方的好处。然而，成功维护总体和平的秘密无疑是因为国际金融的位置，组织和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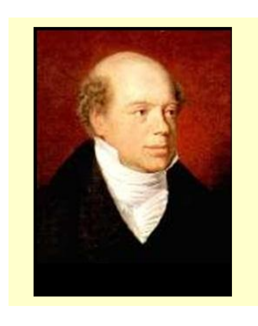
国际金融集团人才和动机赢得的地位是牢牢植根于严格商业利益的私营领域。罗富财家族(Rothschilds，插图为罗富财家族纹章[49])不是任何国家的子民；这家族体现了抽象的国际主义原则，只是对企业效忠；在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企业信贷已成为政治政府和工业界的唯一超国家联系。在最后的情况，企业的独立性是源于时代需求要有主权的代理人，以取得国家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正正是这重要需求，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落足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家王朝的抽象而不受管辖的特质。企业不是和平主义者；企业财富来自战争融资，不受道德考虑影响，不反对任何小规模，短期或局部战争。但如列强全面开战，影响到体系的货币基础，就可能损害业务。事实的逻辑是企业身处革命性变革中必要维持总体和平；世上人人都受这些革命变革影响。

---

[47] *haute finance*

[48] 原注 2：Feis, H.,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本书经常引用参考。

[49]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8/Rotschilds_arms.jpg/220px-Rotschilds_arms.jpg



我不在乎谁坐在英格兰的王位管治日不落帝国。

控制英国的货币供应，即是控制大英帝国。我控制着英国的货币供应。

Nathan Rothschild[50]

在组织方面，人类历史上一手造成最复杂制度之一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集团，虽然为时短暂，但它的丰富形式和工具是兼收并蓄，只有全人类对工商业的追求可堪媲美。除了国际金融集团中心，还有几个围绕着发钞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银行中心。此外，国际银行不仅限于对政府融资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冒险，其业务也包括外商对工业，公用事业和银行的投资，以及对外国公共及私营机构的长期贷款。各国的金融体系是缩影。单是英国已有几十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是各有专注；在这些国家，财政部门的操作及其与私人融资的关系互有不同，令人诧异，其细节也颇为微妙。货币市场处理众多商业票据，海外承兑汇票，纯粹的金融票据，以及活期借款和其他证券经纪业务。各国社群和个性千奇百怪，其威望和地位，权力和忠诚，资金资产和人脉，施惠和社交氛围各有独特类型，使这模式变得眼花缭乱。

国际金融集团不是设计为和平的工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意外之得，而社会学家称之为适逢其会。国际金融集团的动机是收益；要实现这目标，有必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政府目标是权力和征服。在这阶段可以忽视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忽视政府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实际上，在此期间的民族国家其特点使这样的区分没有实质意义，无论是什么目标，政府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和增加国家势力来达致。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集团的组织和员工已是国际化，但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作为银行家的活动中心，参与集团、财团、投资集团、国外贷款、财务控制或其他雄心勃勃的交易，国际金融集团必然要寻求国家银行、国家资本以及国家财政的合作。一般而言，虽然国家财政屈从政府的程度低于国内工业，但仍足以促使国际金融集团急于与政府保持联系。国际金融集团凭借它的位置和人员，以及其私人财富和背景，实际上是独立于任何政府，可以为新的权益服务，这权益没有本身的特定机构，也没有任何其他机构为之服务，但与社会至关重要；这权益就是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以任何独立，主权，既得荣誉或涉及列强未来愿望为代价的和平，但依然是和平，无须有以上牺牲就可以实现的和平。

不是为了和平而牺牲其他。势力优先于利润。然而无论这些领域是如何紧密相互渗透，最终是战争奠定了业务的法则。例如，自 1870 年以来，法国和德国势成

[50] http://www.sott.net/image/image/s5/103815/medium/NathanRothschild.jpg

水火，但这没有阻碍两国之间的交易。为了短暂目的，偶尔组成银行集团；德国银行私下投资国境以外的企业，不在资产负债表披露：参与短期贷款市场贴现的汇票和以法国银行商业文件为抵押发放短期贷款；直接投资铁和焦炭企业以及在法国诺曼底 Thyssen 的工厂；但这样的投资只限于法国的明确领域，而且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猛烈抨击；直接投资较多见于殖民地，例如德国致力取得阿尔及利亚的高质矿石，或参与投资摩洛哥。然而，1870 年以后，虽然巴黎证券交易所取消了禁止德国证券的官方默许政策，不争的严峻事实是法国依然「选择不要冒险让借贷资本的力量针对自己」[51]。奥地利也受到怀疑；在 1905-06 年间的摩洛哥危机，禁令扩大至匈牙利。巴黎金融界呼吁要接纳匈牙利证券，但业界支持政府，坚决不支持对可能的军事对手作出任何让步。政治外交对抗持续不减。政府否决可能增加假想敌潜力的任何举措。从表面上看，不止一次解决了冲突，但内幕人士知道这只是转移到和谐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

德国的东进野心是另一例。政治和金融混在一起，但政治是至高无上。德国和英国危险争吵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在 1914 年 6 月签署了巴格达铁路的全面协议；但很多人认为为时已晚，未能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他人则认为英德协议证明两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因为经济扩张的冲突。两种观点都没有事实的证明。该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主要问题。没有英国政府同意，德国铁路线仍然未能越过〔伊拉克南部〕Basra，而条约设定的经济区势必导致两国在未来的冲突。与此同时，列强继续为大日子做好准备，这日子比他们的预测来得更快。[52]

国际金融不得不面对大大小小的权力冲突野心和阴谋；业界的计划被外交手段挫败，长期投资受损，政治破坏和暗中的阻塞阻碍了它尽力建设。国际金融集团无奈与国家银行合作，否则寸步难行，但国家银行往往是各自政府的帮凶；如没有在事前与各参与者敲定分享战利品，什么计划都是徒然。然而，金融权势也不经常是受害者，而是受惠于融资的笑里藏刀金钱外交。商业上的成功涉及以武力无情对待弱小国家，大规模贿赂落后的管理部门，以及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都常见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森林。但出于功能性考虑，国际金融集团不得不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如战火漫天，绝大多数政府债券持有人以及其他投资者和交易商势必成为第一批输家，特别是如影响货币。国际金融集团对列强施加的影响始终有利于欧洲和平，而且影响是有效的，政府本身在多方面也依赖这样的合作。因此，欧洲协同体从来就是和平权益的代言人，再加上各国内部的投资习惯已经扎根于不断增长的和平权益，就可以理解即使在 1871 至 1914 年间，虽然多个国家几乎动武，但始终没有爆发熊熊大火的战争。

融资是国际金融集团发挥影响力渠道之一，有力影响一些较小的主权国家的议会

---

[51] 原注 3：Feis, H., *op. cit.*, p. 201.

[52] 原注 4：参见本章〈数据参考〉

和政策。贷款和贷款续期是基于信誉，而信誉是基于良好行为。因此，宪制政府的行为反映在财政预算，货币的外部价值不能偏离财政预算，债务国政府要小心留意汇率和避免影响稳健财政状况的政策；非宪制政府不受国际金融集团欢迎。一旦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这些有用的格言成为有说服力的行为规则；金本位制把允许的波动限制在最低波幅。金本位制和宪政主义是伦敦金融城向许多小国传授的工具，这些小国采用了国际新秩序这些守规符号。大英帝国耀武扬威，有时展示船坚炮利，但更经常在国际货币网络扯线。

通过暗地里管理世界各地半殖民地广大地区的财政，包括近东和北非火药库地区的衰败区域的伊斯兰教帝国，国际金融集团也得以确保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些地区，金融家的日常工作影响着内部秩序的微妙因素，为这些和平最为脆弱的动乱地区提供了实际的管理。这些地区面对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能够满足投资的无数先决条取得长期资本投资，正正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巴尔干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史诗式的耐力和惊心动魄，让人想起北美大陆类似的壮举。但是，困扰欧洲资本家的主要风险不是技术或财务失败，而是战争 - 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被孤立），也不是大国与小国之战（经常发生但颇为方便），而是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空洞的大陆，有千百万新旧民族的人民以此为家，每条新铁路要穿越不同可靠程度的边界，有些边界被新铁路严重削弱，有些因此而变得巩固。只有铁腕融资才可以控制落后地区的无能政府，避免灾难。土耳其在 1875 年拖欠债务，立即爆发军事大火，自 1876 年持续至 1878 年签署柏林条约，之后三十六年和平得以维持。这段惊人的和平时期始于 1881 年土耳其苏丹的「圣月宣言[53]」，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由债券外国持有人控制的「公共债务委员会[54]」。国际金融集团的代表被委任管理土耳其的大部份财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促成列强之间的妥协，在其他方面防止土耳其自找麻烦，在其他方面，他们只是列强的政治代理人；整体而言，他们服务债权人的利益，如可能的话，也是服务试图在土耳其谋利的资本家。这任务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债务委员会不是代表私人债权人的机构，而是欧洲公法的工具，但国际金融集团在这机制没有官方代表。但正是因为这两栖能力，国际金融集团能够跨越那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鸿沟。

贸易与和平已互有关联。在过去，贸易组织一直是军事性质和好战，是海盗、浪人、武装行旅、狩猎手、佩剑商人、武装镇民、冒险家和探险者、殖民者和征服者、狙击手和奴隶贩子，以及特许公司殖民地军队的附属品。现在这一切都抛诸脑后。贸易现在依赖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体系在全面战争中无法运行，要求和平，而列强致力维持和平。但正如前述，势力均衡体系本身无法确保和平。国际金融

---

[53] Decree of Muharrem，土耳其（奥图曼帝国）的债务由£191,000,000 减至 £106,000,000，但需以盐税，烟草税等等作为还债抵押。

[54] Dette Ottomane。

集团肩负这任务，而国际金融集团正正体现贸易依赖和平的新原则。

人们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完全不和平的过程，金融资本煽动了无数殖民地罪行和扩张主义入侵，与重工业有密切关联，使得列宁声称金融资本要为帝国主义负责，特别是争夺势力范围、特许权、治外法权和西方列强在落后地区取得控制地位的种种形式，以投资于铁路、公用事业、港口和重工业藉以获利的其它永久性设施。实际上，商业和金融是以往许多殖民地战争的起因，但也避免了大战。商业和金融与重工业相互联系，虽然实际上只是在德国有密切联系，但这种关系是这两项大事的根由。金融资本是重工业的顶层组织，又以多种形式与各工业部门联系，致使金融资本政策不为任何团体支配，以免战争促进了任何一项利益而损及其他利益。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国际资本必然是输家；不过，如战事局限于事发地方，即使国家资本也偶尔会从中获利；这足以解释几十起殖民地战争乎都是由融资者组织；但他们也安排和平。

这务实体系致力防止全面战争爆发，又借着此起彼落的小规模战争进行「和平」业务，而且改变了国际法，这正好展示其本质。尽管民族主义和工业显然会令战事变得更激烈和彻底，但已建立了有效措施以保障和平贸易得以在战事期间继续。据记载，〔普鲁士〕腓特烈大帝[55]「出于报复」于 1752 年拒绝偿还英国债主的贷款。美国政治科学教授 Amos S. Hershey 指出「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意图。…敌对行动爆发后没收交战区内敌国子民的私有财产，法国大革命战争是最后的重要例子。」[56]。克里米亚战争[57]爆发后，敌国商人被允许离港；在其后五十年，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国都遵守这措施。从这场战争开始，交战国一直颇为容忍民间自由地做生意。因此，在 1898 年西班牙—美国之战时，装载着美国货品（不是战争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港口。以为十八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十九世纪战争较少破坏是偏见观点。就敌国侨民地位、处置敌国人民的贷款和财产，以至敌国商人离港权利而言，十九世纪的措施显然有利保障战时的经济系统。到了二十世纪这趋势才逆转。

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组织形式是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阶段，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股危及和平的革命力量，可见诸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动荡；神圣同盟鉴于国家动荡这新因素，所以组织其反动性和平。在第二阶段，新经济取得胜利。中产阶级本身此时变成和平权益的支持者，而且比反动的前人更有势力，也得到新经济体系的国内和国际特点的培育。不过，和平权益在这两方面渐见成效，是因为能够把势力均衡体系为己所用，为体系提供社会工具直接处理活跃于和平领域的内部势力。在神圣同盟时期，这些工具是得到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持的封

[55] Frederick the Great
[56] 原注 5：Hershey, A. S.,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 1927, PP. 565-69.
[57] Crimean War

建制度和王权；欧洲协同体时期的工具是与之结盟的国际金融和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必要夸大两者的区别。在 1816-46 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已迫切要求和平与商业，神圣同盟也没有鄙视罗富财家族的帮助。也是在欧洲协同体时期，国际金融界往往不得不依靠与王朝和贵族的联系。但这些事实只强化本书的观点：在每一情况下，和平得以维持不是简单地通过列强的大臣，而是通过为服务整体利益的有组织具体机构。换句话说，只有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势力均衡体系才能避免全面冲突。不过，欧洲协同体的成就却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是在稳定不变的欧洲大陆有限地区维持和平，而前者是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时成功遍及全球。这伟大的政治功绩是因为国际金融集团这特殊实体出现，是国际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特定纽带。

至此，很明显和平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组织之上，但两种组织有非常不同的一致性。所谓世界性和平组织，只有在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因为欧洲协同体基本上不是和平体系，而仅仅是受战争机制保护的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世界经济组织则与此相反。除非轻率地把「组织」惯性局限为「中央发号施令，所属职能部门执行」，否则就必须承认这组织建基的普世接受原则是最确实，其实际成份是最具体。财政预算和军备，外贸和原材料供应，国家独立和主权，都只是货币和信贷的功能。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商品价格是数百万欧洲大陆农民生活最核心的现实；天下商人每天都注意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各国政府按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讨论未来计划。只有疯子才怀疑国际经济体系不是人类的物质存在之轴心。因为这体系的运行需要和平来维持，势力均衡体系是为其服务。拿走了这经济体系，和平权益就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没有足够原因这经济体系会存在，也没有可能保护这体系。欧洲协同体之成功源于经济体系新国际组织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其解体而终结。

1861-90 年是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主政的年代，也是欧洲协同体的黄金时期。在崛起成为强国之后的二十年，德国是和平权益的主要受益者，以奥地利和法国为代价，强势加入强国行列；出于本身利益，德国必须维持现状和防止战争，因为战争只可能是报复德国之战。卑斯麦刻意把和平的观念培育为列强的共同事业，并避免可能迫使德国放弃其和平强国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和海外的扩张野心；他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对付奥地利，甚至法国；他借助势力均衡策略挫败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巴尔干野心，因而与潜在的同盟国共同进退，并避开可能将德国卷入战争的情况。这位在 1863-70 年是诡计多端的侵略者，在 1878 年变身为诚实的代理人，反对殖民冒险活动。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他有意识地领导着他认为是那时代的和平趋势。

然而，到了 1870 年代末期，自由贸易时期(1846-79 年)结束；德国实际采用金本

位制，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扩张时代的开始。[58] 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坚强联盟，以加强本身的地位；不久之后，卑斯麦失去了德国议会政策的控制。自此之后，英国成为欧洲和平权益的领导者；欧洲依然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组合，因此受到势力均衡的制约。在 1890 年代，国际金融集团处于巅峰，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地牢固。英法两国在非洲有利益分歧；英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相互竞争；欧洲协同体勉力而为，但依然发挥作用；尽管有三国同盟[59]（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但依然有多个独立强国猜疑地相互监视。不久之后，在 1904 年，英国和法国就摩洛哥和埃及问题达成全面交易，几年后又与俄罗斯在波斯问题上妥协，形成一个对抗联盟。欧洲协同体是独立国家之间的松散联邦形式，最终被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取代；势力均衡作为体系已经寿终正寝。此时欧洲有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令势力均衡的机制停止运作，不再有第三个势力集团会与这两集团合纵连环，拉一个打一个以挫败其中一个集团独大。大约在同一时期，当时的世界经济渐见败象：征兆是殖民地竞争和争取异国市场渐趋激烈。国际金融集团避免战争蔓延的能力迅速减弱。和平苟延残喘又七年，但十九世纪经济组织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为百年和平划上句号。

历史学家的要务是要认识和平建基的高度人工化经济组织其真正本质。

第一章数据参考

1. **势力均衡政策**。势力均衡政策是英格兰的国家行为方式，完全是务实和实际，不应混淆「势力均衡原则」或「势力均衡体制」。这政策是英国岛国位于被各政治体系占领的欧洲大陆之外的后果。面对强大的大陆国家正在形成，历代英格兰政治家奉行势力均衡政策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机会。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早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约两世纪，而且政策的形成过程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原则。然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体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英格兰的国策，因为这最终使英格兰更容易与任何在欧洲大陆领头的强国结成联盟。因此，英国政治家往往有这种想法：即英格兰的势力均衡政策实际上表达了势力均衡原则，以及英格兰奉行这政策时只是在以那原则为基础的体制中发挥本身的作用。然而，英国政治家并非有意遮掩本身的自卫政策是有别于有助推动政策的原则。Edward Grey 爵士在《*Twenty-five Years*》表述：「理论上，当欧洲强大集团的优势似乎有利稳定与和平，英国并无异议。支持这样的组合一般总是英国的首选。只有当占优势的势力变得有侵略性以及英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威胁时，即使不是出于谨慎政策也会是出于自卫本能而趋向可被清楚描述为势力均衡的任何行动。」

因此，正是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考虑，英格兰才支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体制发展和支持其原则。英格兰这么做是其政策的一部份。以下的引文说明结合「势力均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含

[58] 原注 6：Eulenburg, F., *Aussenhandel and Aussenhandelspolitik.*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VIII, 1929, p. 209.
[59] Triple Alliance

义所引发的观念混乱。1787 年，Charles James Fox 愤愤不平质问政府：「英国是否不再支持欧洲的势力均衡，是否不再被人尊重为自由的保护者？」他声言英国应被接受为欧洲势力均衡体制的担保人。四年之后，Burke 把体制描述为据言已生效两世纪的「欧洲公法」。这样在言辞上把英格兰国策和欧洲体制视为一致，很自然让美国人更难区分这两个同样令美国人反感的概念。

2. **「势力均衡」作为历史规律**。势力均衡的另一层含义是直接以势力单位的本质为基础。在近代思潮中，Hume（休谟）首先提及。在工业革命后，政治思潮几乎整体暗淡无光，他的成果不再为人所知。Hume 理解到这现象的政治本质，并强调其独立于心理和道德事实。不管动机，只要参与者的行为体现势力的作用，这现象就会发生。他写道：经验证明「不管〔动机是出于〕嫉妒的竞争或谨慎的政治，效果是一样。」F. Schuman 说：「如假定多国体制由 A、B、C 三国组成，很明显任何一国势力上升会引起另外两国势力下降。」他推论势力均衡「其基本形式旨在维持多国体制是独立于各国。」他可以把这设想涵盖所有类型的势力单位，无论这些单位是否在有组织的政治体制之内。历史社会学实际上是这样考虑势力均衡。Arnold Toynbee（汤因比）在《历史研究 *Study of History*》提到处于势力集团边缘的势力单位容易扩大，而是不处于中央又压力最大的单位。在西欧和中欧，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即使是细微的领土变化，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英联邦却是扩张活动惊人。Pirenne 提出类似的历史规律；他留意到最远离强势邻居的相对无组织小区一般形成抵制外部压力的核心。这样的例子有：在遥远北欧建立法兰克王国的 Pepin of Herstal[60]，东普鲁士崛起成为日耳曼民族的组织中心。比利时人 De Greef 的「缓冲国」是这类型的另一个规律，似乎影响了 Frederick Turner 的「边疆论」，把美国西部视为「漂泊的比利时」。这些势力均衡与不均衡概念与道德、法律或心理的概念无关，只涉及势力，这揭示它们的政治本质。

3.**势力均衡作为原则和体制**。一旦各人的利益得到彼此承认，从中会衍生行为原则。自 1648 年以来，〈Munster and Westphalia 条约〉确定了欧洲各国现状的利益，建立了各签署国的团结。欧洲所有强国几乎都签署了 1648 年的条约，宣告本身是该条约的担保人。荷兰和瑞士以签约日期作为取得主权国家国际地位的日子。自此以后，各国有权认为现状有任何重大改变将会涉及所有其它国家的利害关系。这是势力均衡初创形式的的国际大家庭原则；按照这原则，如有国家打算改变现况，无论是非对错，不会被视为针对强国的敌意行为。当然，这样的状况会极大方便形成反对这些改变的联盟。然而，在明确承认「维持欧洲平衡原则[61]」的〈Utrecht 条约〉之后七十五年，西班牙领土被 Bourbon 和 Hapsburg 两大家族瓜分。这原则得到正式承认，欧洲逐渐形成以这原则为基础的体制。由于较大国家吞并（或统治）小国会打乱势力均衡，所以这体制间接保护了小国的独立。欧洲的组织在 1648 年，甚至是 1713 年之后，还是相当模糊，但在二百年间不论大小学国得以维持现况，还是必须归功势力均衡体制。无数战争是为这个名义开战；虽然毫无例外可以认为是为争取势力而战，但有许多情况与参战国是依照集体担保原则对抗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并无二样。没有其它理由可以解释清楚在绝对强大军事邻国环伺之下的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这些弱小政治实体能够持续生存这么长时间。从逻辑而言，原则和

[60] 丕平二世
[61] ad conservandum in Europa equilibrium

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组织（即体制）之间区别似乎是明确的。但即便原则处于半组织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体制阶段，只是对传统习惯或习俗提出指引时，也不应低估原则的有效性。即使没有常设中心、定期会议、共享公职人员或强制性行为准则，欧洲通过各国大使馆和外交使团之间持续密切接触已形成一种体制。〔外交〕查询，外交照会、备忘录（无论是联合或分别公告，相同或不同用语）都有严格传统管制，是表达势力而不致摊牌的多种方法，亦打开妥协的新途径，或如谈判破裂，最终采取联合行动；实际上，如强国的合法利益受到威胁，共同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以上所述等同欧洲已有半组织形式的指引。

或许，这非正式体制的最大支柱是大量国际私营企业的交易经常依据一些贸易协议或由风俗和传统形成的其它国际措施。各国政府和有权势的国民以无数方式卷入由这些国际交易引起的不同类型的金融、经济和司法困境。局部战争只意味着有些交易短时间中断，而其他交易中的各种利害关系暂时会持久或不受影响，相对于其他被战争解体，陷敌人不利的利益关系，形成庞大力量。国际互惠的无形支柱是这种私人利益，其无声压力渗透文明社会整体生活和超越国界，即使不是欧洲协同体或国际联盟这些有组织形式，它是为势力均衡原则提供了有效的约束力。

（参考书目）（略。请参见原文。）

百年和平

1. **事实**。在 1815 至 1914 年这百年，欧洲列强只在三个短暂时期彼此开战：1859 年持续六个月，1866 年持续六周，1870-71 年间持续九个月。整整两年(1853-56)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边缘地区的半殖民地性质战争；历史学家如 Clapham, Trevelyan, Toynbee 和 Binkley 都同意。顺带一提，英国人持有的俄罗斯公债在战争期间可以兑付。十八世纪和以前几个世纪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偶发的全面战争和完全没有全面战争。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少将断言十九世纪年年有战争，他的论断看来似乎无关宏旨。Quincy Wright 比较多个世纪有战争的年份（无论全面或局部战争），似乎回避了要点。

2. **问题**。首先要解释作为全面战争丰富源头的英法两国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停止的现象。这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两个事实有联系：（1）旧有殖民帝国结束，（2）自由贸易进入国际金本位制时代。随着贸易新形式到来，战争利益迅速消退，与此同时因为与金本位制有关的新国际货币和信贷结构的缘故，萌生了积极的和平利益。收入和就业依赖货币稳定和世界市场，而两者的运作涉及整体国家经济体系。直至 1880 年，强国的一般传统扩张主义被反帝国主义趋势取代。（参见第十八章。）

然而，贸易战期间似乎有几十年的间歇期（1815-80 年）；在前期阶段，外交政策往往被认为促进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后期阶段，外交部长有责任关注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和直接投资者的利益。正是在这半世纪的间歇期建立了私有企业利益不应影响外交事务的学说；只是在间歇期结束之时财政部长才考虑接受这说法，但在公众舆论新趋势下设下严格限制条件。本书认为这变化是

由于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贸易的特点是其范围和成功已不再取决于直接的势力政策；商业逐渐影响外交政策的转向是基于国际货币和信贷体制已建立商业利益跨越国界新形式的事实。但如这种商业利益只限于外国债券的持有人，各国政府会极不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从严格意义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海外贷款纯粹是投机性质；既得收入通常是发债国的政府债券；如国民把资金贷给信誉可疑的外国政府，没有政府会认为要支持这样的最高危行为。Canning 断然拒绝投资者要求英国政府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也明确拒绝〔英国是否〕承认拉丁美洲各国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承认其外债。Palmerston 的著名 1948 年公告首次暗示这态度有改变，不过从未走得太远；由于贸易团体的商业利益散布广泛，政府不能让任何不重要的既得利益把世界帝国事务的运行变得复杂。外交政策重新留意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结束和随后回归十八世纪的做法。但海外投资已变得不是投机，而是完全正常的性质，贸易与此有紧密联系，所以外交政策回复传统为社会的贸易利益服务。这后一阶段的事实不需要解释，要解释的是在几十年间歇期内这些利益的中断。



第二章
保守的 1920 年代，革命的 1930 年代

国际金本位制崩溃，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解体与 1930 年代整体文明巨变之间的无形纽带。除非理解这因素的重大意义，否则不可能正确看待欧洲陷入厄运的机制或理解文明的形式和内容竟然建立在如此不稳定基础之上的环境。

人人生活在国际体系之内，但直到体系崩溃之后才体会其真实本质。很少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可怕的突然转型令人人不知所措。金本位制是传统世界经济剩下的唯一支柱，崩溃带来的影响必然是实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金本位制是纯粹的经济制度，拒绝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份。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才认识这灾难的本质，最迟采取应对策略。直至大难临头，领袖才明白国际体系崩溃背后是最先进国家的长期发展使体系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觉察市场经济本身的失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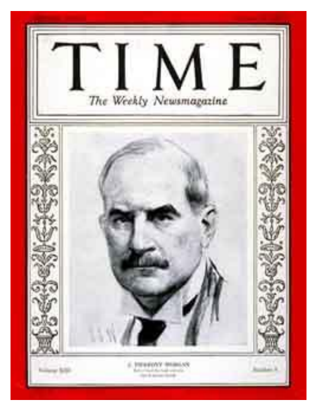
巨变比人们通常认识的更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革命是十九世纪的组成部份。1914-18 年的冲突只是促成和无限加重了不是它本身造成的危机，但当时未能察觉困局的根源；生还者认为大战的恐怖和破坏的源头是国际组织突然出现障碍。由于经济和政治体系突然失灵，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生活造成可怕危害似乎是一个解释。事实上，战后对和平与稳定的障碍与正是催生大战的祸因同一根源。世界经济体系自 1900 年开始瓦解，正是 1914 年爆发政治紧张局面的起因；大战的后果和有关条约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表面上缓和了紧张局面，但同时却加重了紧张的原因，并因此大大加剧政治与经济对和平的障碍。

政治方面，那些条约暗藏着致命的矛盾。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已预先排除了重建势力均衡体系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势力是这体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日内瓦会议希望扩大和改进欧洲协同体，建立国际联盟（国联）[62]，恢复这国际体系，但只是徒劳无功；〈国际联盟盟约[63]〉提出的磋商和联合行动也是徒劳无功，因为欠缺了独立势力单位这个基本前提条件。国联不可能实际建立；第 16 条款（执行条约）和第 19 条款（和平修改）从来没有实施。和平问题的唯一可行解决办法是恢复势力均衡体系，但已是镜花水月；事既如此，以致 1920 年代最具建设性政治家的真正目的不为公众理解，公众依然生活在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有些国家被解除武装，有些国家保留军备，这令人震惊的局面抹杀了组织和平的任何建设性步骤；流行的情绪化态度是以为国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预示着和平时代，只需要经常口头鼓励就会变得持久。美国人普遍相信只要美国加入国联，事情会

---

[62] League of Nations
[63]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变得大不相同。对所谓战后体系的组织性弱点缺乏了解，没有什么说法更能够证明这一点；称之为「所谓」，因为字有其义，欧洲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体系。这样的苍白状况，充其量只能在各方筋疲力尽时方能勉强维持；毫不奇怪，回归十九世纪体系看起来是唯一出路。同时，要不是那全体同意的致命规则确定由那个任性小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国联理事会可能至少起着欧洲协同体在其鼎盛时期发挥的欧洲指南作用。永久解除战败国武装的荒唐策略排除了任何建设性解决办法。这灾难性事态的唯一可选择办法是建立国际秩序，授之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有组织权力。然而，这路线完全超越了那时代的视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臣服这体系，更不用说美国。



经济方面，日内瓦会议的政策较为贯彻，努力恢复世界经济作为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成功重建势力均衡体系，也要恢复国际货币体系才可以为和平效劳。要是没有稳定的交易和贸易自由，各国政府会一如既往不重视和平，只有当和平不干扰任何重大权益时才会为和平而努力。当时的政治家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64]似乎认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不仅保证贸易，也保证和平。难怪国联一直努力重建国际货币和信贷组织成为维持主权国家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预防措施，而世界对国际金融集团的依赖是前所未见。摩根财团[65]已取代罗富财家族成为重新注入活力的十九世纪造物主。

依照十九世纪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似乎是革命年代；按照最近的经验，这恰恰相反。那十年的目标是极其保守，表达了近乎普遍的信念：只有重建 1914 年之前的体系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这一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实际上， 正是这次复古行为的失败才导致 1930 年代的巨变。战后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行动惊心动魄，这只是对军事失败的机械式反应，或至多是在中东欧舞台重演熟悉的西欧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戏剧；到了 1930 年代才有全新元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

无论情节如何，中东欧在 1917-20 年的剧变和反剧变只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建那些战事失利的政权而已。反革命的烟雾消散之后，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体系与战前没有很大差异。直到 1920 年代中期，芬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以及甚至意大利和德国都大致如此。有些国家的民族自由和土地改革取得巨大进步，这种成就自 1789 年以来常见于西欧。俄罗斯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当时的趋势只是建立或重建大体上与英美法革命理想相关的体系。在这广

[64] Woodrow Wilson
[65] J. P. Morgan。插图取自 http://www.mtholyoke.edu/~le20j/images/morgan_jp.jpg

泛意义上，不仅是德国的兴登堡[66]和美国的威尔逊，即使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遵循西方传统。

在 1930 年代早期，变化突然而来，其标志包括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俄罗斯的五年计划；美国推出「新政」；德国的国家社会党革命；国联垮台让位给独裁主义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十九世纪的理想极其重要，影响了其后十年；到了 1940 年，国际体系的痕迹全都消失，除了一些小范围地区，各国全都生活在全新的国际环境。

本书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自世纪以还只是蹒跚而行，最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有关和约摧毁。到了 1920 年代这变得明显，几乎所有欧洲的内部危机都是因为外部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政治学者根据各国依附的稳定货币来划分国家组别，不是根据所属大陆。俄罗斯取消卢布〔货币〕，令世界震惊；卢布币值因通货膨胀已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这铤而走险的手法，以欺骗和约；紧接其后又没收了收租收利息阶级的财产，成为纳粹革命的基础。日内瓦会议的声望源于成功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恢复各自的货币，奥地利新货币克郎运作极其成功；虽然克郎最后被取缔，但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反革命派以恢复货币行动为题作为争取权力的借口。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以稳定货币标准之名将左派赶下台。贫穷巴尔干地区的货币危机没完没了，通过国际信贷体系的弹性捆缚与富裕美国连在一起；这样的捆缚首先把没有完全恢复稳定的货币的紧张压力先从东欧传播到西欧，再从西欧传播到美国。最后，美国自身则被欧洲货币未成熟的稳定化后果吞没，最终出现崩溃。

第一波冲击出现在国家范围之内。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在一年之内已垮台。除了各种货币汇率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变化是发生在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系。人类社会引进了细胞过程，其效应是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国内外都带来混乱。各国发现本国与邻国之间有鸿沟分隔，同时各阶层人民受到完全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影响。知识型中产阶级确实变得赤贫[67]；金融大鳄积累了令人憎恶的财富。一个无法预计的联合与分裂力量的因素已走上舞台。

「资本外逃」是新事物。1848 年，1866 年，甚至 1871 年都没有这样的记录，但明显在以下三件大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 年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1938 年再次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以及 1930 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

[66] Paul von Hindenburg

[67] 本书经常用到两个有关「贫穷」的单字：poor 和 pauper，后者的贫穷程度甚于前者，需要救济。为了清晰区分，poor 译为「贫穷、贫困、贫苦」，而 pauper 译为「赤贫」。

货币已成为国家政治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之下，人人都体会到金融准绳的每日变化，都有货币意识；民众预先折算实际收入的通胀效应；各地民众似乎把稳定货币视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需要。不过，有这种意识也要认识到货币的基础可能依赖国界之外的政治因素。因此，社会骚动会动摇对货币媒介一贯稳定性的信心，也动摇相互依存经济体系中金融主权的幼稚观念。从此以后，与货币相关的内部危机会引发严重的外部问题。

信任金本位制是那时代行为上接受但精神上拒绝的信念，有人认为是天真，有人认为是必不可少，也有人认为是魔鬼信条，但都有同一信念：钞票有价值是因为钞票代表黄金。黄金有价，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黄金包含着劳动力，正统理论指出这是因为黄金有用和稀缺；两种说法没有分别。天地之战不理会金钱问题，使得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可思议地团结一起。十九世纪没人怀疑 Ricardo[68]和马克思的意见是一致。Bismarck[69]和 Lassalle[70], John Stuart Mill[71]和 Henry George[72], Philip Snowden 和 Calvin Coolidge[73], Mises[74]和 Trotzky[75]都同样接受这信念。马克思花尽心思揭露 Proudhon 的理想国劳动券（用来代替货币）是自欺欺人；《资本论》暗示了 Ricardo 式金钱商品理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Sokolnikoff 是战后第一位政治家以黄金为本恢复国家货币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Hilferding[76]坚决主张稳定货币原则而危及本身的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Otto Bauer 支持政敌 Sepal 尝试恢复克郎货币的基本货币原则；英国社会主义者 Philip Snowden 认为英镑在工党手中不安全，转而反对工党；意大利元首把里拉和黄金的比值定为 90，刻在石上并发誓拼死捍卫这比值。很难发现胡佛和列宁、丘吉尔和墨索里尼就这一点的意见有任何分歧。诚然，当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必要有金本位制，这信念是不同国家、阶级、宗教信仰和社会观的人们的唯一共同原则。人们致力恢复其衰败中的存在，与这看不见的现实生死与共。

这努力终归徒然，是世上前所未见的彻底失败。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致力稳定几乎崩溃的货币，不仅是这些小国弱国信心兮兮的行动，在到达黄金彼岸前饱尝饥饿，也使得他们的强大富裕赞助人（西欧的战胜国）面临严峻考验。只要战胜国货币有波动起伏，紧张压力就不会明显；这些国家继续像战前一样借钱给外国，因而有助战败国维持经济。但当英国和法国回归

[68] 李嘉图
[69] 俾斯麦
[70] 拉萨尔
[71] 穆勒
[72] 亨利乔治
[73] 柯立芝
[74] 米塞斯
[75] 托洛茨基
[76] 希法亭

金本位制，其稳定的汇率的负担开始显露。美国是黄金的最大拥有国，最后也要默默关心英镑的安危。美国担心大西洋彼岸的事态，意外地把美国带进危险区。这问题似乎是技术性，但必须清楚理解。美国在 1927 年支持英镑，暗示纽约要有低利率，避免资本从伦敦大量流向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因此向英伦银行承诺维持低利率；但是现在美国自身要有高利率，因为美国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危险的通胀（成本大幅降低，物价保持稳定，使通胀显得模糊）。经历了七年繁荣之后，钟摆带来了 1929 年姗姗来迟的大萧条，隐藏的通胀使事情恶化。通胀减轻了欠债人的负担，但拖垮了债权人。这是先兆。美国出于脱身的本能，在 1933 年脱离金本位制，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尽管当时没有人察觉到事件的较深层意义，但历史趋势几乎当即逆转。

十多年来，恢复金本位制曾是世界团结的象征。欧洲各地有无数会议，以满足稳定货币的政治先决条件。国联得到国际劳工局[77]的辅助，拉平各国之间的竞争条件，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解放贸易。为了克服转账支付的问题，华尔街发起行动以货币为核心，先转为商业票据，然后安排赔款；日内瓦担当康复过程的担保人角色，在这过程中伦敦金融城的压力和维也纳的新古典绝对货币主义者连手为金本位制服务；各种国际努力最终都服从这目标，而各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保护货币，特别是与外贸、贷款、银行业及汇兑有关的政策。尽管人人同意稳定货币最终取决于贸易自由，但除了固执己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大家都知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行动不可避免会限制外贸和国际支付。为了应对同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开发了进口配额、延期偿付和冻结协议、清算系统和双边贸易条约、实物交易安排、禁止资本输出、外贸控制以及汇兑平准基金。然而，自给自足的梦魇时常困扰着保护货币的措施。尽管目标是贸易自由化，结果却是压制贸易。各国政府不但没有进入世界市场，反而本身的行为阻碍了国家与世界的联系，为了维持一点点贸易流动，各国都要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货币的外在价值作为外贸媒介，人们不情愿地疯狂努力，却把自己赶进了自我封闭的经济。自由贸易保守目标的结果是一套完全背离传统经济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而突然逆转。为了恢复金本位制所做的牺牲，又不得不再做一次，目的是为了在没有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活下去。原先为了维持稳定货币体系而设计的制度限制生活和贸易，现在用来调整工业活动以适应永远没有金本位制。或许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机械式和技术性组织能够抵挡金本位制崩溃冲击的原因。因为在奋力保留金本位制时，这世界已无意识地准备了某些类型的工作和组织，以适应没有金本位制的状况。不过，现在目标是相反的；在长期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损失最多，各种强大势力借着反弹卷土重来。国联和国际金融集团比金本位制更早垮台；随着金本位制消失，国联的有组织和平权益及其主要实施工具（罗富财集团和摩根财团）都从政治中消失。

[77]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金线突然折断，是世界革命的讯号。

但金本位制失败只是设定事件的时间，而事件规模之大，不可能是因此而起的。在世界很大部份地区，伴随危机的不止是十九世纪社会的国家制度彻底崩溃，各地的制度被改变和重整得几乎面目全非。许多国家的自由政体被独裁专制统治取代；这世纪的首要制度是基于利伯维尔场的生产，也被新经济形式取代。大国重塑思维模式，假借未听过的宇宙本质概念之名猛然投入以世界为奴役的战争，而更强大的国家奋起捍卫自由，换来了同样是前所未闻的意义。国际体系失败，尽管引发了转型，但肯定不可能说明转型的深度和内容。即便可以知道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来得那么突然，我们却依然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生。

伴随着巨变转型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偶然。历史追随社会变革；各国命运与其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相互关联。这种共生现象在历史中绝非例外；尽管国家群组和社会制度各有本身的起源，但在挣扎求存时相互借力。共生现象的著名事例把资本主义与大西洋沿海各国家联系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兴起有非常密切关联的商业革命[78]，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工具；各国从这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中获益；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这些崛起强国在全球传播。

这规律反过来也适用。国家挣扎求存时可能受阻于正在走下坡的全部或部份制度；二战时的金本位制就是这种过时制度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出于本身理由而反对现状的国家，很快发现现有国际秩序的弱点，希望创建更适合本身利益的制度。这些国家推走正在下堕的东西，迎接迎面而来的事物。看起来好像是这些国家发起了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事实上仅仅是受益者，并甚至可能扭转变革的趋势为本身的目标服务。

因此，战败的德国认识了十九世纪秩序隐藏的弱点，利用这见识加速该秩序的崩溃。在 1930 年代，德国有些政治家积累了邪恶的智力优越感，动脑筋要破坏秩序，试图迫使事态朝着他们的政策倾斜，往往伸延到发展金融、贸易、战争和社会组织的新方法。然而，政府没有造成这些问题，只是在利用这些问题；这些是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依然要面对。还有，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依然是十九世纪的战争类型：势力均衡体系失效导致强国的普通冲突；而后者已经是世界巨变的一部份。

因此是可以把那时期令人心酸的民族史抽离正在演变的社会转型，然后较容易看到德国和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些势力单位如何被社会转型过程或正面或负面影响。不过，社会转型本身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列强崛起为载体，

[78] Commercial Revolution

向各地传播信条。德国和俄罗斯分别变成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无论好坏，只有认识这些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并视之与所服务的国家利益相分离，才能够评估社会运动的真实范围。

本书不会关注列强在二战中的角色，不管是德国或俄罗斯，意大利或日本，英国或美国，尽管这是通史；不过，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是制度转型的活生生力量。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力求在人类历史记录中有更多份额，这股动力可视为事态开展条件的实际资料，而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新政」的主旨正是事态的部份。

这把话题导致依然有待证明的**本书命题：巨变源起于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行为，以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命题似乎赋予体系有近乎神秘的力量；无异间接指出十九世纪文明的基本元素（势力均衡、金本位制和自由政体）全是由自发调节的市场这共同方阵塑造。

这声言似乎颇为极端，其粗疏的唯物主义可能有点骇人。不过，世人目睹文明崩溃，其特点正是该文明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受到赖以存活的物质条件制约；这诚然是所有人类生活、实际上是所有生活的共同特征，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生活，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生活。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受经济因素制约。从不同而且独特的意义来说，只有十九世纪的文明是经济性质，因为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极少被证明是有效，而且肯定从未被提升为日常行动和行为的正当理由的动机：逐利得益。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源自这原则。

能与启动「逐利得益」动机的机制比较效益的，只有历史上最猛烈爆发的宗教狂热。在一代人的时间，整个人类世界受到猛烈影响。众所周知，「逐利得益」动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之后成熟于英国；约五十多年后传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最后三地的类似方案形成一种模式，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都有这模式的主要特征。要理解大灾难的源起，必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衰。

市场社会在英格兰诞生，但欧洲大陆揭露其孕育最悲惨并发症的弱点。要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回顾 Ricardo 式的英格兰。十九世纪是英格兰的世纪；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工业革命是英格兰的大事。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是英格兰人的发明。到了 1920 年代，这些制度在四处碰壁；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事态更多是政治性和更戏剧性。但无论情景和最后情节的剧烈程度，要理解破坏文明的长期因素，必要研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

第二章数据参考

金线突然折断

强制性的稳定货币政策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溃。稳定货币运动的先锋城市是日内瓦，在伦敦金融界和华尔街施加的压力下，这运动传到财力较弱的国家。

稳定货币的第一组国家是其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崩溃的战败国。第二组国家由欧洲战胜国组成，这些国家稳定自身货币晚于第一批国家。第三组国家有金本位制的主要得益国：美国。

I. 欧洲的战败国		II. 欧洲的战胜国			III. 国际债权国	
	稳定货币		稳定货币	脱离金本位制		脱离金本位制
俄罗斯	1923	英国	1925	1931	美国	1933
奥地利	1923	法国	1926	1936		
匈牙利	1924	比利时	1926	1936		
德国	1924	意大利	1926	1933		
保加利亚	1925					
芬兰	1925					
爱沙尼亚	1926					
希腊	1926					
波兰	1926					

第一组国家的不稳定状态由第二组国家支撑了一段时间。一旦第二组国家也同样稳定了货币，也就需要由第三组国家支持。最终，由美国组成的第三组国家遭受了欧洲稳定货币政策累计的不稳定状态的最沉重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钟摆摆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钟摆的摆动普遍而快速，但幅度较小。在 1918-23 年期间，因为战败的原因，紧随着结果是失败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在绝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都恢复了保守派统治；若干年后差不多又普遍建立了一党制政府。这次运动再一次是相当普遍。

国家	革命		反革命		一党制政府
奥地利	1918 年 10 月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0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4
保加利亚	1918 年 10 月	急进农地改革	1923	法西斯反革命	1934
爱沙尼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26

芬兰	1917 年 2 月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中产阶级共和国	----
德国	1918 年 11 月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0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3
匈牙利	1918 年 10 月	民主共和国	1919	反革命	----
	1919 年 3 月	苏维埃			
南斯拉夫	1918	民主联邦	1926	独裁军管国家	1929
拉脱维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4
立陶宛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26
波兰	1919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6	独裁国家	----
罗马尼亚	1918	农地改革	1926	独裁政权	----



第二部

市场经济的兴衰


[79]

（一）血汗工厂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进步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生产工具有了近乎奇迹的改进，紧随其后的却是老百姓生活悲惨混乱的状况。

本书致力澄清百年前英国处于极坏状况时决定各种形式混乱状况的因素。什么「血汗工厂」把人折磨？新的物质条件有什么影响？在新条件下运作的经济依赖性有什么影响？旧社会组织被什么机制破坏，而又未能成功把人和大自然重新结合？

自由主义哲学最失败的是未能理解变革的问题。出于对自发性的情绪化信念，抛弃了对变革的常识性态度，反而莫名其妙接受改善经济的任何社会后果。首先贬低，然后忘记政治科学和治国之道的基本真理。无庸细说：如没有目标的变革过程步伐太快，可能的话应要放慢，以确保社会福祉。传统治国之道的道理本来是家传户晓，往往只是载于古人的社会哲学教诲；到了十九世纪因为粗俗效益主义的荼毒，又毫无怀疑地信赖所谓不自觉增长的自我治愈功效，有识之士的思维已抹去这些道理。

---

[79] http://t3.gstatic.com/images

因为坚持从经济观点评判社会事件，经济自由主义错误解读工业革命的历史。以下探讨一项看来颇为遥远的话题作为说明：英国早期都铎王朝[80]时代把旷野圈围和可耕种农田转为牧场；当时田地和公地被领主用篱笆圈围，乡郡面临人口减少的威胁。提起这些为人民带来不幸的事件，一方面要展示最终有好处的圈地行动造成的破坏是类似工业革命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是要澄清社会在经济进步不受监管时所面对的选择。

如农田没有转为牧场，圈地[81]显然是进步。被圈围的土地其价值是未被圈围土地的两至三倍。在保持耕种的地方，就业率没有下降，而食物供给显著增加。土地的产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出租的田地。

即使耕地改变为牧羊场，也不是全都对周围地区有害，尽管破坏了栖息地和限制了就业。家庭手工业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扩大，一百年后已成为农村的特色。牧羊场出产的羊毛为小佃户和被挤出农耕行业的无地农民提供就业，新的毛纺中心确保许多工匠有收入。

但要点是只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样的补偿效应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没有这样的经济体系，养绵羊和卖羊毛这样的高度有利可图行业可能破坏农村郊野。绵羊「点石成金」，也可以「点金成石」；十七世纪西班牙的财富最终遭此劫难，因为牧羊业过度扩张，被侵蚀的土地无法恢复。

1607 年，一份呈报领主的官方文件权威地陈述变革的问题：「穷人有了栖息之所，应感到满足；领主改善土地的期望不受阻碍。」这公式把纯粹经济进步的本质视为必然如此：改进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但文件也暗示必然的悲惨状况：富人要求以公帑改善，让自己得益，穷人只有栖身的茅舍。



圈地行动一直被恰当地称为富人革穷人的命。领主和贵族推翻社会秩序、打破古代法律和习惯，有时凭借暴力，但经常是施压和恐吓，实情是掠夺穷人的公地份额，推倒一直以来牢不可破习俗默认是属于穷人和他后代的房舍。社会组织受到破坏；荒凉的村庄和废墟见证着革命凶残地危及国防、化城镇为废地、人口急剧减少、负荷过重的土地变为尘土、饱受骚扰的体面农夫沦落为乞丐和小偷。尽管这是零星事件，但黑点大有可能成为全面灾难[82]。国王和议会、大臣和主教都在

[80] Tudor
[81] Enclosure movement
[82] 原注 1：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s the 16th Century,* 1912.

保卫社会的福祉以及社会的人性和天性免受摧残。从 1490 年代到 1640 年代，他们夙夜匪懈要阻止人口减少。Kett 叛乱（插图）[83]被镇压后，几千农民被处死。其后反革命派成功取消圈地法例，护国公 Somerset 公爵[84]被指同情叛乱农民而被处死[85]。

百年过去，两派敌对势力又再一较高下。这时的圈地者往往更多是富有乡绅和商人，不再是领主和贵族。不管是世俗还是教会层次的上层政治都涉及国王行使特权阻止圈地，藉此加强其在宪政斗争中与乡绅互斗的地位；在这场斗争中，Strafford[86]和 Laud[87]被国会判死刑。这些人的政策不仅在工业方面，在政治方面也是反动的；再者，圈地已不是用于耕种，也不是放牧。英国内战（1642-48 年）的浪潮席卷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88]的公共政策。

十九世纪历史学家一致谴责这两个王朝的政策即使不是全然反动，也是哗众取宠。他们同情国会，而国会一直是站在圈地者一边。尽管 H. de B. Gibbins 是老百姓的热心朋友，但他还是说：「然而，这些保护性法规只是一如一般的保护性法规那样完全徒劳无益。」[89] Innes 说得更明确：「为解决就业问题而采用的惯常手法：惩罚流浪行为，试图把工业迁至不适当的土地，把资本赶到获利较少的投资；这一切都失败，一如既往。」[90]。Gairdner 毫不犹豫呼吁把自由贸易概念作为「经济法规」，他写道：「有人就是不理解经济规律，试图通过立法阻止地主拆毁农民的房子，地主发现把农田变成牧场增加羊毛产量是有利可图。经常重复立法反证这些法律在实践中是如何无效。」[91]。最近，经济学家 Heckscher 强调自己的观点：重商主义显然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人类要再花几世纪的时间才能掌握经济现象。」[92] 实际上，反圈地立法似乎从来没有阻止圈地行动的进程，甚至没有构成严重阻碍。John Hales 最热衷共同体百姓原则，也不得不承认很难收集证据对付圈地者；圈地者经常让他们的家仆在陪审团前宣誓，而且「马屁精和食客众多，没有这些人是没法组织陪审团。」。有时只是权宜在农田划出犁沟，犯规的领主已可避免惩罚。

---

[83] 1549 年 7 月，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的农民受不了圈地的折磨，揭竿而起，原本打算拆毁富农 Robert Kett 的篱笆，反而后来说服了他参加农民起义，成为领袖。经多番波折，农民被军队打败，约有三千农民被处死；史称 Kett's Rebellion，是英格兰两次最重大农民起义（叛乱）事件之一。

[84] Edward Seymour, 1st Duke of Somerset，Lord Protector

[85] 这不是完全正确。Somerset 公爵是皇叔，身为护国公，少不免卷入宫廷政治。当时最激烈反对圈地行动的是教会和一些政治人物，当然还有身受其害的农民。Somerset 是在失宠后在 1549 年 3 月被处死。

[86] Thomas Wentworth, 1st Earl of Strafford

[87] William Laud

[88] Stuart

[89] 原注 2：Gibbins, H. de B.,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95.

[90] 原注 3：Innes, A. D.,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1932.

[91] 原注 4：Gairdner, J., "Henry VIII,"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1918.

[92] 原注 5：Heckscher, E. F., *Mercantilism,* 1935, p. 104.

私人利益轻易凌驾公义的现象，往往被视作为立法无效的某种象征；趋势未被制止而且胜出，这后来被作为结论性证据证明「反动性干预主义」的所谓徒劳无益。但这些观点完全点错主题。为何趋势的最终胜利被视为未能拖慢趋势进程的证据？为何不以这些措施的目的来衡量：即是拖慢变革的速度？虽然这未能阻止发展的方向，但不是彻底无效。变革速度与变革方向同样重要；不过，尽管变革方向往往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但可以决定变革速度。

人们相信进步是自发的，必然看不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作用包括经常调整变革速度，根据情况加速或减速；如认为速度是无法改变或甚至更糟的认为干预速度是不正当行为，那么就根本没有干预的空间。圈地行动是一例。回过头看，很明显西欧经济进步的趋势是要消除人为保持一致的农业技术、土地条块式交替种植和原始的公地制度。就英格兰而言，毛纺业的发展肯定是国家资产，终而建立棉纺业这工业革命的载体，也很明显国内纺织业增长依赖国内羊毛供应量增加，这足以证明农田转为牧场和并发的圈地行动是经济进步的趋势。不过，若不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政治家的政策得以维持，经济进程的速度可能具毁灭性，进步本身变得退步而不是有益。因为这速度影响很多事态：被剥夺土地财产的人能否在不严重损害本身（人性和经济、物质和道德）的情况下，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他们能否在与变革间接有关的机会领域中找到新工作；出口增长带来的进口增长其效应能否帮助在变革中失去工作的人找到新的生计。

每种情况的答案都取决于变革和调整的相对速度。经济理论的一般「长期」考虑不切实情；假定事件发生在市场经济体系而预判问题。这样的假设看来很自然，但没有道理：人们很容易忘记市场经济是制度性组织，只在近世出现，而且只是部份出现。但除了这项假设，「长期」考虑是毫无意义。如变革的实时效果是有害，那么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最终结果也是有害。如果农田转为牧场涉及拆毁一定数量的房子、一定数目的人失去工作、当地食物供应减少，那么这些结果可视为最终结果，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这并不排除要考虑其他可能效应：出口增加影响地主的收入；当地羊毛供应量最终增产会增加就业机会；地主收入增加，可能用于投资或奢侈支出。变革与调整两者的时间—比率相比，可得出变革的净效益。但除非证明自发调节的市场确实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假定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中，市场规律才适用；这不是都铎王朝的政治家偏离事实，而是现代经济学家暗示市场体系从前已存在。

英格兰抵住了圈地行动的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只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国王的权力减慢了经济改善的进程，直至社会能够承受变革：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帮助变革的受害者，疏导变革过程以减少破坏。大臣和特权宫廷的观点绝不保守；他们代表着新治国之道的科学精神，赞成外国工匠移居入境，

热心移植新技术，采用统计和精确报告方法，轻视习惯和传统，反对规定性权利，减少教会特权，轻视不成文法[93]。如创新造就革命，他们是那时代的革命者。他们致力于老百姓福祉，美化君王的权力和威严；但是，未来是属于宪政主义和国会。皇室政府让位阶级政府，这阶级带领工商业的进步。宪政主义的伟大原则与政治革命结合，撵走了皇室；当时的皇室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创造性能力，而其保护性职能对经历转型风暴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国王的财政政策过份制约国家的力量，开始抑制贸易；为了维持特权，国王一再滥用特权，并因而损害了国家资源。国王的最后功绩是出色管理劳工和工业以及审慎控制圈地行动。但人们更易于忘记资本家和中兴中产阶级的雇主才是保护性措施的受害者。两个世纪之后，英格兰才再享有被共和体毁掉的有效有序的社会管理。诚然，人们不再那么需要这种家长式管理，但中断了这种管理方式在一方面造成了极大危害：使国家忘记圈地行动时期的恐怖和政府成功克服人口减少的功绩。或许这有助解释一百五十年之后，当工业革命这场类似灾难对国家生活和福祉构成威胁时，为何没有清楚认识危机的真实本质。

这一回事件〔工业革命〕是英格兰独有；这一回的海上贸易是波及整个国家的行动之源；这一回规模最大的变革为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前所未有大浩劫。在这没有走得太远之前，劳工已经拥挤在新的荒凉之地，即所谓英格兰的工业城；乡下人变成贫民窟的居民；家族走向解体；大块的乡村地区被「血汗工厂」吐出的煤渣和废料迅速堆填。不同观点和门派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衰败的真正深渊。

迄今没有人能满意解释这事件。当代人猜想已经在支配财富和贫困的铁律中发现诅咒之钥，称之为工资铁律[94]和人口铁律[95]；但这都被证明是错的。有提出「剥削」作为富和贫的另一解释；但这不能解释以下事实：工业贫民窟的工资高于其它任何地方，而且持续增加了一百年。更常见的是引述一连串成因，但都难以令人满意。

本书的答案决不简单；实际上占了大部份篇幅。本书认为英国面临雪崩式社会混乱，规模远超圈地时期的社会变革；这灾难是经济进步巨大运动的伴物；一个全新的制度性机制开始在西方社会作用，其危险在初改动时有切肤之痛，而且从未被克服；十九世纪文明史大体上是人们致力保护社会免遭这机制蹂躏。工业革命仅仅是革命的开端，极端而反动地点燃了宗派主义者的思维，但新信条是彻底唯物主义，并相信人类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无限数量的物质商品来解决。

[93] Common Law，亦称「习惯法」。
[94] iron law of wages
[95] iron law of population

这故事已传遍无数次：工业革命崛起是由于市场拓展、有煤有铁以及温和气候有利棉花业、诸式人等的土地财产被十八世纪新圈地行动剥夺、自由制度存在、机器发明以及其它因素以某种方式互动。已经有结论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脱离其它而单独成为那场突然而至又出乎意料事件的成因。

如何定义这场革命？有什么基本特征？是否工厂城镇兴起，贫民窟出现，童工的超长工时，某些类别的劳工低工资，人口增长率上升，还是各种产业集中？本书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附属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这基本变革；要理解这制度的本质，先要理解机器对商业社会的影响。本书无意声称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机器引起，但坚持一旦精确的机器和工厂被用于商业社会的生产，必然形成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

在农业和商业社会使用专门化机器肯定会产生典型效果。这样的社会包括农业工人和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商人。使用专门化、精确和昂贵的工具和工厂，要依附买卖才能适用于这样的社会。商人是唯一可以办妥诸事的人，只要不亏本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他出售货品是一视同仁，但买入的形式各有不同：不是买入现成商品，而是买入必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然后指示两者如何制成新产品，再加上一些等待和生产时间。这不只是描述家庭工业或「家庭加工外判[96]」，也是描述工业资本主义，包括当代的工业资本主义。随之而来是社会体制面对的重要影响。

精确机器价钱昂贵，除非生产大量商品才值得投资。[97] 机器生产要不亏损，生产不能因为机器等待初级产品而停工。对商人而言，这意味着有钱就可以买入这些生产要素的任何数量。除非能够满足这条件，否则专门化机器生产方式是过于冒险；商人真金白银投资，社会的收入、就业和商品供应依赖持续的生产。

农业社会没有这样的条件，要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是逐步创造出来，但没有改变令人吃惊的本质。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改变：从只求糊口改变为追求利润。所有交易变为金钱交易，这倒过要求工业活动每一环节要引入交易媒介。所有收入必然来自出售一些东西；不管实际收入来源为何，都必然是销售的结果。「市场体系」这简单术语隐喻以上描述的制度模式。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建立起来，其运行必须没有外界干预。利润没有任何保证，商人必须在市场赚取利润。必须让价格本身自发调节。这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市场经济。先前的经济模式转型为市场经济体系是如此彻底，毛毛虫的蜕变比持续增长和发展更能表达这种演变。例如，比对商人生产者的销售活动与购买活动；销售只关心人造产品；不管他是否找到买主，社会组织不必然受到影响。但他购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即是大自然和劳工。商业社会的机器生产实际涉及转型，把社会的

[96] putting out
[97] 原注 6。Clapham, J. H.,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II.

自然和人类物质转型为货品。结论尽管怪异，却是无法避免；不是这样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些因素引起的混乱肯定分裂了人的多重关系，威胁要完全摧毁人类栖息的自然环境。

实际上，危险迫在眉睫。如仔细研究支配自发调节市场机制的法则，可以察觉它的真实特性。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体系

在讨论支配市场经济体系法则之前，例如十九世纪试图建立的那种法则，必须首先牢牢掌握这体系建基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假设。

市场经济意指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稍微更技术性的说法是市场价格支配的经济模式；没有其他，只有市场价格。这体系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外来帮忙或干预，肯定可称为自发调节。这些粗略解释应该足以显示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除非有某种经济组织，否则社会不能自然地存在，无论时间长短；从原则上说，在近代之前从来没有受市场控制的经济组织。尽管十九世纪学术界一直异口同声，但在人类经济中交易的利润从来未曾发挥重要作用。虽然石器时代之后常见有市场制度，但其作用只不过是附属于经济生活。

有好理由强调以上坚持的论点。正是亚当·斯密[98]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社会的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存在，或正如他指出，人类「倾向以物易物、以实物代工资、以物换物[99]」。这句话后来导出经济人的概念。回头看看，可以说这样的误解过去竟然更能预言未来。因为即使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任何被观察的社会几乎都没有大规模显示那种倾向，至多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特征而已；但百年之后，工业体系在世上重要地区蓬勃发展，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意味着有特殊倾向左右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虽然这没有波及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经济学研究不精的 Herbert Spencer 把劳动分工原则等同以物易物和交易；又五十年后，Ludwig von Mises 和 Walter Lippmann 重复同一谬论。是时，论点已无庸争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史学、政治哲学和普通社会学的许多作者都踏着亚当·斯密的脚步，把他的原始人以物易物范式确立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公理。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见解，与鲁索关于原始人政治心理的观点同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现象，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源自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的固有差异；所谓人类天生倾向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说法几乎全是虚假之言。历史和人种史记录有各种经济模式，大多数有市场制度，但在近代之前从未记录过任何哪怕是近乎由市场支配和调节的经济模式。本书稍后提出

---

[98] Adam Smith

[99] Adam Smith《国富论》第二章的名句：propensity to 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一般中译为「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易」。Barter, truck 和 exchange 都不涉及金钱作为交易媒介，但三者是否同义词？若然三者同义，为何 Smith 要分别列出？中文网上没有相关数据；根据多个英语网页，可归纳为 Barter 原意是「以实物交换实物」；Truck 是雇主以物资（实物、代用卷等等）代替现金发薪；Exchange 是「以实物交换服务」（你做饭，我洗碗）或「以服务交换实物」（性交易）。现代用语的 Barter 已涵盖以上的细微分别，泛指不涉及金钱作为媒介的交易。为免重复，以下的译文笼统译为「以物易物」。

对经济制度史和市场史的整体观，这将变得一清二楚。直至近代，市场在各国内部经济的作用并不重要，后期转向由市场模式支配的经济体系，下文会交待清楚。

先要抛弃十九世纪的一些偏见，这曾经是亚当•斯密所谓原始人偏好获利假设的基础。因为他的道理更适用于眼前的未来而不是模糊的过去，所以这驱使他的追随者对人类早期历史采取奇怪的态度。表面上来看，证据似乎表明原始人非但没有资本主义心理，实际上却有共产主义心理（后来这也证明是弄错了）。因此，经济史学家倾向只关注以物易物和交易已具相当规模的近代历史，原始经济被归入史前史。无意中这导致偏向市场心理的发展，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短短时期内，可以看作万事俱备，最终是为了建立市场体系，而不管其它暂时被压下去的趋势。要纠正这「短短时期」观点，显然经济史要结合社会人类学，而这一直是经常避免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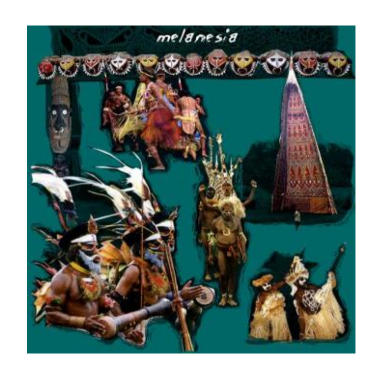
时至今日不能再追随这些路线。人们习惯把过去一万年以及早期的多种社会形式作为大约始于 1776 年《国富论》出版的人类文化真实历史的前奏；可以说至少这是过时的观念。这章节在目前已经结束，而为了估计未来的各种选择，应先克服轻易追随先辈成见的自然倾向。但是，导致亚当•斯密那一代人认为原始人偏好以物易物的偏见，同样致使后来者放弃对早期人类的所有兴趣，因为这以为先民不曾沉湎于这些值得称道的热情。古典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市场法则建基于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所谓倾向，取代这传统观念的是放弃对「未开化」人类的一切兴趣，认为这与理解近世问题无关。

对早期文明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应是有悖科学精神。文明人和「未开化」先民之间的差异一直被过分夸大，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据历史学家说，直到最近，农业欧洲的产业活动形式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无太大差别。自从引进主要是用牲畜牵拉的耕犁，西欧和中欧的农耕方法基本上没有改变，一直到现代。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进步主要是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至于物质条件，公元 1100 年的西欧几乎还不及一千年前的罗马世界。即使到了后来，改变多见诸治国之道、文学和艺术，特别是宗教和学习，而不是工业。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大体上与古波斯、印度或中国同一水平，肯定不及两千年前新埃及王国的财富和文化。欧洲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Max Weber 最先反对因为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问题无关而漠视原始人经济。社会人类学后来的研究有力证明他是对的。对早期社会的研究，最特别突出的结论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是万世不变的。在任何时空的社会，人的禀赋非常稳定的重现；人类社会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看来是一成不变。

近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人的经济关系通常包含在他的社会关系。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拥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其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和社会资产。物质财富服务这目标时才会被重视。生产和分配过程与拥有

物质相关的具体经济利益是不相关的，但这过程每一步骤都与许多社会权益密切相关，最终确保必要步骤得以实施。小小狩猎或捕鱼社会的社会权益与庞大专制社会非常不同，但经济体系都是在非经济动机的基础上运行。

以生存角度来解释较为容易。以部落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极少是至高无上，因为社会养活所有成员，除非社会陷入灾难，则集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不是个人。另一方面，维持社会关系至关重要。首先，如个人忽视大众接受的道德或慷慨守则，将自绝于社会；其次，因为长远来看，所有社会责任都是互惠性质，履行责任最能符合个人的有来有往利益。这种情况肯定对个人形成持续压力，把经济私利从意识中抹掉，以致在许多情况下（但决不是所有情况）甚至无法以利益角度理解本身行为的含意。这态度因经常性部落社会行动而强化，例如分享共同捕捉的食物或参加危险的部落远征。以社会威望来衡量，慷慨行为的代价非常之高，因此任何不是彻底忘我的行为都是得不偿失。个人性格与此几乎没有关系。不同价值观对人有不同定义：好人或坏人，合群或不合群，忌妒或慷慨。分配〔食物，成果〕仪式的大众接受原则是不容许任何人有忌妒的动机，正如以勤劳、灵巧或别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园丁会得到公开赞扬（除非他太成功以致被误为巫术所害而应该慢慢消失）。人的激情，不管好坏，只是指向非经济目标。炫耀仪式目的在尽力鼓励彼此尽力效法，而集体劳动的习俗每每未能达致最高数量和质量。免费送赠礼物的交换行为预期会有回报，虽然不必然是相关个人的回报；这程序通过精心宣传，魔法仪式以及建立把组群以相互责任联结的「二元关系」得以细致传扬和完美被保护；这现象可以解释为何没有得益或甚至财富的概念，只有传统上提高社会声誉的物品。



下文简述太平洋西美拉尼西亚群岛[100]社会的一般特征，没有考虑受风俗、法律、巫术和宗教影响的性别和地域组织，因为本书只打算说明所谓经济动机是如何萌生于社会生活的背景。近代人种学者都同意一项负面观点：没有得利的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最省力原则；特别是没有任何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独立和独特制度。既然如此，如何确保生产和分配的秩序？

答案是是两个基本上与经济学无关的行为原则[101]：**互惠**[102]和**再分配**[103]。以西美拉尼西亚群岛的 Trobriand 岛民[104]为例说明这经济类型：互惠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性

[100] Western Melanesian，包括新几内亚(New Guinea)，瓦努阿图(Vanuatu)，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插图）

[101] 原注 1：这一章大量参考 Malinowski 和 Thurnwald 的论述。

[102] reciprocity

[103] redistribution

[104] Trobriand 岛民不相信怀孕是因为男女交欢，也不承认父亲和子女之间有生理关系。.

系组织，即是家庭和亲属关系；再分配之有效，是因为人人都是同一首领的子民，因此有地域特性。以下分别考虑这些原则。

妇女和儿童是岛民的家庭单位，生计是母系亲戚的责任。男人拿出最好的收成养活姊妹和她的家人，他的良好行为赢得荣誉但没有什么物质利益回报；如果他懒散懈怠，首先是声誉受损。互惠原则为他的妻子子女带来利益，因而他的公民道德行为得到经济补偿。在自己的农圃和受惠家庭前典礼式展示食品，确保他的超卓农艺为人所知。显然农艺和家庭形成社会关系的一部份，与优秀农艺和杰出公民行为有关联。广泛的互惠原则有助保证生产和家庭生计。

再分配原则同样有效。岛上大部份产品由村长送交部族首领储存。岛民的活动主要是节庆、舞会和其它互相款待的场合，也款待岛外邻居来访（在这些场合，按照礼仪规则分发长途贸易的货品和互赠礼品；首领向众人分发习俗礼品），储存制度的绝对重要性清楚显现。从经济角度看，这是现有劳动分工、外贸、公共税收和国防储备的必要部份。但经济体系这些功能完全被极其生动的体验吸纳，为整体社会体系框架内每一行动提供了极丰富的非经济性动机。

然而，除非行为原则适用于现有制度模式，否则不会变得有效。在没有文字记录和精密管理的条件下，互惠和再分配能确保经济体系运行，只是因为这类社会组织符合这解决办法的要求，这解决办法用上了诸如**对等**和**中心**[105]这些模式。

对等制度模式极大促进了互惠，是没有文字民族社会组织的常见特征。部落分支的「**二元关系**[106]」引人注目，有助个人关系配对，因此有助人们在没有永久记录的情况下交换物品和服务。在原始社会中，同一族裔分为两半[107]，这两个亲属组群有互惠行为[108]。关于「二元关系」的起源，知之甚少；Trobriand 群岛沿海村庄似乎都和内地村庄结成姐妹村庄，方便安排表面上是互赠面包果和鱼获礼品的不定期交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Milne Bay 省有一种交换回报制度，称为 Kula 交易：每人和另一个岛的岛民结成对等贸易伙伴，把互惠关系个人化。广泛的互惠行为不能只依赖各自交易行为的长期运行，这是不切实际，还要依赖部落分支对等模式的频率，居住地区和部落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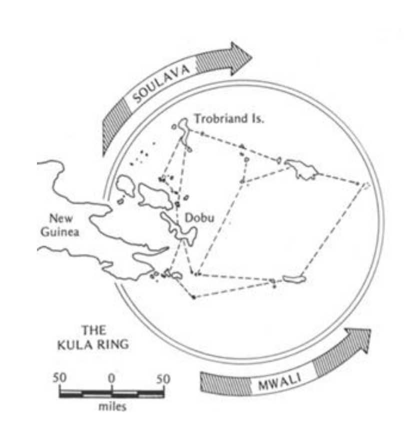
某程度上，所有人类群组都有「**中心**」这制度模式，是收集、储存和再分配物品和服务的途径。狩猎部落的成员通常把猎物交给族长再分配。狩猎活动的特点是猎物数量不固定以及猎物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其它切实可

[105] symmetry and centricity
[106] duality
[107] moieties，可能互相通婚。
[108] 原文的原意是没有顾及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有亲属关系，因此提出「原始社会为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创建“姊妹”关系，而这关系是建基于互惠行为」。译文的修正版似乎更符合一般人情。

行的分配方法可以在每次捕猎行动之后维系部落不致分裂。所有类型的经济体系都有类似的需求，不管有多少组群。领土越大，产品种类越多，再分配更能导致有效的分工，因为这有助联系不同地域的生产者。

对等和中心模式颇能满足互惠和再分配的需求；制度模式和行为原则相互调整。只要社会组织按惯例运行，就无需个人经济动机，不用担心个人逃避责任，自动确保分工，经济责任得到履行；最重要的是所有公共节庆场合有足够物资。这样的社会禁止利润的想法，谴责讨价还价的行为，称赞慷慨馈赠是美德；不会出现所谓以物易物的倾向。经济制度实际上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

不应由此推断这种社会经济原则是局限于原始传统或小型小区；没有利润、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不必然是简单的。上文提到的 Kula 交易建基于互惠原则，是已知最复杂的贸易方式；金字塔文明是规模庞大的再分配形式。



Trobriand 位处环状群岛，大多数岛民上在 Kula 贸易活动花上相当多时间。称之为贸易，但毫不涉及货币或实物的利润；没有储藏物品，甚至没有长久拥有；收到的物品高高兴兴送赠别人；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以物易物；整个活动完全由礼仪和魔法仪式调控。这依然是贸易：环状群岛的岛民定期组织大规模远航，把一种贵重物品送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岛屿居民，另一些人的远航把另一种贵重物品送到逆时针方向岛屿居民[109]。



最后，两组物品（传统手工制作的白贝壳臂章[110]和红贝壳项链[111]）沿着群岛绕了一圈，足足要十年时间。再者，Kula 贸易一般要求个别岛民与对等伙伴互赠同样贵重的臂章和项链，最好是名人曾经拥有的物品。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经长途运输的贵重物品对等交换，无疑可称为贸易。但整个复杂过程全是依照互惠原则行事。



这错综复杂、覆盖数百里地域、跨越数十年时光、联系数以百计岛民和数以千计物品的「时一空一人」系统没有任何记录或管理、也没有任何获利动机。这不是以物易物的倾向，而是互惠的社会行为主导。尽管如此，这结果却是经济领域的巨大组织性成就。可以考虑一下基于严格会计的最先进现代市场体制能否接手这任务。倒霉的经销商面对

[109] http://cla.calpoly.edu/~lcall/213/kula1.gif
[110] http://www.tribalartfinder.com/images/products/Cone%20Shell%20b.jpg
[111] http://www.mossgreen.com.au/imagesart/265_15.jpg

无数买卖个别物品的垄断者，每项交易又涉及许多限制条件，可能没法赚取标准利润，他宁可不做生意。

再分配也有其漫长而多样化的历史，几乎持续到现代。〔Namibia 中部山区〕游牧民族 Bergdama 狩猎归来，妇女出外寻找根茎、果实和叶子归家，都预期要把大部份收获献给集体。实际上，这是和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共同分享活动的成果。至此为止，互惠的概念压到一切：今天送赠他人，他日接受馈赠，只不过有些部落，部落首领或其他有名望的人担当中间人，负责接收和分配供应物品，尤其是需要储存的话。这是正常的再分配。显然，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影响可能意义深远，因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原始狩猎人那样民主。不管是有势力家族、名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或是官僚负责物品分配，都会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增加本身的政治权力。



加拿大原住民 Kwakiutl 的冬季赠礼节日[112]，首领炫耀和分配兽皮财富，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受赠者欠他人情、成为他的债务人并最终成为仆从。

所有大规模实物经济体系的运作都借助再分配原则。公元前巴比伦城邦的 Hammurabi 王朝以及尤其是古埃及新王朝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权，把家长制家庭无限倍数扩大，其「共产主义式」分配分级分等，各有差别很大的不同配给内容。要有大量仓库接收农民的劳动产品，不管是养牛人、猎人、面包师、酿酒师、陶工、编织工或其它职业。每件产品要详细登记；如不是在当地消费，就从小仓库转送大仓库，一直送到法老王的中央政府。布料、艺术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宫廷服饰各有独立的贵重物品仓库；还有要大型粮仓、军械库和酒窖。

但金字塔建造者实施的大规模再分配方式并不局限于那些不知金钱为何物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所有古老王国都使用金属货币支付税收和工资，但其他交易利用粮仓和仓库的各种实物支付，仓库的形形式式物品分配给不从事生产的人员使用和消费，包括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印加帝国、巴比伦王朝、古代中国和印

[112] *potlatch；http://ih1.redbubble.net/image.8765000.7666/flat,550x550,075,f.jpg*

度都实施分配制。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有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有由再分配机制促成的细致周密劳动分工。

这原则也适用于封建制度。非洲的种族分级社会有时会出现定居在农民之间的牧人组成上层阶层，而农民依然使用掘地木棍和锄头。牧民收到的礼物主要是谷物和啤酒这些农产品，分发出去的礼品可能是牲畜，特别是绵羊或山羊。这些情况有劳动分工，但一般情况通常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分工：分配经常遮掩剥削现象，但与此同时这种共生现象对两个阶层都有改善劳动分工的好处。从政治角度来说，在这些封建制度社会，牛和土地有特权价值。东非有固定的养牛封地。研究再分配问题的 Thurnwald 教授以此指出封建制度意味着到处都有再分配体系。只有在极先进的条件和特殊环境，这体系才变得极具政治性，例如西欧之改变是因为诸侯要得到保护，礼品改为封建贡品。

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也易于使经济制度融入社会关系，一般是再分配过程通常形成现政权的部份，不管是部落、城邦、专制还是养牛和土地的封建制度。物品生产和分配大体上分为收集、存储和再分配；这模式以首领、庙宇、专制君主或领主为中心。政治权力的基础各有不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亦有不同，所以再分配原则涉及不同的个人动机，例如有猎人自愿与他人分享猎物，而古阿拉伯农民是因害怕惩罚而以实物缴税。

在此故意忽略**同质社会**[113]和**等级制社会**的重大区分；前者的社会结构大体上统一而后者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虽然某些狩猎部落的自由平等成员与奴隶和奴隶主的相对地位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两种社会有非常不同的动机，经济体系可能依然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但各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征，后者是由于非常不同的人际关系与经济体系相互纠缠。

第三项原则注定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可称为「**自产**[114]」原则，希腊人称之为 *oeconomia*，是「**经济** *economy*」的词根。从人种学记录来看，不应假设为个人和组群生产是比互惠和再分配更古老；相反的是有证据推翻正统观念和某些较新近的理论。蛮夷先民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或家人独自采集食物和狩猎。实际上，只有在较先进农业水平才出现自产行为；但即使如此，这与谋利动机或市场制度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封闭组群模式。无论自给自足的单位是小户家庭或庄园大宅，原则是永远相同：即是生产和储存是为了满足组群成员的需求。这原则与互惠和再分配同样广泛，其组织核心的性质无关紧要：可能是父权制家族的性别、村落

[113] homogeneous societies。作者解释 homogeneous societies 是 societies which are on the whole socially unified，与辞典和学术文章惯常的意思略有不同。homogeneous societies 同质社会泛指其成员分享相同价值观、语言、宗教框架和种族的社会，惯常提出的例子有日本，中国和印度。即使接受这定义，也不能否定日本，中国和印度同样有等级制社会。

[114] householding

的地点或贵族大农庄的政治权力。组群的内部组织也无关重要：可能是专制的罗马家族或斯拉夫地区的民主乡村共同体[115]；可能与法国卡洛林家族[116]的庞大领地或西欧一般农民的小耕地。对贸易和市场的需求是一如互惠或再分配制度。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试图把这样的状况建立为常态。从全球市场经济正在迅速衰落的角度回顾既往，必须承认他在《政治学》序言区别家庭自产和赚钱的著名论述或许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预言性的见解，也依然是对这主题的最佳分析。亚里士多德坚持家庭自产的本质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获利，又强调为市场的附带生产不必然要破坏家庭自产，只要例如牛羊和谷物这些经济作物也可以自行生产留作己用，出售剩余产品不一定破坏家庭自产的基础。只有他这样有常识的天才会如此断言谋利动机只是限于为市场而生产，而金钱因素为这情况引入了新元素；不过尽管如此，只要金钱和市场只是附加于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家庭自产，「生产为了使用」的原则是可以运作。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说法是对的，尽管他未能察觉忽视市场的存在是多么不切实际，当时希腊经济已依赖批发贸易和借贷资本。在那年代，Delos 和 Rhodes 诸岛正在发展成为货物保险、海贸贷款和转账银行的商业中心；对比之下，一千多年后的西欧只是一幅原始图景。但牛津大学 Balliol 学院院长 Jowett 犯了严重错误，以为他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掌握家庭自产与谋利之间有差异的本质。他为亚里士多德开脱：「与人相关的知识相互交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不易区分。」亚里士多德确实没有清楚认识劳动分工的含意及其与市场和金钱的联系，也不认识金钱的借贷和资本效用。至此 Jewett 院长的批评有道理，但他不明白谋利的人性含意，不是亚里士多德。他没有看清楚使用与谋利原则上的区别是完全不同文明的关键；两千多年前，在当时粗疏市场经济还没有显示这些原则之前，亚里士多德已准确预测其大略，而 Jowett 面对完全发展成熟范例，却忽略这些原则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责毫无节制，为谋利而生产「不是人的本性」，实际上他是瞄准关键点，即是独立的经济动机剥离了原本含有这些局限的社会关系。

从广义上来说，这命题认为直至西欧封建制度结束时，所知的所有经济制度要么是建基于互惠或再分配或家庭自产，要么是这三项原则的某种混合体。社会组织把这些原则制度化，利用对称、中心和独裁这些模式。在这框架内，一般行为准则约束了多种多样的个人动机，以确保物品有序生产和分配。谋利在这些动机中并不显眼。风俗和法规，魔法和宗教一起促使个人遵守行为准则，而这最终确保个人在经济制度中发挥作用。

在希腊－罗马时代，尽管贸易高度发达，这方面没有中断；特征是罗马政府在本来是家庭自产的经济中施行大规模粮食再分配，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依然没有超越

[115] *zadruga*
[116] Carolingian

这规格：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没有重要作用；其它制度模式发挥作用。

自十六世纪以还，市场既数量多而且重要。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市场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但还没有迹象显示市场即将控制人类社会。相反，规则和管辖比前更严格，没有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若要理解经济制度在十九世纪突然转变为全新类型，必要考察市场史；在回顾以往各种经济制度时往往可以实际上忽略市场。

第四章数据参考

金融与和平

关于上半个世纪国际金融的政治作用，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Corti[117]的罗富财集团著作只涵盖欧洲协同体之前的时期，没有提到集团参与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交易，没有记载〔与罗富财集团有密切关系的〕Bleichroeder 投资银行通过发行国际贷款为 1871 年法国战争赔款融资，以及〔土耳其〕东方铁路公司[118]期间的大量交易。Langer 和 Sontag 的历史著作鲜有提及国际金融问题（Sontag 列举和平因素时没有提到金融）；Leathes 在《剑桥现代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评论几乎是例外。正如法国的 Lysis 和英国的 J. A. Hobson 这些作家的任意兼论直接揭露金融家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或是他们倾向支持损害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趋势。Rudolf Hilferding[119]或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强调来自国家银行业界的帝国主义力量以及与重工业的有机联系。这些论点主要限于德国，肯定未能处理国际银行业界的利害关系。

华尔街对 1920 年代发展的影响近在眼前，不方便客观研究。总的来说，没有人会怀疑尔街的影响波及国际缓和与国际仲裁方面，从和平条约时代到 Dawes 计划、Young 计划和〔瑞士〕洛桑会议前后的清偿赔款。最近的一些文献往往分开私人投资的问题，例如 Staley 的著作特意不包括给政府的贷款，不管贷款是其他政府还是私人投资者提供；这种限制实际上排除了他的有趣研究对国际金融的一般性评价。本书多处引用 Feis 的优秀研究，他几乎涵盖了整个主题，但不能避免没有真实数据的缺失，因为国际金融集团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Earle、Remer 和 Viner 的有价值著作也无可避免有相同的局限。



117 Luigi Conte Corti：1823-88 年，意大利外交家

118 Oriental Railway Company

119 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 年，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代表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变

若要破除对十九世纪的经济迷信，先要详细研究市场的本质和起源，然后理解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在这经济体系中以物易物或交换原则的基本意义。[120]

以物易物，以实物代工资和以物换物是经济行为原则，其有效性取决于市场模式。市场是以物易物或买卖双方会面的场所。除非有这种市场模式存在，至少是部份存在，否则以物易物的倾向没有足够空间，无法产生价格。[121] 一如互惠得助于对等的组织模式、再分配因权力集中而变得较容易、家庭自产必须建基于独裁专制，交换原则的有效性必然取决于市场模式。社会可能有互惠、再分配或家庭自产，但不普遍；如其它原则占据上风，以物易物原则也可能在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在某些其它方面，以物易物原则不是与另外三项原则处在同样地位。与以物易物原则相关的市场模式，比「对等、中心或专制」更具体；与市场模式相比，这三项仅仅是「特征」而已，没有建立只为一项功能设计的制度。对等只是社会安排，没有产生独立制度，而是把现有制度模式化（部落或村庄是否具有对等模式，不涉及任何不同制度）。虽然中心模式往往产生独特的制度，意味没有动机会令制度只服务单一功能（例如村长或中央官员可能担任不同的政治、军事、宗教或经济职务）。最后，经济专制制度只是现有封闭组群的附属特征。

在另一方面，市场模式有特有以实物代工资或以物易物动机，能够建立具体的制度，即是市场。最终，这也是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有极其重要后果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运作是附属于市场。社会关系**镶嵌**[122]在经济体系之内，不是经济镶嵌在社会关系。经济因素对社会存在至关重要，排除了任何其它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基于具体动机和特别地位而组成不同制度，社会必然被塑造以容许该体系按照本身规律运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声言：市场经济只能在市场社会运作。

把多个孤立的市场组织成市场经济体系、把受调节的市场改变为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步骤确实至关重要。无论十九世纪欢呼这是文明巅峰或悲叹这是毒瘤增长，

[120] 原注 1：见本章数据参考。
[121] 原注 2：Hawtrey, G. R., *The Economic Problem,* 1925, p. 13. 「个人主义原则的实际应用全然取决于交易的实务。」但 Hawtrey 错误假设市场的存在是简单地源自交易实务。
[122] embedded

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以为这样的发展是市场扩张的自然结果，没有认识到市场逐渐转变为有巨大力量的自发调节体系，不是市场内在倾向要长出多余的东西，而是社会受到高度人为刺激的效应，以满足机械这人为现象产生的情况。当然没有认识到市场模式的有限性和非扩张性，近代研究令人信服地澄清了这事实。

「市场并非处处都有；如市场不存在，尽管显示孤立状态和孤立的倾向，但却是与任何特殊发展状况无关；同样，市场存在也不能说明什么。」这乏味的句子引自 Thurnwald 的《原始社会经济学[123]》，概括了对这问题的近代研究重要成果。另一位作者从货币角度复述 Thurnwald 关于市场的说法：「从经济学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钱这事实与其它处于相同文化水平但没有使用金钱的部落没有分别。」无需更多论述，只要指出这些话语的更加惊人含意。

市场或金钱是否存在，不必然影响原始社会的经济体系；这反驳了十九世纪的神话：金钱是一项发明，加快劳动分工的步伐和释放人类以物易物的倾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建立市场。实际上，正统经济史是基于对市场重要性有无限夸大的观点。唯一可以从没有市场状态正确导出的经济特征是「某种孤立状态」或「孤立倾向」；对经济的内部组织来说，市场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差别。

理由很简单。市场不是主要在经济之内运行的制度，而是在其外。市场是长途贸易聚会之地。普通的地方市场并不重要。此外，长途贸易和地方市场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因此这两种市场都没有什么压力要建立地域贸易，即所谓内部市场或国家市场。以上每一句话都打击传统经济学家的一些公理式假设，但这些言论严格追随近代研究所呈现的事实。

诚然，这些说法的逻辑几乎与传统学说的基础逻辑相反。正统学说从个人倾向于以物易物开始，从而导出要有当地市场，然后是劳动分工，最后是贸易，然后是外贸甚至包括长途贸易的必要性。依据现有的知识，这次序应该几乎颠倒：真正的起点是长途贸易，这是商品地理位置的结果，地理位置也决定劳动分工。长途贸易往往产生市场，而市场涉及以物易物行为和买卖行为（如有使用金钱）；因此，市场最终为某些人提供机会让他们陶醉于所谓讨价还价的倾向，当然这不是必要的。

这学说的重要特点是贸易源于与经济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环境：「从观察狩猎到**区域以外**取得物品得出的原则付诸应用，导致一些我们后来认为是贸易的交易形式。」[124] 寻找贸易之源，起始点应是从远方取得物品，一如狩猎。「澳大利亚中部 Dieri 族每年七、八月间长途跋涉到南方以取得用于彩绘身体的红赭石…他们

[123]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24] 原注 3。Thurnwald, R. C.,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147.

的邻居 Yantruwunta 族同样到八百公里外的 Flinders 山区取得赭石和沙岩板，用作碾压草籽。在这两个例子，如当地人反对他们采石，可能要动武。」相对于我们惯见的贸易，这种强行采石或寻宝行动明显非常类似抢夺和海盗行径，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事情，后来变为双方「某种形式的交易」，往往只是因为当地有势力人士勒索，或是类似 Kula 贸易圈、西非 Pengwe 远访团的互惠安排，又例如 Kpelle 族族长坚持招待全部宾客从而垄断外贸。诚然，这种访问不是偶然行为，而是真正的贸易行旅；这是我们现在的观点，不是他们当时的观念；物品交易以互赠礼品为名、并经常回访。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尽管人类社会似乎从未完全忘掉外部贸易，这种贸易不是必然涉及市场。最初，外贸更多是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这也极少有和平是双方事务的意思，即使有这样的意思，通常也是按照互惠原则组织，不是以物易物。

这种交易形式转变为和平的以物易物，可追溯两个方向：何谓以物易物，何谓和平。如上所述，部落行旅可能不得不遵守当地有势力人士设定的条件，可能向陌生人强行索取一些对等之物；这种关系尽管不完全是和平性质，但可能导致以物易物：单方面来访变为两方面交往。另一种发展情况常见于非洲丛林的「无声贸易」：通过有组织的休战以避免战斗，而贸易在双方小心谨慎的情况引进了和平，信任和信心这些元素。

众所周知，市场后来成为重要的外贸组织。但从经济观点来看，外贸市场完全不同于地方市场或内部市场，不仅规模有区别，而且制度有不同功能和起源。外贸是运输；重点是某地区缺少某些类型的物资；例子是英格兰以羊毛交换葡萄牙的葡萄酒。地方贸易不用运输，局限于当地物资，因为物品太重、太大或容易损耗。因此，外贸和地方贸易与地理距离有关；地方贸易局限于那些无法克服地理距离的货品，外贸限于能克服地理距离的货品。这种贸易正确地描述为补充性贸易。地方贸易是城乡之间的补充性贸易，外贸是不同气候区域之间的补充性贸易；都是建立在这原则。这种贸易无需意味着竞争，如竞争可能会扰乱贸易，消除竞争不会有矛盾。相对于外部和地方贸易，内部贸易的本质有竞争性；除了补充性交易，还包括来自不同源头但相似货品的庞大数量交易彼此竞争。因此，内部贸易或国内贸易出现之后，竞争才逐渐被接受为贸易的通常原则。

这三种贸易类型的经济功能和起源都非常不同。上文已讨论外贸的起源：因应运输需要歇脚的浅滩、海港、河源或陆路交通交汇，市场应运而生。「港口」成为水路交通交汇点。[125] 欧洲著名集市的短暂昌盛是长途贸易产生某种类型市场的例子；英格兰的专卖城镇是另一个例子。尽管集市和专卖城镇再次突然消失令教

[125] 原注 4。Pirenne, H., *Medieval Cities,* 1925, p. 148 (footnote 12).

条主义进化论者惊惶失措，但港口和城镇在西欧人民定居过程中有巨大作用。即使城镇建立在外贸市场所在之处，地方市场往往在功能和组织两方面都是独立于前者。港口、集市和专卖城镇都不是内部或国内市场的发源地。究竟源出何处？

既然有了个别的以物易物行为，理所当然以为这会导致地方市场的发展，而这样的市场一经存在，也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内部或国内市场的建立。然而这些假设全都不成立。一般而言，个别的以物易物行为不会导致在社会中建立市场，社会有其它经济行为的原则。几乎所有原始社会都常见以物易物的行为，但被认为并不重要，因为这没有供给生活必需品。古代的再分配制度庞大，常见有以物易物行为和地方市场，但至多只是附属性特征。互惠原则也是如此：以物易物行为一般镶嵌在长期关系之中，意味着信任和信心，这情况会消除交易的双边特征。限制因素来自于社会各方面：风俗和法律、宗教和魔法都同样限制了交易行为的人和物、时间和场合。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只是参与大家心中有数的物品交易。西南太平洋小岛 Tikopia 语言的 *Uta* 就是互惠交易中的传统对等安排。[126] 十八世纪观念认为交易的基本特征包括讨价还价的自愿元素和以实物代替工资，在实际交易中没有什么空间；在这交易程序背后这动机很少有机会浮现。

习惯性的表现方式反而是反其道而行。送礼者可能只是把礼品丢在地上，而收礼者假装偶然捡起，或甚至让随从拾起。仔细检视收到的礼品，不是大家接受的行为。有理由相信这高雅态度不是因为对交易的物质方面没有兴趣，而是可以把以物易物的礼节描述为限制这项特征的抵消性发展。

诚然，从已有证据来看，断言地方市场是从个人交易行为发展而来可能是轻率之言。地方市场的源由模糊不清，只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制度有许多安全措施以保护社会的现有经济组织不受市场作为的干扰。人们的礼节仪式是确保市场安宁的代价，限制了市场范围又确保市场在既定的狭窄局限内运行。市场体系最重要的结果是城镇和都市文明的诞生，实际上是这种矛盾发展状况的成果。城镇作为市场的产物，不仅保护了市场，也防止市场向乡村扩张而侵扰社会的现有经济组织。「包围[127]」这单词的两个意思正好涵盖城镇的双重功能：「包含」和「限制」发展。

如以物易物的行为被各种禁忌包围，以避免这种人际关系滥用正常经济组织的功能，那么市场的纪律是更加严厉。非洲坦桑尼亚人数最多的 Chaga 族有这样的例子：「市场必须在墟期定期开放。若是因任何事情未能开放一两天，市场在净化之前就不能做生意…有任何流血事件，市场都必须立即补赎。从那一刻起，妇女不得离开市场，人们不得触摸货品；货品必须先净化才可以带走或用作食物。最

[126] 原注 5：Firth, R.,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ics,* 1939, p. 347.
[127] contain

低限度要实时用山羊献祭。如妇女在市场生孩子或流产，必须采用更昂贵严肃的补赎方式，以生乳畜牲献祭。首领的家宅还须用乳牛血液净化，并逐区喷洒区内的妇女。」[128] 这样的规则使市场扩张更不容易。

家庭主妇在典型地方市场购买日常必需品，农民和工匠出售各自的产品；世上各地的市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种市集在原始社会是相当普遍，而且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几乎保持不变。不管是中非部落，还是法国中古时代的城市，或是亚当•斯密时代的苏格兰村庄，大同小异的市集都是当地生活的附属品。乡村如是，城市也如是。城市的地方市场基本上是街坊市场；尽管这对社会生活极为重要，但没有任何迹象依照本身模式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街坊市场不是内部或国内贸易的起源。

西欧的内部贸易实际上是因国家干预促成。一直至〔十六世纪〕商业革命时代，我们现在当作是国内贸易并不是全国性质，而只是城市之间的贸易。汉萨同盟[129]不是由德国商人组成，而是由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城镇的贸易寡头组成的公会。汉萨同盟没有把德国经济生活「国家化」，而是故意切断了内陆与贸易的联系。安特卫普、汉堡、威尼斯或里昂的贸易决不是荷兰、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的国内贸易。伦敦也不例外，没有什么「英格兰」色彩。这时期的欧洲贸易地图只有城镇，留白的都是乡村地区：从有组织贸易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没有乡村。所谓国家只是非常松散的政治单位，经济是由无数大大小小，自给自足的家庭和不起眼的地方市场组成。贸易局限在有组织城镇的地方性街坊贸易或是长途贸易；两者被严格分开，而且不允许随意渗透乡村。

城镇组织内部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长久分离，对演化论者来说肯定是另一打击；演化论认为事情似乎总是一事生一事。但就是这特殊事实形成西欧都市生活的社会史关键。这颇为支持本书根据原始经济体系的条件所推断市场的起源。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显著分别可能看起来过于刻板，尤其是这导致本书颇为令人惊讶的结论，即是长途贸易和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内部贸易的起源，因而别无选择，只能以政府干预作为解释。最近的研究也证实这结论。不过，先要简略介绍都市文明史，因为这是由中世纪城镇范围内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的特别分离状态塑造。

这分离状态实际上是中世纪城市中心制度的核心。[130] 城镇是**自由民**[131]的组织。只有自由民才有公民身份，而这制度是建基于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间的区别。乡

[128] 原注 6。Thurnwald, R. C., *op. cit.*, p. 162-164.

[129] Hanseatic League/ Hanse。十二至十三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中欧诸城组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国北部城市为主。

[130] 原注 7：本文表述追随 H. Pirenne 的知名著作。

[131] burgesses

下的农民和来自其它城镇的商人很自然都不是自由民。但是，尽管城镇有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对付周边的农民，但不能加诸外国商人。因此，自由民在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的地位是完全不同。

关于食品供应，规章要求强制公开交易和禁止中间人，以管制贸易和防止提高物价。但这些规章只适用于城镇之间及周边地区的贸易，长途贸易有完全不同的管制。香料、咸鱼或酒类要经长途运输，因此是属于外商及其资本性批发贸易的范围。地方规章不能管制这种贸易，只可以尽可能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并为此而完全禁止外商从事零售。在进口方面，资本性批发贸易量增长越多，强行将其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的措施就越严格。

在工业产品方面，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分离更为深切，影响出口生产的整体组织。原因在于组织工业生产的行业公会的性质。地方市场的生产是根据生产者的需要而管制，因而把生产限制在有利可图的水平。这原则很自然不适于出口，因为生产者的权益不会为生产设限。因此，虽然地方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出口生产只受到行业公会的常规控制。那时代的主导出口产业是布匹贸易，实际上建基于资本性的受薪劳工制。

地方贸易与出口贸易之间越来越严厉的分离，是都市生活对灵活资本威胁要瓦解城镇制度的反应。典型的中世纪城镇要避免威胁，不是试图化解可控制的地方市场与变化多端又不可控制的长途贸易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最严厉执行排斥和保护政策来面对危险；这些政策是其生存之道。

实际上，这意味着城镇致力建立任何可能的障碍以阻止资本性批发商迫切要求的国内市场或内部市场。通过维持非竞争的地方贸易和城镇之间同样非竞争长途贸易的原则，自由民利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贸易范畴纳入乡村，也阻止开放城镇之间的一视同仁贸易。正是这发展迫使领土国家走到最前线，成为市场「国家化」的工具和创立内部贸易。

十五和十六世纪时，国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把营商体系强加诸极度保护主义的城镇和诸侯国。重商主义摧毁了地方贸易和城市间贸易的过时**特殊主义**[132]，清除了这两种非竞争商贸活动之间的屏障，为国内市场扫除障碍，而国内市场则越来越忽视城乡之间以及各城镇及省份之间的区别。

营商体系实际上是人们面对许多问题时的反应。从政治上来说，中央集权国家是商业革命召唤的创新；商业革命把西方世界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带，促使较大规模农业国家的落后人民为了商业和贸易而组织起来。就外部政治

[132] particularism

而言，建立主权是时代的需求；因此，重商主义的治国之道包括为外交事务的力量而调集整个国土的资源。就内部政治而言，统一被封建主义和城市特殊主义分裂的乡间是这种努力的必要副产品。

就经济而言，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即是私人囤积的财富，因此尤其适用于商业发展。最后，把传统的地方自治体系扩大到整个国家领土，为中央政府经济政策提供了管理技能。法国的行业公会每每是国家机构，扩大到整个国家；在英格兰，围城城镇衰落，致命削弱行业公会制度，乡村在没有行业公会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工业化；与此同时，在英法两国，贸易和商业扩大到全国各地，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这情况就是重商主义的内部贸易政策的起源。

国家干预行动从特权城镇的约束下解放了贸易，现在需要解决城镇曾经成功对付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威胁：垄断和竞争。当时众人皆知竞争最终肯定导致垄断，对垄断的畏惧比后来更甚，因为这往往影响生活必需品，容易置社会于险境。解决办法是全面管制经济生活，但这一次是在全国范围而不再只是在自治区。以现代眼光来看，可能容易认为排除竞争是目光短浅，但实际上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市场运作的手段。因为买方或卖方的任何暂时侵扰市场的行为肯定会打破市场平衡，挫伤一般买家或卖家，导致市场停止运作。从前的经销商无法肯定货物卖得好价钱而停止供货，而供给不足的市场成为垄断商家的猎物。需求方面有程度较少的同样危险，因为需求快速减少之后可能是需求垄断。政府为了使市场摆脱特殊主义的限制和各种收费及禁令，所采取的每步骤都危及生产和分配的有组织制度；这制度受到无节制竞争和无执照商人侵入的威胁，只从市场「捞好处」但不保证市场长期存在。因此，虽然新的国内市场无可避免具有某程度的竞争，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管制特征，不是新的竞争元素。[133] 经济体系的广泛基础依然是为生计而劳动的自给自足农户，逐渐通过内部市场的形成而被集成庞大的国家单位。这国内市场现与地方市场和外国市场并存和部份重迭。内部商贸补充农业，而内部商贸是相对孤立的众多市场，与在农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经济原则完全并行不悖。

以上总结本书对工业革命时代为止的市场史概述。众所周知，人类史的下一阶段试图建立庞大的自发调节市场。西方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特有政策没有预示这独特的发展结果。重商主义「解放」贸易，仅仅是把贸易从特殊主义中解放，但同时却扩大管制范围。经济体系被淹没在一般的社会关系；市场仅仅是社会权威为了控制和管制而订立制度的附属特征而已。

[133] 原注 8：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748. "The English constrain the merchant, but it is in favor of commerce."

第五章数据参考

「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参考文献

十九世纪曾试图建立基于个人谋利动机的自发调节经济体系。本文认为如此的冒险行为本质上是极不可能的事情。本文只关注这方法意味着对生活和社会的扭曲观念。例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假定人们的行为一如市场的商贾是「自然」的行为，而任何其它行为模式都是非自然的经济行为，是干预人类本能的结果；只要人类听其自然，就会自发形成市场；不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道德基础，其可行性起码是建基于人类不可改变的特性，等等。与这些主张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现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现代研究证言，涉及诸如社会人类学、原始经济、早期文明社会史以及一般经济史。确实，不管明示或暗喻，经济自由主义哲学包含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假设，几乎全都被驳倒。以下是一些引文。

（1）「谋利」的动机不是人类的「天性」。

「原始经济的典型特点是生产或交易没有谋利的意欲。」(Thurnwald,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xiii) 「另一个必须彻底被推翻的概念是目前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原始经济人**概念。」(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30, p. 60) 「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派的理想型在理论和历史观点都是误导，必须反对。」(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IV, p. 11).

（2）期望劳动有偿不是人类的「天性」。

「在较文明的社会中，谋利经常是劳动的刺激因素，但在原始的天然状态中从来没有激励劳动的作用。」(Malinowski, *op. cit.,* p. 156) 「未受影响的原始社会根本找不到劳动与有偿报酬的想法有任何联系。」 (Lowie, "Social Organiz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V, p. t4). 「没有地方出租或出售劳力。」(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Bk. III, 1932, p. 169) 「把劳动视作责任，无需补偿…」很普遍。(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1929) 「即使在中世纪，因为赚工资而为陌生人工作是闻所未闻。」「陌生人与责任没有个人联系，因此应为荣誉和认同而劳动。」游吟乐师是陌生人，「接受报酬，因而被人鄙视。」(Lowie, *op. cit.*)

（3）把劳动限制在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不是人的「天性」。

「我们留意到到工作从来不局限于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而是超出绝对必要的数量，这归因于自然或已成习惯要有所为的功能性欲望。」(Thurnwald, *Economics,* p. 209) 「劳动量总是超过严格需要。」(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p. 163)

（4）劳动的常见激励因素不是谋利，而是互惠、竞争、工作的乐趣和社会认可。

互惠：「即便不是全部，大部份经济行为属于某种互惠送赠和回赠的链条，长期而言两方平衡，双方同等受益…。如某人的经济行为经常固执地不服从法规，很快会被社会和经济秩序排斥—这

人也非常清楚。」(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6, pp. 40-41)

竞争：“竞争是尽力表现，尽管目标一致，但竞争的表现却极不一致…为力争优秀而重复各种模式。」 (Goldenweiser,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p. 99) 「把大木柱搬到庭园或搬走已收割的山药，人们在速度、干劲和能够举起的重量方面相互竞争。」(Malinowski, *Argonauts,* p. 61)

工作的乐趣：「为工作而工作，是〔新西兰〕毛利族人不变的特点。」(Firth, "Some Features of Primitive Industry," *E.J.,* Vol. I, p. 17) 「大部份时间和劳动花在美观美化的事情，庭园打扫整洁，清除所有垃圾；筑起精致又牢固的栅栏，特别是支撑结实和粗大的山药杆子。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种植庄稼要做的事；但毫无疑问土人尽心尽意已远远超出纯粹必需的限度。」(Malinowski, *op. cit.,* p. 59)

社会认可：「庭园收拾得尽善尽美，是某人社会价值的一般指数。」(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II, 1935, p. 124) 「预期小区人人一样的勤奋。」(Firth,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y,* 1939, p. 161) 「印度洋的安达曼岛人认为懒惰是反社会行为。」(Rat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受命于他人而劳动，是社会服务，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服务。」(Firth, *op. cit.,* p. 303)

（5）从古至今人性皆是如此。

Linton 在《人类研究 *Study of Man*》提醒要注意心理学理论的性格决定论，主张「全面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性格〕类型的整个范围普见于所有社会…。换句话说，观察者一旦看透了文化差异的屏障，会发现各式人等基本上和我们相同。」（p. 484）。Thurnwald 强调人类在所有发展阶段极为相似：「上文研究的原始经济与其它形式的经济没有区别，都是关乎人际关系，并建基于相同的社会生活普遍原则。」(*Economics,* p. 288)「人类的自然元素有一些基本相同的集体情绪，足以解释人类社会存在重复出现相似结构。」("Sozialpsychische Ablaufe im Volkerleben."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383) Ruth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 *Patterns of Culture*》最终是基于相似的假设：『愚见以为普世人类的性格相当稳定，似乎每一社会都潜在大致相似的分配，似乎文化根据传统模式从中选择，把大多数人铸为一体。例如，按照这种解释，「灵魂出窍」的出体经验是局限于任何人口的少数人。如这种体验得到尊重和奖赏，有相当比例的人会演示或效仿…』」（第 233 页）。Malinowksi 的著作始终坚持相同的立场。

（6）经济体系一般是嵌镶于社会关系；非经济动机确保物品的分配。

原始经济是「是社会事件，把各人作为有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 这同样见诸财富、劳动和实物交易。「原始财富不具有经济特性而是社会特性。」（同上）。劳动能够「有效工作」，因为这「被社会力量整合为有组织的努力。」(Malinowski, *Argonauts,* p. 157) 「商品和服务的实物交易大多数在固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或与一定的社会关连有关，或是涉及非经济事务的相互依存关系。」(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39)

支配经济行为的两项主要原则似乎是「互惠」和「贮存与再分配」：**「整个部落生活渗透着频繁的交换。」**(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 「今天之给，有日后之得作为补偿。这是遍及原始生活的每一层关系的互惠原则结果，…」(Thurnwald, *Economics,* p. 106)互惠之变得可能，「每一原始社会都有一定的制度〔两重性〕或是结构的均衡，作为互惠责任不可缺少的基础。」(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25)「〔巴布亚新基内亚〕Banaro 族人先人灵位的对称分隔是以同样对称的社会结构为基础。」(Thurnwald, *Die Gemeinde der Banaro,* 1921, p. 378) Thurnwald 发现，「贮存和再分配」的做法最为普遍，从原始狩猎部落一直至最大的帝国都适用；与互惠行为有时互不相干，有时相互结合。物品由中央以各种各样方式收集，然后再分配社会各人。例如，在太平洋群岛，「国王作为第一部族的代表人物，接受部落的收入，随后以赏赐形式再分配各人。」(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 这种分配功能是中央机构政治权力的主要源头（同上，第 107 页）。

（7）为自己和家人储存食物不是初民生活的部份。

经典著作假定「前经济人」不得不照料自己和家庭。Carl Buecher 本世纪之交的开拓性著作重提这项假设并广泛传播。最近的研究一致纠正了他的观点。(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oari, pp. 12, 206, 350 ; Thurnwald, Economics, pp. 170, 268, an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46; Herskovits,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p. 34; 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 footnote).

（8）互赠与再分配是经济行为原则，不仅适用于小原始社会，也适用于庞大而富有的帝国。

「分配有本身的独特历史，起始于狩猎部落的最原始生活。」「…较为现代和有较明确阶层的社会其情况不同…」「牧人与农民的接触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这些社会的各自情况有颇有差异。随着一些家族的政治权力提升和专制君主崛起，分配的功能增大。族长收受农民的礼物，现已变成〔税收〕，分发百官，特别是附属宫廷的官员。」

「这发展涉及更复杂的分配制度…。」 所有古国（古中国、印加帝国、印度各王国、埃及、巴比伦）的税款和工资利用金属货币，但更多利用储存在谷仓和仓库的实物支付…分配给官员、士兵、有闲阶级这些不参与生产的人口。在这个例子，分配实现了基本的经济功能。」 (Thurnwald, *Economics,* pp. 106-8).

「谈到封建主义，我们通常想到中世纪欧洲…。然而，这是一种体制，很快呈现在有阶层的社会。大多数交易是实物形式，上层阶级声称独霸所有土地或家畜；这些事实是封建主义的经济起因…。」（同上，第 195 页）。



第六章
自发调节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

  [134]

上一章简略概述经济体系和市场，可见在我们这时代之前市场从来都只是附属经济活动。一般而言，经济体系被归入社会体系，

而市场模式总能配合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原则。这模式背后的以物易物和交换的原则没有因为扩大而牺牲其它原则的倾向。在重商主义中最高度发展的市场制度，是在中央政权控制下繁荣兴旺，政权在家庭经济和国民生活两方面都培育了专制制度。规章制度和市场实际上是一起成长。没有人知道有自发调节的市场；实际上，自发调节这概念的出现是完全背离发展趋势。有了这些事实才可以完全理解市场经济背后的一些不寻常假设。

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系，负责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这种经济体系源于预期人类行为是为了赚取最大金钱收益。这假设市场价格固定的商品供给（包括服务）是相等于在这价格的需求；又假设货币的存在，发挥拥有者购买力的功能。因此生产是由价格控制，因为指导生产者的利润是视乎价格，商品分配也视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有了收入商品才可以在社会成员中分配。这些假设认为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只是由价格独自确定。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因此，所有生产要素都有市场，不仅只是商品（必然包括服务），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也有市场，其价格分别称为商品价格、工资、租金和利息。这些术语表明价格形成收入：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价格，是出资人的收入；租金是使用土地的价格，是地主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的价格，是劳工的收入；最后，商品价格是企业管理服务出售者的收入，利润实际上是两组价格之差，即是商品价格减去生产成本之差。如果这些条件全都得到满足，来自市场销售的全部收入正好足够购买所有

[134] http://en.docsity.com/news/wp-content/uploads/2012/03/Economic-resources.gif, http://www.fltia.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money-bags.jpg

产品。

国家及其政策有另一组假设：不应抑制市场的形成，收入必须源自销售；不得干预价格随市场条件而变化，无论价格是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或是资本价格。因此，所有生产业要素都要有市场[135]，而且任何措施或政策不得影响这些市场的运作。无论价格、供给和需求都不应固定或管制；正确的政策或措施必需创造条件，让市场成为经济领域的唯一组织力量，从而有助确保市场自发调节。

为了全面理解，先暂时回顾重商主义制度及其致力发展的国内市场。在封建制度和行业公会制度，土地和劳力是社会组织本身（资本还没有发展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的部份。作为封建秩序的关键要素，土地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其地位和功能由法律和习俗确定。土地所有权是否可以转让？如果可以，可以转让何人？有什么限制？产权包括什么？一些土地有什么用途？所有这些问题被剔除在买卖组织之外，被另一组完全不同的制度规管。

劳动力的组织也是如此。一如以往历史的其它经济制度，行业公会制度下的生产活动其动机和条件被镶嵌在社会的一般组织。师傅、满师学徒和学徒之间的关系，行会的规矩，学徒的数目以及工资都受到行业公会和城镇的习惯和规章管制。重商主义制度只是统一这些条件；或是英格兰以法例出之，或是法国把行业公会「国有化」。土地的封建地位被废除，但只限于切断省内特权；其他土地仍然是**在商业范畴之外**[136]，英法两国就是如此。直至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作为农庄地主依然是法国社会特权之源；甚至在此之后，英格兰关于土地的不成文法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尽管重商主义偏向商业化，但始终没有攻击保护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的保障，使其成为商品。英格兰在通过〈1563 年工匠法[137]〉和〈1601 年济贫法[138]〉把劳动力「国有化」，不再受危险威胁；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一贯反对农庄地主从中得利的原则。

无论重商主义如何坚持商业化作为国家政策，但对市场的概念却违反市场经济，最好左证是极度扩大国家对产业的干预。重商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宫廷谋划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中央集权的官僚与保守的特殊主义者，他们通通对这一点没有

---

[135] 原注 1：Henderson, H. D., *Supply and Demand,* 1922. 市场的实务有两方面：为不同用途分配要素，以及组织各项力量以影响各项要素的总体供给。

[136] *extra commercium*

[137] Statute of Artificers。〈工匠法〉限制价格，设定工资上限，限制劳工的人身自由和监管培训。当地官员有责任控制农业工资；行业工会控制城镇的工资。这实际上把以前封建时代工艺行业公会的功能交给新成立的英格兰国家。

[138] Poor Law。1601 年伊莉萨白一世女王颁布第一部〈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负责济贫工作，授权当地官员以教区为管理济贫事宜单位，征收济贫税及核发济贫公帑。救济细节因人而异：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在指定人家寄养，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当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

分歧；他们意见不同的只是针对管制方法：行业公会、城镇和省份诉诸风俗习惯和传统，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偏重政令和法规；但他们都一致反对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的概念，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法国在 1790 年才废除工艺行业公会和封建特权；英格兰在 1813-14 年间才废止〈工匠法〉，1834 年才废止〈济贫法〉。直至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这两个国家才讨论建立自由的劳工市场，而经济生活自发调节是完全超出那时代的概念。重商主义者关心通过贸易和商业开放乡间资源，包括充分就业，但理所当然地接受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在这方面，重商主义者的观念一如他对政治领域的现代观念大相径庭；重商主义者相信开明独裁君主的绝对权力不受民主调和。正如民主制度和代议政治的过渡涉及彻底逆转那时代的趋势，十八世纪末期市场从被管制转变为自发调节也代表着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

自发调节的市场从制度上把社会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就整体社会的角度而言，这两分法实际上只是重申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可以推论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有这两个分离的领域，不过这样的推论是建基于谬误。诚然，任何社会存在都必然有某种制度以确保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但这不意味有独立的经济制度存在；一般来说，经济秩序仅仅是身处的社会的功能而已。上文已指出，无论是部落、封建或重商的社会都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制度。十九世纪实际上是独一无二，偏离常规的时代：经济活动独立，并归因于独特的经济动机。

除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的制度模式无法运作。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本书分析市场模式的整体情况得出这结论，以下较为详尽说明理由。市场经济必然由全部产业要素组成：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在市场经济，最后一项是产业活动的必需要素；市场机制纳入资金具有深远的制度性影响。）劳动力和土地就是组成每一社会的两部份：人类本身及其身处的大自然环境。市场机制纳入这两要素，意味着社会的本质要服从市场规律。

现在可以更具体探讨市场经济其制度性本质和所涉及的社会风险。首先，下文描述市场机制何以能够控制和指导产业活动的实际要素；这机制影响社会，本书稍后评估这些影响的本质。

得助于商品概念，市场机制逐步适应产业活动的各种要素。商品在此按实证定义为供给市场销售的产品；而市场也是按实证定义为买卖双方的实际接触。因此，产业每一要素都被认为是为销售而生产，这样才只会受到供求机制与价格互动的支配。实际上，这意味着产业每一要素都必须有市场；在市场上，每一要素都被组成供应方和需求方；每一要素都有价格，与供求一起互动。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市场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大市场。[139]

[139] 原注 2：Hawtrey, G. R., *op. cit.* Hawtrey 认为功能在于「把所有商品的相对市场价值变得彼此

关键是在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是产业的基本要素，也必须组织成为市场；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市场经济体系绝对至关重要的部份。但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显然**不是**商品；假设任何供买卖的东西必然是为销售而生产，这说法不适用于这些要素。换句话说，根据商品的实证性定义，这些不是商品。劳动力只是人类活动的另一名称，与生活本身同在，不是为销售而生产，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人类活动也不能脱离生活的其余部份、不能储存或移动；土地是大自然的另一名称，不是人生产的；最后，实际资金（金钱）只是购买力的象征，通常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借助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产生。这三项没有一项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对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商品描述完全是虚拟。

无论如何，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市场得以组织起来，是得助于这虚拟说法[140]；这些要素实际上在市场买卖，其供求规模庞大；任何可能抑制这种市场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会实际上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自发调节。因此，对整体社会而言，**虚拟商品**[141]的说法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原则，以最变化多端的方式影响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即是，原则上任何措施或行为不得阻碍依照虚拟商品这说法建立的市场实际运作。

就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而言，这样的假设现在是无法站住脚。若是让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大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甚至只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社会会因此而毁灭。因为所谓「劳动力」商品是不能推来攘去、不能随便使用或甚至不能被丢在边上而不影响恰好是这特殊商品的载体：个人。在安排个人劳动力时，体系会无意中弃置了附上这标签的肉体、心理和道德实体：「人」。若然丧失了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会因为暴露于社会的效应而消亡，可能死于恶行、颠倒黑白、犯罪和饥饿等剧烈社会混乱。大自然满目疮痍，破坏周围环境，污染河流，军事安全岌岌可危，失去生产食物和原材料的能力。最后，由市场管理购买力会一再杀死商业企业，因为资金短缺和泛滥的破坏力一如原始社会的洪水和旱灾。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但除非社会的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商业组织得到保护，免受血汗工厂蹂躏，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承受这样粗疏虚拟假设的体系影响，哪怕只是极短时期。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本质其根源在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以购买和销售的形式组织起来。[142] 商业社会没有其他组织生产的方法。在中世纪后期，出口工业生产是由富裕自由民组织，在家乡城镇直接监督生产。后来，在重商社会中，生产由商

相若。」

[140] 原注 3。马克思论及商品价值的崇物特征，是指真实商品的交易价值，与本文提到的虚拟商品无关。

[141] commodity fiction

[142] 原注 4：Cunningham, W.,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人组织，而且不再局限于城镇；这是「走出去」时代，纯粹做生意的资本商人向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材料，控制生产过程。从此商人明确掌控工业生产，而且规模庞大。商人了解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也能保证原料供应；原料供应只包括羊毛和靛青染料，有时还包括家庭手工业使用的织布机或编织架。如供应出了问题，手工业工人受害最深，暂时失去工作；但这不涉及昂贵工厂，商人不用负担生产责任的严重风险。几百年来，这体系的力量日增、范围扩大；例如英格兰的主导产业是毛纺业，覆盖大片地域，由服装商组织生产。做买卖的人偶然也涉及生产，但无需其他动机。创造商品不涉及互助形式的互惠态度，不用照顾户主的需要，不用关心工匠一展身手的自豪感，无需公众夸奖——只有商人最熟悉的利润动机。直至十八世纪末，西欧的工业生产只是附属于商业。

若然机器便宜、不是专用工具，这情况无需改变。家庭手工业要利用同样时间生产更多商品，可能促使户主使用机器以增加收入，但这事实本身不必然会影响生产的组织。便宜的机器是工人或商人所有，这对双方的社会地位会造成一些差异，也几乎肯定会影响工人的收入；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经济状况要好一些；但这不会迫使商人变成工业资本家，也不会限制商人和从前一样只借钱给拥有工具的工人。商品出路极少出问题；较大的困难依然是原材料供应，因为供应有时不可避免被打断。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拥有机器的商人所受的损失也不是严重。彻底改变了商人与生产的关系不是上文述说的机器，而是发明了配置精良的专用机器和工厂。商人引进了新的生产组织，这决定了整个转变历程；但使用配置精良的机器和工厂涉及工厂体系的发展，因而改变了商业和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后者越来越吃重。工业生产不再附属于商人的买卖组织，而是涉及带有风险的长期投资。除非持续生产得到合理保证，否则难以承受这样的风险。

工业生产变得愈复杂，就更多生产要素的品种需要保证供应。当然，这些要素中的老三项尤其重要：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商业社会只有一种方法组织这些要素的的供应：买入；因此要组织这些要素在市场买卖，即是成为商品。市场机制扩大到产业的三大要素，是商业社会引进工厂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生产要素必须可以买卖。

这与对市场体系的需求同义。这样的制度要借助相互依存的众多市场以确保自发调节，利润才得到保证。鉴于工厂体系已组织成为买卖过程的一部份，因此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必须转变为商品，才可以维持生产。当然，这实际上不可能转变为商品，因为这老三项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但假设这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虚拟说法已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老三项的劳动力最为突出：劳动力是「人」的代名术语，不是雇员就是雇主；因此劳动力的组织会与市场体系组织一同改变。但由于劳动力的组织只是老百姓生活形式的另一种叫法，这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会伴随社会自身组织的改变。沿着这路线，人类社会已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物。

上文提到英国历史上圈地行动的灾祸与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惨剧是相类似，又指出社会进步通常是以社会紊乱为代价。如紊乱来得太快，社会肯定在过程中崩溃。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调节社会变革的进程，让社会更能承受改变，放缓改变的破坏力，从而解救了英格兰免遭西班牙的厄运。但这不能解救英格兰平民免受工业革命的冲击。人们盲目相信自发性进步，最开明人士带着宗派狂热极力推动无节制和无监管的社会变革。变革为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诚然，若不是有保护性反制行动消减了这自我毁灭机制的行动，人类社会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因此，十九世纪社会史是**双向动力**[143]的结果：一方面是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是对虚拟商品的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扩张，所涉及商品之数量增长至不可思议的规模，但在另一方面措施和政策整合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关的市场行动。在金本位制之下，商品、资本和货币的世界市场为市场机制注入前所未见的动力，但同时出现了深层次运动旨在对抗由市场掌控经济体系的有害作用。社会保护自身以避免自发调节市场体系的内在危险；这是当代历史的最全面特征。



[143] double movement

英格兰劳工及济贫法律大事记

1215 年：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建立（天赋）人权的概念，对自由人权的影响颇大，像英格兰 1628 年的「权利请愿书」以及 1679 年的「人身保护令」都出自宪章第 39 条，美国的联邦宪法及各州的宪法多少受其影响。

1349 年：〈工匠法〉要求人们留在家中，并且要为地主工作，不管地主给予多少报酬。除了老人及无法工作的人，法律禁止乞讨及施舍。首度将贫民分类为值得帮助的穷人如老人、残障者、寡妇幼儿等；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如身体条件可工作却未就业的成人。

1531 年：穷人救济法案授权地方官员许可某些特定的人（如老人及无生活能力的人）在邻近地区乞讨，若无许可而乞讨者则予以处罚。为了执行此法案，官员必须提出判断是否给予执照的标准与程序，并且给予申请者许可的类别。

1601 〈伊丽莎白济贫法〉主张以地方（教区）标准来管理贫穷救济，每一教区纳税人仅对该教区之贫民负责。济贫法也为贫穷儿童制定学徒计划，为依赖人口规划工寮济贫院，而对健壮而不工作的贫民予以严厉惩罚。

1662 年：〈定居与迁移法〉是世上第一条以居住地为资格决定帮助与否的法律。市政当局被授权只能帮助当地的贫穷居民，更排除可能成为受助的依赖人口的司法权利。此法赋予主政者有权评估该地贫困的潜在人口，此法虽严苛而且充满了对贫民的惩罚性，但对贫穷原因的探讨有颇多着墨。

1697 年：Bristol 市设立工寮济贫院，很快传遍整个英国以及部份欧洲。此法的规划本来是为了避免增加济贫税，所以要求穷人必须在工寮工作，否则不予救济以示惩罚。工寮经常与私人企业订定契约由私人企业家管理，让穷人在工寮工作来换取照顾。住在工寮的人经常是非常年幼的儿童，无谋生能力或年老的依赖人口，工寮只给最低度的照顾，却要他们像奴隶一样长时间工作。

1782 年：〈Gilbert 法〉为工寮住民被剥削权利而呼吁要求给他们更人道的待遇，此法案使许多工寮被关闭，建立了穷人可在家中接受救济的制度（院外救济），而且要求六岁以下儿童必须与家人一同安置。其他未关闭的工寮则由市政职员代替企业家管理。

1795 年：史宾汉兰制度订立贫穷线。有工作的人若其收入低于贫穷线可从政府领到

救助，数额根据当时面包价格与该人家中依赖人口数目而定，当物价上涨而工资下降，由公帑补足差额。

1834 年：〈新济贫法〉强调自立原则，再也不认为公共救助是人民的权利，政府也不必为百姓的失业负责，而且建立了「次于合格标准」的原则，意即受助者所得的救济金额绝对不能超过有工作者的最低工资。

1847 年：〈工厂法〉规定妇人及儿童的最高工作时间由原来的 13-18 小时降为 10 小时。

1908 年：〈老年退休金法[144]〉向年满七十岁以上老人发放退休金，唯需经资产调查，而国民无需为此供款。

1911 年〈国民保险法[145]〉确定由在职者、雇主与社会分担国民的医疗和失业救济金开支。

1925 年：〈寡妇、孤儿及老年缴费式退休金法[146]〉

1942 年：Beveridge 的《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书[147]〉催生了其后工党在 1945 年上台执政后扩大国民保险范围和建立国立医疗体制。

录自：简春安〈从典范变迁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略有改写和补充。

[144] Old Age Pension Act
[145] National Insurance Act
[146] Widow, Orphans and Old Contributory Pension Act
[147]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第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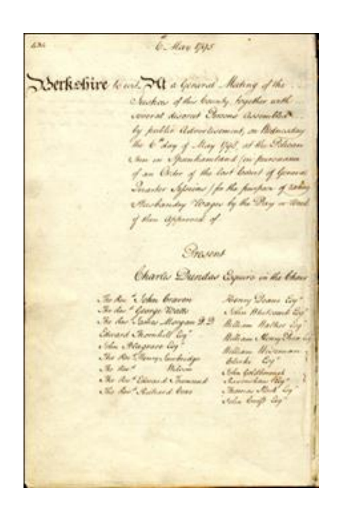
1795 年史宾汉兰制度

十八世纪社会无意识地抵制把社会变成市场的附属物。无法想象有任何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包括劳工市场；但若要建立这样的市场，特别是在英格兰农业文明条件下，无异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组织。在 1795-1834 年间工业革命最活跃时期，英格兰制定「史宾汉兰制度[148]」，〔无意中〕阻止建立劳工市场。

劳工市场实际上是新产业制度下最后组织的市场，在市场经济即将启动才采取这最后步骤；其时老百姓感受到没有劳工市场的缺点是多于引进劳工市场带来的灾难。虽然创立劳工市场的做法颇为不人道，最后人人得益于自由劳工市场。

但就在此时出现了关键问题。自由劳工市场的经济优点无法弥补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不得不引进新的监管制度再度保护劳工，但这一次是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引进诸如工会和工厂法规这些新的保护制度是尽可能适应经济机制的要求，但依然干扰体系的自发调节和最终摧毁了制度。

从这发展结果的广义逻辑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占据了战略位置。



6 May 1795

Berkshire

Present

Charles Dundas Esquire in the Chair

在英格兰，土地和资金的调动是先于劳工。法律严格限制了劳工流动，阻碍国内劳工市场的形成，因为劳工事实上被限制在本身教区之内。1662 年的〈定居与迁移法〉制定了所谓教区佃农制度的规章，直至 1795 年才放宽。若然不是同年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或补贴制度，这步骤可能方便建立国内劳工市场。史宾汉兰制度的意图正好相反，要强力执行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家长式劳工组织制度。1795 年是极为艰苦的年代，当年 5 月 6 日 Berkshire（郡）的地方官员在 Newbury（镇）附近的史宾汉兰（村）的鹈鹕酒馆开会，决定以面包价格为标准，按比例补贴穷人的工资；无论穷人有多少工资，补贴确保他们有最低收入。

官员的著名建议是这样的：如符合质量的一加仑装面包[149]价格为 1 先令，每名贫穷但勤劳的人民每周可得 3 先令补贴，由本人或家中劳工领取，或从平民救济税

[148]原文多处称之为 Speenhamland Law，有点混淆观点。Berkshire 郡地方官员在 Speenhamland 召开会议，为农业工人定出最低收入和救济标准。插图是会议记录首页。因此史宾汉兰制度只是地方措施，不是纯粹定义的 law。译文全以「史宾汉兰制度」出之。

[149] gallon。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出售面包惯常以加仑（容量单位）计，其重量约为 8.6875 磅。

领取补贴（妻子和每名家人可得 1 先令 6 便士）；如面包价格上升至 1 先令 6 便士，每周补贴 4 先令外另加 1 先令 10 便士；面包价格在 1 先令价位上每上涨 1 便士，他本人可得 3 便士，其他家人每人 1 便士。各郡的金额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采用了史宾汉兰标准。这在当时是作为紧急措施，而且不是很正规施行。尽管一般称之为法律，但这标准从未作为法律颁布，但很快就成为英格兰大多数乡村地区的当地规则，实际上这引进了不亚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创新；直至 1834 年被废除，这「法」有效阻止了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两年之前，中产阶级在 1832 年成功闯入权力中心[150]，部份原因是为了消除新资本主义经济面对的这一障碍。最明显的是工资制度权威地要求撤销史宾汉兰制度声言的「生存权利」：在经济人的新制度下，如无需做工就可以过日子，没人会为工资而工作。

十九世纪的作家大多数没有看清楚撤销史宾汉兰制度的另一特点，即是为了领薪族自身的利益，工资制度必须普及，即使这意味会剥夺劳工求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权利」已证明是死亡陷阱。

这矛盾只是表面。据闻史宾汉兰制度意味可以宽松执行〈济贫法〉，但实际上却与原意相反。按照〈济贫法〉，不管能够拿到多少工资，穷人都得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有资格得到救济；以救济代替工资不是原来的意图，也不是必然。按照史宾汉兰制度，即使有工作的劳工也可得到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是低于标准规定的家庭收入。因此，劳工没有物质利益要满足雇主的要求；无论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工资+补贴）都是一样；只有当标准工资（即实际支付的工资）超出标准，情况才有所不同，但工资超出标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雇主几乎以任何工资都可以招聘劳工；不管雇主支付的工资是多么少，济贫税的补贴都使工人的工资达到标准。不出几年，劳工的生产力开始跌至赤贫劳工的水平，因此雇主更有理由不把工资提升到规定标准之上。因为一旦劳工尽心和效率的强度跌至一定水平之下，这等于门面功夫，只做琐碎而无价值的琐事。尽管原则上依然强制人要工作，但实际上院外救济[151]已变得普遍；即使被强制住在济贫院的穷人从事的职业几乎算不上是工作。这等同废除都铎王朝的法律，不是因为较少而是更多家长式管治。扩大院外救济，引入工资补贴，另加家庭主妇和子女补贴，而每项补贴随面包价格加减；这一切等同整体工业活动正迅速消除的监管原则在劳工范畴内却戏剧性复活。

没有什么措施是如此广受欢迎。[152] 父母不用费心照顾子女，子女不再依赖父母；雇主可以随意降低工资，工人不管忙碌还是懒散都不会挨饿；人道主义者欢呼这措施是怜悯之举，尽管不是那么公正，而自私自利者高兴地安慰自己：虽然是怜

[150] 英格兰在 1832 年通过〈改革法 Reform Act〉，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加入了中产阶级。
[151] outdoor relief。申请救济的人无需强制居住在济贫院。
[152] 原注 1：Meredith, H. O., *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08.

悯，但至少不是施舍；甚至纳税人也没有很快认清楚这对税收有什么影响。这制度宣扬「生存权利」，不管这人是否挣钱养家。

最后的结果是可怕的。虽然要过了一段时间老百姓的自尊才降至最低点，情愿领取救济而不挣工资；由公帑补贴工资必然是无底黑洞，并迫使老百姓依赖税收。农民逐渐变得赤贫化；顺口溜说得好：「一日靠补贴，日日靠补贴」，此话确实不假。若不是补贴制度的长期效果，不可能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和社会堕落。

史宾汉兰事件向那个世纪领先国家的人民揭示了他们正在参与的社会冒险行动的真正本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傻瓜乐园的教训；如 1832 年〈改革法〉和 1843 年〈济贫法修正案〉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那是因为这结束了仁慈地主阶级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试图建立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秩序，已经一败涂地。支配这秩序的法则曾大展身手，又与家长式原则绝对对立。这些法则的严厉苛刻已是显而易见，而违背法则的人受到无情报复。

在史宾汉兰制度下，社会被两股对立势力撕裂；一股势力来自家长式管理，保护劳工免遭市场制度威胁；另一股势力在市场制度下组织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并因此剥夺了老百姓从前的地位，迫使他们靠出卖劳动为生，而且同时剥夺了劳动的市场价值。新的雇主阶层正在形成，但雇员没有形成相应的阶层。一场新的庞大圈地浪潮正在调动土地并生成了乡村无产阶级，而济贫法错误施行却妨碍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劳动赚取生计。毫不奇怪当代人对看似矛盾的现象感到惊骇：伴随着近乎奇迹的生产增长是群众近乎忍饥挨饿。到了 1834 年，大家已经有了共识，对许多长于思考的人来说，这是充满情感的共识：随便什么措施都比继续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更可取。要么就消灭机器（就像 Luddite 成员[153]的所为），要么就必须建立正常的劳工市场。由此，人类被迫走上理想国实验的道路。

这一章的篇幅不足以详细论述史宾汉兰制度的经济方面，稍后再谈。从表面看，「生存权利」措施应该完全消灭赚取工资的劳工。标准工资应该逐渐下降至零，由此把实际的工资单完全交由教区处理，这样的话，补贴制度的荒谬就会一览无遗。但当时基本上只是资本主义的预备时代，老百姓依然保持传统思想，行为还不是只受金钱动机的支配。绝大多数乡下人都是自住业主或终生租户，为了不陷入赤贫，愿意选择任何糊口方式，即使要承受随后发生的令人厌恶或可耻的伤残。如劳工能自由团结争取权益，补贴制度当然可能对标准工资有相反作用：因为宽松执行〈济贫法〉，对失业者的救济可能极大帮助工会行动。那可能就是 1799-1800 年不公义的〈反结社法[154]〉出台的原因，否则是难以解释，因为 Berkshire 地方

[153] 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劳工不能改善生活，甚至失去工作。工人起而反抗，毁坏纺织机。事件以虚构人物 Ludd 命名。
[154] Anti-Combination Laws

官员和国会议员整体上是关心穷人的经济情况，况且在 1797 年之后政治动乱已经平息。可以说史宾汉兰制度的家长式干预引起了〈反结社法〉进一步干预。若不是〈反结社法〉，史宾汉兰制度可能有提高工资的作用，而不是实际上压低了工资。史宾汉兰制度与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废除的〈反结社法〉一起导致极具讽刺的结果：即是以财政施行的「生存权利」措施最终却糟蹋了表面上要救助的人民。

对后代人来说，工资制度和「生存权利」措施之间的互不兼容是显而易见；换句话说，只要用公帑补贴工资，资本主义秩序的运作就绝无可能。但当代人未曾理解他们为之铺路的秩序。群众生产力被严重削弱，是阻碍机器文明进步的民族灾祸；只有在这情况下，社会才醒觉有必要取消穷人无条件可获得救济的权利。当时最具专业水平的观察家也不理解史宾汉兰制度的复杂经济内容；但结论似乎是更令人信服：即是工资补贴肯定有内在的邪恶，因为这不可思议地损害了接受补贴的人。

市场体系的缺陷不是显而易见。要清楚认识，必须区别自机器问世以来，英格兰劳工经历的沧桑巨变：首先是 1795-1834 年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其次是其后十年〈新济贫法[155]〉造成的困苦；最后是 1834 年之后对竞争性劳工市场的有害影响；直至 1870 年代工会得到承认后才提供充分保护。按时间次序，史宾汉兰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之前；〈新济贫法〉的十年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与前一时期交叠的最后阶段是市场经济时期。

这三个时期差异悬殊。史宾汉兰制度旨在防止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放慢改变的速度。结果却是老百姓赤贫化，在这过程中几乎不似人形。

1834 年的〈新济贫法〉废除「生存权利」措施，取消了劳工市场的这一障碍。新法的科学性残忍在 1830 和 1840 年代对公众情绪造成极大震撼，以致当时的激烈抗议模糊了后世眼中的图像。确实，随着取消院外救济，许多最贫苦的人被迫听天由命，最凄惨的是所谓「值得帮助的穷人[156]」，他们自尊心极强，不愿进入已经变成耻辱居所的救济院。或许现代历史从来没有比这更加冷酷无情的社会改革，压垮众多生命时只是由救济院假装提出真正贫困的标准。温和的慈善家冷静地提出和实施心理虐待，作为润滑劳动力工厂轮子的手段。不过，大多数的埋怨是归咎突然连根拔起旧制度被和激进变革突然生效。〔英格兰保守党政治家〕Disraeli 公开指责人民生活中这「不可思议的革命」。然而，如果只考虑金钱收入，人民的生活条件会很快就被认为已得到改善。

[155] Poor Law Reform Act
[156] deserving poor

第三阶段的问题更为深层。与所有现代制度中最有能量的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相比，1834 年之后十年因为中央集权的〈新济贫法〉官僚对穷人犯下的暴行只是零星事件。〔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的规模与史宾汉兰制度构成的威胁相似，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是竞争性劳工市场已成为危险之源，不是没有劳工市场。如史宾汉兰制度曾阻止劳工阶层崛起，那么现在的贫穷劳工是被冷酷无情的机制压力形成这样的阶层。如在史宾汉兰制度之下，穷人曾被当作普通动物看待，现在要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而自求多福。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可怜兮兮的堕落，劳工现在是社会的无家可归可怜人。如史宾汉兰制度过度利用邻里、家庭和乡村周边的价值观，现在的老百姓离开家人亲人，连根拔起，远离有意义的环境。简而言之，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守株待兔而奄奄一息，现在的危险是死于暴晒。

直至 1834 年英格兰才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因此，在此之前不能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是已存在的社会体系。不过，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几乎紧随其后开动：工厂法和社会法，以及政治和产业工人阶级运动乘时而起。保护性行动试图阻止市场机制的全新危险，与体系的自发调节发生致命冲突。毫不夸张地说，1834 年〈新济贫法〉为市场体系打通经脉，市场体系的逻辑决定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史。事态的起点就是史宾汉兰制度。

若然本文提出研究史宾汉兰制度即是研究十九世纪文明的诞生，研究重点不是其经济和社会后果，甚至不是这些后果对现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而是现代人大多不知道的事实：〔史宾汉兰制度〕的模子铸造了我们的社会意识。此后几乎已被遗忘的赤贫人口，曾经是人们的主要话题，其影响力可以媲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归功于 Voltaire、Diderot、Quesnay 和鲁索(Rousseau)的思想，〈济贫法〉的讨论影响了 Bentham、Burke、Godwin、马尔萨斯、Ricardo、马克思、Robert Owen、John Stuart Mill、达尔文和 Spencer 的思想；彼等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精神源头的滋养。就是在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的思想带着新的忧虑之情转向本身的社会：Berkshire 地方官员未能阻止后来被〈新济贫法〉释放的革命，把人们的视野转到自身的集体存在，恍如从前未有留意。人们揭开了其存在从未被怀疑的世界：掌控复杂社会的多项原则。虽然这崭新而独特的社会出现在经济范畴，其涵义是普世适用。

进入人们意识的新生现实其形式是政治经济，其令人惊异的规则性和同样令人惊叹的矛盾性必须套入哲学和神学的体系才可以溶入人类的意义。顽固的事实和冷酷的法律似乎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但已在多方面与「和平」和解。这是秘密支撑实证论者和功利论者那些形而上势力的主要动力。面对这些可怕的局限，人类思想的矛盾反应是对从未探索的人类各种可能性领域既有无限希望也有无边失望。希望是完美的期望，从人口和工资法的梦魇中被排出，转而体现在鼓舞人心的进步理念，以致「希望」似乎证明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又令人痛苦的社会转型是有理

有据。「失望」其后被证明才是社会转型的更强大推手。

人被迫无奈接受现世的灭亡：注定或是不再生育儿女，或是因为战争和瘟疫、饥饿和邪恶而灰飞湮灭。社会的残存常态是贫困；食粮有限，人口无限，成为当前问题；正当此时突然有望财富无限增加；这讽刺变得更为苦涩。

对社会的发现与人类精神世界就是如此结合；但是，这新现实，新社会如何转化为生活？作为行为指南，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原则已极度受压，被逼走入几乎是完全矛盾的模式。据说，和谐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是一致，但这种和谐性的自发调节要求个人尊重即使摧毁个人的经济法规。冲突似乎也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不管是个人之间冲突或是阶级斗争，但这些冲突可能只是当前或未来社会更深层次内在和谐的载体。

赤贫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现是紧密交织一起。贫困把人们的目光固定在无法理解的事实，即是贫困与富裕似乎结伴而行。但这只是现代人面对工业社会诸多令人困惑的悖论的第一个。通过经济学之门，人类已进入新居，而这后天环境为那个时代套上唯物主义的光环。对 Ricardo 和 Malthus 来说，没什么比物资货品更真实。对他们而言，市场规律就是人类可能性的界限。Godwin 相信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不得不否定市场规律。Owen 一士谔谔，认为人类的可能性有限，不是因为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自身的规律，他察觉到市场经济面纱背后浮现的现实：社会。然而，他的见解尘封百年。

同时，就着贫困问题，人们开始探索复杂社会中的生命意义。政治经济学以两个对立的视角进入普世范畴，一个视角是进步和完美性，另一视角是决定论和诅咒；政治经济学付诸实践也是以两个对立的方式进行，一是和谐与自发调节的原则，另一是竞争与冲突的原则。这些矛盾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概念。一套全新观念以重大事件终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意识。

第七章数据参考

「市场模式演变」的参考文献

经济自由主义受错觉支配：以为本身的实作和方法是进步法则的自然产物。为了使支持自发调节市场的原则符合这模式，这些原则被回溯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全面扭曲了贸易、市场和货币、城镇生活和民族国家的真正本质和起源。

(1) 原始社会少见「以物易物[157]」的个别行动。

「几乎无人知道以物易物。原始社会的先民非但没有以物易物的渴望，反而讨厌。」(Buecher, *Die*

[157]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p. 109) 「例如不可能以食物的数量表达鱼钩的价值，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交换；太平洋岛民会认为〔鱼钩〕是神奇事物…每种对象是适合特定的社会情况。」(Firth, 同上，p. 340)

(2) 贸易不是在小区内出现；这是涉及不同小区的外部事务。

「在初期阶段，商业是种族群体之间的交易，不会发生在同一种族或部落的人群，而是最古老社会小区的外部现象，只是直接面向外族。」(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 195) 「虽然看上去很奇怪，中世纪的商业一开始不是受本地贸易、而是受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发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 142) 「中世纪的经济因为远程贸易得以复苏。」(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25).

(3) 贸易不依靠市场；其源起是单方面的运送，无论是和平还是其它手段。

Thurnwald 确定了最早的贸易模式只是远距离运送采购和物品，本质是狩猎的远征。远征是否类似找寻奴隶或海盗行为的开战情况，主要取决于遇到的抵抗（同上，第 145、146 页）。「荷马时代希腊人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初是由海盗行为促成，正如挪威海盗一样；在颇长时间两种行业并行发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09)

(4) 市场是否存在，不是基本特征；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

「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无需为此共同拥有其它特征。」(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37) 在早期的市场，「只有明确数量的确定物品可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同前，第 137 页）。「特别值得一提 Thurnwald 注意到原始货币和贸易本质上具有社会意义，不是经济意义。」(Loeb,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153)
当地市场之产生，不是因「武装贸易」或「悄悄以物易物」或其它外贸形式，而是萌生于维护与邻区进行交易这有限目的的某个聚会地点的「和平」。「本地市场的目的是为居住当地的人口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这说明了本地市场每星期一次的墟期、吸引的圈子非常有限以及活动范围局限于小规模零售业务。」(Pirenne, *op. cit.,* Ch. 4, "Commerce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7) 即使到了后来，与市集比较，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市场满足了本地居民的需求，只有邻近的居民到来；商品都是乡村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35, Vol. I, p. 221) 本地贸易「通常发展自农民和从事家庭工业的副业，一般来说是季节性工作…」(Weber, 同上，p. 195) 「乍看起来，很自然会想到商人阶层是慢慢从农业人口中成长起来。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理论。」(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11)

(5) 劳动分工不是源于贸易和交易，而是源自地理、生物性和其它非经济因素。

「劳动分工决不是复杂经济情况的结果，尽管理性主义理论认为如此；原则上这要归因于生理的性别和年龄差异。」(Thurnwald, *Economics,* p. 212) 「几乎所有劳动分工只是在男女之间。」(Herskovits, *op. cit.,* p. 13)劳动分工可能源于生物性因素的另一情况：不同种族群体的共生关系。「不同种族群体〔通过形成社会的上层阶级戏〕转变为专业—社会群体。从而创造了的组织一方面是基于附属阶级的供养和服务，一方面是基于领导阶层家长的分配权力。」(Thurnwald,

Economics, p. 86) 这是国家源起的一个因素。(Thurnwald, *Sozialpsyschische Ablaufe,* p. 387)

(6) 货币不是决定性的发明；其是否存在对经济类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经济学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钱这纯粹事实与不使用金钱的部落没有很大区别。」(Loeb, *op. cit.,* p. 154) 「如有使用货币，其作用大异于在我们文明社会的作用。货币一直是具体对象，从来不是抽象地代表价值。」 (Thurnwald, *Economics,* p. 107)。以物易物的种种难处没有导致「发明」货币。「传统经济学家这种陈旧的观点与人种学研究背道而驰。」(Loeb, *op. cit.,* p. 167, footnote 6) 商品既有金钱的功能又有权力属性的象征意义，由于这些特殊效能，不可能「只从单方面的理性角度来看待〔商品〕的经济拥有。」(Thurnwald, *Economics*) 例如，金钱可能只用于支付工资和税款（同前，第 108 页）或买下妻子，支付赔偿或罚款。「因此，从这些有国家之前的例子可见，有价物品的评估是源自习俗性价值的数量，领导人物的地位和他们与几个群体平民的具体关系。」(Thurnwald, *Economics,* p. 263)

总的来说，货币像市场一样外部现象，对社群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贸易关系决定。「金钱的观念通常是从外部引进。」(Loeb, 同上，p. 156) 「金钱作为交易的一般媒介其作用源于对外贸易。」(Weber, *op. cit.,* p. 238).

(7) 对外贸易不是源于个体而是集团之间的贸易。

贸易是「集体作业」，涉及「集体取得的各种物品。」，源自「集体的贸易旅程。」「为这些通常具有外贸性质的远征队伍做出安排的，体现了集体性原则。」(Thurnwald, *Economics,* p. 145) “「总之，最古老的商业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换关系。」(Weber, 同上，p. 195)。中世纪贸易明显不是个体之间的贸易，而是「一些城镇，小区或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I, "The Middle Ages," p. 102)

(8) 乡村在中世纪被排斥在贸易之外。

「一直到十五世纪及在这世纪，城镇已成为商业和工业的唯一中心，情况是没有什么生意跑到开放的乡郊。」(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69) 「与农村贸易和农村手工业的斗争持续了至少七、八百年。」(Heckscher, Mercantilism, 1935, Vol. 1, p. 129) 「随着民主政府的发展，这些措施变得更严厉…」「在整个十四世纪，经常派出正规的武装远征军对付附近的所有乡村，把织布机和染缸破坏或运走。」(Pirenne, *op. cit.,* p. 211).

(9) 中世纪没有城镇之间的随意贸易。

城镇之间的贸易意味着特定城镇或城镇群之间有优惠关系，例如伦敦和德国之间的 Hanse 结盟。这些城镇之间的关系借助互惠和报复的原则。例如，如欠债不还，债权人所在城镇的地方官员可以求助债务人所在地的官员，要求一如处理当地案件执法，「并威胁如欠债不还，会对城镇全部人等报复。」(Ashley, *op. cit.,* Part I, p. 109).

(10) 没有国家保护主义。

「从经济角度看，在十三世纪几乎无需区分不同的国家，因为在耶教范围内社会交流面对的障碍比我们今天遇到的阻碍要少得多。」(Cunningha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 p. 3) 直至十五世纪政治边界才出现关税。「在此之前，没有证据显示出〔国家〕有一丁点兴趣要保护本国贸易免受外国竞争。」(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92) 所有贸易的「国际」贸易都是自由开放的。(Power and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1) 重商主义强迫国内城镇和省市有更自由的贸易。

Heckscher 的 1935 年著作第一卷的书目是：《重商主义是统一团结的制度 *Mercantilism as a Unifying System*》。因此重商主义「反对把经济生活限制在特定地方，阻碍国内贸易的任何措施。」(Heckscher, *op. cit.,* Vol. II, p. 273) 「城市政策有两方面与国家的经济目标有冲突：对乡村的压制和对抗国外城市的竞争。」（同上，第 1 卷第 131 页）。「重商主义把各国国有化，是通过商业行为把本地做法推广至全国。」(Pantlen, "Handel." In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VI, p. 281) 「竞争通常是由重商主义人为培养，目的是为了通过供求的自动调节来组织市场。」(Heckscher)。Schmoller (1884)是第一位近代作家认识到商业制度的自由化倾向。

(12) 中世纪的监管主义极为成功。

「在旧世界衰落以后，中世纪的城镇政策很可能是西欧首次试图根据一致的原则在经济方面监管社会，而且颇不寻常地成功。独霸天下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鼎盛时期也许是这情形；但从整个时段来看，与城镇政策的持续韧性相比，自由主义是短暂和逐渐消失的插曲。」(Heckscher, *op. cit.,* p. 139) 「它们通过监管制度达到这目的，巧妙地令监管措施适应它的目标，可以视为杰出…。城市经济比得上同时期的歌德式建筑。」(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217).

(13) 重商主义把城市的实践扩展至全国。

「结果是城市政策扩展到更广泛地区，这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地方性政策。」(Heckscher, *op. cit.,* Vol. I, p. 131)

(14) 重商主义是最成功的政策。

「重商主义创造了复杂精美，让人满意的优秀制度。」(Buecher, 同上， p. 159) 〔法国〕为私营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定下无数的「规章」，成就惊人。(Heckscher, 同上，Vol. I, p. 166) 「国家规模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政治中央集权的结果。」(Buecher, 同上，p. 157) 要归功重商主义的监管制度「建立了劳工法规和劳工纪律，比受限于道德和科技的中世纪城镇政府的狭隘特殊主义能够提出的法规要严格得多。」(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IV)



第八章
前因后果

史宾汉兰制度起初只是权宜之计，但后来决定性塑造了整体文化，而又在新时代能够启动之前被抛弃。这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典型产物，值得当今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关注。

在重商主义制度下，英格兰的劳动力组织是建基于〈济贫法〉和〈工匠法〉。把1536-1601年间的诸多法律称为〈济贫法〉，无可否认是误称；实际上，这些法律与后来的修订部份形成了英格兰劳工法规半数之多；另一半是由1563年〈工匠法〉组成。后者针对雇员；〈济贫法〉针对可称之为失业者和不可能被雇用的人（老人和孩子除外）。这些措施后来又加上1662年关于人民合法居所的〈定居法〉，严格限制人民迁居的自由。（当然，雇员、失业者和不可能被雇用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是时代错误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二百五十年后才问世的现代工资制度；概论使用这些术语只是为了简单表述。）

根据〈工匠法〉，劳动力组织有三个支柱：强制劳动，七年学徒期，政府官员每年评审工资。应要强调法律同样适用于农业劳工和工匠，并在城乡一并执行。法律严格执行了八十年；学徒期条款后来部份废止，严格限制在传统手艺，但不适用于新产业，例如棉纺业；根据生活费用评审工资部份在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不再执行，但直至1813年才正式废止评审，1814年才废止工资条款。然而，在许多方面，学徒规则在该法被废止后依然存在，时至今日依然是英格兰手艺行当的通例。强制劳动在乡村逐渐停止。但依然可以力陈在这二百五十年间，〈工匠法〉基于监管和家长式管理原则，为全国的劳动力组织奠定基础。

〈工匠法〉因此得到〈济贫法〉补充。现代人对「贫穷」和「赤贫」[158] 两个类似词语颇为困惑。英国绅士认为受薪一族不够钱过着闲暇日子即属于穷人，所以poor实际上是「普通人」的同义词，而普通人是没有土地的阶级（几乎任何成功商人都不会没有土地财产）。因此，「穷人」指「有所求」的人。当然，这包括赤贫民，但不只是赤贫民。社会既自称在本身范围之内每个耶教徒都有容身之地，老弱孤儿必须得到照顾。但除此之外；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都假设他们如果找到工作，都可以自力谋生。行乞会严重受罚；流浪是杀头之罪。1601年〈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工作养活自己，由教区负责提供工作；救济的负担完全由教区承担，教区被授权通过地方税或不动产税筹措必要资金。无论贫富，所有家庭和租户都必须按地租或屋租缴付税金。

[158] Poor and pauper

〈工匠法〉和〈济贫法〉共同构成可称之为「劳工守规」的制度。然而，〈济贫法〉是由地方管理，每个教区都是细小的管理单位，对如何安置有劳动能力的人工作，维持济贫院，安排孤儿和贫穷孩子当学徒，照顾老弱病残者，埋葬赤贫民等等，各有不同安排。各教区的税收标准也各有不同。所有这一切其实言过其实；许多教区没有济贫院，更多教区没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此外当地纳税人拖拖拉拉，穷人监管者漠不关心，利益集团对赤贫问题铁石心肠；以上一切都危害法律的运行。即使如此，全国约有一万六千个济贫机构基本上维持了农村生活的社会组织完整和安然无恙。

在国家的劳动力制度下，失业者和救济穷人的地方组织明显是异常事物。管理得宜的教区越是有更多济贫措施，越会吸引「职业赤贫民」。在王政复辟之后，推出〈定居法〉以保护「较好」教区免遭赤贫民大量涌入之苦。百多年后，亚当•斯密猛烈抨击〈定居法〉，指责这迫使人民寸步难行，因此阻碍人民找到有用的工作，也阻碍资本家找到雇员。〈定居法〉规定要有当地方官员和教区机构许可，人民才能在教区居住；若是迁居他地，即使有很好地位和工作，都很可能被逐。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受到严苛限制；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但没有为自己或子女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按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以及被迫劳动。伊利莎白一世的伟大〈济贫法〉、〈工匠法〉和〈定居法〉一起构成了平民的自由宪章，同时也是束缚他们的封条。

是时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在产业需求压力之下，1662 年的法令在 1795 年被部份废除、教区佃农制被废止，劳工重获定居自由权利。国家规模的劳工市场从而可以建立。但是，就在同一年引进了济贫法的管理方法，这颠倒了伊丽莎白立法的强制劳动原则。史宾汉兰制度保证了「生存权利」；普遍实行工资补贴；外加家庭补贴；所有这都是以院外救济形式发放，接受救济的人不一定要住在济贫院。尽管救济的标准极低，但足以维持基本生计。似乎正当蒸气机在呼唤自由、机器迫切需要人手之际，却回到了管制主义和家长式管治。但史宾汉兰制度出台与〈定居法〉撤销同时发生，这矛盾很明显：废除〈定居法〉是因为工业革命要求国家提供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工，而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是任何人不需担心饿死；无论他挣钱多少，教区都会养活他和他的家人。这两项产业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两项政策同时继续推行，除了社会暴行之外，还能指望有什么其他结果？

但史宾汉兰制度时期的一代人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在史上最伟大工业革命的前夕依然没有资本主义悄然而至的任何征兆。没人预言机器生产的发展，它的到来完全是意外。当围坝破裂、旧世界被朝向全球经济的一往无前洪流席卷之际，英格兰有一段时间实际上预期外贸会永久衰退。

然而，直至 1850 年代，没有人肯定有这样的见识。要理解史宾汉兰官员的建议，

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当时面对的发展其广泛意义。回头看看，他们似乎是尝试不可能之事，而且是利用当时应该已颇为明显的内部矛盾。实际上，他们成功保护了乡村免遭混乱之苦，但措施在其它未曾预见的方面却带来更大灾难。史宾汉兰措施是劳工市场发展过程一个特定阶段的后果，应该从当时制定政策者的角度来理解。从这角度看，补贴制度是乡绅阶级面对再也无法限制劳工流动而设计的手段；乡绅希望避免因为接受自由的国内劳工市场而改变当地条件，包括较高工资。

因此，史宾汉兰措施的动力是植根于其渊源的环境。农村赤贫化状况出现是剧变即将来临的征兆，不过当时似乎没人想到。农村贫困与世界贸易的冲击之间的联系不是显而易见。那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理由把农村穷人的数目与七大洋的商业发展联系。穷人数目的增加无法解释，通常几乎都归咎〈济贫法〉的执行，而这不是没有一些好理由。实际上，在表面之下，农村赤贫的恶性增长是与经济通史的趋势直接相关，但这联系依然几乎难以觉察。很多作者曾探究穷人零星流入乡村的途径，提出令人惊讶的途径数目和不同理由。不过，只有少数当代作者提到现代人通常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混乱征兆。直至 1785 年，英格兰人没有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任何重大变化，除了隅尔的贸易增长和赤贫人口增加。

穷人来自何处？这是随着时日越来越多小册子提出的问题。在文献中，赤贫化的成因与对抗措施很难两者分开，因为启发文献的信念是只要能够纾解赤贫化的最显著邪恶，贫困不再存在。曾几何时，人们对贫民增多的不同成因有普遍的一致意见，包括：谷物短缺、农民工资太高、引致食品价格高昂；农民工资太低、城镇工资太高；城镇就业波动；自耕农消失；城镇工人不会干农活；农场主不愿支付较高工资；地主担心如支付较高工资，就会减少地租收入；济贫院不敌工厂的竞争；国内经济不发达；居住环境狭小；饮食习惯一成不变；毒瘾。有些作者责怪新品种大绵羊，也有人责怪应以牛代马；甚至有人敦促少养狗。有些作者认为穷人应该少吃或不吃面包，有些人甚至想到「穷人免费享用最好的面包。」有人认为茶饮损害许多穷人的健康，而「家酿啤酒」恢复健康；最坚信这说法的人强调茶饮好不了最便宜的酒。四十年之后，〔英格兰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Harriet Martineau 依然相信为了纾解贫困应要宣传戒除饮茶习惯。[159] 诚然，有许多作者埋怨圈地行动的混乱后果；另有许多人坚持制造业的起伏损害了农村的就业。不过，普遍的总体印象认为赤贫是自成一格的现象，由多种成因引起的社会疾病，只是由于〈济贫法〉没有运用正确的补救方法才被激活。

正确的答案几乎肯定是：由于今天称为「隐性失业」增加，才导致当时赤贫状况加剧和增多。在当时即使就业也是隐性，当然不容易看清事实；这是家庭手工业某程度上的必然结果。但以下的问题依然悬而未解：为何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为何当代最敏锐的观察家没有注意到产业领域迫在眼前的变化迹象？

[159] 原注 1：Martineau, H., *The Hamlet,* 1833.

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早期贸易过度波动，遮掩了贸易量的绝对增加。尽管就业率上升可归因贸易增加，但贸易波动却造成失业率以较大幅度上升。总体就业水平上升缓慢，但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数增加较快。因此，恩格斯称之为「产业后备军」的累积超过了产业创建的正规军。

这带来重要后果：容易忽视失业率与贸易总量上升的关系。虽然有人常说失业上升归咎贸易量巨大波动，但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波动形成潜在进程变化幅度更大的一部份，即是商业的总体增长越来越依赖制造业。对当代人而言，以城镇为主的制造工厂与乡村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似乎没有联系。

贸易总量增加必然导致就业人口增加，而劳工的地域分割与贸易的剧烈波动结合，导致城乡职场的严重混乱，引致失业人口快速增加。穷人听闻谣传远处有高工资，对农业能够负担的工资感到不满，造成穷人厌恶报酬很低的农业劳动。那时代的工业区就像新国家新美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移居之后又是大量的再移居。人们回流农村必然曾经发生，似乎支持农村人口没有绝对减少的事实。因此，由于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被吸引进入商业和制造业，过后又返回农村原居地，所以人口状况一直不稳定。

英格兰乡村遭受的大部份破坏，起先是因为贸易破坏了农村。农业革命肯定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方法有了巨大进步，但同时公地被圈围和合并，导致极度混乱。农舍屡遭迫害、菜园和土地被收购、公地权益被剥夺，这些行动剥夺了家庭手工业的两大支柱：家庭收入和农业背景。若然手工业生产者有菜园子、小块土地或放牧权的补充，劳工无需全部依赖金钱收入；一块土豆田、几台除草机、利用公地放养的一头母牛或甚至一头毛驴，都会令境况完全不同；家庭收入担当失业保险的角色。农业合理化措施无可避免把劳动者赶出家园，并危及他们的社会安全。

城镇生活又如何？波动性就业新灾祸的影响当然清晰可见。工业通常被视为没有前途的职业。〔英格兰国教会教士〕David Davis 在 1795 年写道[160]：「今天有工作的工人，明天可能在街上讨饭…」，他还写道：「这些新发展的最险恶后果是劳工没有保障。」「在工厂工作的镇民一旦没有工作，一下子陷入瘫痪，立即成为教区的负担；而这厄运不会随着那一代人逝去…」。因为劳动分工同时在发泄仇恨：失业的工匠徒然回到他的村庄，因为「织布工双手没有别的用处。」城镇化的致命不可逆转是建基于这简单事实；亚当·斯密已有预见，当时他描述工人的智力比不上最穷的农民，因为农民通常可以适应任何工作。尽管如此，直至亚当·斯

[160] David Davies, *The Condition of The Agriculture Worker*, 1795

密出版《国富论[161]》，赤贫现象没有急剧增加。

在随后二十年，形势突变。Burke 在 1795 年向 Pitt 递交的备忘录〈思考匮乏及详论[162]〉，承认尽管总体上有进步，但「过去二十年是恶性循环。」实际上，在七年战争（1763 年）之后十年，院外救济增加显示失业人口明显增加。第一次看到贸易繁荣伴随着穷人的灾难增长。对西方的下一代来说，这明显的矛盾注定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难理解的周而复始现象。人口过多的幽灵开始困扰人们的思想。Joseph Townsend 在《济贫法论述[163]》警告：「撇开投机，事实上英格兰的人口多于我们能够供养，而且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是多于我们可以有利可图的雇用。」亚当•斯密在 1776 年曾反映悄然进步的气氛。Townsend 在其后十年的著作已意识到风潮的来临。

风雨欲来之际，还要有许多事情发生，（只是五年后）逼使苏格兰造桥专家 Thomas Telford 这样远离政治的成功人士苦苦抱怨说不能指望政府的常规方针有什么改变，革命是唯一希望。Telford 把 Paine 的《人权论[164]》寄给家乡父老，引发了暴动。巴黎正在催化欧洲的发酵。

〔英国政治家〕George Canning 深信〈济贫法〉解救了英格兰不受革命之苦。他主要是考虑到 1790 年代和法国战争。新的圈地行动爆发进一步压低了农村穷人的生活标准。J. H. Clapham 是这些圈地行动的辩护者，他承认：「最有系统利用税收补贴工资的地区，正好是近来圈地最多的地区，这巧合最为显著。」换句话说，若不是有工资补贴，英格兰广大农村地区的穷人可能已跌至饥饿水平之下。到处都在纵火焚烧干草堆[165]。越来越多人相信要拿起武器[166]。经常出现暴动，更多的是暴动的谣传。英格兰东南部 Hampshire（不止这地方郡），法院威胁对「在市场或路上强行压低商品价格」处以极刑，不过又同时紧急要求普遍发放工资补贴。显然，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时机已到。

但是，在所有行动路线中为何选择那个事后看起是最不切实际的路线？下文考虑当时的情况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乡绅和教士管治农村。Townsend 总结情况：乡绅地主与制造业保持「进退有余的距离」，因为「〔乡绅地主〕认为制造业不稳

---

[161] *Wealth of Nations*

[162] *Thoughts & Details on Scarcity* by Edmund Burke, 1795

[163]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Wisher to Mankind* by Joseph Townsend, 1786。原文为 William Townsend，遍查没有资料，应为误植。

[164] *The Rights of Man* by Thomas Paine, 1791-1792. 网上简体译本《人权论》。

[165] 1830 年，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农工起义，要求提高工资和取缔影响他们冬季就业的打谷脱粒机。他们抗议之余，纵火焚烧干草堆以壮声势。

[166] 原文是 The Popgun Plot found wide credence。1794 年，名医 James Parkinson 被指控与同党密谋以气枪发射毒箭行刺英皇乔治三世，但事无左证，不了了之；史称「气枪阴谋」。此处比喻武装行事。

定；他从制造业获得的利益抵不上这对他的财产带来的沉重负担…」负担主要是制造业的两个看似矛盾的效果，即是赤贫人口增加和工资上涨。不过，只要假定有竞争性劳工市场存在，这两个效果才是互相矛盾，因为这样的市场倾向减少雇员工资以减少失业。缺乏这样的市场——〈定居法〉依然有效——，贫困人口和工资可能同时上升。在这条件下，城镇失业的「社会成本」主要由失业人士往往回流的家乡村庄承担。城镇的高工资是农村经济更大的负担。农业工资超出农场主的承受能力，但又不够劳工维持生计。似乎很明显农业无法与城镇工资竞争。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应废除〈定居法〉或至少应该放宽，以帮助劳工找到工作和雇主找到劳工。大家觉得这会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顺带减少工资的实际负担。如容许城乡工资「找到自身水平」，城乡工资差异这实时问题给农村带来更大压力。随着工业劳工在就业和失业阵痛交替之间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对农村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不得不建设防护大坝保护农村免遭不断上涨的工资洪水侵害。要想办法保护农村不陷入社会混乱，巩固传统权威，防止农村劳工流失，在不过分增加农场主负担的情况下提高农业工资。史宾汉兰制度就是这办法，一旦投入工业革命的汹涌洪流，必会产生经济旋涡，但掌控农村利益的乡绅阶层认为史宾汉兰制度的含意正好符合当时形势。

从执行〈济贫法〉的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是可悲的倒退措施。二百五十年的经验显示教区是太小的管理单位，完全没能力管理〈济贫法〉，因为要适当处理这问题，必要区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和老弱病残及儿童。这犹如今天的城镇单枪匹马地试图处理失业保险，又或是失业保险混杂了照顾老人。因此，只有在〈济贫法〉管理既具有国家性质又能够区别对待的很短时期内，才稍为让人满意。政治家 William Cecil 和 William Laud 大主教在 1590-1640 年主政期间就是这样的时期；当时王朝当政时是通过太平绅士[167]管理〈济贫法〉，并发起建立济贫院的鸿图大计以及执行强制劳动。1642-60 年的动荡政局[168]再次摧毁了被斥为国王个人统治的政权，但 1660 年王政复辟[169]，反为极其讽刺的完成了昙花一现的联邦共和政制未竟之功[170]。1662 年的〈定居法〉把〈济贫法〉限制在教区，而直至 1830 年代，立法机构对贫困问题毫不关心。最后在 1722 年才开始区分济贫的工作；教区联盟建立「贫民习艺所[171]」，有别于本地的济贫院[172]；偶尔也允许院外救济

[167] Justice of the Peace, JP 是源于英国的委任制度，由政府委任民间知名人士担任太平绅士（中译源出香港殖民政府）维持小区安宁（例如定期巡视监狱，初步鉴定精神病人然后送院）和处理较简单的法律程序（例如小贩和垃圾违规）。
[168] 1642-60 年英格兰的动荡政局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内战(1642-45)，第二次内战(1645-1648)和强势首相 Oliver Cromwell 以联邦共和政制(Commonwealth, 1649-53 以及 1659-60)管治英国。
[169] Restoration 1660。英王查理士二世复辟，
[170] 1689 年，英国宫廷政变，英王詹姆士二世被迫流亡海外，国会和新任英王威廉三世共同通过〈权利法〉，永远改变了英王的政治地位和承继制度。
[171] workhouse
[172] poorhouse

活动，因为贫民习艺所接管了评审贫困的工作。1792 年〈新济贫法[173]〉的长远策略鼓励设立教区联盟以扩大管理单位；当时政府敦促教区在当地为有劳动能力的劳工寻找工作，其他辅助政策有院外救济和甚至工资补贴措施，以减少对有劳动能力失业者的救济成本。尽管建立教区联盟不是强制性，但这意味着向扩大管理单位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受救济穷人迈进一步。尽管救济制度有诸多缺陷，虽然〈新济贫法〉仍有不足，但已朝向正确方向；只要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仅仅是辅助积极的社会立法，就不会危及合理的解决方案。史宾汉兰制度使改革陷于终止。由于普遍推行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这制度没有遵循〈新济贫法〉路线，而是彻底逆转了新法的趋势和实际摧毁了〈济贫法〉整个体系。费精劳神区分贫民习艺所与济贫院的措施变得毫无意义；各类型的贫民和体格健全失业者，现在不分青红皂白融合为具依赖性的赤贫群体。另一个与区分相反的程序开始了：贫民习艺所并入济贫院，而济贫院本身逐渐消失；教区再一次成为制度退化真正杰作的唯一和最后的单位。

史宾汉兰制度的后效果提升了乡绅和教区牧师的崇高地位，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穷人督导者抱怨「不分青红皂白的权力善行」，在「保守派社会主义[174]」中发挥最好的作用：太平绅士行使仁爱权力，而税收的重担由农村中产阶级承受。大多数自耕农已在农业革命的变迁中消失；在农村权势阶层看来，余下的中农阶层（拥有部份田地和房产）和佃农和雇农阶层合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但未能仔细区分穷人和偶尔穷困的人；权势阶层居高临下，看到农民艰苦挣扎，却似乎看不到穷人与赤贫的严格分界线；即使知道在歉收年份小农场主由于收成太差而要「吃救济」，也不会大惊失色。这种事例肯定不是常见但有可能发生，这突显许多纳税人也是穷人的事实。总体而言，当时纳税人和赤贫民之间的关系就如现代各种保险计划中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关系：就业者承担供养暂时失业者的责任。但典型的纳税人通常没有资格享受贫困救济，而典型农业劳工却无需纳税。从政治上来说，史宾汉兰制度加强了乡绅阶层对农村穷人的影响力，但却削弱了对农村中产阶级的影响力。

制度最怪诞之处是在经济方面。「谁为史宾汉兰制度埋单？」是实际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当然是由纳税人直接承担。但农场主因为支付低工资而得到部份补偿，这是史宾汉兰制度的直接后果。另外，如农场主愿意雇用要依靠救济的失业村民，可以减免部份税款。由此导致农场主的厨房和院子多出人手（有些干活不买力）就必须记在借方栏。吃救济的劳工，其劳动力更加便宜。他们必须经常换地方打杂工，所得的报酬只是一顿饭，或者在村中「劳动力市场」出售廉价劳力。这种退缩的劳动到底价值几何，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穷人偶尔会得到一些租金补贴，但村舍房主却通过高价出租那些脏兮兮住房而赚钱；乡村管理机关很可能睁

[173] Relief of the Poor Act，亦称 Gilbert's Act。
[174] Tory socialism

一眼闭一眼，只要那些简陋房舍继续缴纳税金。显而易见，这种纠缠不清的利害关系会损害任何财务责任，并鼓励各种各样卑劣的腐败行为。

虽然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史宾汉兰制度是值得的。制度从工资补贴开始，表面惠及雇员，但实际上以公帑补贴雇主。补贴制度的主要后效是把工资压至糊口水平之下。在那些全面赤贫化的地区，农场主根本不想雇用那些依然拥有小块土地的劳工，「因为拥有土地的人没资格获得教区救济，而标准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如没有某种救济，已婚男子根本没法养家。」因此，在某些地区，只有吃救济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工作；试图不要救济而自食其力，几乎无法找到工作。但是在大部份农村地区，后者占绝大多数，雇主阶层因为得益于低工资而获取额外利润，同时却无需以税金做出补偿。长期而言，这样没有效率的制度必然影响劳动生产力和压低标准工资水平，最终甚至压低地方官员为穷人利益而设定的「标准比例」。到了 1820 年代，许多郡县都不断降低面包标准，而穷人的可怜收入降低更加厉害。在 1815-30 年间，曾在全国各地相当均等的史宾汉兰标准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实际上降低份额不是普遍如此）。Clapham 怀疑究竟地税的总负担是否一如突然爆发的抱怨使人们相信的那样严重。他的怀疑有道理。因为虽然地税上升令人侧目，而且在一些地方肯定被认为是灾难，但麻烦的根源似乎最有可能的不是税金负担，而是工资补贴对劳动生产的经济效应。受冲击最严重的英格兰南部地区，济贫支出还不到税收 3.3%，Clapham 认为这是非常可以承受的份额，因为这笔税款的大部份「应该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穷人」。实际上，地税总额在 1830 年代一直稳定下降，而比对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其相对负担肯定下降得更快。1818 年，实际用于济贫的支出总额约为八百万英镑，至 1826 年已持续下降至少于六百万，而国民收入却快速增加。尽管如此，对史宾汉兰制度的批评却越来越激烈，原因似乎在于群众的非人性化倾向开始瘫痪国家生活，特别是限制了工业本身的能量。

史宾汉兰制度触发了社会大灾难。我们已习惯把早期资本主义的可怕表现轻视为「伤感的材料」。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上文提到的 Harriet Martineau 是〈新济贫法〉的热心信徒，她描绘的情况吻合极力反对〈新济贫法〉的宪章派宣传。著名的 1834 年济贫法委员会[175]报告主张立即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报告罗列的事实可以作为大文豪狄更斯反对委员会政策的参考数据。Kingsley[176]、Engels[177]、Blake[178]和 Carlyle[179]相信人类形象曾经被某种可怕灾祸败坏，他们的想法没有错。比诗人和慈善家咆哮的痛苦和愤怒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althus[180]和 Ricardo[181]

[175]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
[176] 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文学家，大学教授和神学家。
[177]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1820=1895)，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
[178] 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179]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
[180]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无情漠视他们的世俗沉沦哲学所建基的那些场面。

毋庸置疑，机器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和人类现在必定要为机器服务的环境带来许多无法避免的后果。稍后欧洲大陆工业城镇成长的城镇环境缺少了英格兰的乡村文明。[182] 新城镇没有城市中产阶级在此定居，也没有工匠和手艺工人的核心，没有受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和城里人组成粗鲁工人的同化媒介；这些工人被高工资吸引或被诡计多端的圈地者赶出农村，来到早期的工厂干苦活。英格兰中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是文化荒地；当地的贫民窟反映了缺乏传统和市民自尊。移居而来的农民以及以前的自耕农或农地租户跌入这荒凉悲惨境地，很快堕落成为泥沼中的四不像动物。这不仅仅是工资太低或工时太长（虽然往往如此），而是劳工被生活环境折磨至不似人形。来自非洲森林的黑人被关在笼子，在奴隶贩子的船舱里透不过气，可能与这些劳工有同样感受。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无法弥补。只要权势中人坚守他家族或同胞确立的榜样，他可以为之而战，救赎自己的灵魂。但是，劳工只有一条阳关道：把自己打造为新阶级成员。除非他能够以本身的劳动谋生，他就不是工人，而是乞丐。史宾汉兰制度最令人痛恨的就是把人逼上绝路。这含糊不清的人道主义行动阻碍了劳工把本身打造成为经济阶层，因此剥夺他们逃离本来注定要在经济工厂做苦力的命运的唯一途径。

史宾汉兰制度是使大众道德败坏的万无一失措施。如人类社会是自动机器，维持着自身赖以建立的标准，那么史宾汉兰制度是自动摧毁任何类型社会赖以建立的标准，不仅奖赏逃避和假装不能工作的行为，而且恰好在某人尽力逃避赤贫命运的关键时刻提高了赤贫主义的吸引力。一旦进了济贫院（如果贫民和家人已经吃救济一段时间，通常会被送到这里），一头陷进去就极少有可能离开。在济贫院的杂乱环境中，几百年来安定生活形成的体面和自尊很快消耗殆尽；在那个地方，人人小心不让人以为活得比他人好，以免被赶出院外找工作，而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拖拖拉拉混日子。「济贫宠坏了群众…为了取得救济份额，粗暴的人威胁管理人员，放荡鬼展示他们的野种，懒人抱着双臂一直等待拿到救济；无知的少男少女在济贫院成婚；窃贼、小偷和妓女以恐吓手段强抢；乡绅为讨民众欢心而胡乱发放，委员会为了方便而发放。公帑就是这样花掉…」「农场主不是雇用正常数目的劳工耕种田地，而是被迫雇用两倍正常数目的劳工，工资部份由地税支付；劳工不情不愿工作，农场主控制不了他们：劳工可以选择干活或不干活，因而农产质量下降，农场主又不能雇用愿意自食其力的较好人手。好人坏人一起沉沦；纳税的农户经过一阵徒劳的挣扎，也跑去寻求救济…」Harriet Martineau 如是说。[183] 羞愧的自由主义者忘恩负义地忽视了这位坦率信徒对他们的信条的回忆。他们害怕即使她的说法夸张，也是说到点子。她本人就是挣扎的中产阶级，这穷得

---

[181] 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182] 原注 2：Usher 教授认为城市化始于 1795。
[183] 原注 3：Martineau, H.,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Thirty Tears' Peace (1816-1846),* 1849

优雅阶层对〈济贫法〉的道德复杂性更为敏感。她理解并清楚说明社会需要「独立劳工」的新阶层。他们是她梦中的英雄，她也创作了一位主角：一位长期失业但拒绝救济的劳工骄傲地对另一位决定去吃救济的劳工说：「我顶天立地，向任何鄙视我的人挑战。我带孩子走教堂的中央过道，看谁有地位敢嘲弄他们。有人比我聪明，有人比我富有；但没人比我更有尊严。」统治阶层的大人物依然没有理解这新阶层的需求。Martineau 指责「贵族的庸俗过失，以为富裕阶层之下只存在一个他们出于无奈要打交道的社会阶层。」她抱怨大法官 Eldon 勋爵和其他知情人士「把最富有的银行家之外的其他人全归一个档次（社会下层阶级）：生产商，贸易商，工匠，劳工和赤贫民…」[184] 她坚持认为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区分最后两种人。她写道：「除了君王和子民之间的区分，没有比独立劳工和赤贫民之间的社会差别有更大的鸿沟；把两者混为一谈是无知、不道德和失策。」当然，这肯定不是事实的陈述；在史宾汉兰制度下，这两个阶层之间已经不存在差异。更准确地说，这是基于预言性期望的政策陈述。这政策就是新济贫改革委员的政策；预言想象有自由竞争的劳工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人阶级。废除史宾汉兰制度之日正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诞生之时，他们的实时自身利益注定他们成为社会保卫者，对抗机器文明的内在危险。无论将来如何，工人阶级和市场经济历史同时出现。英国工人阶级一代又一代的特征是痛恨公共救济、不信任政府行为以及坚持尊严和自食其力。

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是英国中产阶层这个新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任务。地主阶级无法完成的任务，注定由中产阶层完成：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转变开始之前，废止十多项法律和订立新法。1832 年的国会〈改革法〉废除腐败自治市镇的特权，并转交下议院永远授予平民。他们的第一项伟大改革就是废除史宾汉兰制度。现在我们认识到它的家长主义方法与农村生活融合的程度，可以理解为何即使最激进的改革支持者会有保留，建议不少于十年或十五年的过渡期。实际上，事情发生颇为突然；后来人们寻找反对激进改革的论据时，所谓英国式渐进主义传奇变成笑柄。那事件的残酷冲击困扰着几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白日梦。但这令人心痛行动的成功是因为广大人民的一些根深蒂固观念，包括劳工本身；这些观念认为表面上支持人民的制度实际上却是在掠夺人民，而「生存权利」措施是把病人送往死亡。

新法规定不再有院外救济，由国家管理和有所区分。在这方面，这是彻底改革。工资补贴当然终止。再次采用贫民习艺所测试，但有了新意思。现在是由申请者自行决定是否一无所有，是否自愿进入被故意弄成恐怖之地的收容所。贫民习艺所被赋予污名；住在习艺所成为心理和道德折磨，还要遵守卫生和礼节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巧妙利用这些要求作为进一步剥削的借口。太平绅士和当地督导员不再管理习艺所，而是交由有更广泛权力的管理人员在独裁的中央政府监督之下管

[184] 原注 4：Martineau, H., *The Parish,* 1833.

理。赤贫民举殡之时变成同是天涯沦落人与他断绝关系之日。

1834 年，工业资本主义已准备启动，〈新济贫法〉也开始执行。史宾汉兰制度曾保护英格兰农村和一般劳动人口免受市场机制全面吸吮社会的骨髓。至该法被废止之时，大批劳工已变得更像恶梦中的鬼怪而不是人。如果说工人肉体方面被非人化，富裕阶层则在道德方面走下坡路。耶教社会的传统团结正被富人拒绝为同胞承担责任的态度取代。「两个民族」正在形成。有思想的人感到困惑的是前所未闻的财富竟然与前所未闻的贫困贴在一起。学者一致宣称已经发现了新科学，清楚展示支配人类世界的规律。规律要求抛弃同情心，以最多人最大幸福之名而坚决放弃人类团结；这规律取得了世俗宗教的尊严。

市场机制逐步进逼，争取完成使命：人类劳工必须成为商品。追求复古的家长主义试图抵制这必然发展，但徒劳无功。人们离开了史宾汉兰制度的恐怖，盲目冲向理想国式市场经济作为避难所。

第八章数据参考

史宾汉兰制度的文献

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和结束时，我们才意识到史宾汉兰制的决定性重要。当然，那是在 1834 年前后。然而，通常提到「补贴制」和「济贫法弊政」不是始于由 1795 年的史宾汉兰制，而是从 1782 年的〈Gilbert 法〉算起；当时公众人士还没有清楚理解史宾汉兰制的真正特点。

即使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史宾汉兰制只是随意对穷人发放救济。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这是系统性的补助性工资。当代人只是有限地认识到这样做法与都铎时期的法律原则有正面冲突，人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与正在形成的工资制度完全不兼容。至于实际效果，直到结合 1799-1800 年制定的〈反合并法[185]〉，人们才认识到这会压低工资和变成对雇主的补助。

正如古典经济学家对租金和货币的研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仔细研究「补贴制」的细节。他们把补贴和院外救济的所有形式和〈济贫法〉混为一谈，迫切要求要彻底清除。Townsend、Malthus 和 Ricardo 都没有提出要改革〈济贫法〉，而是要求废止。只有 Bentham 曾研究这题目，在这问题上比起别人少了些教条。他和 Burke 理解工资补贴是真正的坏原则；这 Pitt 所忽略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研究〈济贫法〉。可以想象最符合他们心意的莫过于披露一种制度的伪人道主义：这制度据称迎合穷人的想法，但实际上把他们的工资压制在仅堪糊口水平以下（有赖特别的反工会法大力帮助），把公帑交给富人，帮助他们从穷人身上赚更多钱。但到了他们的时代，〈新济贫法〉已是众人之敌，Cobbett 和宪章运动份子往往把旧版〈济贫法〉理想化。而且，恩

[185] Anti-Combination Laws

格斯和马克思正确地坚信，如资本主义要到来，改革〈济贫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仅漏掉了一些一流论点，也漏掉史宾汉兰制的论点会强化他们的理论体系：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不能运行。



Harriet Martineau（插图）对史宾汉兰制效果的骇人描述，大量引用 1834 年《济贫法报告[186]》的经典段落。她深信只要穷人能理解这些政治经济的法规，必然更能承受他们的命运，因此她执笔写成几十本小册子，解释穷人的悲惨境遇是必然的；赞助她出版小册子的宗教人士不可能再找到更真诚以及总的来说更博学的人来倡导他们的信条。她的著作《卅年和平：1816-46 年[187]》语调克制，比诸她对恩师 Bentham 的回忆，她更为同情宪章运动份子。(Vol. III, p. 489, and Vol. IV, p. 453) 她的编年史结语：「最有智慧的人现在专注劳工权利这个大问题，带来国外的深刻教训：绝不能忽视这个大问题，否则人人遭殃。是否无从解决？这解决方案可能是下一时期英国历史的核心现实；解决方案可能比现在更好，似乎过往三十年的和平已为此准备。」这是延后行为的预言。英国历史下一个时期没有劳工问题，但在 1870 年代卷土重来，再数十年后，「人人遭殃」。显而易见，在 1840 年代比 1940 年代较容易看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管理〈济贫法改革法案〉的各种原则。

维多利亚时期及之后的哲学家和史学家都没有仔细研究过史宾汉兰制的琐碎经济。效益主义的三位历学名家之中，Leslie Stephen 爵士没有探究细节；Elie Halevy 首先认识到〈济贫法〉在哲学激进主义历史的关键作用，但对这个主题只有朦胧的概念；Dicey 的错漏更是惊人，他对法律和舆论关系的出色分析把「自由放任」和「集体主义」作为事物的经纬，认为这模式本身源于当代的工业和商业趋势，即是源于塑造经济生活的制度。Dicey 最强调赤贫论对舆论的主导作用以及〈济贫法〉改革对整套效益主义法例的重要性，然而他不理解效益主义者在立法计划中极为重视〈济贫法〉改革，而他实际上认为地方税对业界的负担才是关键问题。Schumpeter[188]或 Mitchell 这些经济学思想史大师在分析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时没有提到史宾汉兰制的情况。

Toynbee 的 1881 年讲座把工业革命纳入经济史，认为史宾汉兰制及其「富人保护穷人的原则」是因为「保守派托利社会主义」。William Cunningham 在同一时期研究同一主题，奇迹地有所成就，但他只是没有知音的一家之言。Mantoux 的 1907 年著作得益于 Cunningham 1881 年的杰作，但他只是把史宾汉兰制度称之为「另一改革」，奇怪地把「将穷人赶入劳动力市场」的后果归因于史宾汉兰制。(*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38)。Beer 专注研究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但他几乎没有提及〈济贫法〉。

直至 Hammonds(1911)想到由工业革命带来新文明的景象，史宾汉兰制才被重新发现，成为社会史的部份而不只是经济史的事件。Webbs (1927)继续研究，提出史宾汉兰制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

[186] Poor Law Report
[187] *Thirty Years' Peace, 1816-1846*
[188] 熊彼特

件这些问题，认识到这是我们这时代社会问题的起因。

J. H. Clapham 尝试建立论点反对恩格斯、马克思、Cunningham, Mantoux 和近代 Hammonds 提出被称为经济史的制度论。Clapham 不承认史宾汉兰是一种制度，只是国家「农业组织」的特征（第 1 卷，第 4 章）。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正是把史宾汉兰制扩展到城镇而导致制度的崩溃。此外，他分开考虑史宾汉兰制对地方税和工资的影响，把前者置于「国家经济活动」来讨论。这相当武断，忽略了从雇主阶层的角度来看制度：雇主从低工资得到的好处等同甚或超过地方税方面的损失。但 Clapham 有意识地考虑各种事实，弥补了他对制度的不当处理。他首次揭示了推行史宾汉兰制地区的「暴力圈地」和制度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真实程度。

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史宾汉兰制和工资制度互不相融，认为广义上来说任何保护劳工的形式都涉及一些史宾汉兰制度的干预原则。Herbert Spencer 愤怒指控「有补贴的工资」是「集体主义」的做法，他也轻易把这论点扩大到公共教育、公共房屋和游乐场地等等。Dicey 在 1913 年概括了他对〈1908 年老年人养老金法案[189]〉的批评：「本质上只是院外济贫的新形式。」他同时质疑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否曾有公平的机会成功落实他们的政策。「他们的一些提议从没有落实；例如，院外济贫从来没有废除。」既然 Dicey 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很自然 Mises 会断言「只要一直支付失业救济金，失业就肯定会存在。」(*Liberalisms,* 1927, p. 74)；而「帮助失业者证明是最具破坏力的武器。」(*Socialism,* 1927, p. 484; *Nationalokonomie,* 1940, p. 720)。Walter Lippmann 在《美好社会 *Good Society*》（1937 年）试图与 Spencer 的理论分开，但引用了 Mises。 Mises 和 Lippmann 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对 1920 和 30 年代新保护主义的反应。无疑当时的形势有许多特点令人想起史宾汉兰制。在奥地利，破产的财政部要拨款救济失业者；英国的长期失业福利和失业救济金没什么区分；美国推行了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化工企业总裁 Alfred Mond 爵士在 1926 年曾要求英国雇主应收到失业基金的补贴，以「补贴」工资，有助增加就业，但不得要领。自由资本主义由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和货币问题。

赤贫问题和旧济贫法的当代文献（从略，可参见原文）

史宾汉兰和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发展，其发人深思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吸引了本文作者研究史宾汉兰制度及其对传统经济学家的影响。

奥地利是是完全资本主义的环境，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市政府建立了被经济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的政权。市政府施行的一些干预政策无疑与市场经济机制不能和谐共存。但纯经济论点不能够详细阐述一个主要是社会性而不是经济的问题。

有关维也纳的主要史实如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 年）后十五年的大部份时间，奥地利的失业保险金由公帑大量补贴，因而无限期延长了院外救济；住屋受到管制，固定在以前水平的

[189] Old Age Pensions Act (1908)

极低百份比，而维也纳市政府征税筹集资金建造非牟利的出租房。尽管没有工资补贴，然而全面提供的社会服务虽然不算过份，但实际上还是方便了工资过多地下降，但发达的工会运动得到强力的支持而扩大失业救济。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样的制度当然是不正常。租金被限制在完全无利可图的水平，不能配合现有的私企制度，特别是建造业。另外，贫穷国家在初期实施社会保护干预了货币的稳定：通货膨胀政策和干预政策两者互相影响。

最终，维也纳不得不屈服于纯经济论点强力支持的政治势力；这是和史宾汉兰制度一样的命运。1832 年在英格兰以及 1934 年在奥地利的政治波动都旨在解放劳动力市场，免受保护主义干预。无论是乡绅的农村或是工人阶级的维也纳，都不可能长时间与周围的环境隔离。

然而，显而易见，这两个干预时期有颇大差别。在 1795 年，英格兰农村要被保护，免受城市工业大步向前的经济发展造成混乱；而在 1918 年，维也纳的工业工人阶级受到保护，免受因为战争、战败和工业混乱引起的经济衰败影响。最后，史宾汉兰制度导致劳工组织的危机，开拓了通向繁荣新纪元之路；但是奥地利保安团[190]的胜利却是国家和社会体制整体灾难的部份。

本文想强调这两类型的干预在文化和道德影响有巨大差别：史宾汉兰制试图阻止市场经济到来，而维也纳实验则尝试完全超越这样的市场经济。史宾汉兰制为老百姓带来真正的灾难，而维也纳却实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蔚为奇观的文化胜利。1795 年导致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空前下降，阻止他们取得新的社会地位；在 1918 年，工业工人阶级受到维也纳制度保护，抵御了严重经济混乱的负面影响，把自身提升到任何工业化社会广大民众从未达到的水平，从而启动了前所未见的道德和知识兴起。

很明显，这要归因于事态的社会方面原因，这有别于经济方面。但正统经济学家是否正确掌握干预主义的经济理据？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维也纳制度是另一种「济贫不得其法」，另一种「补贴制度」，传统经济学家必要除之而后快。但这些思想家是否被史宾汉兰制建立的相对持久情况误导？他们的深邃洞察力有助正确预测未来，但他们对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思考却是完全错误。现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他们的可靠判断声誉是名不副实。Malthus 完全误解他那个时代的要求； T. H. Marshall 说过，如新娘子都相信 Malthus 的人口过剩倾向性警告，「也许经济进步已当场止步。」Ricardo 错误陈述了货币的争论和英伦银行的作用，没有抓住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知道货币贬值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性支付和转账的困难。如英国采纳了 Ricardo 对《1810 年黄金委员会报告书[191]》的建议，将会输掉拿破仑战争，而「大英帝国今天也不会存在。」
因此，维也纳经验及其与史宾汉兰制度相似之处让一些人重拾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但也让一些人改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不采用〈Whitbread 草案〉？

如舍弃史宾汉兰政策，唯一的另外方案似乎应该是 1795 年冬提出的〈Whitbread 草案〉。该草案

[190] *Heimwehr*
[191] Bullion Report

要求扩大 1563 年的〈工匠法[192]〉以包括每年评审最低工资。草案的提案者认为这可维持伊丽莎白时代的工资评审规则，从最高工资扩大至最低工资，从而预防农村出现饥饿。无疑这将满足紧急状态的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萨福克郡的议员支持草案，但地方官员也支持由 Arthur Young 亲自出席的一次会议提出的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在外行人看来，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差别极大。这种看法不令人奇怪。一百三十年后，1926 年的〈Mond 计划〉提议使用失业基金以补贴工业界的工资，公众仍然很难理解救济失业者和补贴在职者工资之间的决定性经济区别。

然而，1795 年的选择是最低工资或工资补贴。连同〈1834 年济贫修订法〉废除〈1662 年定居法[193]〉一起研读，就可以看到这两项政策的差别。〔〈定居法〉类似户籍制度，规定国民出生地的教会负责他一生的救济事务。〕该法被废止，就有可能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目的是让工资「找到自身的水平。」Whitbread 的最低工资草案其意图正正与废除〈安居法〉的意图相反，而史宾汉兰法却不是这样。通过扩大应用 1601 年的〈济贫法〉而不是 Whitbread 建议扩大 1563 年的〈工匠法〉，乡绅对农民的照顾其力度和形式只会对市场运作有最低限度的干预，而**实际上使订定工资的机制无法运作**。从来没有人公开承认这种所谓〈济贫法〉运作实际上完全推翻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强制性劳动原则。

对史宾汉兰法的发起人来说，实效的考虑才是最重要。尊敬的当代宗教领袖 Edward Wilson 本应是这法例的支持者，但他在小册子明确赞成自由放任：「一如市场的其他商品，在没有法律的干预下，劳力从古至今都找到自身的水平。」如英格兰地方官员持相反论调，认为如没有法律干预，劳力从古至今都没有找到自身的水平；这说法可能更适合。不过，根据记录，这位教士继续指出工资增长追不上谷物价格，因此他恭敬提请地方行政官员考虑「定量救济穷人的措施」：一家三口每星期的总救济金为 5 先令。小册子中的〈启事〉是这么说：「下述内容在去年 5 月 6 日 Newbury 郡议会中提出。」就我们所知，地方官员比教士走得更远：郡会议一致同意救济金额为 5 先令 6 便士。

Disraeli[194]的「两个民族论」和有色种族问题

有几位作者曾坚持殖民地的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相似，但他们未能以其它方法跟进这样的比喻类推，也就是如实描述百年前英格兰较贫困阶级是那时代被剥离社会成员资格和被贬低的土著，以解释他们的状况。

这样容易忽略这明显的相似性，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主义的偏见，不恰当地重视基本上是非经济过程的经济方面。当今在一些殖民地区的种族分裂现象，还是百年前工人阶级的类似「非人性化」待遇本质上都不是经济方面。

1. 破坏性的文化接触主要不是经济现象。

---

[192] Statute of Artificers

[193] Settlement and Removal Act

[194]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出任首相。

L. P. Mair 指出现在大多数土著社会正经历着快速而强力的变革，只有革命的暴力改变可与其相比。尽管入侵者的动机无疑是经济性质，但原始社会崩溃必然是由于其经济体系被破坏所造成；明显的事实是**原来的文化不能够同化新经济制度**，原来的文化没有被任何其它有条理的价值体制取代，因而分崩离析。

西方体制中具破坏性倾向的趋势首推「广泛地区的和平」打破了「部族生活、族长统治的权威以及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基本上禁止部族或部落迁徙。」(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p. 394). 「战争必然令土著生活保持敏锐，遗憾的是在和平年代这种敏锐性丧失…。」废止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因为战斗的伤亡人数不多，而没有战争意味着丧失了富有生机的风俗和仪式，乡村生活变得不利健康的沉闷和冷漠。」(F. E. Williams, *Depopulation of the Suan District,* 1933, "Anthropology" Report, No. 13, p. 43) 这情况可比较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原居民「充满活力、生气勃勃和使人兴奋的生活。」(Goldenweiser, *Loose Ends,* p. 99).

用 Goldenweiser 的话说，真正的危险是「介乎中间的文化」。 (Goldenweiser, *Anthropology,* 1937, p. 429) 对这一点实际有一致的意见。「旧有障碍正逐渐减少，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指导方针。」(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p. 111). 「如小区认为积累商品是反社会行为，要把这样的小区与当代的白人文化结合，是试图协调两个互不兼容的制度体制。」(Wissel in Introduction to M. Mead,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 1932) 「带入移民文化的人也许可以成功消灭原有文化，但无法消灭或同化承传文化的原居民。」(Pitt-Rivers, "The Effect on Native Races of Contact with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n,* Vol. XXVII, 1927) 或是用 Lesser 的尖刻说话，以为这是工业化文明的另一牺牲者：「Pawnee 族印第安人的成熟文化降格为白人的文化婴儿。」(*The Pawnee Ghost Dance Hand Game,* p. 44)。

在公认的意义来说，虽生犹死的状况不是由于一方之得即另一方之失的经济剥削；但这肯定与影响经济状况的土地所有权、战争、婚姻等有关，各自影响众多形形式式的社会习惯、风俗和传统。强行把货币经济引进人口稀少的西非，造成当地人「买不到食品以填补充没有种植的食品，因为没有人会种植多余的食品卖给他们。」 (Mair,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p. 5)他们的体制蕴含着不同的价值量表；他们既节俭同时又没有市场头脑。「无论市场是供过于求或求过于供，他们仍然索取要同样的价格；为了节省一些小钱，却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跑远路去买东西。」(Mary H. Kingsley, *West African Studies,* p. 339).工资上涨常常导致旷工。据说〔墨西哥〕的 Zapotec 族人每日工资 50 分的勤奋程度只是每天工资 25 分的一半。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的日子也常见这种矛盾的现象。

人口比率的经济指数不见得比工资更能满意〔表达情况〕。Goldenweiser 证实了 Rivers 对在太平洋群岛(Melanesia)的著名调查：文化匮乏的土著人可能「死于无聊。」F. E. Williams 是当时在那地区工作的传教士，他记述很容易理解「心理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许多观察家指出土著可能很容易死去。」以前的兴趣和活动被限制，似乎对他的情绪是致命打击。结果是土著的身体抵抗力受到伤害，很容易死于各种疾病。(*op. cit.,* p. 43) 这与经济欲望的压力无关。「因此，人口自然

增长率极高，可能是文化活力或文化退化的症状。」(Frank Lorimer, *Observations on the Trend of Ind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1).

只有与生活的经济标准不相应的社会措施才能阻止文化退化，诸如恢复部落土地所有制或隔离部落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的影响。John Collier 在 1942 年写道：「把印第安人与他的土地分离是致命打击。」1887 年的〈一般土地分配法[195]〉把印第安人的土地「个体化」，其后的文化崩溃导致印第安人丢失了约四分之三的土地，即九千万亩。1934 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196]〉重组部落的土地，通过复兴文化得以挽救了印第安人社会。

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况。人人关心各种土地所有制，因为这是社会组织的最直接基础。看来是经济冲突的高税收和租金、低工资等，几乎全都是隐蔽的压力，诱使土著放弃传统文化，从而迫使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方法，即是为了工资而工作和到市场上采购所需货品。在这过程中，一些土著部落移居到城镇，丧失了祖先遗传的美德，成为居无定所的「半驯化动物」：有流浪者、小偷和妓女；这是前所未见，像极了约在 1795～1834 年期间英格兰的赤贫人口。

(2) 工人阶级在早期资本主义下的人性退化是社会灾难的结果，不能以经济学术语衡量。
Robert Owen 早在 1816 年已留意他的工人「不管挣到什么工资，大多数人注定是不幸的…。」(*To the British Master Manufacturers*, p. 146)。还记得亚当•斯密估计失去土地的工人完全没有智力方面的兴趣。M'Farlane 估计「懂得写作和计算的老百姓日渐减少。」(*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p. 249-50)一代人之后，Owen 将工人退化归因于「未成年时被忽视」和「过度工作」，致使他们「即使可以赚得高工资，因出于愚昧而不能很好使用所得。」Owen 只付给工人低工资，但同时人为地为他们创建全新的文化环境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数人养成的恶习大体上与有色人种因文化接触瓦解而被低贬的特性：浪费、卖淫、盗窃、没有节俭和节约、邋遢、生产力低下、没有自尊和毅力。市场经济扩散正在破坏农村社会、乡村小区、家庭、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在文化框架内支撑生活的风俗和标准等传统结构。史宾汉兰提供的保护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到了 1830 年代，老百姓身受的社会灾难完全与今天的〔南非〕Kaffir 族人一样。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 Charles S. Johnson 独自一人推翻了种族贬低和阶层退化之间的模拟，把他的观点应用到阶层退化：「顺提一下，英格兰工业革命比欧洲各地超前，急剧经济重组之后的社会混乱把贫穷的儿童变成与过去非洲奴隶一样的「单件货品」…为儿童农奴制开解之辞与开解奴隶贸易几乎如出一辙。」("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E. Thompson,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 1939, p. 274).

〈济贫法〉与劳工组织

迄今为止没有人研究史宾汉兰制度的更广泛含义、其起源、影响以及突然终止的原因。以下是有关这方面的几个观点。

---

[195] General Allotment Act
[196]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1. 史宾汉兰制度在何种程度是战时措施？

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不是一些人所谓的战时措施。当代人很少把工资的状况与战时的紧急状态联系。工资有明显上涨的情况**在战前已经开始**。Arthur Young 的 1795 年《通函 *Circular Letter*》旨在查明农作物歉收对谷物价格的影响，提出以下的问题：「与前段时期相比，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了多少（如果有的话）？」他没有定义「前段时期」，但引用的参考数据时间范围从三年到五十年；参考数据的作者都没有把时段设置为两年，这是在 1793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战争的时段。实际上，没有人提及那次战争。

顺提一下，应付因歉收和恶劣天气条件导致赤贫现象增加的措施有：（一）当地捐献，包括失业救济金、免费或减价分发食物和燃料；（二）提供就业机会。工资通常不受影响；在 1788-9 年期间的类似紧急状态，曾以低于正常工资的水平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Cf. J. Harvey, "Worcestershire," in *Ann. of Agr.,* v, XII, p. 132, 1789. Also E. Holmes, "Cruckton," *l.c.,* p. 196.)

然而，有好的理由认为战争至少影响了间接采用了史宾汉兰紧急措施。实际上，战争加剧了快速扩大市场体制的两个弱点，也导致引发史宾汉兰制度的形势：（一）谷物价格波动的趋势，（二）骚乱对这些波动的影响最为有害。最近才开放的谷物市场不可能承受战争的压力和封锁的威胁。谷物市场也无法抵抗有外来不祥因素的习惯性骚乱引起的恐慌。在所谓的自发调节的制度下，中央当局认为「有秩序的骚乱」或多或少是本地供应不足的**指标**，应该温和处理；但现在这被指责是稀缺的**成因**和对整体社会的经济威胁，不仅局限于穷人。Arthur Young 警告「食品价格昂贵引发骚乱的结果」，Hannah More 的说教式歌词有类似的观点：「骚乱或是半条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她对家庭主妇的回答只是抑扬顿挫表达 Young 的虚拟对话：「我们是否直至挨饿都一声不发？肯定你不想这样，你应该抱怨；但抱怨或行动的态度不要让所感受的不幸更为恶化。」他强调「**只要没有骚乱**」，根本不会有饥荒的危险。这样的担心是有很好的理由：谷物供应极易受恐慌的影响。另外，因为法国大革命，即使有秩序的骚乱有了威胁性的含义。尽管害怕工资上涨无疑是史宾汉兰制度的经济成因，但可以认为就战争而言，这种情况的含意较多是社会性和政治性，而不是经济方面。

2. William Young 爵士和放宽〈定居法〉

1795 年有两项关键性〈济贫法〉措施：史宾汉兰制度和放宽「教区农奴制[197]」。很难相信只是巧合，而各自对劳工流动的影响刚好相反。因为后者，工人对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较有吸引力，而前者则减少他这样做的意欲。研究移民时有使用「推」和「拉」这些术语；当目的地有强大的「拉」，家乡的「推」会减弱。修订〈1662 年法案〉可能导致农村劳工大规模不安本份，史宾汉兰制度肯定减轻了这方面的危险。从管理〈济贫法〉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明显是是互补。因为放宽〈1662 年法案〉涉及设计该法案要回避的风险，即是穷人大量涌入「较好的」教区。要是没有史宾汉兰制度，这种风险也许真的发生。当代人很少提及这种关系，回想〈1662 年法案〉几乎没有公开讨论就付诸实施，这样的反应是不足为奇。然而，William Young 爵士必然有这信

[197] parish serfdom

念，因为他曾两次共同提出这两项措施。在 1795 年，他倡议修改〈定居法〉，又动议〈1796 年法案〉，把史宾汉兰制度的原则纳入法律。在此之前，他在 1788 年曾倡议同样的两项措施，但未获成功。他几乎以 1795 年相同的措辞动议废止〈定居法〉，同时又和议救济穷人的措施，建议设立生活工资，三分之二由雇主支付，三分之一由地方税支付。(Nicholson,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 Vol. II)然而，这一直要等到另一次严重歉收再加上法国战争，这些原则才付诸实行。

3. 城市高工资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城镇的「拉」导致农村工资上涨，同时也往往导致农村劳动力储备流失。这两个灾难密切相关，以后者的影响更为重要。农业生产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因为冬季的农闲，春秋两季的农活需要很多人手。在传统社会的自然结构中，这样的劳动力储备不是简单的工资水平问题，而是决定人口中较贫困的劳工其**地位**的制度性环境问题。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都有法定或习俗安排，方便地主在农忙时节佣用农村劳工。

城市工资上涨导致农村社会的问题，情况的核心是**地位**让位于**合约**。在工业革命之前，农村有重要的劳动力储备：男人在冬季忙于家庭手工业，而在春秋两季男工和妻子则忙于田间农活。〈定居法〉实际上使穷人成为教区的农奴，依赖当地的农民。〈济贫法〉有其他形式把当地劳工变成易受操纵的工人，例如劳工地方税、必须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或由教区以补贴鼓励农民聘用贫民。拥有特许权的作坊不但可随意残酷地惩罚穷人，实际上也秘密施罚；地方政府有权光天化日强行进入民居，如认为穷人「身陷贫困，并且应该得到救济」，可以逮捕穷人并送往作坊。(31 Geo. III. *c.* 78) 这些作坊的死亡率骇人听闻。除了这些惨况，北部的雇农或边境居民的工资以实物支付，且被强迫随时到田间干活，穷人的茅房和土地有各种契约把他们牢牢缚在一起，可以想象温顺的后备劳工大军任由农村雇主鱼肉。因此，除了工资的问题，还有维持足够农业劳动力储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引入史宾汉兰制度与农场主害怕工资上涨有密切关系，同样原因可能导致在后期农业萧条期间（1815 年之后）补贴制度快速普及；1830 年代早期，农业界几乎一致坚持保留补贴制度，不是因为害怕工资上涨，而是担心是否有充足供应的随时可用劳动力。特别是在 1792～1813 年的异常繁荣期间，他们一直担心人手问题；在这期间，谷物的平均价格剧增，并远超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史宾汉兰制度的背后动力不是工资，而是劳动力供应。

从农业小区的角度看，津贴制度的真正功能没有什么值得怀疑；那真正功能就是确保随时都有贫民作为可用的农工储备。顺带一提，虽然现实中没有剩余人口，史宾汉兰制度就是这样建立了类似的农村剩余人口。

工资上涨会吸引更多劳工，因此试图区分这两套动机似乎只是刻意而为。但在一些情况下，有证据说明农民较为重视那一套。

首先，有大量证据表明，就贫穷居民而言，农场主反对会减少临时农业帮工的任何形式的外间就业。1834 年报告书的一份证词指责贫穷居民「为了每星期一英镑去捕捉鲱鱼和鲭鱼，却把家

人留给教区照顾。他们不在乎一转头就被送进监狱，只要他们出狱后有机会赚钱…」（第 33 页）。同一份证词抱怨「农场主在春秋农忙季节常常不能找到足够数量的劳工。」 (Henry Stuart's Report, App. A, Pt. I, p. 334A).

其次是小耕地的关键问题。农场主一致认为小耕地最能帮助穷人和他的家庭脱离救济行列，但即使地方税的负担也不能诱使他们同意以任何形式向贫穷居民分配小耕地，以帮助穷人更少依赖临时农活。

这一点值得注意。直到 1833 年，农业社会默然支持保留史宾汉兰制度。《济贫法专员报告》提到：补贴制度意味着「廉价劳工，加快收割」(Power)。「没有补贴制度，农场主不可能继续耕作土地。」(Cowell)。「农场主希望佣工的工资由济贫款项支付。」(J. Mann)「我不认特别是大户农场主希望减少〔地方税〕。地方税保持改变，他们总是能够聘用想要的额外人手；一旦情况变坏，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手全部赶回教区…」（农场主的证词）。教区人士「反对任何致使劳工不依靠教区援助的措施，这样才可以把劳工限制在教区范围之内，有紧急工作时才有人可用。…高工资和劳工自由会捣垮〔教区〕。(Pringle) 教会默默反对向穷人分配小耕地。小耕地让穷人自给自足，有体面有自尊，也使他们脱离农业所需的储备大军。Majendie 建议小耕地面积为 1/4 英亩，认为高于这个面积的要求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土地）占有者担心使劳工会自给自足。」。另一位支持者 Power 也证实：「农场主一般反对推行小耕地，唯恐土地财产会缩水，找肥料要走更多的路，也反对劳工自给自足。」Okeden 建议小耕地面积为 1/16 英亩，因为这刚好用尽每个手工业家庭的余暇，一如「纺车和纱杆、梭子和织针消耗了他们的闲暇时间。」

4. 工业化城镇的补贴制度

史宾汉兰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作为农村减贫困的措施，不是要限制乡村，因为乡镇也是农村部份。直到 1830 年代早期，在典型的史宾汉兰地区大多数城镇已推行补贴制。例如，Hereford 郡颇为人口过剩，八个城镇（四个「肯定」，四个「可能」）有执行补贴制，而人口没有过剩的 Sussex 郡的十二个呈报城镇有九个执行补贴制。

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情况非常不同。直到 1834 年，工业城镇的依赖性穷人数目比农村地区少得多；甚至在 1795 年之前靠近工厂的乡郊地区其赤贫人口往往大幅度增加。1789 年，John Howlett 教士令人信服地反驳：「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大城市和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城镇的穷人比例高于教区；事实正好相反。」(*Annals of Agriculture,* v, XI, p. 6, 1789)

遗憾的是对新型工业城镇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济贫法专员看来担心史宾汉兰措施即将扩散到制造业城镇的所谓危险。人们知道「北部各郡受影响程度最小，」然而仍然声称「甚至在城镇，这种危险的存在已达可怕程度。」这没有事实证实。诚然，Manchester 或 Oldham 郡的救济偶尔惠及健康良好和充分就业的人。Henderson 报告在 Preston 镇的纳税人会议上，一位赤贫者大声疾呼，投诉「周薪从一英镑一直降至十八先令」。Salford, Padiham 和 Ulverston 诸镇归类为「定期」实施工资补助；Wigan 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也是同样情况。Nottingham 的长袜低于成本价出售，

但生产商依然「有利可图」，明显是因为有地方税补贴工资。Henderson 撰写 Preston 的报告时，脑海中已想到这可恶的制度「逐渐成形和引用私人利益来保护自己。」根据济贫法专员报告书，这制度较少在城镇中流行，只是「因为制造业资本家只是地方税纳税人的少数，因此对教区的影响少于农民。」

从短期看可能是这样，但从长期看似乎可能有几个理由令工业界雇主不普遍接受补贴制度。

一个理由是穷人工人效率低下。棉纺业主要以计工计算工资。但现在即使在农业方面「领取教区救济的人士效率低下，四、五个人的效率才等同一个计件工人。」(Select Committee on Laborers' Wages, H. of C. 4, VI, 1824, p. 4.) 济贫法专员报告书提到计件工作可使用史宾汉兰方法，而不必破坏「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效率」；这样生产商也许会「真正得到廉价劳工。」这暗示着农业工人的低工资不一定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工人的低效率可能压低了低工资的价值。

企业家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另一可能原因是竞争者可能利用补贴工资以较低的工资成本生产。这种威胁不会影响在不受限制市场出售产品的农民，但城市的厂家会感到极大不安。济贫法专员报告认为「因为甲郡滥用〈济贫法〉，乙郡的制造商可能被对手廉价倾销并导致破产。」William Cunningham 指出 1834 年法案之重要在于对〈济贫法〉管理的「国有化」影响，从而消除了发展全国市场的严重障碍。

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第三个理由，可能也是对资本家集团影响最大的理由，是这制度往往扣住「大量懒惰的剩余劳动力」，未能流入城市劳工市场。(Redford)。到了 1820 年代后期，城市生产商对劳工的需求很大；Doherty 的工会引起大规模动荡；这是 Owen 主义运动的开始，导致英格兰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和停工。

因此，从雇主的角度看，有三个强力而长期论据反对史宾汉兰制度：对劳动生产力的负面影响；造成国家不同地区成本差异的趋势；促成农村「劳动力市场不能流动」(Webb)，从而维持城市工人垄断劳动力市场。个别雇主或甚至当地的雇主小圈子可能不大理会这些情况，可能轻易相信低劳工成本的优势，不仅确保利润，而且有助与其它城镇生产商竞争。然而，企业家阶层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随着时日，看来原本对个别雇主或雇主小圈了有利的事情却对整个阶层构成威胁。实际上，补贴制度在 1830 年代早期向北部工业城镇扩展（即使补贴制度形式上有所精简），巩固了反对史宾汉兰制度的舆论，并在全国推行改革。

这证据表明城市政策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在城镇逐步建立工业的劳工储备，主要是为了应付经济活动的剧烈波动。在这方面，城镇和农村没有多大区别。乡村当局宁可选择高地方税而不是高工资，城市当局也不愿意赶走在城市落脚的非常住穷人。农村和城市雇主之间为争取劳工储备而彼此竞争。1840 年代中期有严重和长时间经济萧条，以地方税为代价支持劳工储备才变得不可行。即使如此，农村和城市的雇主还是以相同方式行事：工业城镇开始大规模清除穷人，与之相呼应的是农村地主「清洗农村」：两者都是为了减少常住穷人的数目。(cf. Redford, p. 111)

5. 城镇优先农村

本文假设史宾汉兰制度是面对城市工资水平上涨威胁时的措施，以保护农村社会。这涉及贸易周期中城镇优先农村。1837-45 年萧条时期是例子，说明这种情况。1847 年的细致统计调查显示萧条从英格兰西北部的工业城镇开始，然后蔓延到农业郡县，其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明显迟于工业城镇。数据显示「压力首先影响制造业地区，最后才在农业地区消失。」调查涵盖的制造业地区 Yorkshire 郡的 Lancashire 和 West Riding 为代表，人口有 201,000，分为 584 个济贫区；农业地区调查包括 Northumberland, Norfolk, Suffolk, Cambridgeshire, Bucks, Herts, Berks, Wilts 和 Devon，人口有 208,000，也是分为 584 个济贫区。制造业地区的情况在 1842 年开始改善，赤贫增加率从 29.37%降至 16.72%，1843 年实质减少 29.80%，1844 年 15.26%，1845 年进一步减少 12.24%。与此相比，农业地区 1845 年才开始改善，减少 9.08%。调查计算人均的济贫法开支，后者是分年分郡计算。(J. T. Danson,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U.K., 1839-1847," *Journ. of Stat. Soc.,* Vol. XI, p. 101, 1848)

6. 农村人口减少和人口过多

欧洲各国只有英格兰是统一管理城镇和农村的劳工。例如 1563 年或 1662 年的法令在农村和城市教区一律实施，各地官员在全国公平执法。这种情况归因于农村较早时期已工业化和城市基地随后的工业化。因此，城乡的劳工组织没有管理上的断层，这与欧洲大陆回然不同。这再次解释了劳工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受约束，从而避免欧洲大陆人口的两大不幸特征：即是由于农民向城镇移民而导致农村人口突然减少，以及不能逆转这过程，把已在城镇定居工作的移民再次连根拔起。自十九世纪下半以来，劳动人口大举外流，是中欧农村社会的恐怖现象[198]，但英格兰的人口流动是在城乡就业之间来来回回的钟摆波动。这情况近乎大部份人口一直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使国内移民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非常困难。另外，这国家到处都有港口，没有长距离移民的必要，因而在理解全国劳工组织后，〈济贫法〉的管理可以轻易调节。农村教区经常向在不太遥远的乡镇就业的非常住穷人发放院外救济，救济金送到他们的住所；另一方面，制造业城镇经常救济没有在城镇定居的常住穷人。只有在 1841-43 年非常时期，城市当局才例外实施大规模迁移。按照 Redford 的说法，有 12,628 名穷人被迁出北部的十九个制造业城镇，其中只有 1%的定居地是在九个农业区内。他也指出几乎很少远距离移民，雇主利用城乡的宽松救济措施维持大部份的后备劳工以供后用。难怪城乡会同时出现「人口过多」现象，而实际上 Lancashire 郡的制造商在高峰期还要从爱尔兰引进大量工人，而农场主强调如村里的穷人都被诱惑移民，庄稼收割期间将不够人手应付。



〈参考阅读〉

简春安〈从典范变迁看社会福利的发展〉

[198] 德文 *Landflucht*

郭家宏〈工业革命与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9 年第 7 期

第九章
赤贫主义与理想国

贫穷问题以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为核心：赤贫和政治经济学。虽然本书分别探讨两者各自对现代意识的影响，但两者曾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的发现。

直至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对于「穷人来自何处」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大体上同意赤贫化和进步是不可分离。John M'Farlane 在 1782 年报告：最多穷人的地方不是贫瘠国家或野蛮民族，而是最富饶和最文明的国度。意大利经济学家 Giammaria Ortes 在 1774 年提出公理：国家财富与其人口相对应，其不幸与其财富相对应。甚至亚当•斯密也慎重宣称最富裕国家的劳工工资不是最高的。所以，M'Farlane 认为英国已接近其全盛时期，「穷人数目将继续增加」[199]，他的意见不是危言耸听。

况且英格兰人预言商业停滞只不过是附和广泛的意见。如 1782 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是显著的话，那么贸易的波动更是如此。贸易正开始从把出口数字降低至半世纪前水平的衰退中恢复。对当代人而言，英法七年战争（1756-63 年）后贸易巨大扩张和国家繁荣，意味着紧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的英国也有本身的机会。英国急速崛起已经是过去的事，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可以持续进步，因为这仅仅是一场幸运战争的结果。现在回看，当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贸易会衰退。

事实上，繁荣就在不远处，排山倒海的繁荣注定要成为新生活形式，不仅一国如此，整个世界也如此。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丝毫暗示繁荣即将到来。对政治家来说，这可能是无关紧要，因为在两代人时间，贸易数字急剧上升只是略为减轻大众的不幸。对经济学家来说，极其不幸的是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在这「畸形」洪水中建立，其间贸易和生产的庞大增长碰巧与人类苦难庞大增加相伴随：实际上，Malthus, Ricardo 和 James Mill 的原则所依据的明显事实，只是反映这明确过渡时期的矛盾性趋势。

这情况确实令人莫名其妙。英格兰的穷人首次出现在十六世纪上半叶；随着个人脱离庄园或「任何封建主子」，穷人变得引人注目；穷人逐渐成为自由劳工阶层，是以下两种情况结合的结果：对流浪行为的残暴迫害以及培养家庭手工业，后者得助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在十七世纪，人们较少提到赤贫化，甚至〈定居法〉的苛刻措施在没有公共讨论的情况下被通过。到了世纪末重提议题时，Thomas

[199] 原注 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More 的《理想国》(1516 年）和早期的〈济贫法〉已经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往事；很久以来，人们已忘记解散修道院和镇压 Kett 造反的事。有些圈地和「霸占〔公地〕」行为一直在进行，例如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各新阶层的整体已经成形。十六世纪中期穷人突然出现对社会是危险，到了十七世纪末，穷人只是依赖救济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商业社会，其有代表性的人民是因为喜欢工作而工作，不接受认为贫穷不成问题的中世纪观点，也不接受成功圈地者的看法，认为失业者是有劳动能力的懒汉。从此以后，对赤贫化的各种观点开始反映哲学态度，非常类似以前的神学问题。对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反映对总体存在的见解；因此，这些观点各有不同和看似混乱不清，在文明历史也是极为重要。

贵格会教徒是探索现代生活可能性的先驱者，最先认识到非自愿性失业肯定是劳动力组织某种缺陷的结果。他们坚决相信以做生意的手法办事，以集体自助的原则帮助本身社群中的穷人；他们偶尔以有良心反对者的身份支付关押穷人的费用而避免支持政府。Thomas Lawson 是热心的贵格会教徒，在 1660 年发表了〈呼吁国会关注穷人，英格兰不应有乞丐[200]〉文章作为「平台」，建议设立「劳工交易所」这种现代意义的公共职业辅导中心。作家 Henry Robinson 十年前已发表〈职业咨询事务处[201]〉的建议。但王政复辟政府喜爱比较呆板的方法；1662 年〈定居法〉的倾向与任何合理的劳工交易制度大相径庭；劳工交易制度可能建立更广大的劳工市场；该法案中第一次使用「居住权」这词语，把劳工限制在教区之内。

1688 年的「光荣革命[202]」之后，信奉贵格会哲理的 John Bellers 成为遥远未来的社会思想趋势的名副其实预言者。「受难者会议[203]」当时经常利用统计资料为宗教济贫政策提供科学准确性；Bellers 在 1696 年提出建立「行业协会[204]」，更好利用穷人的非自愿性空闲时间。这不是基于劳工交易所原则，而是非常不同的劳工交易原则。前者与为失业者寻找雇主的传统概念相关；后者意味着劳工不需要雇主，只要他们的产品能够直接交易。Bellers 说：「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宝库」，质疑穷人为何不能利用这些财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还有富余？只要劳工组织成为「协会」或企业，就可以集合资源。这就是后来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不管是 Owen 的「乡村联盟[205]」，Charles Fourier 的自给自足的合作社区[206]，

[200] *Appeal to the Parliament concerning the Poor that there be no beggar in England* by Thomas Lawson, 1660

[201] *Office of Addresses and Encounters* by Henry Robinson, 1650.

[202] Glorious Revolution(1688-89)是英国和耶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信奉新教的政党连手推翻信奉旧教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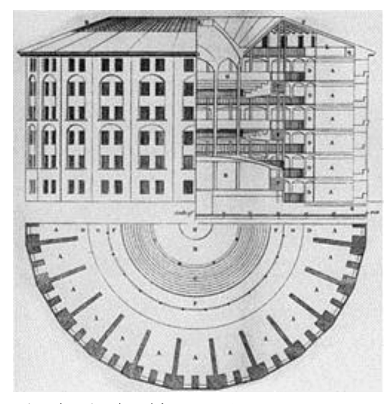
[203] Meeting of Suffering；贵格会在 1675 年成立的关注社会贫困问题的议政团体，至今依然存在。

[204] Colleges of Industry

[205] Villages of Union

[206] 德语 *Phalansteres*

Proudhon 的交易银行[207]，Louis Blanc 的国立工厂[208]，Lassalle 的国立工作坊[209]，甚至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简言之，Bellers 的著作包含了自机器在现代社会出现所产生巨大混乱以来与这问题相关的大多数建议。「这协会伙伴关系使劳动而不是金钱成为评价所有必需品的标准…」。设想的方案是「由所有有用行业组成协会，相互帮助，无需救济…」。把劳动券、自助和合作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以三百人为一组的自给自足劳工，为糊口之计而一起工作，「多劳者另有报酬。」。因此，糊口口粮和劳动所得混合计算。一些小型自助实验把财政盈余交给「受难者会议」，用于宗教团体其他成员的福利。这些盈余注定有伟大的前途；利润是新概念，是那时代的万应灵药。Bellers 的国家失业救济计划实际上是由资本家为营利而执行！同年，即 1696 年，商人 John Cary 推动在 Bristol 成立济贫企业[210]，初期取得少许成功之后未能继续盈利，其它同类的企业也是同样命运。Bellers 的建议建基于 John Locke 在 1696 年提出的劳工分配制；Locke 建议按照地税比例把当地农村穷人分配为纳税人工作。这是 1782 年〈新济贫法〉实施轮工制[211]的起源。赤贫民要为得到救济付出代价的概念已深入民心。[212]



正好在百年之后，最多产的社会预言家 Jeremy Bentham 构思计划大规模利用赤贫民操作由他更具创造天才的兄弟 Samuel 设计的机器为木材和金属加工。Leslie Stephen 爵士说：「Bentham 和他的兄弟期待蒸气机的出现。现在他们有机会利用囚犯而不是蒸汽。」这是在 1794 年；Bentham 已多年筹划图形监狱（见图）[213]，设计既便宜而又可以有效管理，他现在决定把这应用于囚犯作业的工厂，只不过是由穷人代替了囚犯。Bentham 兄弟的生意经并入了解决整体社会问题的计划。1795 年史宾汉兰地方官员的决定，同年 Samuel Whitbread 向国会提出最低工资草案，尤其首相 William Pitt 在 1796 年私下传阅的济贫法改革草案，使赤贫成为政治人物的议题。Bentham 的批评可能促使 Pitt 撤回草案，而 Bentham 于 1797 年在 Arthur Young 出版的《农业年鉴[214]》中提出他本人的精心建议。他的工业大楼[215]是按照圆形监狱的蓝图，有五层高分为十二个分区，是为了利用接受救济的

---

207 Banks of Exchange

208 法语 *Ateliers Nationaux*

209 德语 *Nationale Werkstatten*

210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

211 Roundsman System：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被轮派为农民工作，工资由农民和教区共同承担。

212 原注 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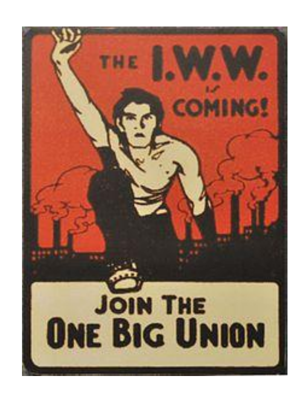
213 Panopticon；监狱设计如图所示：环形建筑分隔成囚室，一端面向外界采光，另一端面向中间的高塔，高塔的监视人员可以时刻监视到任何囚室，而囚犯因为逆光无法看到监视人员。经多年波折，Bentham 的计划最终从来没有落实。

214 *Annals of Agriculture*

215 Industry-House

穷人的劳动力；大楼交由设在首都的中央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参照英伦银行董事会的组织，投资五或十英镑的股东都有投票权。几年后发表的文本这样说：「英国南部的济贫事务交由一个机构管理，相应开支从一个基金支付。」[216]这管理机构是股份公司，名称大概是「国家慈善公司」；公司「将建设不少于二百五十幢工业大楼，有大约五十万住宿者」。连同这计划是对各类型失业者的详细分析，Bentham 此举走在这方面的其他研究之前足足一百年。他擅长分类，把脑袋的现实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最近刚刚丢掉工作的「新失业者」有别于可能因为「暂时停滞」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受「周期性停滞」影响的季节工有别于「被替代的失业者」，例如「因为引进机械而失去工作的失业者」，现代术语称之为技术性失业；最后一个组群是「被遣散人员」，这是 Bentham 时代由法国战争造成的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失业者。然而，最重要的类别是受「暂时性停滞」影响的失业者，不仅包括生计「依赖时尚」的手艺工匠和艺术家，还包括 「制造业普遍停滞」时更为重要的失业者组群。Bentham 的计划无异是通过失业人口大规模商业化而平顺商业周期。

1819 年，Robert Owen 重新发表 Bellers 一百二十年前提出设立「行业协会」计划。零星的贫困现象现在已发展成为苦难的急流。他本人的「乡村联盟」有别于 Bellers：「乡村联盟」规模大得多，由一千二百人和相等的土地亩数组成。包括 Ricardo 这权威人士在内的委员会呼吁人们参加这高度试验性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稍后，法国人 Charles Fourier 因为痴想隐名合伙人最终会参加他的公社组织而受人嘲笑；他的计划概念非常类似同时代最伟大金融家赞助的计划。Owen 在苏格兰 New Lanark 镇的公司（Bentham 是隐名合伙人）是否已曾因其慈善计划的财政成功而变得举世闻名？世上还没有关于贫困的标准观点，也没有从穷人身上牟利的常规方法。



1832 年，Owen 把 Bellers 的劳动券概念应用于他的「国立公平劳动交易所[217]」，以失败告终。劳动阶层与经济自给自足密切相关的原则（也是 Bellers 的想法），是随后两年著名的英国总工会[218]运动的背后动力。当时的总工会是所有行业、工艺和手艺的联合工会，也不排除小户师傅，其模糊目标是把以和平的表现方式把他们组成社会主体。谁会想到这是百年之后的暴力「大联盟[219]」（见图）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各自为穷人制定的计划

[216] 原注 2：Bentham, J., *Pauper Management.* First published 1797.
[217] National Equitable Labor Exchange
[218] Trades-Union，留意不是个别工会 trade union。
[219] One Big Union 是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概念，工会人士希望团结工人以解决劳工问题，尤以「世界劳工组织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最热衷推动。（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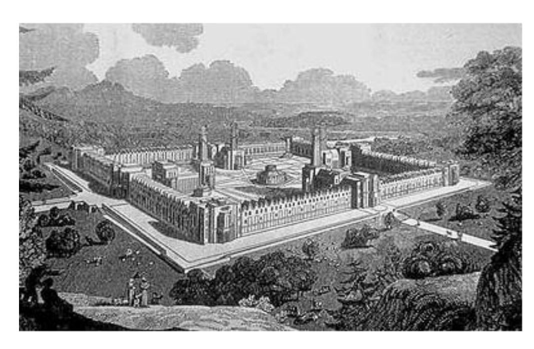
上实际上几乎没有分别。1848 年 Proudhon 的「交易银行」是哲学无政府主义[220]第一项实际业绩，基本上衍生自 Owen 的实验。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严厉抨击 Proudhon 的想法；此后是由国家为这类型的集体主义计划提供资本，Louis Blanc 和 Lassalle 的集体主义计划已尘归历史。

从赤贫民身上赚不到钱，其经济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一百五十年前，笛福[221]在 1704 年出版的小册子终止 Bellers 和洛克发起的讨论。笛福坚持如穷人得到救济，他们就不会为工资而工作；如他们在公共工厂从事制造劳动，只会为私营制造业造成更多失业。笛福〔就社会问题出版了很多小册子〕的小册子有一些的题目很吓人：〈发放救济不是慈善，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222]〉，之后还有荷兰医生 Bernard Mandeville 的著名诗集《蜜蜂的寓言[223]》谈到聪明蜜蜂的社会繁荣只是因为这鼓励了虚荣和忌妒以及邪恶和浪费。这位怪医沉湎于肤浅的道德悖论，笛福这位小册子作者却击中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笛福的文章很快在「低级政治[224]」圈子之外被遗忘，但 Mandeville 的粗浅悖论吸引到 Berkeley, Hume 和 Smith 这些有识之士。显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流动财富依然是道德问题，而贫穷问题不是。清教徒阶层对明显浪费的封建形式感到震惊，他们的良知斥责这种浪费为奢侈和罪恶；他们不情不愿地赞同 Mandeville 关于蜜蜂的说法，只是因为希望那些罪恶的商业和贸易很快会衰退。后来，这些富有商人的商业道德得到保证：新棉纺厂不再迎合无谓摆阔，而是满足朴素的日常需要，浪费形式在暗地里形成，不再如前明显，却比老一套更为浪费。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笑还不足以穿透那些全神关注财富的道德危险的良心；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不过，笛福的悖论预测了将要来临的种种困惑：「发放救济不是慈善」，因为消除了饥饿的锋芒，生产活动受到阻碍，只会造成饥荒；「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创造公营就业机会只会令市场的物资过剩，加快私营贸易商的破产。大约在十七世纪之初，在 Bellers、贵格会教徒和那位趋炎附势的记者笛福之间，在圣人和愤世嫉俗者之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要经历二百多年的工作和思考、希望和折磨，才费尽力气找到答案。

但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人们仍不理解赤贫的真正性质。人们一致同意人越多越好，因为国家的力量在于人。人们也欣然同意廉价劳工的好处，因为劳动力便宜，制造业才能兴旺发达。另外，若没有穷人，谁会开船和打仗？也有人怀疑赤贫是否完全的坏事。无论如何，为什么赤贫民不能被公营机构利用赚钱，一如他们为私营机构创造利润？对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笛福偶然发现的真理，七十年后的亚当 • 斯密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开发状态隐

[220]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221] Daniel Defoe (1660 – 1731)；名著《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也是社运份子。
[222] *Giving Alms no Charity and employing the Poor a Grievance to the Nation*
[223]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1705*。《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24] inferior politics，十八世纪把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称之为低级政治。

藏着其内在弱点。没有人完全理解新财富和新贫困。



贵格会教徒 Bellers、无神论者 Owen 和功利论者 Bentham 各有不同思想，但他们的计划却令人惊奇的一致，说明以上的问题还在蝶蛹待变时期。Owen 是社会主义者，热忱相信人人生来平等，天生权利也是平等；而 Bentham 鄙视平均主义，嘲笑人权，非常倾向自由放任。Owen 的「平行四边形村庄[225]」（见图）与 Bentham 的「产业大楼」是如此相似，以致人们记起他受到 Bellers 影响之前，可能以为他是完全被「产业大楼」启发。这三位人士全都相信适当组织失业者的劳动肯定会产生盈利：人道主义者 Bellers 希望是为了救济其他受难者；功利自由主义者 Bentham 希望交由股东处理；社会主义者 Owen 希望把事业交还失业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显露了未来裂痕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征兆，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揭示了他们彻底误解新生市场经济中赤贫化的性质。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穷人数目一直持续增加：1696 年当 Bellers 写作时，地税救济金约为四十万英镑；1796 年 Bentham 强烈反对 Pitt 的草案，已超过二百万英镑；到 1818 年 Owen 开始行动时，已接近八百万英镑。从 Bellers 到 Owen 的一百二十年间，人口可能增加了三倍，而救济金却增加二十倍。赤贫化已成为险恶的征兆，但没人猜透含意。



[225] parallelogram。Owen 提出「把世界分成村庄，每村有三百至二千人进住，各人获分配半亩到一亩半土地；村内民居以平行四边形排列，有共享厨房，食堂，学校和礼拜场所；各人放弃个人主义，要为共同利益工作。」（插图）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人们认识贫困的意义时，十九世纪已做好准备。分水岭大约是 1780 年。亚当 • 斯密的伟大著作认为济贫不是问题；但十年后 Townsend 的《济贫法论述》把济贫提升为重要议题，在此后一百五十年一直困扰人们的思想。

从亚当 • 斯密到 Townsend 的氛围变化确实引人注目。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由 Thomas More 和马基雅弗利[226]，马丁路德[227]和 John Calvin 开创的国家年代；后者属于 Ricardo 和黑格尔从相反角度发现了社会存在的十九世纪；社会不服从国家的规律，相反，国家服从社会的规律。诚然，亚当 • 斯密把物质财富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以极大的现实主义而为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科学（即经济学）的奠基人。对他而言，财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其用途是服从社会；财富是历史上各国争取生存过程的附属物，不能与国家分离。依照他的观点，支配国家财富有一组条件源自整个国家的进步、静止或衰退状态；另一组条件源于国家安全稳定以及势力均衡的需要；还有一组条件取决于政府偏袒城市或乡村、工业或农业的政策。因此，他认为只有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才可以阐述财富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广大民众」的物质福祉。他的著作没有透露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为社会制定法则，也没有透露资本家代表管治自成一体经济世界的上天在世俗发言。在他而言，经济范畴还没有本身法则可以作为善与恶的标准。

亚当 •斯密打算把各国的财富视为该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函数；所以他的海军政策与 Cromwell 的 1651 年《航海法则[228]》是如此契合，而他的人类社会观念与 John Locke 的天赋权利论是如此和谐一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指出社会的经济范畴可能成为道德法则和政治责任的源头。自利行为只会促使人们做出本质上也会有利他人的事情，就像屠夫的自利行为最终为他人提供菜肴。斯密的思维是广泛的乐观，因为支配世界的经济部份其法则是和人类命运共鸣，支配其余事物的法则也是如此。没有无形之手试图以自利之名把自相残杀的习俗强加人类。人的尊严是有道德的人的尊严，因此人是家庭、国家和「伟大人类社会」公民秩序的成员。理性和人性为零星行为设定界限；竞争和获利必须让位给理性和人性。依据人类的内在精神原则就是「自然」；依据这些原则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亚当 • 斯密有意识把物质意义的「自然」排除在财富问题之外。「无论任何国家的土地、气候或领土范围如何，其每年的供给是丰富或不足，必然在特定情况下肯定取决于两个条件，」即是劳工的技能和社会上有用成员和闲散人员的比例。没有自然

[226] Machiavelli
[227] Martin Luther
[228] Navigation Laws

因素，只有人的因素。他故意在书的开始部份排除了生物和地理因素。重农主义者的谬论对他起了警示作用；他们偏好农业，致使他们混淆了物质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并促使他们强辩只有土地才真正具创造力。斯密的思想没有歌颂自然之理。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人文科学，应该研究什么是人的本性，不是「自然」的本性。

十年后的 Townsend《济贫法论述》集中讨论山羊和狗的定理。场景是智利海岸之外的太平洋鲁宾逊岛。Juan Fernandez 登陆岛上，放养了一些山羊，以便日后重临时有肉可吃。山羊以惊人速度繁殖，成为骚扰西班牙贸易的武装民船（主要是英国人）的便利食品储备。为了消灭山羊，西班牙当局在那里放养公狗母狗各一，这两只狗日后也大量繁殖，减少了它们以之为食的山羊数量。Townsend 写道：「然后恢复了新平衡。两个物种的最弱者最先成为自然债务的牺牲品；最活跃和最健壮的保存了性命。」他又补充：「食物的数量控制了人类物种的数目。」

搜索资料[229]，找不到可以证明上述故事的证据。Juan Fernandez 确实在某时候放养了山羊；但据 William Funnell 的描述，传说中的犬只是美丽猫儿，而且据说狗或猫都没有繁殖；山羊栖息在难以接近的岩石，而沙滩满是肥胖海豹（所有的报告都是一致），这些胖家伙更可能成为野狗的猎物。不过，范式并不依赖实证支持。没有古文物研究的真实证明，丝毫没有影响 Malthus 和达尔文受到这故事的启发：Malthus 从 Condorcet 知道这故事，而达尔文是从 Malthus 得知。若不是 Townsend 从山羊和狗的故事得到如下的箴言并希望应用到济贫法改革，达尔文的天择论[230]和 Malthus 的人口法则都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Townsend 说：「饥饿会驯服最凶猛的动物，教导最堕落的人学会体面和礼貌、顺从和臣服。通常，只有饥饿能驱使和刺激他们（穷人）劳动；但我们的法律声言他们决不会挨饿，也必须承认法律提及他们会被迫要工作。不过，法律制约带来许多麻烦、暴力和吵闹，令人憎恶，决不能产生为人接受的好服务；而饥饿不仅是平和、无声、持续的压力，而且作为生产和劳动的最自然动机，饥饿驱使人尽全力；一旦受惠他人慷慨解囊，这是善意和感恩的持久和可靠的基础。奴隶肯定要强制工作。但自由人应该自行考虑和判断，应保护他全面就业，无论多少；当他侵犯邻居的财物时应受到惩罚。」

这是政治学的新起点。Townsend 从动物方面理解人类社会，绕过了所谓无法避免的政府基础问题，从而把新的法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即是大自然法规。
Thomas Hobbes[231]的几何学偏见，以及 Hume、Hartley、Quesnay 和 Helvetius 等人在社会寻求牛顿定律都只是比喻性：他们全都渴望要发现普遍的社会规律，一

---

[229] 原注 1：Cf. Antonio de Ulloa, Wafer, William Funnell, 以及 Isaac James（包括 Captain Wood Rogers 对 Alexander Selkirk 的描述）和 Edward Cooke 的观察。
[230]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231] 霍布斯 (1588 – 1679)，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 *Leviathan*》作者，偏好几何学，认为是寻找真理的途径，可惜这方面学艺不精。

如大自然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但他们想到的是人类的定律，例如 Hobbes 的恐惧心理力量，Hartley 的心理学联想、Quesnay 的自利或 Helvetius 对功利的探索。这没有什么神经过敏：Quesnay 像柏拉图一样偶尔采用饲养者的观点看人间事物，亚当 • 斯密肯定没有忽视实际工资与劳工长期供应之间的联系。然而，亚里士多德曾教导只有诸神或野兽能够在社会之外生活，而人不是神也不是野兽。耶教思想认为人与野兽之间的区别也是构成的；生理学现实领域的研究不可能混淆人类共和国精神根源的宗教意义。对 Hobbes 而言，如人是狼，那是因为人在社会之外表现像狼，而不是因为人与狼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生物性因素。最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没有设想到有任何人类社会是没有法律和政府。但是在 Juan Fernandez 的岛上，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山羊和狗之间却依然保持平衡。平衡得以维持，一方面是因为狗没有办法吃掉那些逃往岛上岩石险峻地带的山羊，另一方面是山羊克服了种种不便以躲避狗的捕食。那种平衡无需政府维持；是一阵阵的饥饿和食物不足恢复了平衡。Hobbes 曾主张要有暴君，因为人就像野兽；Townsend 坚持人实际上就是野兽，而正因如此所以只需要最小限度的政府。依照这种崭新的观点，自由社会可以当作是由两类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目受到食物量的限制；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就会驱使他们去工作。无需地方治安官员，因为饥饿比他们更能维持纪律。Townsend 尖锐地指出，恳求治安官员插手即是「强者恳求弱者。」

新基础与正在浮现的社会密切吻合。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市场一直在发展；谷物价格不再是地方性，而是地区性；这预示几乎是普遍使用货币以及货品有广泛的市场可能性。市场价格和收入，包括租金和工资相当稳定。重农主义者首先注意到这些规律，但在封建收入依然流行的法国、劳工往往是半奴隶性，以至租金和工资通常都不是由市场决定，所以重农主义者甚至无法把这些规律整理成为理论。但在亚当 • 斯密时代的英国乡村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部份，地主的租金和农业劳工的工资明显依赖价格。只有在例外情况才由政府机构限制工资或价格。在这奇怪的新秩序下，旧的社会阶层却继续多多少少维持先前的阶级，尽管他们的合法特权和限制已经消失。虽然没有法律限制劳工要为农户干活，也没有法律迫使农户让地主过好日子，但劳工和农户还是似乎在这种压力之下生活。什么法规命中注定劳工要服从没有法定责任的主人？什么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分开，好像彼此是不同人种？什么维系这人类社会的均衡和秩序，无需动用或甚至容忍政治性政府的干预？

山羊和狗的范式似乎提出答案。人类的生物特性似乎是没有政治秩序的社会的既定基础。因此，当前的经济学家放弃了亚当 • 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转而采纳 Townsend 的论点。Malthus 的人口论和 Ricardo 的递减回报法则使人口繁衍和土地肥力成为新发现领域的的组成要素。经济社会已形成与政治国家有别。

就十九世纪思想史而言，这人类集体存在的环境（复杂社会）明显极其重要。因为浮现的社会就是市场体系，人类社会面临的险境是从迄今以政治实体为部份基础的道德世界转至完全陌生的基础。赤贫化问题显然难以解决，正迫使 Malthus 和 Ricardo 赞同 Townsend 对自然主义的沉缅。

Burke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探讨赤贫化问题。西印度群岛的环境令他确信如不为白人主子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培育大量奴隶人口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黑人经常被允许带有武器。他认为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国内失业人口增加，因为政府根本没有警力可用。虽然他是不折不扣的家长制传统的拥护者，但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热情信徒，因为他看到对付迫在眉睫赤贫化管理问题的答案。地方管理机构很乐意看到棉纺厂对贫困儿童的意外需求，而儿童的学徒问题留给教区处理。成百上千与生产商签订契约，而工厂往往是在偏远地区。新城镇需要大量赤贫民；工厂甚至愿意支付穷人。成年人被分配到任何愿意养活他们的雇主，一如被轮流分派到教区内农场当杂工。外派穷人比管理「无罪的监狱」节省成本；这是贫民习艺所的别称。从管理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雇主有更贯彻而细致的权力[232]」，取代了政府和教区强制〔劳工〕工作的职能。

显然，这涉及治国之道的问题。如教区向资本主义企业家外派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而资本家又愿意支付工资，为何穷人要成为政府的负担，要由教区养活？这岂不是清楚表明，除了教区方案，还有更便宜的方法促使穷人挣钱养活自己？答案在于废除伊丽莎白济贫法，无需以其它法律代替。无需评审工资，无需救济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也没有最低工资或保障生存权利。处理劳工就要正视劳工是在市场寻找自身价格的商品。商业规则是自然法则，因此也是上帝的法则。当软弱的地方官员向较强者求助，太平绅士求助于饥饿，还会是什么别的？对政治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自由放任**[233]」只是保证法律和秩序的原则，而且成本和着力最少。就让市场负责养活穷人，事情将会水到渠成。正是在这一点，理性主义者 Bentham 与传统主义者 Burke 彼此意见一致。痛苦和快乐的要求不要造成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可以解决问题，就无需任何别的痛苦。「法律能为生计做些什么？」Bentham 的回答是：「没法直接做什么。」[234]。贫困是「大自然」在社会挣扎求存，其具体约束就是饥饿。「具体约束力量够大，就业的政治约束可能是多余。」[235] 所需的一切只是「科学而又经济」地对待穷人。[236]Bentham 强烈反对 Pitt 的〈济贫法草案〉，草案等同把史宾汉兰制度变成法律，因为这允许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但 Bentham 与他的学生不同，他当时既不是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的「行业大楼」是虚假科学管理实行细致实际

[232]原注 2：Webb, S. and 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Vols. VII-IX, "Poor Law History."
[233] *laissez-faire*
[234] 原注 3：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4. (Bowring, Vol. I, p. 333.)
[235] 原注 4：Bentham, J., *ibid.*
[236] 原注 5：Bentham, J., *Observation on the Poor Bill,* 1797

管理的恶梦。他坚持计划总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对穷人的命运不可能无动于衷。Bentham 相信贫困是繁荣的部份。他说：「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大多数平民除了日常劳动之外没有极少的其它财富，因此总是濒临贫困…」所以他建议「应定期对贫穷的需求提供援助」，他遗憾地补充：「理论上，需求减少，损害了工业」，因为从效益主义角度看，政府的任务就是增加需求，以加强饥饿的具体约束效力。[237]

让大多数老百姓濒临贫困作为繁荣最高阶段的代价，涉及非常不同的人文态度。Townsend 通过沉缅于偏见和情感主义而纠正他的情感平衡。人穷志短是自然规律，否则卑屈、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工作没人去干了。如果不依赖穷人，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除了苦难和贫穷，有什么能能迫使下层人民面对暴风海洋和战场的一切可怕？」但这样的粗疏爱国主义展示依然为更细腻的情感留下空间。济贫措施当然应该彻底取消。〈济贫法〉「始于近乎荒谬的原则，声称要完成本质和世间组织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若是把穷人交付富人的怜悯，谁能够怀疑「唯一的困难」只是限制后者仁爱之心的冲动？慈善的情感不是远比严格法律责任的情感更加高贵？他高呼「大自然之中能否有比仁慈的温和满足感更美？」，并比对铁石心肠的教区救济没有「直接表达对意外恩惠的真诚感激」情景。「当穷人不得不与富人为友，富人决不会希望减轻穷人的苦难…」。读过《两个民族[238]》对生活细节的动人描述，没人会（下意识）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是从山羊和狗的岛上学会情感教育。

Edmund Burke 是不同境界的人。Townsend 这样的人有少许失误，他却犯下大错。他的天赋把残忍的事实表彰为悲剧，情感上添上神秘的光环。「当我们假装可怜那些必须劳动的穷人，否则世界无法存在，我们是在轻视人类的情况。」这无疑好过粗俗的漠不关心、空洞的悲叹或同情心高涨的伪善之言。但这现实态度的雄浑气度，却因强调贵族统治地位时的微妙满足感而打了折扣。结果是要比希律王[239]*还要希律王，但低估了及时改革的机会。公正的猜想是如果 Burke 还活着，1832 年打算结束古代统治的〈国会改革草案[240]〉可能获得通过，但付出不可避免流血革命的代价。不过，一旦政治经济的法则注定人民要在不幸中挣扎，Burke 可能反驳：平等的概念不就是残酷地引诱人类走向自我毁灭？

Bentham 不是 Townsend 那种圆滑的自满，也不是 Burke 的过份沉淀的历史主义[241]。他相信理性，改革新发现的社会规律领域似乎是效益主义实验梦寐以求的无

[237] 原注 6：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p. 314.

[238] Benjamin Disraeli 的 1845 年小说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记述英格兰劳工的苦难。

[239] King Herod：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

[240] Parliamentary Reform Bill

[241] historicism，必须研究与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才能认真了解社会与政治。「人类历史」的意思是「人类发展」，不是「记录往事」。

人境地。他一如 Burke 拒绝**动物性决定论**[242]，也拒绝经济学优于正当政治学。虽然他是《论高利贷[243]》和《政治经济学手册[244]》的作者，但他是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没有提出效益主义[245]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即是价值来自效益。他反而被联想心理学促使成为有无穷想象力的社会设计师。他认为「自由放任」只是社会机械的另一工具。工业革命的智慧主要动力是社会创新，不是科技创新。过了整整百年，当工业革命早已结束之后，自然科学[246]才对工程学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机械学和化学这些新的应用科学发展之前，对桥梁或运河的实际建造者以及机器或发动机设计师而言，一般自然规律的知识是完全无用。Telford 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拒绝接纳物理学学者成为会员；据 David Brewster 爵士所言，他从不学习几何学原理。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真正意义上是属于理论性，其实际重要性没法与当时的社会科学[247]相比。科学的声誉高于常规和传统，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地位因为与人文科学[248]的联系而大大提升；对此我们这代人认为难以置信。发现经济学是惊人的意外，大大加速了社会变革和建立市场体系，而具决定性影响的机器却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工匠发明。因此，可以公正又恰当地指出社会科学应当是机械革命的智慧之源，不是自然科学；机械革命把自然力量置于人类控制之下。

Bentham 认为他发现了一门新社会科学，即是道德伦理和立法，这将建基于效益原则，借助联想心理学以精确计算。十八世纪英格兰认为「科学」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正是由于科学在人文事务的范畴内变得有效。对这样的务实态度的需求颇为势不可挡。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往往不可能指出人口增加或减少、外贸平衡的趋势如何、那个人口阶层取得优势。人们往往只能猜想国家财富增加或减少，穷人来自何处，信贷、银行或利润的情况如何。「科学」最初是以实证方法解答这些问题，而不是纯粹猜测或古文物研究；而由于实际利益很自然是重要，所以科学要提出如何控制和组织新事物的庞大领域。历史见证了圣徒对贫困的本质感到困惑，又聪明地实验自助形式；利润的概念曾被欢呼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贫困是好还是坏的征兆，众说纷纭；科学性质的贫民习艺所管理层发现无法利用穷人创造财富而感到困惑；Owen 以良知慈善事业运作他的工厂而致富；

---

[242] zoological determinism，也称为「生物性决定论」，认为人的本性和行为是演化而来，基调是「人性本恶」，如不受社会制约，受基因支配的行为必然祸及他人。
[243] *Essay on Usury*
[244]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45] utilitarianism
[246]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中有机或无机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等。
[247]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还包括法学、犯罪学、哲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艺术、社会工作学及法律学等等，与人文科学有重叠，因此有时统称为「社会人文科学」。
[248] Human sciences 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还有许多其它实验似乎运用了同样的启蒙性自助原则，但都令人惋惜地失败，善心的发起人陷于悲惨的困惑。如果把视野从赤贫问题扩大到信贷、铸币、垄断、储蓄、保险、投资、公共财政以及监狱、教育和彩票业等方面，可能每项都容易引出许多相关的新类型探索。

这时期大约在 Bentham 去世时结束[249]；自 1840 年代，在世的计划者只是特定风险事业的推手，而不再去探讨所谓互惠、信任、风险以及人文事业的其它要素这些通用原则的新应用方法。从此以后，商人以为知道业务活动应采取什么形式，在成立银行之前极少考虑资金的性质。当时的社会设计师每每是怪人或骗子，也经常被投入监狱。从 Paterson 和 John Law 到 Pereires 的工业和银行体系曾积极推动各样宗教、社会和学术宗派项目短暂泛滥股票交易所，现已变成只是细流。负责日常事务的不再如前重视分折意见。至少有人认为社会的探索已经终结，人类的地图已没有空白点。百年之内不可能出现 Bentham 那样的人。一旦工业活动的市场体制成为主导，所有其它体制领域都附属这模式；社会的人为计划的天才也失去归宿。

Bentham 的圆形监狱，不仅只是「把无赖磨练成诚实的人、把懒汉磨练成勤劳的人的工厂」[250]，也像英伦银行一样支付股息。他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改善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建立卫生部；促进储蓄普遍化的有息票据；蔬果低温储藏室；按新科技原则建立军工厂、最终由囚犯或者接受救济的穷人运行；设立文摘日校向社会中上阶层教授效益主义；公共会计制度；房地产登记制度；公共教育改革；制服登记；消除高利贷；放弃殖民地；采取避孕措施降低穷人比例；通过股份公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以及其它建议。这些建议有一些计划确实可能带来小小进步，例如「行业大楼」集合多项基于联想心理学成就的创新，以改善和利用人的劳力。虽然 Townsend 和 Burke 把自由放任扯上**立法无为主义**[251]，但 Bentham 认为这无阻改革浪潮。

Malthus 在 1798 年曾回答 William Godwin 的问题，答案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正式起点，但在讨论之前先回顾当年的情况。Godwin 的《政治正义[252]》是要反驳 Burke 的 1790 年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253]》。Godwin 的著作面世正好在镇压风潮之前，风潮始于 1794 年暂时中止人身保护状[254]和迫害民主「通讯会社[255]」。当时

[249] 原注 7：1832.
[250] 原注 8：Stephen, Sir L.,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1900.
[251] legislative quietism
[252] *Political Justice*
[253]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4] habeas corpus
[255] Correspondence Societies。通讯会社在 1792 于伦敦成立，主张议会改革，特别是扩大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会社反对与法国开战，因而被政府镇压，后来通过扩大〈叛国法〉以法律手段禁止会社，但会社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和宪章主义。

英格兰正和法国交战，那恐怖时代令「民主」一词成为社会革命的同义词。Richard Price 在 1789 年发表的《爱国论述[256]》祷辞奠定英格兰民主运动，到 1791 年 Paine 的《人权论[257]》达到文学高点，民主运动一直局限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到贫苦劳工的不满；只有鼓吹全民选举和国会任期一年的小册子略有提及济贫法问题。但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对抗手段（即史宾汉兰制度）是在〈济贫法〉的范围内。教区退缩到人为的泥沼，其幌子一直维持到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年。1790 年代那场政治镇压的惊惶失措行动其有害后果（如只是独立事件）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史宾汉兰制度引起的退化过程却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这制度把地主阶级统治延长四十年，代价是牺牲了平民的活力。Mantoux 说道：「当有产阶级抱怨济贫税越来越重，他们忽略了这实际上是革命保险；劳工接受了少量补贴，没有认识到部份原因是本身的合法收入减少了。因为补贴无可避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甚至压低到工薪阶层不能更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之下。农场主或生产商依靠教区补足工资与工薪阶层最低生活需要之间的差距。他们为什么要支出一笔容易转嫁纳税人的费用？另一方面，收取教区救济的人愿意为较低工资工作，那些没有教区救助的人失去了竞争力。由此而起的矛盾结果是所谓「济贫税」对雇主而言是节省开支，对不指望公共救济的勤劳劳工而言是损失。因此，利害关系的无情相互作用将仁爱的法律变成铁铸枷锁。」[258]

本书以为新工资法和人口规律就是建基于这枷锁。Malthus 和 Burke 和 Bentham 都强烈反对史宾汉兰制度，主张完全废除〈济贫法〉。他们没有料到史宾汉兰制度会把工资压到最低生活需要水平和这水平之下；相反，他们预期这会推高工资，或至少人为地维持原况；若不是有〈反结社法〉，情况可能是这样。这错误的期望有助解释他们未能把农村的低工资水平追溯至史宾汉兰制度这实际原因，而是视为所谓工资法则作用的不可逆转证明。下文讨论新经济科学的基础。

Townsend 的自然主义无疑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唯一可能基础。经济社会之存在，见诸价格的规律性，而收入的稳定性依赖那些价格；因此，经济规律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建基于价格。促使正统经济学在自然主义中寻找基础，是大量生产者另一令人费解的不幸；就今天所知，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源于旧市场的规律。但当代人看到的大概是这样的事实：过往劳工一直习惯活在贫穷边缘（如考虑到习惯标准不断变化的水平，至少是这样）；自机器出现，劳工肯定未有上升至糊口水平之上；既然经济社会最终成形，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数十年来劳苦大众物质水平实际上即使没有变坏也没有改善。

---

[256]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Price 于 1789 年在伦敦老犹太人街会议室发表演讲，因此也称为 Old Jewry 祷辞。

[257] *The Rights of Man*

[258] 原注 9：Mantoux, P. 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28.

如这些事实的充份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工资的铁打法则；这法则声言是法律导致劳工仅堪糊口的最低水平工资，这法律把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不可能有其他标准。这假象当然是误导，而且从资本主义的任何价格和收入的严格理论角度来看，这几近荒谬。不过，归根到底，正是由于这虚假外表，工资法则不可能是基于人类行为的任何理性规则，而是必须来自人类繁衍和土地肥力的自然事实；Malthus 的人口论和收益递减定律已说得清楚。正统经济学基础的自然主义要素主要是史宾汉兰制度造成的环境所导致。

这引伸而来的是 Ricardo 和 Malthus 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直至《国富论》百年后出版才清楚认识在市场制度下，生产要素是产品的组成部份；随着生产增加，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必会上升。[259] 虽然亚当・斯密在价值的劳动力源头方面曾错误跟随 Locke 的观点，但他的现实主义感挽救了他，没有一直错下去。因此，他曾经混淆了价格的要素，但同时又正确坚持如社会大多数是穷人，社会不可能繁荣兴旺。我们现在认识的公理在他的时代却是悖论。斯密本人的观点认为普遍的繁荣必然惠及所有人；如社会越来越富有，人民不可能越来越穷。遗撼的是此后很长时间的事实没有证明他的观点；理论家要解释事实，所以 Ricardo 进而提出：社会越进步，越难取得食物；地主越富有，资本家和工人都受剥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誓不两立，但这种对立最终无效，因为工人的工资永远不会超出糊口水平，而利润必然枯萎。从松散意义来看，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些正确元素，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些说法既不真实又艰深难懂。然而，事实本身是建基于矛盾的模式，即使时至今日依然难以澄清。科学体系的作者声称是从人的行为导出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不是动植物的行为；但毫不奇怪他们要引用动植物繁殖作为天外救星[260]。

下文简述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奠定及其后果：看来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其实是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混乱不清。财富与价值的对称导致 Ricardo 经济学几乎每方面都出现最令人困惑的假问题。亚当・斯密留下的**工资基金理论**[261]带来无限误解。除了一些有深度洞识的特殊理论，例如租金、税收和外贸方面，理论只是无望地试图得出一些定义不严格的术语试图得出分类结果；价格的表现、收入的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工资以及利息

[259] 原注 10：Cannan, E.,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1930.

[260] *deus ex machina* 天外救星是意料之外、突然和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源出希腊戏剧往往以天外救星突然出现来为情节或场面解困。

[261] wage-fund theory，理论指出企业的产出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工资基金代表当年度的产出被雇主（地主与资本家）用来购买来年生产所必须的劳力，其多少（即工资的多少）视乎雇主可使用的产出多少而定，因此工资率即是指可用的工资基金除以就业人口。这理论与 Malthus 人口论结合，认为长此以往，人口不断增加，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工资水平必须至少维持在生计水平以上。（参考数据）

的水平；有了术语解释，但大多数依然模糊不清。

其次，由于问题出现的既定情况，不可能有其它结果。没有一个统一体系能够解释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没有形成任何体系的部份，而实际上却是两个彼此排斥的体系对社会同时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初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个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范畴内的家长式管制主义。

其三，古典经济学家偶然发现的答案对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具有最深远的后果。随着人们逐渐领会，那些支配市场经济的规律被视为是在大自然权势之下。递减回报定律是植物生理学的规律。Malthus 人口论反映了人口繁殖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情况都是大自然的力量发挥作用：动物的性本能和植物在既定土地上的生长。此处涉及的原则类似 Townsend 的山羊和狗例子：人类的繁衍不可能超出食物供给量所确定的自然界限。像 Townsend 一样，Malthus 得出的结论是多出来的会被杀死；山羊被狗吃掉，狗肯定也因为食物不足而挨饿。Malthus 认为压迫性控制在于多余的被残忍的自然力量消灭。除了饥饿，人类会死于其他：战争、瘟疫和罪行这些等同大自然毁灭性力量的因素。严格来说，这涉及一个矛盾论点：社会力量要实现大自然要求的平衡；Malthus 对这批评的回答可能是：在没有战争和罪行的美善社会，和平的美德挽救了许多生命，但同样有等同数目的人挨饿。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社会是建基于大自然的无情现实；如人违背管治社会的规律，倒下的刽子手会扼杀那些短视人类的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受到森林法则的制裁。

直至那时才清晰显示折磨众生的贫困问题其真正意义：支配经济社会的法则不是人的法律。亚当・斯密与 Townsend 之间的裂隙已扩大为深谷，出现了标志着十九世纪意识诞生的**两分法**[262]。从此自然主义萦绕着人类的科学；社会与人类世界重新结合，成为社会思想演化孜孜以求的目标。依据这样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败了，未能达成这目标；失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过份恪守 Ricardo 和自由经济学的传统。

古典经济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需求。Malthus 和 Ricardo 对穷人的命运绝不是漠不关心，但他们的人道关怀只是把错误理论逼上更折腾的道路。工资的铁打法则有著名的保留条款：劳动阶层的习惯性要求越高，生计线水平就越高，即使铁打法则也无法把工资压低到这水平之下。Malthus 把他的希望建立在这「可怜的标准」[263]，也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提高这标准，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最可怜的境地拯救那些（依照他的规律）注定要跌落可怜境地的可怜人。出于同

[262] dichotomy

[263] 原注 11：Hazlitt, W., *A Reply to the Essay on Population by the Rev. T. A. Malthu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1808.

样理由，Ricardo 也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阶级都应追求舒适和享乐，「并应该借助一切合法手段激励他们争取。」讽刺的是为了规避自然法则，竟然责成平民要提高本身的饥饿线水平。但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致力拯救穷人不会陷入他们的理论帮忙布置的悲惨命运。

就 Ricardo 而言，理论包含了抗衡僵硬的自然主义的要素。这要素贯穿整个理论体系，并牢固植根于其价值论，即是**劳动力原则**[264]。他完成了 Locke 和亚当·斯密未竟之功：经济价值人性化；重农主义者归于自然的，Ricardo 归于人类。在这错误定理的极大范畴，他认为劳动力有唯一的能力创造价值，因此把经济社会所有可以设想的交易都归因自由人社会的平等交易原则。

在 Ricardo 的体系中，在经济社会里争夺主导地位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是相互共存。这情况有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结果是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取得了自然过程的不可抵挡动力。因为当时相信自发调节的市场源自无情的自然法则，解放市场成为无法逃避的必要。创建劳工市场是在社会躯体上做活体解剖手术，执行手术者以只有科学才可以保证的信心去完成任务，而且肯定要废除〈济贫法〉。Ricardo 写道：「地心引力原理不及这些把财富和活力改变为贫困和虚弱的法则那么肯定…直到最后所有阶级都受到普世贫困的困扰。」[265]。事实上，他可能会是心知肚明的道德懦夫，没有勇气废除济贫以拯救人类。在这一点，Townsend、Malthus、Ricardo、Bentham 和 Burke 是一致。虽然他们的方法和视野非常不同，但他们是一致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史宾汉兰制度。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抵挡的力量，是因为这些南辕北辙的观点对此是意见一致；极端改革者 Bentham 和极端传统主义者 Burke 一致同意的观点自动展示了不言而喻的特点。

只有一士谔谔察觉到这严酷考验的意义，或许因为那时代的先锋人物中只有他有实际的工业知识，也善于内省。没有思想家比 Robert Owen 更了解工业社会。他深刻认识社会与政府的区别。他不如 Godwin 那样对政府有偏见，但只是在政府有所为的范畴才利用政府：有益的干预旨在避免损害社会，决不是为了组织社会。同样，他认识机器的中性特点，所以不敌视机器。国家的政治机制和机器的科技功能都没有挡住眼前的现像：社会。他拒绝社会的兽性论，反驳 Malthus 和 Ricardo 的局限论。他的思想支点是他脱离耶教，指责耶教犯了「个体化[266]」的错误，把个性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因此否定了社会的现实及其对性格的强大塑造影响。他抨击「个体化」，真正意义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根源：「个体化的人以及耶教真正有价值的一切被如此分隔，以至永远都绝对无法统一。」正是 Owen 发现了社会，使得他超越耶教。他抓住了真理，因为社会是真实的，人最终必须服

[264] principle of labor
[265] 原注 12：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Gonner, 1929, p. 86).
[266] individualization

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是建基于通过认识社会的现实而改造人的意识。他写道：「若是众人即将获得的新能力不能消除任何罪恶的成因，众人会知道那些罪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幼稚而无效的抱怨亦会停止。」

Owen 可能夸大了那些能力，否则他不可能向 Lanark 县的地方官员建议此后社会应从「社会核心」重新启动，他在他的农村公社发现这核心。滔滔不绝的想象力是天才的特权；没有天才，人类不可能存在，因为人类不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不能移动的自由疆界，那是为了消除社会邪恶而设定的必要界限。Owen 认为只有在人借助其获得的新能力改革社会之后，那自由的疆界才会显而易见；然后，人就会以不带幼稚抱怨的成熟态度接受这疆界。

Owen 在 1817 年描述西方人民已经踏上的道路，他的说话概括了未来百年的问题。他指出「如放任自然」，制造业会产生巨大影响。「制造业普及全国，居民会形成新性格；形成这性格的是非常不利个人或整体福祉的原则，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能够抗衡这趋势，这将会产生最可悲而持久的罪恶。」以盈利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肯定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他从人性角度阐述这些后果。新制度体系的最明显后果是破坏了定居人口的传统性格，改变成为某种新人类：迁徙、游牧、没有自尊和纪律——劳工和资本家就是野蛮而无情的典型新人类。他进一步概述涉及的法则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导致严重的罪恶，除非通过立法使其有效的有意识社会指令可以控制市场制度的固有倾向。诚然，他悲叹的劳工生存环境部份是「补贴制度」的效应。但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对城镇和农村劳工而言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比引进那些制造工厂之前更堕落和悲惨，他们的起码生计依赖那些制造工厂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把话讲到底了，他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堕落和悲惨。他再一次正确指出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把起码的生计寄托在工厂。他抓住了事实：看起来主要是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工人肯定是被剥削：工人在交易中得不到他应得的。不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虽然工人受到剥削，但手头可能比前宽裕。但不利于个人和整体福祉的法则正在破坏他的社会环境、邻里、社会地位、手艺；简而言之，即是他以前的经济存在所植根的大自然和人文关系。工业革命正引发范围庞大的社会秩序变动，而贫困问题只是这事件的经济方面。Owen 的断言是正确的：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抗衡这些破坏力量，巨大而持久的罪行就会接踵而至。

当其时他没有预见他呼吁的社会自我保护是不配合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

第二部（二）

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

百年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向趋势的支配：市场不断扩大，然而这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抑制。虽然这相反趋势对保护社会至关重要，但最后分析是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兼容，因此与市场体制本身也是不兼容。

那体制以跳跃式方式发展，吞噬了空间和时间，通过创造银行货币而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动力。大概在 1914 年，这体制已达极致，一网打尽全球各地、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自然人和虚拟实体的企业。自耶教开始传播以来，一种生活新方式以空前绝后的方式广泛传遍世上，而这一次是在纯粹物质层面。

但同时有相反的趋势在发展。这不仅仅是社会面对变革时的惯常防御行为，而是对抗混乱的反应；混乱已经攻击社会结构，可能破坏由市场创造的生产组织。

Owen 的洞识是正确的：如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庞大而永久的灾难。

生产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如这过程的组织是通过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自发调节，人和大自然必然要进入轨道，受制于供求关系；换句话说，人和大自然都是商品，是待售的生产货品。

这正是市场体系的安排。人以劳工之名、大自然以土地之名出售；劳动力以工资价格四处买卖，土地以协商的租金价格出让使用权。劳动力有市场，土地也有市场，两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到各自的工资和租金高度调节；劳动力和土地待售的假设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不同组合的投入资本在生产部门之间流转，自动平衡各部门的收入水平。

但是，虽然理论上可以这样组织生产，但商品化的假设忽略了如把土地和人的命运交给市场，效果等同摧毁土地和人。因此，相反的趋势存在于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方面抑制市场的行动。这是干预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受到同一方面的威胁，价格水平改变危及工业、农业或商业的单一企业。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如价格下跌，业务受损；除非所有要素的成本同比下降，否则「做生意的公司」被迫倒闭；价格下跌很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全面下跌，而只不过是由于货币体制的组织方式。这就是自发调节市场发生的情况。下文详述。

理论上，购买力是由市场行为自身提供和调节；「货币是商品」就是这意思，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商品（刚好发挥货币的作用）的供求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传统理论。根据这学说，货币只是比其它商品更常用于交易的一种商品的另一名字，拥有货币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为求达到这目的，使用兽皮、牛只、贝壳还是黄金作为货币并不重要；任何发挥货币作用的对象其价值取决于对象只是作为食粮、衣着、装饰或其它目的用途。如刚好以黄金作为货币，其价值、数量和流向是受到适用于其它商品的相同法则支配。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都涉及在市场之外创立货币；无论由银行或是政府发行货币，都会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关键在于作为货币的商品与其它商品没有什么不同；其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被市场调节；货币只是间接交易的手段，因此赋予货币其它特征的观念本质上是错误。因此如以黄金作为货币，假如有纸币的话，纸币必定代表黄金。Ricardo学派根据这学说期望英伦银行组织货币的供应。确实没有其它方法能够阻止政府「干预」货币体制，从而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

商业的情况非常类似社会的自然和人力物质的情况。出于基本上相似的理由，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全体的威胁。如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规管工厂的法律和社会法律来保护工人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如土地和农业方面需要土地法律和农业关税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那么同样也需要中央银行和货币体制的管理来保护制造业和其它生产型企业免受虚构商品对货币的危害。矛盾的是不单只是人类和大自然资源、资本性生产本身的组织也有必要寻求保护，免受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回到上文提到的双向趋势。这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各自为本身定出具体的制度性目标，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用本身的独特方法。趋势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旨在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依赖贸易阶层的支持和主要利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趋势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和大自然以及生产性组织，依赖最直接受到市场行为有害影响阶级的不同支持（主要但并不限于劳动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利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措施作为手段。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塑造了十九世纪的整体社会史，彼此各有角色，因为各自承担源自社会总体状况不同功

能的功能。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承载者，其商业利益整体而言与生产和就业的一般利益并行；如生意兴荣，可能人人就业，地主收到租金；如市场扩大，可以自由和容易投资；如贸易成功与外国竞争，货币安如盘石。另一方面，贸易阶层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器官；这些危险涉及榨取工人体力、破坏家庭生活、破坏邻里关系、滥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艺标准退化、社会习俗瓦解以及生存水平总体下降，生存包括房舍和艺术以及无数不影响利润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对利润是普世恩泽有几乎是神圣的信念，藉此发挥他们的功能，但这信念使他们没有资格保护幸福生活中一如促进生产同样重要的其它利益。那些没有在生产中应用昂贵、复杂和特殊机器的阶级就可以乘机而起。粗略地说，地主贵族和农民有责任确保国家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依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而劳动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已是无家可归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在不同时间，各社会阶层代表的利益是大于本身的利益，即使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十九世纪来临之际，普选已是相当普遍，工人阶级是国家的有影响力因素；另一方面，把持立法机关的贸易阶层受到挑战，更注意他们在行业中领导地位涉及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体系继续在没有大压力和张力的情况运作，影响力和权力奇特的本地化不会造成麻烦；但如出于内在原因情况不再是这样、当社会阶级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各方角力把政府和企业、以及国家和行业分别形成各自大本营，就会危及社会本身。为争取本身利益，各方使用和滥用政治和经济这两项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武器。正是由于这危险僵局导致二十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危机。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概述塑造十九世纪社会史的趋势。一种趋势源自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导致根深蒂固的体制张力；另一趋势源自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两者相互影响，于是危机剧化为灾难。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创建市场体制的组织原则，初时只是倾向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然后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演化成为人类世俗救赎的真正信念。这样的狂热是因为社会发现承担的任务突然变得严重：无辜人民遭受巨大痛苦以及建立新秩序时涉及大范围的连锁改变。自由主义信念只是响应全面配置的市场经济体系的需求，才有这份传道式热情。

往往把「**自由放任**[267]」政策追溯至法国首先使用这流行语的十八世纪中叶，这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较实在的说法是直至两代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是「似有还无」的趋势。直至 1820 年代，「自由放任」政策才概括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应在市场找寻价格，发行货币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约束，货物应在各国之间自由流通，不受阻碍或优惠；简而言之即是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

把这种情况的设想归因于 François Quesnay 是言之过重。重商主义世界的重农主义者只是要求谷物自由出口，以保障农民、佃农和地主有更好收入。其它的所谓「自然法则[268]」只不过是指导性原则，认为应由据称是全能和无所不知的政府监管工业和农业。Quesnay 的著作《格言[269]》打算为这样的政府提供把《经济表[270]》的原则转化为实用政策的各种观点；《经济表》是他定期更新的统计资料。他从未想到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概念。

英格兰也狭义解释「自由放任」：生产不受规章制约，并不包括贸易。棉织品制造业是那时代的奇迹，从无足轻重已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出口产业，但依然明令禁止进口印花棉布。虽然国内市场是传统垄断，但白洋布或细棉布获发出口补贴。保护主义根深蒂固，以至曼彻斯特市的棉织生产商在 1800 年要求禁止纺线出口，虽然知道生意有损失。1791 年立法把禁止棉织制造工具出口的惩罚扩大到模型或技术规范出口。所谓自由贸易始于棉织业是神话而矣。业界要求的是生产范畴不受管制；交易范畴不受管制依然被认为是危险。

可能有人认为生产自由会从纯粹科技领域自然地伸延到劳工就业。然而，曼彻斯特市是在相对较晚时期才增加对自由劳工的要求。棉织业从来不受〈工匠法〉管制，因此每年一度的工资评审或学徒规则没有妨碍这行业。另一方面，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猛烈反对的旧〈济贫法〉有利生产商：这不仅为生产商提供依赖教区救

[267] *laissez-faire*
[268] *ordre naturel*
[269] *Maximes*
[270] *Tableau Ecollomique*

济的学徒，而且容许他们免除对被解顾员工的责任，从而把失业雇员的负担大部份扔给公帑。棉织生产商初时不欢迎史宾汉兰制度：只要补贴的道义效果没有减少劳工的生产能力，该行业就有充分理由把家庭已有资产[271]视为帮助措施，以维持储备劳动力应付急剧贸易波动的迫切需要。当时的农业就业仍然以年计算，有这样的流动劳工储备对扩展中的产业是非常重要。因此，生产商抨击〈定居法〉妨碍劳工的实际流动，但法律在 1795 年才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是较多，不是较少家长式作风的〈济贫法〉。贫困依然是乡绅和农村居民的关注。即使史宾汉兰制度的激烈批评者，例如 Burke, Bentham 和 Malthus，是把自己看作是农业管理合理原则的倡导者，而不是工业进步的代表。

直至 1830 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迸发改革的激情，而「自由放任」成为战斗的信条。生产商阶层迫切要修改〈济贫法〉，因为阻碍了收入是多劳多得的产业工人阶级崛起。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涉及的风险规模和改革牺牲者遭受的痛苦程度已显而易见。因此，至 1830 年代初期，情绪已明显急剧变化。1817 年，Townsend 的《论述》再版，〈绪言〉赞美作者的远见对〈济贫法〉造成压力，并要求彻底废止；但编辑警告作者提议在短短十年废除对穷人的院外救济是「卤莽和轻率」。Ricardo 的《原理[272]》在同年发表，坚持废除补贴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强烈主张应逐步废除。Pitt 是亚当・斯密的信徒，反对废除补贴，因为会造成无辜者的苦难。到了 1829 年，Peel 还在「怀疑除了渐进之外还有其它方法能够安全废除补贴制度。」[273] 然而，中产阶级在 1832 年取得政治胜利后，〈济贫法修正案〉以最极端形式出台，没有任何宽限期就仓促实施。「自由放任」被催化为不妥协的暴行动力。

经济自由主义在工业组织其他两方面从学术兴趣提升为无限制的活动主义：货币和贸易。明显见到除极端方案之外，别无他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之下，这两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融合为受热烈拥护的单一信条。

英格兰社会第一次认识货币问题，是生活费用普遍上升。在 1790 年至 1815 年，物价翻了一番，实际工资下跌，商业受到汇率暴跌的打击。可是，直至 1825 年的经济恐慌，健全的货币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当 Ricardo 原则已深深烙印在政治家和商人的脑海，致力维持「金本位制」，不管会造成多大的金融伤亡。这是人们坚定不移相信金本位制自动导航机制的开始；没有金本位制，市场体系无法启动。

国际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种信任的行为，含义极为丰富。这意味着英格兰的食品

[271] family endowment
[272] *Principles*
[273] 原注 1：Webb, S. and B., *op. cit.*

将依靠海外供应，有必要时会牺牲本国农业，并进入新的生活形式：英格兰会成为模糊设想的未来世界整体的部份，这样的全球社会将肯定是和平的社会，不然的话，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会保证这世界的安全；英国深信能以优越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面对持续的产业混乱的可能性。然而，人们认为只要全世界的谷物能自由流入英国，英国工厂就能以较低价格向全球出售。再一次，完全接受方案涉及的提议力度和风险规模限定了所需决心的措施，做不到完全接受即是肯定会灭亡。

如分别看待「自由放任」教条的理想国根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它有三条原则形成一个整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国际自由贸易。为了只满足任何一项的努力是不够的，必定要确保其它两个原则能同时成功，否则要么全胜，要么彻底失败。

例如，任何人都看得出金本位制意味着通货紧缩的极危，在惊慌时致命的银根短绌。因此，生产商要能坚持就要有保证：以有利可图的价格扩大生产规模（换句话说，工资至少按价格总体下降的比例下降，生产商可以充份利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因此，1846 年的〈反谷物草案[274]〉是 1844 年 Peel 的〈银行法[275]〉的必然结果；两者都假定自 1834〈济贫法修订法[276]〉以来，劳动阶级在饥饿威胁下被迫最大限度付出，因此工资是依据谷物价格调整。三种重要手段形成连贯的整体。

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已是一清二楚。只有全球规模的自发调节市场能够保证这巨大机制的运行。除非劳工价格取决于最便宜的谷物，否则不能保证没有保护的产业不会屈服于人们自愿接受的监工（即黄金）。市场机制在十九世纪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工市场和金本位制度三位一体同时扩大。难怪一旦这风险开始呈现巨大危险之时，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世俗世界的信仰。

「自由放任」不是自然事物；如事物顺其自然发展，不会有利伯维尔场。例子是建立棉织生产这最主要的自由贸易行业是通过保护性关税、出口补贴以及间接工资补贴的帮助；「自由放任」是由国家推行的。1830 和 40 年代有很多新法撤销了限制性规章，而且国家的行政管理功能也大大增加，中央官僚制度可以完成自由主义信徒定下的任务。对典型的效益主义者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项目，应该为最多人谋取最大福祉；「自由放任」不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而是需要实现的目标。诚然，除了撤销有害的限制，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做任何事，尤其是间接做事。恰恰相反，效益论的自由主义者把政府视

[274] Anti-Corn Law Bill of 1846
[275] Bank Act of 1844
[276]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

为实现福祉的最大机构。Bentham 认为就物质福祉而言，比对「警务部部长」的无意识贡献，立法机构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经济成功要有三个条件：取向、知识和权力，而人民只有取向。Bentham 指出：由政府管理知识和权力比由人民管理便宜得多。行政机关的任务是收集统计数据和信息、促进科学和实验以及在政府范畴提供最终实现的无数措施。Bentham 式自由主义意味着由行政机关的行动取代国会的行动。

这方面有很大空间。英格兰不是如法国那样以行政手段处理〔社会〕反应，而是由国会立法实施政治压制。「1785 年和 1815-20 年的革命运动不是以行政部门行动应对，而是由国会立法。暂时废除〈人身保护令〉、通过〈诽谤法[277]〉和 1819 年的「六法规[278]」都是极其严重的强制手段，但没有企图赋予行政机关任何欧洲大陆式的特点，国会立法破坏了个人自由。」[279] 经济自由主义者在 1832 年刚赢得对政府的影响，形势已改变为赞同行政手段。「以不同力度为 1832 年定性的立法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零星但非常复杂的行政机器，一如现代生产工厂时常要修理、重建和适应新要求。」[280] 行政机构这样增长，反映了效益主义的精神。Bentham 的寓言性「圆形监狱」是他的最个人化理想国：一所星状的建筑物，狱警在监狱中心以最少公共成本有效监视最大数目的囚犯。同样，在效益主义的国家，他喜爱的「可检查[281]」原则保证高高在上的部长应有效控制所有地方行政。

通向利伯维尔场的路已经打开，由大量增加的持续、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干预主义维持道路畅通。亚当 • 斯密的「简单又自然的自由」要配合人类社会的需求是最复杂的事务。这见诸无数圈地法的复杂条款；涉及管理〈新济贫法〉的官僚控制数量，这是自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中央机构的第一次有效监管；或是颇见成效的市政改革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然而建立所有这些政府干预的据点，目的是要组织一些简单的自由，例如土地、劳工或市政。与预期相反，正如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没有减少，反而实际上增加使用人类劳动力，引入利伯维尔场远远没有摆脱对控制、管理以及干预的需求，反而大大扩大了范围。行政官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确保该体制的自由运作。因此，即使是最热衷希望免除国家所有不必要责任以及哲理上要求限制国家行动的人都不得不把建立自由放任政策所需的新权力、机构和措施交给同一国家。

[277] Libel Act

[278] 'Six Acts' of 1819。英国在 1819 年 8 月 16 民众暴动后，在当年十二月通过六条新法以防止未来暴动：〈培训防治法 *Training Prevention Act*〉禁止任何人接受任何武器培训或演习；〈充公武器法 *Seizure of Arms Act* 〉；〈轻罪法 *Misdemeanors Act*〉减少保释的机会和方便法院更快处理案件；〈煽动性会议防治法 *Seditious Meetings Prevention Act*〉规定五十人以上讨论国事的会议要法官批准；〈亵渎和煽动性诽谤法 *Blasphemous and Seditious Libels Act*〉提高已有法律的刑罚；〈报章和印花税法 *Newspaper and Stamp Duties Act*〉规定论政出版物要纳税。

[279] 原注 2：Redlich and Hirst, J.,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Vol.* II, p. 240, quoted Dicey, A. V., *Law and Opinion in England,* p. 305.

[280] 原注 3：Ilbert, *Legislative Methods,* pp. 212-3, quoted Dicey, A. V., *op. cit.*

[281] inspectability

另一种矛盾超越了这种矛盾。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是国家有意作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是以自发方式开始。「自由放任」是有规划的政策，但规划本身没有规划。这说法的前半部份正确。若是曾为执行故意由政府控制的政策而有意识利用行政机关，这就是自由放任全盛时期的 Bentham 主义。后半部份最初由杰出的自由主义者 Dicey 提出，他致力探究自 1860 年代以来渐趋明显的「反自由放任」趋势的起源，他称之为英格兰舆论的「集体主义」趋势。他惊讶的发现除了有关法案，找不到有这样趋势存在的证据。更确切地说，在那些似乎代表这种趋势的法律之前，没有发现舆论中有「集体主义趋势」的证据。至于后期的「集体主义」观点，Dicey 推断「集体主义」法律本身可能就是主要来源。Dicey 明察秋毫的研究结果表明在 1870-80 年代直接负责制定限制性法律的人完全没有打算扩大国家的职能或约束个人自由。在 1860 年下半叶对抗自发调节市场的立法矛头证明是自发的，没有受到舆论引导，而是被纯粹务实精神驱使。

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强烈反对这观点。他们全套社会哲学的关键是确信自由放任是自然发展的概念，而随后的反自由放任立法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反对者有意而为的结果。对双向趋势的两种完全相反解释，涉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到底是真言或谎话。

Spencer, Sumner, Mises 和 Lippmann 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对双向趋势的记述很大程度上与本书相同，但他们提出的解释却完全不同。本书的观点认为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理想国，其进程被社会的现实自我保护阻止。他们的观点认为所有保护主义是由急躁、贪欲和眼光短浅做成的过失；没有这些缺失，市场可以解决困难。近代社会史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要找出那一种观点是正确，涉及要决定经济自由主义是否所声称的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在转向以事实说话之前，有必要更详细表述这议题。

日后回顾会认为我们这时代见证了自发调节市场的终结。在 1920 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声望达到顶点。通货膨胀的灾祸折磨着数亿人民，剥夺了整体社会阶级和整体国家〔的财产〕。稳定货币成为各国人民和政府政治思想的焦点；恢复金本位制成为经济领域群起而攻之的最高目标。人们认为偿还外债以及回复稳定货币是政治理性的试金石；为了重建健全货币，不惜人民受苦和侵犯主权。为满足经济自由主义先验推论的健全预算和健全货币的要求，即使失业者因通货紧缩失去工作而陷入穷困、公仆被解职得不到微薄补偿、甚至放弃国家权利和损失宪法自由，这些都是合理的代价。

1930 年代开始质疑 1920 年代的极端观点。英美两个最大强国在重新稳定货币和预算平衡的若干年后陷入困境，抛弃了金本位制和着手管理本国的货币。最富有

和最受尊敬的借贷人大规模拒绝偿还国际债务，又漠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在 1930 年代中期，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依然坚持金本位制，但被以前坚决维护自由主义信条的英美两国财政部逼迫而放弃。

经济自由主义在 1940 年代遭受更不幸的失败。虽然英美两国背弃了正统货币学说，但在工业和商业以及经济生活的一般组织却保留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措施。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创造和培养独裁政治必定带来经济大灾难的错觉，这就成为促使战争突然爆发和阻碍应战的因素。由于这样的信条，民主政府最后才理解管理货币和指导贸易的含义，即使是为势所迫要实行这些政策；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以平衡预算和自由企业的名义阻止了及时重振军备，而重振军备是处于战争状态时经济力量的唯一可靠基础。英国的正统预算和货币学说导致国家事实上面对全面战争时依然坚持有限度参战的传统战略原则；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石油和铝矿行业，躲在自由企业的戒律后面，成功抗拒为工业的紧急情况作好准备。若然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是固执和坚持他们的谬论，民族领袖和大多数自由人可能为这时代的考验有更充份准备，甚至也许能够完全避免冲突。

十年间发生的事件没有改变拥抱着整个文明世界社会组织的世俗原则。在英美两国，自由放任原则衍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独立企业单位，在某一领域颓然失败没有摧毁它在所有领域的权威。诚然，自由放任原则的部份衰落可能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因为拥护者藉此强调未有完全执行原则是造成任何困难的原因。

实际上，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迄今的最后论点。辩士以无尽的不同说法重复辩解：若是没有批评者鼓吹的政策，自由主义会完成任务；导致种种弊病的不是竞争性体系和自动调节的市场，而是对那体制和那市场的干预。这论点不仅有最近侵犯经济自由的无数事例支持，而且还有另一明确事实的支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自动调节市场体系的扩展遇上持久的逆向趋势，阻碍了这样的经济体制自由运转。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臆猜把现和过去连接成为连贯的整体。试问谁能否认政府干预企业会破坏信心？如法律没有提供失业救济，失业有时反而会少一些？公共工程的竞争损害私人企业？财政赤字会影响私人投资？家长式作风会抑制企业的主动性？当今如此，当然过去也是如此。在 1870 年代，一股全面的社会和国家保护主义运动在欧洲兴起，谁可怀疑这会妨碍和限制贸易？谁可以怀疑工厂法，社会保险，市政企业[282]，医疗服务，公用事业，关税，赏金和补贴，垄断集团与信托，禁止移民、资本转移和进口，更不用说较少公开的对人、物、支付

[282] municipal trading。政府的公众服务对象一般是整体市民（警政、街灯等）或有资格限制的使用者（济贫、儿童教育等），政费开支来自税收。如政府决定一些经济服务（水、电、坟场等）要收费，收回部份或全部成本，这已类似企业运作。

流动的限制，必定对竞争性体制功能造成重重阻碍，延长了经济萧条，失业恶化，金融低潮深化，贸易量减少，严重破坏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自由主义者坚持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自 1875 年以来不同派别的社会、民族和垄断保护主义对就业、贸易和货币自由的干预；若是工会和工人组织没有和垄断性生产商和农业集团组成非神圣同盟[283]，因为目光短浅的贪婪连手阻挠经济自由，今天的世界已在享受这近乎自动创造财富机制的成果。自由主义的领袖从不厌倦重复唠叨十九世纪的悲剧源于人类没有能力信奉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启示；先辈的许多方案受到以下种种因素阻挠：民族主义、阶级冲突、既得利益团体、垄断者以及劳动人民漠视全人类（包括工人）最终受惠于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精神弱点阻挠了伟大的智慧和精神前进；自私自利的力量力使〔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成就化为乌有。简言之，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辩词。如不驳倒这些辩词，经济自由主义将继续在辩论中把持发言权。

下文集中这问题。一致公认旨在推广市场体制的自由主义运动遭遇趋向约束市场体制的保护性逆向动力；这样的假设是本书有关双向趋势的基本论点。本书断言市场体系自动调节的概念其内在谬论最终会摧毁社会，但自由主义者指责最不同的因素破坏了这伟大的方案。自由主义者未能举出证据证明有任何协调的力量阻挠自由主义运动，只好提出几乎不能反驳的阴谋论。这是自由主义者解读 1870-80 年代事件时以不同形式提出反自由主义阴谋论的神话，通常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崛起是改变情景的主要因素；生产商协会和垄断者、农业集团和工会被认为这情景的反派角色。因此，自由主义学说的最高精神形式假设现代社会的一些辩证规律证明启蒙理性显得矛盾，而其粗糙形式沦为攻击政治民主主义是干涉主义的主要动机。

事实的证言明确地驳斥自由主义的论点。反自由主义阴谋纯粹是想象。「集体主义」逆向趋势的不同形式不是因为一致的利益集团偏爱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市场机制膨胀影响更大范围的重要社会利益。这解释了那机制膨胀引起普遍反应的重要务实特点。知识潮流对这过程没有任何作用；因此，自由主义者偏见认为反自由主义发展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没有任何作用。虽然正统自由主义在 1870-80 年代终结的说法是正确，现今的所有关键问题可追溯那年代也是正确，但如认为社会保护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变化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而不是自动调节市场体系的内在弱点和危险引起，这说法是不正确。可以有多种方法表达这情况。

首先是行动针对的问题有惊人的差异。单单这种情况会排除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以下引用 Herbert Spencer 在 1884 年编纂的干预清单，当时他指责自由主义者为

[283] unholy alliance

了「限制性立法」而放弃他们的原则。[284] 清单可见题目是如此多式多样。1860年授权政府「从地方税支付分析员的食物和饮料」；接着的法案规定「检查煤气工程」；补充〈开矿法〉，规定「聘用十二岁以下缀学文盲男孩即属违法」；1861年授权「济贫督察强制执行接种疫苗」；授权地方管理委员会「订定租用交通工具的费率」；授权一些地方团体「在当地征税以支付农村排污和灌溉工程以及饲养牲畜供水」。1862年通过法案，宣布「只有单一通风管道的煤矿」违法；另一法案赋予医学教育委员会独有权力「提出药典，价格由财政部制定」。惊恐的Spencer写了数页纸列举这些或类似的法案。1863年，「苏格兰和爱尔兰强制接种疫苗」。还有法案委任检查官员负责检查「食物是否可口」；〈烟囱清洁工法〉防止指派儿童清扫太窄的烟囱而导致折磨和最终死亡；〈传染病法〉；〈公共图书馆法〉授权地方政府「为购买图书，多数人可向少数人征税」。Spencer指出这些都是反自由主义阴谋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但这些法案任何一项都是为了处理某些现代工业环境引起的问题，旨在维护某些公共利益免受环境或处理工业问题的市场手段危害。不带偏见的看法认为这正好证明「集体主义」逆向趋势本质纯粹是实际和务实。大多数执行这些法案的负责人都是深信自由放任的支持者，肯定不希望他们同意在伦敦成立消防队是暗示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表示不满。正好相反，这些法案的支持者一般是毫不妥协地反对社会主义或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

其二，解决办法从自由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情，参与立法酝酿过程的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Dicey举出的典型例子是〈劳工赔偿法[285]〉处理工人在受雇期内因工受伤时雇主的责任。自1880年以来，有多项法案都依据个人原则：必须有序规管雇主对雇员的责任，一如规管他对其他人的责任，例如陌生人。舆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在1897年雇主突然成为雇员的承保人，承担雇员因工受伤的责任；正如Dicey公正地评论，这是「彻底的集体主义立法」。这是最好左证说明自由主义原则被反自由主义原则取代，不是涉及的利益集团类型和对事情的舆论已经改变，而是纯粹因为环境演变，产生问题，要找出解决办法。

其三，比较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国家的发展，得出间接但最引人注目的证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和卑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德国）相差甚远，与法国第三共和国或是哈布斯堡王朝[286]有很大差异。可是各国都经历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时期，接着在公共卫生、工厂条件、市政企业、社会保险、海运津贴、公用事业、贸易协会等方面经历了反自由主义立法时期。很容易制作各国大事纪的清单。劳工赔偿法：英格兰在1880和1897年立法，德国1879年，奥地利1887年，法国1899年；执行工厂检查：英格兰1833年，普鲁士1853年，奥地利1883年，

[284] 原注4：Spencer, H., *The Man vs. the State.,* 1884.
[285]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286] Empire of the Hapsburgs

法国 1874 和 1883 年；市政企业：英格兰伯明翰市异见人士和资本家 Joseph Chamberlain 在 1870 年代引进包括公用事业的市政企业；Karl Lueger 在 1870 年代为维也纳帝国引入市政企业，他是信奉耶教旧教的「社会主义者」和极度痛恨犹太人；德国和法国许多城市的当地联盟引入市政企业。在一些案例，支持一方是极端反动和反社会主义（维也纳），或是「极端帝国主义」（伯明翰），或是像法国里昂市长 Edouard Herriot 的纯粹自由主义色彩。英格兰信奉耶教新教，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替的内阁断断续续努力争取完成工厂法。在德国，耶教旧教徒和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同参与；奥地利教会和最好战的支持者、法国教会的敌人和激烈反对教权的人负责制定几乎相同的法律。不同国家的形形式式政党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口号，有非常不同的动机，面对一大堆复杂问题时都实施了几完全一样的措施。从表面来看，如果像反自由主义阴谋论那样以为各路人马秘密地被相同的意识形态成见或狭隘集团利益驱使，这是荒谬绝伦的想法。与此相反，所有事情都支持这个假设：严竣大自然的客观理性强迫立法者表态。

其四，重要的事实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本身在不同时间提出在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的明确案例，倡议限制**契约自由**[287]和自由放任政策。当然，他们的动机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偏见。例如一方面是劳工结社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是工商企业法。前者指工人结社以争取改善工资；后者指信托权益、垄断集团或其他资本主义式结社以提高价格。指责在这两情况下利用契约自由或自由放任政策以抑制贸易，这说法是公正的。无论劳工结社是为了争取提高工资，或是企业结盟是为了提高价格，既得利益集团明显利用自由放任原则来缩小劳动力市场或其它商品市场。极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从 Lloyd George 和罗斯福，到 Thurman Arnold 和 Walter Lippmann 这些长期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放任」屈服于自由竞争市场的需求；他们迫切要求规章和限制，迫切要求刑事法律和强制，并一如任何「集体主义者」一样指责工会或企业正「滥用」契约自由。理论上，自由放任或契约自由意味工人可以决定个别或联合一起拒绝工作；也意味商家不用理会消费者的愿望，相互协商售价。但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与自动调节市场的机制相互抵触，并且，**在这样的抵触情况，自动调节市场必然优先**。换句话说，如自动调节市场的需求与自由放任的需求彼此矛盾，经济自由主义者会背弃自由放任，宁愿采用集体主义的规章和限制措施，一如反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催生了工会法和反垄断法。事实就是即使经济自由主义者时常在工业组织的绝对重要领域中使用「集体主义」措施，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说明现代工业社会无可避免要使用反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措施。

顺便一提，以上有助阐明术语「干预主义」的真正意义；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以这术语表示与己相反的政策，但只是显得思想混乱。干预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放任，而上文解释经济自由主义不等同自由放任（虽然一般用法是可以把两个术

[287] freedom of contract

语交替使用）。严格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的工业建基于自动调节市场机制。诚然，一旦这样的体系差不多完成，就较少需要某一类干预。但这远远不是说市场体系和干预是相互排斥。因为只要这体系还没有建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以及毫不犹豫要求国家干预以建立这体系；一旦体系建立，也要求国家维护。所以，经济自由主义者没有任何犹豫要求国家运用法律的力量，甚至可能利用内战的强暴力量建立自动调节市场的先决条件。在美国，南部邦联诉诸自由放任论点来证明奴隶制度有道理；北部邦联求助于武力干预建立自由劳工市场。因此，自由主义作者对干预主义的谴责是空洞口号，意味着只是凭一己是否恰好赞同一套行动而是否谴责。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始终坚持的唯一原则是自动调节的市场，无论这原则是否涉及干预。

总而言之，针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逆向趋势拥有自发性反应的明显特征。逆向趋势在无数断开的结点落脚，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利益之间看不到可以追踪的连结或是任何一致的意识形态。以工人赔偿为例，经济利益、思想影响或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方面没有任何改变，但同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从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变为反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转变为干预主义；这仅仅是由于更多认识该问题的本质。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工业发展一定阶段中都有非常类似的变化，从自由放任转变为「集体主义」，揭示这过程的根本成因其深度和独立性，但经济自由主义者肤浅地把这归因为情绪的改变或各种各样的利益。最后，分析揭示即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激进拥护者也不能避开令自由放任主义不适用于先进工业环境的规律；因为在工会法和反垄断监管这些关键案例，极端自由主义者不得不要求国家多方面干预，以保护自动调节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不受垄断性影响。甚至自由贸易和竞争也需要干预才可以运作。1870 和 80 年代的「集体主义」阴谋论的自由主义神话与所有事实恰恰相反。

本书对双向趋势的解读有证据支持。本书强调如市场经济对社会组织的人文和自然成份构成威胁，人民迫切要求某种形式的保护时还有什么别的期望？这是本书的发现。同样，可以预期事情的发生不是他们有任何理论的或理性的先设概念，也无关他们对市场经济背后的原则有什么态度。再说一遍，情况就是这样。此外，本书提出如能证明特定利益是独立于许多不同国家的特有意识形态，各国政府的历史比较也许对本书的论点提出半实验性支持。本书对此可以举出明显证据。最后，自由主义者本身的行为证明了维护贸易自由（本书的定义是自动调节的市场）非但不排斥干预，实际上是要求这样的行动，而自由主义者时常要求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例如工会法和反垄断法。因此，对双向趋势的两个对立解释，历史证据最能决定那一种解释正确：一方面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坚持他的政策从未有过机会，被目光短浅的工会会员，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贪婪的生产商以及保守的地主所扼杀；另一方面是批评者提出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普遍「集体主义」反应以反对市场经济扩展，作为自动调节市场的理想原则必然危及社会的结论性证据。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

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纪政策的真正基础，先要完全消灭集体主义阴谋论这自由主义神话。这神话表明保护主义只是重农派、生产商和工会份子邪恶利益的结果；彼等自私地破坏市场的自动机制。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形式（当然是没有相左的政治倾向），其论点用上同一套派系术语。（马克思的基本哲学集中在整个社会和人类非经济本质，与本文不相关[288]。）马克思追随 Ricardo 以经济学术语定义各阶级，而毫无疑问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

这导致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的粗糙阶级论。争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压力被简单视为少数资本家的谋利动机。帝国主义被解释为资本家阴谋，促使政府为大企业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的成因是这些利益团体结合军备企业，奇迹地有能力驱使整个国家陷入与国家重要利益相反的致命政策。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从派系利益的力量推断保护主义运动和农业关税是由于反动地主的政治影响力，工业巨头渴求利润是企业垄断形式发展的原因，战争是由于商业猖獗。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得到狭隘阶级理论的有力支持。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阶级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彼此主张一致。他们建立滴水不漏的例子：十九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必然服务有关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这两大门派完全防碍了市场社会的整体观念以及保护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发挥作用。

事实上，阶级利益对社会的长期趋势只是有限度的解释。阶级命运更多是由社会需求决定，不是阶级需求决定社会命运。如社会结构不变，阶级论可以成立，但假如社会结构本身改变，那又如何？失去作用的阶级可能瓦解，一夜之间被一个或多个新阶级取代。而且各阶级在斗争中的机会取决于能否赢得阶级成员以外的支持，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履行比本身阶级更广大利益的任务。因此，要理解阶级的生与死、阶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程度、阶级合作或对抗。必先要理解整体社会形势。

整体形势的建立通常由于外在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农作物产量，新的敌人，宿

[288] 原注 1：Marx, K., *Nationalokonomie and Philosophie.* In 《历史唯物主义》"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32.

敌使用新武器，新的社会目标，或就此而言发现达到传统目标的新方法。如派系在社会发展的功能派系变得明显，派系利益最终必然关连整体形势。

阶级利益在社会变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事物的本质。任何大范围的变化必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的不同部份，例如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工具。因此，派系利益是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自然载体。无论变化是源自战争或贸易，令人吃惊的发明或自然环境的改变，社会的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的调整方法（包括强制方法）以不同方法调整本身的利益，这些方法有别于他们想胜出其他团体的方法；因此要识别造成变化的组群或多个组群，才可以解释变化是如何发生。最终成因是由外部力量设定，而社会依赖内部力量只不过是变化的机制。「挑战」是针对整个社会；「反应」来自组群、派系和阶级。

因此，仅仅是阶级利益不能够满意解释任何社会长期进程。第一，因为该进程可能决定阶级本身的存在；其次，因为既定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只是那些阶级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成功与否。阶级利益不是可以从其它阶级成员取得对这阶级成员支持的魔法。然而，这些支持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保护主义只是例子。此处的问题不是务农者、生产商或工会人士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行动来增加收入，而是为什么他们做得到；不是商家和工人为什么希望建立商品垄断，而是为什么他们达到目的；不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些组群为什么希望使用类似方法，而是在很多方面不类似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组群，而且都达到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什么种植玉米的人试图以高价出售，而是他们为什么经常成功说服购买玉米的顾客，从而有助提高售价。

其二，对阶级利益的基本经济本质有同样错误的学说。虽然人类社会自然而然被经济因素设定条件，但个别人士的动机却是唯一异乎寻常地由物质的满足需求欲望决定。十九世纪的社会组织是基于这假设：这样的动机可变得普遍，是那时代的特色。因此，分析该社会时要适当容许经济动机有相对较大的范围，但必须不要预判问题，而问题正正就是在什么程度这不寻常的动机如何能起作用。

与社会认知问题相比，诸如需求—满足影响的纯经济问题与阶级行为有较少关连。当然，「需求—满足」也许是这种认知的结果，特别是它的向外告示或奖赏。但是，最直接代表阶级利益的是身份和等级、地位和保障；换句话说，主要不是经济性而是社会性。

那些断断续续参与 1870 年之后保护主义运动的阶级和组群主要不是为本身的经济利益。在关键年代制定的「集体主义」法案揭示只有特殊情况才牵涉某一阶级的利益；即使这样，那利益也极少被描述为经济性。确实有一些法例不是服务「目光短浅的经济利益」，例如授权城镇当局接管被忽略的闲置空间、要求至少半年

一次用热水和肥皂清洗面包坊、强制检查缆索和锚。这些措施只是对工业文明需求的反应，而市场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干预措施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收入，间接影响也是轻微。所有与卫生和家宅、公众文娱设施和图书馆、工厂环境和社会保险有关的法律大概都是如此。公用事业、教育、运输和无数其它事务也是如此。即使牵涉金钱价值，相对于其它利益只是次要。几乎必然涉及专业地位、安全和保障、个人生活形式、生命的阔度、周边环境的稳定。不应低估一些典型干预的金钱价值重要性，例如海关关税和工伤赔偿。但即使如此，这些案例的非金钱利益是不能与金钱利益分割。海关关税隐含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最终意味着避免失业的保障，稳定地区环境，保障业界不致倒闭，也许最重要的是避免被迫转职而丧失地位的痛苦，因为旧工作技能和经验不适用于新工作。

一旦摆脱以为只有局部派系利益，不是整体，会变得有作用的固执看法，也摆脱把人类组群的利益限制在金钱收入的孪生偏见，那么保护主义运动的广度和广泛性不再是神秘。与金钱利益相关者必然会为此发声，但其它利益涉及更多人，以无穷无尽方式影响无数个人，例如邻居、专业人士、消费者、行人、乘客、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园林工人、病人、母亲或爱侣；因而可以通过任何种类的区域性或功能性协会来表达，例如教会、城镇、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最普遍的是基于忠诚原则的政治团体。过于狭窄的利益观念事实上必定导致对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歪曲景象；而且利益的纯粹金钱定义没有对社会保护有重要需求留下空间，保护的任务经常落在主管社会总体利益的负责人——在现代的情况就是在任政府。正正是因为受市场威胁的是不同人口组群的社会利益，不是经济利益，不同经济阶层的老百姓不知不觉间连手面对危机。

因此，阶级势力的行动既促进又妨碍市场扩展。既然建立市场体制要有机器生产，只有贸易阶级在转型之初可以处于领导地位。较旧阶级的幸存者萌生了新的创业者阶级，以接管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发展。但如工业家、创业家和资本家的崛起是由于他们在扩张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传统的地主阶级以及新生的工人阶级就必须起来抗衡。如贸易组群中只有资本家代表市场体系的结构性原则，那么封建制度的贵族阶级和崛起中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顽固保卫社会组织。地主阶级自然要维护过去并从中找寻应付所有恶势力的办法，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市场社会的界限，从未来的角度借用解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封建制度或社会主义宣言是可能的行动方法，但这显示完全不同的方向：重农派和城市工人阶级往往在紧急关头寻求救济。如市场经济崩溃（正如每次重大危机都有这样的威胁），地主阶级会尝试恢复军事或封建制度的家长式作风，而工厂工人认为要建立劳工合作社。应付危机的「各方反应」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法。本来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的阶级利益冲突，如今致命地更显重要。

所有这一切应当警戒我们在解读历史时不要过份倚赖既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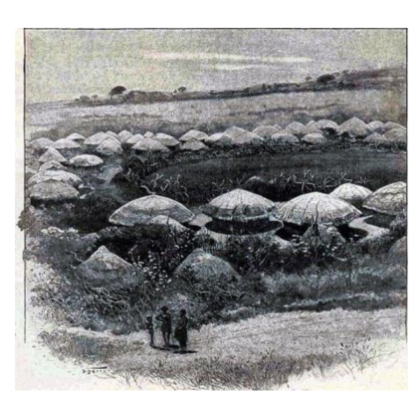
会默认那些阶级的既定性，而这只能在不可破坏的社会中发生。这没有顾及当文明崩溃或经历变革时，有时在极短暂时间内通常有新阶级在旧阶级的废墟中崛起，甚至外国冒险家或流氓无赖也可能乘时而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新阶级诞生往往是因应当时的需求。因此，最终是阶级与整个社会关系决定它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它可以照顾本身的利益，但它的成功取决于自身以外诸多利益的广度和多样性。诚然，除了少许例外情况，狭窄阶级利益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好好保护自身利益。除非社会组织的另行选择是突然陷入完全毁灭，赤裸裸自私的阶级不可能维持本身的领导地位。

为了安全地把过失归咎集体主义者阴谋论，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最终否认已经出现了社会保护的任何需求。他们最近称赞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曾经否定工业革命的传统学说，这学说认为大概在 1790 年代，不幸的英国工人阶级遭遇大灾难。依据这些作家，人民的生活标准没有突然恶化。一般而言，在引进工厂制度之后，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没有人能够否认具体数字已快速增长。按照公认的经济福利标准（实际工资和人口数字），从来没有早期资本主义地狱；工人阶级非但没有被剥削，反而成为经济的得益者；这体系惠及全民，明显不可能要争辩需要有社会保护。

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受到挫折。差不多七十年以来，学者和皇家调查委员会都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显赫的诗人、思想家和作家都给工业革命打上残忍的记号。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无情的剥削者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迫使他们挨饥抵饿干活；圈地行动剥夺了乡民的房舍和土地，把他们抛入〈济贫法修正案〉建立的劳工市场，另外还有孩子不时在矿井和工厂因工作过劳致死的确证悲剧；这些都是民众穷困的有力证据。诚然，对工业革命的耳熟能详的解读是基于十八世纪圈地行动做成剥削的程度、无家可归的工人的低工资（这解释了棉制业的高利润），以及早期生产商迅速累积的资本。对他们的控诉就是剥削，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民无限剥削成为如此悲惨和堕落的根源。所有这些内容现在已被明确反驳。经济史学家宣告笼罩早期几十年工厂制度的阴影已被驱散。既然经济确实得到改善，怎么会有社会大灾难？

当然，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的经济现象。包含了更多普通民众阶层的文化灾难自然不可能经常发生；但也不会像工业革命那样的洪水般事件：一次经济地震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把大量英国农村居民从定居的人口改变为走投无路的流动人口。但是，即使这样的破坏性的山崩在阶级历史记录中是罕见的，但在不同种族的人民的文化交往领域内，它们是通常发生的事情。本质上，环境是相同的。主要的差别是这样：当文化交往通常发生在定居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而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一个社会阶级成为一个社会的要素。在这两个情况中，这种交往也许会对较弱的一方造成

破坏性后果。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经济剥削，而是那些牺牲者的文化环境崩溃才是当时恶化的原因。经济过程也许自然地提供毁灭的媒介，同时，几乎总是经济的次等性将造成比较弱的回报率，但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它存在于对制度的致命伤害，这制度包含其社会存在。这一结果是丧失自尊和标准，无论单位是人或阶级，无论这过程源自所谓「文化冲突」或源自在社会范围内的一个阶级的地位改变。



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对比是极其重要。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环境非常类似于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环境。南非的高贵野人 Kaffir[289]原来居住在牛栏（见图），最有社会完全感，但已经改变为被半驯养的人种，穿着「即使是最堕落的白人也不穿着的污秽又难看的破旧衣服」[290]，无可名状的生命，没有自尊或标准、真正的人类废物。描述令人想起 Owen 描述他本国的工人；他当时在 New Lanark 向工人演讲，以社会研究员记录事实一样冷静和客观直斥工人他们变成堕落贱民的原因；最适当的说法是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生存在「文化真空」；一位人类学家[291]引用这术语来描述与白人文化接触受到影响的一些非洲勇敢黑人部族其文化退化的成因。他们的工艺衰退，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受到破坏，正如 Rivers 出名的描述，他们因厌倦而消亡，或是浪费生命和挥霍物质。当他们本身的目标不再值得他们努力或牺牲，种族的势利和偏见阻挡他们充份参与白人入侵者的文化。[292] 以社会障碍取代肤色障碍，1840 年代的「两个国家[293]」出现了，Kaffir 人适当地取代了小说描述的呆滞贫民区居民。

然而，若是轻易赞同文化真空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似乎期望无论在怎样的环境，经济需求会自动填补这真空和使人生是可以活下去。人类学研究推翻了这项假设。Mead 博士说：「个人会争取的目标由文化决定，不是生物对外部文化没有定义的情况的反应，例如简简单单的食物不足…原始人改变成为采金矿工或船员或只是被剥夺对工作的激励，被遗弃在满满鱼获的河边默然死去；这过程可能看来是稀奇古怪，背离社会的本性和正常运作，以至近乎病态。…但一般而言在外部引入暴力或至少是外部引起改变时，这过程确实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她总结「这样的粗糙交流，这样把天真民族从传统中连根拔起是过于频繁，根本不值得社会史学家认真关注。」

---

[289] 泛指南非黑人，现已成为脏话。（插图）

[290] 原详 2：Millin, Mrs. S. G., *The South Africans,* 1926.

[291] 原注 3：Goldenweiser, A., *Anthropology,* 1937.

[292] 原注 4：Goldenweiser, A., *ibid.*

[293] Disraeli 的小说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 主题是急速扩展的工业城镇的贫穷问题。小说副题 The Two Nations 暗喻英格兰已分裂为两个民族：奢华的贵族阶级和极度贫困的工人阶级。

然而，社会史学家没有理解提示，依然拒绝理解把殖民世界弄得翻天覆地的文化交流自然力量其实类似百年前造成资本主义初期可怕场景的力量。一位人类学家[294]有以下的推论：「虽然有许多分歧之处，但是当今外族的困境与我们数十年或数百年前的困境基本一样。新科技设备，新知识，财富和权力的新形式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也就是个人流动，家庭兴衰，组群区分，新形式领导，新模式生活，不同价值观。」 Thurnwald 明察秋毫的看法理解当今黑人社会的文化大灾难近乎类似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大部份白人社会。只有社会史学家仍然没有觉察到这模拟。

经济性偏见比任何事情更有效遮挡我们的社会视野。「剥削」一直被放在殖民地问题的最前线，这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而且从明显的人文意义来说，白人是如此经常、持久、无情剥削世上落后的人，对殖民地问题的任何讨论如不突出这特别事实，辩论没有意义。然而，正正是这样强调「剥削」，蒙蔽了文化衰退这更大问题。如以经济角度定义「剥削」为交易比例从来不足不全，这会令人质疑是否有「剥削」这回事。土著社会大灾难是受害者的基本制度被迅速和激烈破坏的直接结果（这过程中是否使用武力似乎完全不相关）。这些制度之所以被破坏，正是因为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完全不同组织的社会；工人和土地变成商品。重提一次，这只是肃清有机体社会每一和任何文化制度的简短公式。收入和人口数目的变化明显与这过程不匹配。例如，虽然相比在本国丛林的生活，奴隶被贩卖后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人为意义来说已有改善，但没有人会否定自由人被卖为奴是剥削。但如假设被征服的土著如前享受自由，甚至没有强迫他们为不值钱的棉产品付出高昂价钱，他们挨饿「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被破坏，那么什么都没有改变。

以著名的印度事件为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印度平民因饥饿大量死亡，不是因为英格兰棉织工业城镇剥削，而是印度农村社会被破坏，破坏成因是经济竞争的力量：机器制造的成衣长期以低于手工编织布匹的价格出售；这是事实；不过这只证明是经济剥削的相反，因为倾销意味高价格降至低价格。过去五十年饥荒的真正成因是谷物自由买卖，加上当地人收入减少。当然，农作物歉收是饥荒的部份原因，但铁路可以运输谷物，可以运输救济物品到受威胁地区；问题是人民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急剧上升的谷物。在自由但组织不完善的市场，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升的反应。从前，本地小店铺是粮食歉收的缓冲，但小店铺已不复见或被大市场吸纳。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采取公共工程形式让人民有能力承担高价格以防止饥荒。1857 年印度反英革命之后，英国统治下的三、四次大饥荒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也不是剥削所致，而只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的新市场瓦解了旧乡村但没有解决它的问题。在封建和农村社会的制度下，位高责重、亲族团结以及玉米市场监管防止了饥荒；在市场规则中，没有游戏规则保护人民避免挨饿。东印

[294] 原注 5：Thurnwald, R. C.,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度公司的无情垄断被废除和印度引入自由贸易后，情况变得严重，称得上「剥削」。在垄断者得势时，又有乡下地方的陈旧组织帮忙，包括谷物自由分发，情况还控制得住；在自由和平等交易过程中，数以百万计印度平民死去。从经济角度看，印度也许已经受益，从长期来说肯定受益；但从社会角度看，印度已瓦解，印度人民深受穷困和衰败所害。

至少有一些案例可以说明文化交流开始瓦解的过程，这是剥削的相反。1887 年，强制把土地分配给北美洲印第安人，依照我们的财政计算尺度，他们人人受益。这措施几乎消灭种族的肉体存在，是有记录以来文化衰败的突出案例。John Collier 这位道德天才在差不多五十年后重新取回立场，坚持重回土著的土地：今天北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经是有生命的小区——不是经济改善，而是**重建社会**恢复奇迹。大概 1890 年代，美国土著 Pawnee 族的手号游戏[295]衍生为著名的〔宗教仪式〕「鬼舞[296]」，记录了破坏性文化交流的冲突；当时印第安人正在改善经济环境，印第安人文化变得不合时宜。此外，另一经济指标是人口增长不必然排除文化灾难，人类学研究同样证明这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许是文化活力或衰败的指标。「无产阶级[297]」一词把人口出生率和乞讨生活联系一起，最能明显表达这矛盾心理。

经济性偏见是资本主义初期剥削粗糙理论的源头，也是随后否认有社会大灾难这虽然稍有学术气质但同样粗糙误解的源头。后者的重要意义和最近对历史的诠释在于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复兴。因为如果自由经济没有造成灾难，那么剥夺这世界利伯维尔场利益的保护主义便就是荒唐的罪行。「工业革命」这术语令人蹙眉不悦，认为只不过是言过其实的缓慢进程。这些学者坚持这只不过是科技进步的力量逐渐开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无庸置疑，很多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苦，但整体而言是持续改善。虽然受到一些不耐烦的人夸大当时不可避免的困难、这良好后果是经济力量近乎自动运作完成有益任务的结果。这些干预否认新经济体系的危险已威胁着社会。如工业革命的修订历史正确反映实际情况，那么保护主义运动就没有所有客观的理由，而自由放任会被证明是正确。社会和文化大灾难本质的唯物主义谬论助长了传说：背离经济自由主义导致当代的所有邪恶。

简而言之，虽然所涉及阶级利益的本质决定性影响后果，没有单一社群或阶级是所谓集体主义运动的起源。最终是社会整体利益导致事情发生，但保卫社会利益主要由一些社群负担。对保护主义运动的合理分析似乎应以被市场损害的社会实体为对象，而不是阶级利益。

---

[295] Hand Game

[296] Ghost Dance

[297] 无产阶级 proletarian 一词出自拉丁语 proletarius，古罗马社会最低下层的社会阶段，字源是 proles（子嗣），意味该阶层的唯一贡献是延续香火并供应人丁，带有轻蔑之意。

抨击的主要方向指出各个危险点。竞争性劳工市场冲击「人」，这是劳动力的载体。国际自由贸易基本上是威胁最大依赖大自然的行业，即农业。金本位制是否危及生产性组织，要视乎组织在价格上相对运作的功能。市场在每一领域发展，意味对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方面有潜在威胁。

容易区分劳工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但不是很容易区分文化的那些组成部份其核心是分别由人类、他们的大自然环境和生产组织组成。在文化领域中，人和大自然几乎是一个整体，而生产企业的货币方面只涉及一项重大的社会利益，即是国家统一和凝聚力。因此，虽然容易区别和分隔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虚拟商品的市场，但彼等涉及的社会威胁不是能够准确地分隔。

以上对西方社会在那重要八十年（1834-1914 年）期间制度发展的概述可能以相似术语提及每一危险点。因为市场组织已危及人类、大自然或生产组织，所以一定数量的社群或阶级迫切要求保护。在每一情况，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有相当长的时间间距是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世纪之交，保护主义的逆向趋势在所有西方国家建立了模拟的形势。

因此，下文分别阐述人、大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防卫（自我保护运动），后果是出现了更紧密组织的社会，但面对全面破坏的危险。



第十四章
市场和人

把劳动从其它生活活动中分离，使劳动受制于市场规律，即是扼杀存在的全部有机形式，并以原子化、个体化的不同类型组织取代。

实现这样的毁灭性计划，最好是运用**自由契约原则**[298]**，**实际意思是要清除诸如血缘关系、邻里、同行、宗教这些非契约组织，因为这都要求个人效忠，从而限制了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把这描述为「非干预」原则，只是表达了赞同明确干预的根深蒂固偏见，也就是说，干预会摧毁个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防止他们自发性重组〔非契约关系〕。

建立劳工市场的效果在今天的殖民地区非常显著。土著被迫出售劳动来谋生。为了达到这目的，必须摧毁传统制度，并防止重组，因为原始社会的个人一般不会受饥饿威胁，除非整个小区遭遇类似困境。例如在南非 Kaffirs 族人的围地制度下，「不可能穷途末路；无论谁需要帮忙，〔邻人〕毫不犹豫伸出援手。」[299] 北美洲的 Kwakiutl 族「从不会挨饿。」[300]「仅堪糊口的小区没有挨饿。」[301] 印第安人的农村社会同样承认需求不匮的原则，可以补充说大约一直到十六世纪初人道主义者 Vives 在索邦神学院[302]提出对穷人的现代观念之前，几乎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同一情况。个人不受饥饿威胁，使得原始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比市场经济更有人性，但同时经济力较差。讽刺的是白人对黑人世界的最初贡献主要是引进如何利用饥饿的灾难。因此，殖民者可能决定砍掉面包果树，人为造成食物短缺，或者向土著征税，迫使他们贱卖劳动力。这两种情况的效果都类似英格兰都铎时代的圈地行动，导致游民漂泊。国际联盟[303]的报告恐怖地说到最近在非洲丛林出现了十六世纪欧洲场景中的不祥人物——无主孤魂。[304] 在中世纪后期，无主孤魂只活在社会「裂缝」[305]，然而却成为十九世纪漂泊劳工的前人。[306]

时至今日，白人可能依然在偏远地区偶尔这么做，为了从社会结构榨取劳动力这要素而瓦解社会结构，一如在十八世纪白人曾经为了同样目的同样对待白人。

---

[298]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contract
[299] 原注 1：Mair, L. P.,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300] 原注 2：Loeb, E. M.,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301] 原注 3：Herskovits, M. J.,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302] the 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
[303] League of Nations
[304] masterless man。原注 4：Thurnwald, R. C., *op. cit.*
[305] 原注 5：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306] 原注 6：Toynbee, A.,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7, p. 98.

Ricardo 构建的的劳动力市场是川流不息的人类生命受制于食物数量的供应，使 Hobbes 对国家的古怪构想相形见绌；国家巨灵的躯体是由无数人类躯体组成。虽然人们承认有惯常标准，劳动工资不能低于这标准，但这想法要有效果，就要迫使劳工只能选择没有食物或是在市场以任何价格出售劳力。这顺带解释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的疏忽，即是只有饥饿的惩罚，不是高工资的魅力，才有能力建立一个运作的劳动力市场。殖民地的经验也证实了这想法。因为工资越高，对土著的诱因越低；土著不同白人，不会受到本身文化标准驱使尽力赚最多的钱。早期劳工也痛恨工厂，感到屈辱和受折磨；除非受到体罚（不是身体致残），土著不乐意以我们的方式工作。十八世纪法国里昂生产商主张低工资，主要是出于社会理由，[307] 认为劳工过度工作和被压制才放弃与伙伴交往和放弃逃出听任主子命令的环境。「心甘情愿的劳工」要有一些先设条件：例如英格兰的法律强制和教区农奴制，欧洲大陆的严苛劳工警察，美洲早期的契约劳工。但最后阶段是运用「大自然的惩罚」，即饥饿，而且必须摧毁不让个人挨饿的有机社会。

保护社会的责任首先落在能够直接执行他们意向的统治者。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过于容易假设经济性统治者才会受益，而政治性统治者往往不能受益。亚当 •斯密似乎不是这么认为，他极力主张英国直接统治应取代通过在印度的特许公司，认为政治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的利益平衡，后者的财富增加前者的税收，而商人的利益很自然与顾客的利益对立。

出于本身利益和倾向，英格兰地主有责任保护平民生活免受工业革命洪流的冲击。史宾汉兰制度是保卫传统农村组织的护城河，抵抗当时席卷乡村的动乱导致农业成为不稳定的行业。乡绅很自然不情愿向工业城镇各种要求屈服，首先起来全力对抗一场注定失败的百年之战。他们的反抗不是徒劳，而是拖延了几代人的衰落和争取到几乎是全面调整的时间，阻碍了关键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并在 1834 年「改革议会[308]」废除史宾汉兰制度时，地主把对抗转移反对工厂法。教会和乡绅鼓动人民对抗纺织厂厂主；如厂家取得优势会使得人们大力要求廉价食物，间接威胁要削减地租和税金。其中一位是 Oastler：「牧师、托利党党员，保护主义者」[309]和人文主义者；工厂运动的主要人物还有混杂了保守党社会主义[310]的 Sadler、Southey 和 Shaftesbury 勋爵。但推动大量信徒的是各人对金钱损失的预感确实有充份的左证：英格兰曼彻斯特市出口商很快要求较低工资和较便宜的谷粮；废除史宾汉兰制度和工厂的发展事实上为 1846 年〈反谷物法[311]〉的骚动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偶然的原因，英格兰农业的崩溃整整推迟了一代。其间，Disraeli 以抗议〈济贫法修正法〉为保守党社会主义打下基础，英格兰的保守地

---

[307] 原注 7：Heckscher, E. F., *op. cit.,* Vol. 11, p. 168.
[308] Reform Parliament
[309] 原注 8：Dicey, A. V., *op. cit.,* p. 226.
[310] Tory socialism
[311] Anti-Corn Law

主以激进的新生活方法加诸工业社会。马克思赞扬 1847 年的〈10 小时法案[312]〉为社会主义第一次胜利，是受启蒙的反动份子的成果。

劳动人民本身在这伟大运动中根本不是要素；形象地说，这运动的效果是让劳动人民捱过了中央航道[313]。一如 Hawkins 船长装运的黑奴一样，劳动人民在决定本身命运时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正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没有主动参与决定本身的命运而决定了英格兰社会史的进程；无论是好是坏，英格兰的进程与欧洲大陆大不相同。

漫无目的的刺激，新兴阶级的摸索和失误；很久以前历史已经揭示其独特色彩。政治方面，1832 年〈议会改革法[314]〉拒绝英国工人阶级有投票权；经济方面，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区分工人和赤贫民，工人得不到救济；英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被定义。在未来一段时间，「未成形」工业工人不能确定救赎是否回归农村生活和手工艺。在史宾汉兰制度后二十年，劳工致力遏止自由使用机器：或是执行〈工匠法〉的学徒条款，或是一如 Luddite 派的直接行动〔捣毁机器〕。这向后看的保守态度是 Owen 主义运动的潜流，直至 1840 年代末期〈十小时法案〉，宪章运动[315]的衰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开始，人们才忘记过去。直至那时，新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不了解自己；只有密切注意并理解其半意识行动，才可以评估英国工人阶级未能平等分享国家生活引致的庞大损失。Owen 主义和宪章运动已精疲力尽，英格兰国变得更贫穷；在这些事情的背景，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316]可以建立未来数百年自由社会的理想。

即使 Owen 主义运动只引发了规模不大的地方性活动，但在人类创造性想象方面是丰碑；即使宪章运动没有走出构思「国定假日[317]」以争取人民权利这核心的界限，宪章运动显示了有些人仍然在梦想他们的梦，对已忘记人类的社会有意见。然而 Owen 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都不是这种情况。Owen 主义不是小圈子的启示，宪章运动也不是只限于政治精英；两个运动的参与者包括成千上万的工匠、劳工和工人，组成现代史上最大型的社会运动。虽然两项运动不尽相似，但失败的程度类似，但前者已足以证明保护人民免受市场威胁的必要性是无可避免。

---

[312] 1847 年〈工厂法〉Factory Act 亦称 Ten Hours Act，限制纺织厂女工和十三至十八岁青年工人每最期五天每天工时十小时，星期六八小时。
[313] Middle Passage。奴隶贸易时代，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之间形成三角形航运路线。「中间航道」是欧洲前往南北美洲的中手航程，泛指旅途的中段。。
[314]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315] Chartism， 1838-48 年英国劳工要求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
[316] Anglo-Saxon，泛指五世纪至十一世纪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生活，其语言和种族近似的多个民族。
[317] national holiday。所谓「国定假日」其实是 1830 年代工运份子计划全国大罢工，以争取政治改革。

Owen 主义运动本来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只是普通民众的欲求被工厂到来所打击，要寻找人控制机器的生存方式。我们看来这运动本质上的目的是要绕过资本主义。当然，这样的构思必然是相当误导，因为人们依然没有理解资本的组织角色和自发调节市场的本质。可是，这也许最能表达 Owen 的精神，要强调他从来不是机器的敌人。Owen 认为尽管有了机器，人民依然应该是自己的雇主；合作或「结合」的原则可以解决机器的问题，不用牺牲个人自由或社会团结，不用牺牲人的尊严或他对同胞的同情心。

Owen 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启示非常实用，而方法是建立在对人的整体理解。尽管各种问题本质上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诸如食物质量、住房、教育、工资水平、防止失业、生病时的支持等等，但涉及的各种问题是一如所呼吁的道德力量一样广泛。如能找到正确方法，认为人可以找回存在〔意义和方法〕的信念就可以让运动的根源穿透人格形成的更深层次。极少有另一规模相近但稍欠智慧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信念把即使看似非常琐细的活动都赋予意义，因而无需设定任何信条。诚然，他们的信念是预言性，因为他们坚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场经济。

Owen 主义是工业宗教，工人阶级是承载者[318]，其形式和方案之丰富无与伦比。实际上，这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始祖。成立合作社，以会员为主要零售对象；这当然不是常规的消费者合作社，而是由热心者支持的商店，利润用于促进 Owen 主义的计划，尤其是建立合作社乡村[319]。「他们的活动有教育性和宣传性以及商业性，目的在连手创造新社会」[320]。工会成员成立的「工会商店」本质近乎「生产者合作社」，方便失业工匠找到工作，或是如发生罢工时可以赚点钱。Owen 式「劳工交易所」把合作社商店的精神发展成为独特的制度。「交易所」或「集市」的核心是各种工艺的互补性质；工匠满足彼此的需求，从而解放自己，以为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随后采用流通量很大的劳动券。这样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好；但 Owen 时代还没有探讨劳动工资以及甚至钞票的特点。社会主义与 Bentham 式运动丰富想象的大量计划，本质上和发明没有差异。不仅是反叛的反对派，受尊重的中产阶级也是在探索。Bentham 本人有投资 Owen 在 New Lanark 的未来教育计划，还得到分红。Owen 式会社是协会或同人组织，以支持上文提到的与济贫有关的乡村合作社；这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社的起源，是长期又卓越有成的概念。第一个全国性生产者合作社是「作业建筑商协会[321]」，有工团主义者的目标，试图通过建造「范围最广泛的协会」直接监管建造业，引人本身的货币，展示实现「旨在解放生产阶级的伟大协会」的手段。十九世纪的工业生产者合作社源自这事业。其后的建筑工人工会[322]及其「议会」萌生了更雄心勃勃和牢固的工会，

[318] 原注 9：Cole, G. D. H., *Robert Owen,* 1925.
[319] Villages of Co-operation
[320] New Society
[321]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
[322] Builders' Union or Guild

短时间已有近百万工人工匠附属于其松散组织的工会联盟和合作社。工会的思想是工业和平革命；记得他们的运动初始时是以救世主形式出现，只是劳动人民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已足以使劳动人民的心愿难以压制，因此工业和平革命的想法看来没有矛盾。Tolpuddle 蒙难者[323]属于这工会一个农业分会。「重建会社」[324]继续宣传工厂立法，并在稍后成立道德会社，是世俗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些组织全面开展非暴力抵抗。一如法国的**圣西蒙主义**[325]，英格兰的 Owen 主义表现出精神启蒙的所有特点；但圣西蒙致力耶教复兴，而 Owen 是现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耶教。世界各地都有模仿英国的消费者合作社，这当然是 Owen 主义最突出和实用的衍生成就。英国工业史最大的一次精神力量挫折莫过于消费者合作社失去动力，或更精确地说只是在消费者运动边缘存在。但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道德衰败之后，这民族仍然有弹力发挥和维持如此有想象力的新犹，这民族有无限智力和情感活力。

Owen 主义的整体看法仍然残存着某些中世纪遗传的社团生活方式，见诸「建筑工匠协会」和他的社会理想「合作乡村」的农村情景。虽然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源头，但建议不是基于财产问题，财产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方面。一如圣西蒙主义，Owen 主义遇上工业新现象，认识到机器的挑战。但 Owen 主义的特点是坚持**社会**方法，拒绝接受把社会分割为经济和政治领域，亦因而拒绝政治行动。接受有分隔的经济领域，意味着承认社会的组织力量是得益和利润的原则。Owen 拒绝这说法。他的天赋认识到只有新社会才能够包容机器。对他来说，事情的工业方面决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这意味着他拒绝了社会的市场观点）。New Lanark 工厂的经验让他明白工资只是工人生命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大自然与住宅环境，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以及就业稳定。（一如其他工厂，New Lanark 工厂即使没有工作也发工资。）但调整过程包含更多因素。整体工业人口要有建立新社会地位的环境，就要顾及儿童和成人的教育，娱乐、舞蹈和音乐，以及人人有高尚道德和个人标准。来自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访客川流不息参观 New Lanark，以为这是未来的保留地，完成了不可能的壮举，即是整体员工操作成功的工厂。但 Owen 支付的工资其实低于附近一些城镇的公司。New Lanark 工厂的利润主要是因为工时较短而工人有较高生产率，这是因为卓越组织和工人有充分休息，这些优势胜过增加实际工资来慷慨提供体面生活。但后者已足以解释工人以阿谀奉承的态度紧贴 Owen。他从这些经历汲取以社会方法解决工业问题，即是比经济方法更广泛。

[323] Martyrs of Tolpuddle；1832 年，英格兰南部 Tolpuddle 村六名农业工人成立友谊会，抗议工资过低。当时法律禁止宣誓加入会社，六人被定罪流放澳大利亚殖民地。此案引起民愤，掀起英格兰首次大型示威抗议，六人先后获释回国。

[324] Regeneration Societies

[325] Saint-Simonianism；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由 Saint-Simon 发起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他的著作关心工业化和科学发现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他认为社会要重整，先要放弃传统的时空观念，才可以演变成为人人各尽其力的有生产力社会，这是「真正平等」的基础。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斯，John Stuart Mill 和其他思想家及社会理论家。



尽管这有全面观点，但他有见识抓住了支配工人生活的具体事实的尖锐特性。他的宗教意识厌恶 Hannah More 的实用性**先验论**[326]，以及她的《廉价宗教小册子[327]》。有一本小册子赞扬一位在兰开夏煤矿工作的女孩。她九岁就要下矿井，为她少两年的弟弟当拉车工[328]。「她高高兴兴跟随父亲进入煤坑，埋首地下深处，少少年纪已不以性别为借口，和矿工做同样工作；这帮男人很粗鲁，但对社会有极大贡献。」（见图）在一次事故中她目睹父亲死于矿难。她后来申请做佣人，但由于当过矿工被歧视，女雇也当不成。幸运的是她的举止和耐性引起人关注，到煤矿查询，她有了很好的推荐，终于找到工作。小册子总结「这故事让穷人明白只要选择努力工作，必定可以脱离如此糟糕的生存条件，提升至某种程度的独立，悲惨的境遇也不能禁绝许多高尚美德的行为。」More 姐妹团乐意和挨饿的劳工一起工作，但对他们肉体受苦没有兴趣，只是利用工人的宽宏大量赋予他们社会地位和功能以解决工业主义的实质问题。More 坚持女主角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用的人，雇主的好评是女儿地位的左证。More 认为正常运作的社会只需要这些。[329] Owen 舍弃耶教，因为这宗教拒绝人可以掌握世界，偏重歌颂 More 笔下可怜女主角的假想地位和功能，而不是面对超越耶教新约经文揭示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苦况。没有人怀疑 More 的信念：她认为穷人越容易默默接受许其堕落的景况，就越容易转向寻求上天的慰藉；她坚信市场社会，认为这是穷人得到救赎和市场有序运作的依归。最有爱心的上层阶级深信这些耶教空话，与努力挽回社会的英格兰人民对工业宗教的创造性信念是南辕北辙。然而，资本主义仍然还是有前途的。

在 Owen 主义实践和不成熟倡议失败之后，几乎可以预见诉诸于许多不同冲动的宪章运动会乘时而起。这纯粹是试图通过宪法途径试图影响政府，追随以往中产阶级取得选举权的「改革运动」的传统路线。「宪章六条[330]」要求有效的普选权。六、七十年来，改革后的国会毫不妥协，面对群众对宪章派的广泛支持时不惜使用武力，自由主义者在 1840 年代对人民政府概念的憎恶，在在证明英格兰中产阶级不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只有在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

[326] transcendentalism

[327] Cheap Repository Tracts；1795 至 1797 年间，Hannah More 策划和出版约一百二十份宗教小册子，廉价出售，读者是略懂文墨的穷人。小册子批判酗酒、放荡、懒散、赌博、暴力集会；赞扬诚实、勤俭、忍耐和安于本份等美德。小册子颇为成功，每年销量有二百万份。

[328] 原注 10：More, H., *The Lancashire Colliery Girl,* May, 1795; Cf. Hammond, J. L. and B., *The Town Labourer,* 1917, p. 230.

[329] 原注 11：Cf. Drucker, P.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939, p. 93, on the English Evangelicals;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 pp. 21 and 194 on status and function.

[330] Six Points of the Charter。伦敦工人协会的人民宪章运动提出的六项政治改革：一人一票、保护投票选民、选民资格不以财产甄别、议员受薪、公平选区规模、议员任期一年。（资料）

以工业顺利运作为己任之后，中产阶级才把选举权向较高地位的工人开放；这时宪章运动已烟消云散，肯定工人不会利用选举权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从扩展市场存在形式的角度来看，这可能言之成理，因为这有助克服劳动人民依然保留残存的根本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障碍；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已被工业革命连根拔起，如何重整老百姓的种种不同工作，这方面只字不提。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影响了他们分享领导权的能力，授予他们有投票权也不能改善这情况。统治阶级犯了错误，把僵硬的阶级统治原则扩大至另一类型的文化：为了避免衰退性影响，这文化要求联邦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统一。

宪章运动是政治性，比 Owen 主义更容易领会，但如对那时代没有一些丰富想象力，则不能够理解运动的情感强度或广泛范围。1789 年和 1830 年把欧洲革命变成常规；1848 年巴黎起义实际上是柏林和伦敦的预报，预告社会动乱爆发的精确程度比预告集市开张更为准确，「后续」革命迅速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镇爆发。伦敦极度紧张，因为包括宪章运动者在内人人期望以暴力行动迫使国会同意人民有选举权。（有普选权的成年男人少于 15%。）1848 年 4 月 12 日这一天是英格兰史上集结最多武力的一天，以保卫法律和秩序；几十万市民在那一天以辅警身份武装起来对付宪章运动者。巴黎革命来得太迟，未能把英格兰的平民运动带向胜利。由〈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 1840 年代苦难激起的反革命精神已逐渐减弱；贸易兴旺的浪潮增加就业，资本主义渐见成果。宪章运动者和平散去。国会稍后考虑他们的要求，下议院以五比一多数票不通过议案。数百万人签名没有作用。宪章运动者的奉公守法行为没有作用。胜利者的嘲弄使运动烟消云散，结束了英格兰人民建立平民民主的最大政治努力。一两年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宪章主义。

半世纪后，工业革命传至欧洲大陆。当地没有圈地行动迫使工人阶级放弃土地；更确切地说，高工资和城市生活引诱半奴隶农工放弃庄园移居到城镇，与传统的下层中产阶级交往，有机会学习城市语调。在新的环境中，他非但没有感到社会地位降低，反而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在二十世纪之初，低下阶层的城镇工人的居住条件依然恶劣，酗酒卖淫猖獗，但这与英格兰农工或世代相传佃农的道德和文化灾难无法相比，因为后者是无助地在工厂附近的贫民窟沉沦于社会和物质困境；在这方面，斯洛伐克或波兰的农工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拥有稳定住所的雇农变成现代大都市的工业工人。爱尔兰或韦尔斯的日薪工人或苏格兰高地人懒洋洋走过早期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小巷时，也许有相似经历；但英格兰自耕农的儿辈或被逐离家的佃农肯定没有觉得社会地位提高。然而，在欧洲大陆，不只最近得到解放的胡涂农民极可能提升至中产阶级的下层（古代文化传统的工匠和商人），社会地位稍高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都有相同处境，几乎一样被排除在实际统治阶层之外。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紧密结盟，以反对封建贵族和罗马主教势力。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结合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

攻击专制主义和特权阶级。无论是十七世纪的乡绅和商人还是十九世纪的农场主和商贩，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有足够力量维护本身的权利，即使在 1832 年的近乎革命中也没有寻求劳工阶层的支持。此外英格兰贵族一直吸收最富裕的新移民，扩大最高社会阶层的范围，而欧洲大陆的半封建贵族依然没有与中产阶级的子女通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的制度，从而使贵族自闭于其它阶级。因此，迈向同等权力与自由的每一步，使欧洲大陆的中产和工人阶级同样受益。始于 1830 年（如果不是 1789 年），工人阶级参与中产阶级对抗封建制度是欧洲大陆传统的部份，但正如常言道中产阶级盗取了胜利的果实。但不管是胜是败，工人阶级取得经验，把目标提升到政治层面。这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明确了城市工人的视野，环境教导了城市工人使用其工业和政治力量作为高层政治的武器。英国工人在工会主义的个人和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无与伦比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的策略，把国家政治留给较有能力的人，而中欧工人成为政治社会主义者，惯于处理治国之道的各种问题，说真的是主要关心本身的利益，诸如工厂法和社会法案。

如果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有半个世纪左右的间距，那么建立统一的国家有更大的时间间距。英国在数百年前已实现统一，意大利和德国要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统一，东欧一些小国更晚一些。在这建国过程中，工人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过程一定包含了社会政策。卑斯麦通过采用社会立法这种新纪元形式试图统一第二帝国。意大利的铁路国有化加快了统一。奥匈帝国融合了多个种族和民族，国王一再呼吁劳工阶级支持中央集权和帝国统一。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这个较大领域内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有更多机会服务工业工人的利益。

唯物主义的先设概念模糊了工人阶级的轮廓。英国作家很难理解欧洲大陆观察员对〔英格兰〕兰开夏郡早期资本主义环境的极坏印象。他们指出中欧纺织业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与英格兰同行一样差劲。然而，这种比较掩盖了显著要点，即是欧洲大陆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升，而英格兰工人的地位下降。欧洲大陆工人没有经历史宾汉兰制度那样可耻的赤贫化，也没有类似〈新济贫法〉的灼热经历，他的社会地位从佃农改变，或更精确地说是升级成为工厂工人，并且很快成为有选举权和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因此避开了紧随英格兰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大灾难。而且由于效法英格兰的社会保护措施，欧洲大陆工业化时已可以调整适应新的生产技术。[331]

从社会意义来说，欧洲大陆根本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大陆工人需要的保护不是针对工业革命，而只是针对工厂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正常行动。大陆工人主要借助

[331] 原注 12：Knowles, L.,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26.

立法来实现保护，而英国工人更多依赖自愿性协会（工会）以及协会垄断劳动力的势力。相对来说，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计划早于英格兰，这种差异在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工人群众较早享有投票权。尽管容易高估强制性和自愿性保护方法（即立法与工会主义）的经济差异，但政治方面是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大陆，工会由工人阶级政党创立，而英格兰是由工会创立政党。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或多或少改变为社会主义，而在英格兰甚至政治性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工团主义。因此，普选权在英格兰提升国家团结，但有时在欧洲大陆有相反效果。评论家担心人民政府对经济体系构成危险，这体现在欧洲大陆，不是英格兰。

从经济角度看，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方法导致几乎一样的结果：都实现了原来的打算，即是破坏称为劳动力这生产要素的市场。只有当工资和物价一并下降，这样的市场才能实现其目的。从人的角度看，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工人收入极不稳定，绝对没有专业标准，可怜无依地任由市场突如其来随意摆布。Mises 公正地指出，如工人「没有成为工团主义者，而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降低要求和转换地点和职业，最终会找到工作。」这总结了建基于劳动力商品化假设的制度的情况。商品不能决定在什么地方出售，用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价格转手，以及以什么形式被消耗或消灭。这位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写道：『没有人曾想到「没有工资」是比「没有工作」更好的用语，因为失业者错过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他说得对，但这不是他的创见；一百五十年前，Whately 主教说过：「有人乞求工作时，他要求的不是工作，而是工资。」但以下的说法技术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是旨在维持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不相符的工资水平。」Mises 质疑：若然不是工人「因为工资不符理想，拒绝劳工市场某些他们有能力和愿意做的工作」，不可能有失业问题。这清楚解释了雇主要求劳工流动和弹性工资的真正意思正正是上文把市场限定为劳动力商品化的市场。

所有社会保护措施的正常目的是破坏这样的制度，使其难以存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标准和规章制度能够保障所谓商品（即劳工）的人文特性的情况下，才允许劳动力市场保留其主要功能。有时有人指出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特别是工会没有干预工人流动性和弹性工资，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这目的正正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定律，使其离开市场轨道。

（参考阅读）王文霞：英国工会与工会主义的发展(1800-1880)



第十五章

市场和大自然

所谓「土地」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与人类制度紧密交织。把土地独立出来并形成土地市场，或许是先民最不可思议的事业。

土地和劳动传统上是不可分离；劳动是生活的一部份，土地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活和大自然形成了明确的整体。因此，土地跟家族、邻里、行业和宗教这些组织、与乡村、协会和教会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大市场[332]」是经济生活的安排，包括生产要素的多个市场。因为这些要素正好不能与人类制度、人以及大自然这些要素区分，所以很容易看到市场经济包括了社会，而社会制度是服从市场机制的需要。

有关土地的命题，就像劳动力的命题一样是理想国形态。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之一。土地赋予人类生活的稳定性，是居住的地方，人身安全的条件，是风景和四季。可以想象出生时没有手脚，犹如生活没有土地。然而，市场经济体系的理想国概念就是把人和土地分离，并以这方式组织社会以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要。

再者，现代殖民化领域特显这情况的真正意义。无论殖民者取得土地是为了埋藏其下的财富，或是土著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盈余，这都无关宏旨；土著是否在殖民者直接监督或某些间接强迫形式下工作，这也没有很大分别；因为每种情况都是先要粉碎大自然生活的社会和文化体系。

现在的殖民形势和西欧一二百年前的形势极为相似。外国实现动用土地资源可以压缩为若干年或数十年，西欧可能要用上几百年。

挑战来自资本主义的纯粹商业形式以外的增长。农业资本主义始于英格兰都铎王朝，要对土地特殊处理，包括改造和圈地。自十八世纪起，工业资本主义在法国和英格兰兴起，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要有场地用于建造工厂和工人的住宅。最具影响力的挑战是十九世纪工业城镇兴起，对食物和原材料供应的无限需求，但这更多是影响土地的使用而不是所有权。

表面上看，对这些挑战的各种反应似乎没有什么相似，然而这些都是地球这行星表面臣服于工业社会需求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商业化，调动封建时代的土地收入。第二阶段是强迫增加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生产以满足国家规模的快速增长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阶段是把盈余生产的体制延伸到海外和殖民领地。随着这最后阶段，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适应了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系统。

[332] One Big Market

土地商业化是清算封建主义的另一名称，始于十四世纪西方城市中心和英格兰，约在五百年后结束于欧洲革命消灭了农奴制的残余。人和土地分离，意味着经济体系分解为各个要素，方便各要素在经济体系中找到最适合发挥本身作用的地方。新体制建立时，与旧体制并存，并通过控制与前资本主义依然紧密关联的土地，试图同化和吸收旧体制。封建时代没收土地的措施被取消，「目的在于消除邻里和家族组织对土地的所有要求，特别是在商业和抵押之外的男系贵族和教会对土地的要求。」[333] 实现这目的之途径包括：个人势力和暴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战争和征服，立法手段，行政压力，以及民间自发的小规模长期努力。混乱是否很快结束，或是否对社会体系造成显著创伤，主要取决于调节个程的各项措施。政府引入各种有力的变革和调节因素。例如，直至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1815-70 年），教会土地回归民间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是土地有序转让私人的主要手段。

法国大革命和 1830-40 年代的效益主义改革采取了最大的单一步骤。Bentham 写道：「没有指定继承人、没有不可转让的捐赠、没有公地、没有回赎权、没有十一税…，这是农业繁荣最有利的条件。」这样有自由处理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构成了 Bentham 个人自由主义概念的基本部份。立法的目标和结果是以种种方法扩大这种自由，包括〈1832 年时效归益法[334]〉、〈1833 年继承法[335]〉、〈1833 年拟诉弃权法[336]〉、〈1833 年土地财产时效法[337]〉 以及 1801 年的一般〈圈地法[338]〉及其后修订版本[339]，还有从 1841 至 1926 年间多项〈土地登记法[340]〉。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拿破仑法典[341]》确立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形式，使土地成为可买卖商品，抵押成为民间契约。

第二步骤与第一步骤有重迭，是使土地服务城市人口快速增的需求。土地实质上当然不可能流动，但如运输条件和法律允许，土地的产品可以流动。「**因此，商品流通在某程度上弥补了要素不能在地区间流通**；或者说（其实是同一件事）**贸易减轻了生产设施不适当地理分布的劣势**。」[342] 传统思想没有这种观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和中世纪早期没有定期买卖日用品的习惯。」[343] 剩余的谷物

---

[333] 原注 1：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334] Prescription Act，界定长期使用某物品（包括土地）的时效而取得拥有权。
[335] Inheritance Act
[336]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 废除两项土地业权。
[337] 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
[338] Enclosure Act
[339] 原注 2：Dicey, A. V., *op. cit.,* p. 226.
[340] Copyhold Acts
[341] Code Napoleon
[342] 原注 3：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5, P. 42.
[343] 原注 4：Bucher, K.,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Cf. also Penrose, E. F.,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1934, 引述 Longfield, 1834 首次提出商品流通可以被视为代替生产

是用来供应附近地区，特别是本地城镇的粮食需要；一直到十五世纪，谷物市场一直是当地化组织。但城镇发展吸引了地主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在英格兰，大城市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并允许谷物在地区之间流通，但这从未发展为全国规模。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人口聚结，最终根本性改变了形势；首先是全国范围，然后是世界范围。

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推动这改变。农产品流通从附近农村地区延伸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应用。因此，遥远地区的人民被扯入这变化的漩涡，但不理解这变化的源头；欧洲各国的日常活动变得依赖还没有得到确实保证的全人类生活一体化。有了自由贸易，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新庞大危险便应运而生。

社会防卫全面混乱的阵线也是一如面对全面攻击的范围广阔。虽然不成文法和立法时不时加快变革节奏，但是在其它情况下则拖慢步伐。但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在任何时候未必有相同方向的作用。

在促进建立劳动力市场方面，不成文法有积极作用；首先强调提出劳动商品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在有关劳动组合和合谋法方面，不成文法偏向自由劳动力市场，但这意味着要限制组织工会的自由。

但不成文法对土地问题的作用却从鼓励变革改变为反对。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不成文法经常主张地主有权提高土地的盈利性，即使这导致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陷入严重混乱。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这流通过程涉及《罗马法》的孕育，而英格兰的不成文法独树一帜，成功消除有限制的中世纪产权与现代个人产权的差距，但没有牺牲与宪法自由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是由法官制定法律。另一方面，自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土地的不成文法在面对法律现代化时起了保护过去的作用。但最终是效益主义起了作用；在 1830-60 年代，契约自由扩大到土地，但到了 1870 年代这强大趋势逆转，立法急剧改变方向。「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开始。

各项成文法有意强化不成文法的惯性，以保护农村各阶级的居住环境和地权免受契约自由的影响。为确保穷人的住处符合一定程度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有综合计划为穷人提供分配地[344]，让穷人有机会暂离贫民窟，呼吸大自然（所谓「绅士公园」）的新鲜空气。立法行动旨在保护穷人居住环境免遭经济进步浪潮破坏，从

要素流通。

[344] allotment。政府把市区的闲置空地分划成小块耕地，低价向附近居民出租，绝大多数作园艺种植。这措施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

市场法则控制中解救了不幸的爱尔兰租户和伦敦贫民窟居民。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行为挽救了租户、农民和农业劳工免受城市化最强烈的影响。普鲁士（德国）保守主义者，例如 Rodbertus[345]是英格兰托利—民主党人的血缘兄弟；普鲁士的贵族地主社会主义[346]影响了马克思。

当其时，就世界各国和各大陆农业人口的保护问题出现了。如果不加限制，国际自由贸易必然消除越来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的紧密团体。[347] 这个不可避免的破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发展过程的内在不连续性而变得更严重，因为运输价格昂贵而无法推广到世上的新地区，除非获利甚丰。一旦建造蒸汽船和铁路的巨大投资结出硕果，整个大陆得到开发，大量谷物雪崩似压向不幸的欧洲。这与经典预言相反。Ricardo 把这发展定为公理：人们首先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当铁路在地球的另一相对极发现更肥沃的土地时，他的说法变成莫大的嘲弄。中欧面临着农业社会全面遭到破坏，被迫引入谷物法保护农民。

欧洲有组织的国家可以保护自己免遭国际自由贸易逆流影响，政治上没有组织的殖民地人民就无能为力。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异域人民试图争取必需的政治地位，以保护自己避开欧洲贸易政策导致的社会混乱。白人通过本身社会的主权地位轻易取得的保护，是有色人种无法企及，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政府这种先决条件。

商贸阶级提出了土地流通的要求。Cobden[348]发现农牧业是「生意」，失败者要淘汰出局；这让英格兰的地主大吃一惊。工人阶级赞同自由贸易，因为食品明显变得更便宜。工会变成反对土地改革的堡垒，而革命性社会主义把世界农民打上反动份子的标记。国际劳动分工无疑是进步的信条；其反对者往往是判断力受到既得利益损坏或是天生愚昧。只有少数人既有独立思想而又没有利益关系，发现了不受限制自由贸易的误区，但人数太少，不成气候。

不过，虽然不是有意识地承认这些事情，其后果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阻碍土地流通那些力量所起的重要保护作用，可轻易解释十九世纪期间西欧的土地利益集团以及中东欧残存封建生活形式。经常有提出这问题：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已失去权势来源的军事、司法和行政职权，如何在中产阶级国家维持影响力？有时会提出「幸存者」理论作为解释：失去功能的机构或特征由于惯性作用可能继续存在。较为真实的说法可能是这样：没有机构可以在失去功能后依然存活；如能存活下来，这是因为机构已在发挥其他功能，但**不一定包括原来的功能**。因此，封建制度和土地保护主义能保持力量，是因为致力一个目标：这恰巧是能够限制

345 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
346 Junker socialism
347 原注 5：Borkenau, F., *The Totalitarian Enemy,* 1939, Chapter "Towards Collectivism.
348 Richard Cobden (1804 –65)，英国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

土地流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其时自由贸易者已忘记土地是国家领土的一部份，而国家主权的领土特点不仅是感情联想的结果，也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大量事实。「相对于游牧人民，耕种者投入的改良是**固定在特定地方**。没有这些改良，人类生活必然保持原始状态，与动物无异。这些固定的改良在人类历史有多大的作用！正是这些被开垦和耕种的农田，房屋和其它建筑物，交流的方法，生产所需各种各样的工厂（包括工业和矿业），所有永久和不可移动的改良把人类社会牢缚在当地。这些改良不可能是即兴，必然经过多代人耐心努力逐步建立；社会不能牺牲一切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主权的**领土**特点渗透政治构想。」[349] 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百年来受到嘲讽。

经济论点可以轻易扩展至包括国土和资源完整所系的安全先决条件，诸如人民的精力和毅力，丰富的食物供应，战略物资的数量和特点，甚至国家的气候可能受到滥伐森林以及侵蚀土壤和沙尘暴的影响；所有这些最终取决于土地因素，而没有一项对市场的供求机制有反应。既然体制是完全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存在的需求，很自然信心会转投市场体制之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有能力保护被该体制损害的共同利益。这观点吻合本书对阶级影响真正源头的理解：与其以反对阶级的影响（没有解释）来解释与一般趋势相逆的发展，本书以事实解释这些阶级的影响即使是无意之间代表着各种发展，也只是表面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这些阶级的利益往往受惠于这样的政策，正好说明真相：各阶级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对一般平民的服务。

史宾汉兰制度是另一例子。管理农村的乡绅想到办法放慢农村工资上涨和延迟可能破坏农村传统结构的威胁。长远来看，他们选择的方法必然有最邪恶的后果。然而，如乡绅不是能够帮助整个国家迎接工业革命的风潮，他们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惯常做法。

重复以上的说法：欧洲大陆的农业保护主义是必要的。但当代最活跃理性力量参与的冒险事业恰巧改变了他们的视角，以至未能察觉农业苦况的真正重要意义。在这情况下，有组织能够代表面临危险的农村利益，其成员的影响力可以越出人数比例。保护主义的对抗运动实际上成功稳住欧洲农村以及减缓向城镇流动这些当代灾害，也恰好发挥了对社会有用的功能，而反动〔阶级〕由此得益。当欧洲的反动阶级为耕地税而战时，以类似功能玩弄传统感情，也是半世纪之后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其它进步的社会技术成功的根由。社会的相同需求，在新世界有助民主，但在旧世界却加强了贵族的影响力。

反对土地流动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政治史中自由主义和反动主义之间斗争的社会背景。在斗争中，军方和教会高层与土地阶级结盟，后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对社

[349] 原注 6：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33.

会的较直接功能。当时社会陷入僵局，而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必然后果（即宪制政府）有主导大局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从来不服从传统以及公众自由和议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土地阶级成为任何解决僵局的反动方案的可用筹码。

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政体联姻，而土地利益集团形单影只；这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享有永久政治影响的源头，从而产生卑斯麦治下普鲁士的政治横流，刺激法国神职人员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确保哈布斯堡王朝[350]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教会和军队成为崩溃王朝的保卫者。因为这关系经历了重要的两代人，土地和土地财产被认为有保守的先天性偏好；凯恩斯确定这关系为「永恒」之外的切实可行方案。人们已忘记英格兰的托利派自由贸易者和重农先行者，一如忘记了都铎王朝的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赚钱的革命方法；现代人对农村永远落后状态的偏见抹去了法国和德国的重农地主对自由贸易热情的记忆。Herbert Spencer 认为一代人已是永恒的样本，他简单地把军国主义等同保守，他不会明白日本、俄罗斯或纳粹军队近来显示的社会和科技适应性。

这些思想有短暂时限。市场经济在工业方面所取得惊人成就，代价是对社会内涵造成巨大损害。封建阶级从中发现机会恢复失掉的声誉：摇身一变成为土地和土地耕种者美德的代言人。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大自然」与「过去」结盟；在十九世纪的农地分配运动中，封建主义颇为成功重拾过去：以监护人自居，保卫人类的大自然生活环境（土地）。如果危险是不真实，这种计谋不会得逞。

但军方和教会也是通过「保卫法律和秩序」取得声誉，不过法律和秩序现在变得非常脆弱，而管治的中产阶级不适合确保新经济体系的要求。与任何已知的其它经济体系相比，市场体制对暴乱更敏感。都铎政府因为有暴乱才注意到当地人民不满；可能处死几个元凶，之后一切如常。金融市场崛起意味着完全抛弃这种态度；1797 年之后暴乱已不常见于伦敦生活，逐渐被会议取代，会议至少在原则上以举手表决，不是挥拳相向。[351] 普鲁士国王宣布维持和平是臣民首要职责，他为这悖论而出名；然而不久这已是寻常事物。十九世纪时，如武装暴民破坏和平，会被认为是初期叛乱，对国家构成严重危险；股票崩盘且一泻而下。大城市街上射击闹事可能破坏国家名义首都的颇大部份。然而中产阶级不是英勇军人；大众欢迎的民主因为鼓动广大群众发表意见而沾沾自喜；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在防卫路障面对残暴的贵族时，仍然念念不忘革命青年时代。受自由病毒毒害最少的农民最终被认为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站出来的唯一阶级。保守派的作用之一是维持工人阶级的现状，以免市场陷入恐慌。虽然不是经常要用到农民，但农民

[350] Hapsburg empire 包括了 1804 年到 1867 年的奥地利帝国和 1867 年到 1918 年的奥匈帝国。
[351] 原注 7：Trevelyan, G. M., *History of England,* 1926, p. 533. 「Walpole 治下的英格兰依然是贵族统治，但不时有动乱。」Hannah More 的诗篇 *The Riot* 是在 1895 年书成，「那是稀缺和警号的一年」，也是史宾汉兰制度出台的一年。Cf. *The Repository Tracts,* Vol. 1, New York, 1835. Also *The Library,* 1940, fourth series, Vol. XX, p. 295, on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98)."

可以作为产权的保护者已经是重农阵营的资产。

不是这样不可以理解 1920 年代的历史。当其时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和战败的压力下瓦解，只有工人阶级使社会继续运转。各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接掌权力：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宣布成为共和国，虽然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活跃的共和国政党。但一旦混乱的严重危险过去，工会的效用变得多余，中产阶级试图排除工人阶级对公众生活的全部影响力。这被称为战后时期的反革命阶段。实际上，自从工人组建为积极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工会，共产主义政权从来不是任何严重的危险。（匈牙利抵御法国入侵后别无选择，曾有几乎是强加于该国的短暂布尔什维克[352]时期。）在非常时期，危险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忽视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体系，本来对公共秩序和贸易习惯没有损害的干扰可能构成致命威胁[353]，因为这会导致社会日常生活所依赖的经济制度崩溃。这解释了一些国家从即将由工业工人独裁统治转由农民独裁统治的重大改变。在整个 1920 年代，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经济政策，而一般而言农民以前只是小角色，但当时他们恰巧是唯一阶级能够保卫法律和秩序（现代的高度张力术语）。

战后欧洲激烈的农地均分主义从侧面说明了由于政治原因农民阶级享有优惠待遇。从芬兰的拉普阿运动[354]到奥地利的保安团[355]，农民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股势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战后初期食物短缺，有时被认为是农民优势所在的原因，但这其实无关宏旨。例如奥地利为了让农民在财政上得到好处，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来满足本国的食品要求，但还是维持谷物税以降低本国的食品水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惜代价，虽然重农保护主义为城镇居民带来不幸，出口产业要承担不合理的生产高成本。以前没有影响力的农民阶级就是这样取得与其经济重要性很不成比例的优势。人们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造就了农民的牢固政治地位。然而这并不是恐惧工人阶级独裁统治（眼前没有丝毫迹象），而是恐惧市场经济停顿，除非能够消除如在受压情况下可能放弃市场游戏规则的全部势力。只要农民是有能力消除这些势力的唯一阶级，就可以维持极高声誉和控制城市的中产阶级。一旦国家权力巩固（甚至在这之前），法西斯主义者把城市的中产下层阶级组织成突击队，资产阶级才能摆脱对农民的依赖，而农民的声誉迅速

---

[352] 「布尔什维 Bolsheviks」是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政治运动中由列宁领导的成员，在 1917 年 10 月参与俄国革命夺取政权。布尔什维派是当时社会主义民主劳动党（Socialist Democratic Labor Party）的其中一派系，主张强硬路线和只接受全面革命家入党。布尔什维主义自此成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代名词。

[353] 原注 8：Hayes, C.,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0-1890,* 谓「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大多数国家现在是无比的内部稳定。」

[354] Lapua Movement 是芬兰激进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成立基地 Lapua 镇命名。激进之余，运动转向极右政治，并在 1932 年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取缔。

[355] Heimwehr，1920-30 年代奥地利境内民族主义的半军事组织，反对议会民主；其方法，组织和思想模仿德国的自由军团(Freikorps)。

回落。一旦城镇和工厂的「内部敌人」被肃清和压制，农民又再回落到以前在工业社会的卑微地位。

大地主的影响力没有受到类似的削弱，因为有一个恒常的有利因素：农业自给自足的军事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众明白基本的战略事实，不再是不问情由依赖世界市场，而是恐慌性储存食品生产能力。由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所启动的中欧「重新均分农地运动」是以绝对手段完成。除了「内部敌人」论点，还多了「外部敌人」论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如既往只看到不健全经济学说导致虚构的过失，而实际上政治大事唤醒了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民明白到在面对国际体系即将陷入混乱时，经济考虑已是无关重要。日内瓦（国联）继续软弱无力提醒各地人民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想象中的危险而储备物资，只要大家一致行动，就能恢复自由贸易，大家都有好处。在当时极其容易轻信的氛围，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问题（不管这意味什么）的解决方案不仅减轻战争的危险，而且实际上永远避免战争的威胁。百年和平建立了一堵牢不可破幻想之墙掩盖事实真相。当代作家以脱离现实见长。Toynbee[356]认为民族国家是狭隘的偏见，Mises[357]认为主权国家是荒谬的幻想，Angell[358]指责战争是做生意计算错误。对政治问题本质特点的认识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

自由贸易在 1846 年受到〈谷物法〉挑战并取得胜利，八十年后再次受到同一问题挑战，但这一回失败了。从一开始，自给自足的问题就经常困扰着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者据此祈求赶走战争的幽灵，天真地把论点建基于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假想。人们忽略了这些论点只是揭示人们的安全只靠依赖自发调节市场这样脆弱的制度是有多大危险。1920 年代的自给自足运动本质上是先兆：指出要适应秩序即将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这种危险，而人们有相应行动；但由于他们是在十年后行动，低估了因果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合理。许多当代人都这么说：「危险已经过去，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这错误逻辑不仅误解了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误解了法西斯主义。实际上两者可以由事实解释清楚：只要危险的根源没有清除，人民一旦有了危险的印象，依然会有潜藏的恐惧。

本书坚持认为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战争经历的冲击，这种经历意想不到地使他们要面临相互依赖的危险。贸易恢复，多多国际会议为和平的愉悦呐喊，多国政府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原则，但这一切都是徒然；没有人会忘记如果本身不是拥有食物和原材料资源或是肯定有军事途径可以取得资源，健全的货币或无懈可击的

[356]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 26 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

[357]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裔美国人，知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促进古典自由主义复苏。

[358] 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国政治家，1933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信用都不能拯救国家于无助。这些基本考虑塑造了社会政策，「到处杨梅一样花」的一致性是有逻辑的。既然危险根源没有消除，又怎能预期恐惧会平息？

类似的谬论捉弄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形成大多数，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没有政治比例的怪胎。据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统计资料证明「进军罗马[359]」一年多之前，罢工浪潮已经平息。武装工人确实在 1921 年占领了工厂，但这是否在 1923 年解除工人武装的理由？当时工人已经再次走下站岗放哨的护城墙。希特勒声称他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拯救了德国。难道不能看出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失业狂潮在他出任总理之前已经退却？希特勒声称阻止了他掌权时已经不再存在的事情，是与因果定律恰恰相反；在政治方面也应遵守因果定律。

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战后时期的情况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也确实说明在紧急情况下，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和党派可能忽视已建立的契约自由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规律；这可能性必然对社会有不良影响：投资失去信心，妨碍资本积累，工资维持在无利可图的水平，危及货币，破坏外国信贷，削弱信心和瘫痪企业。潜在恐惧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影式危险，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工人阶级可以在法西斯恐慌爆发的紧要关头时强行破坏性干预。

人类和大自然面对的危险是不能清楚分开。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致保护主义，前者的形式主要是社会法和工厂法，而后者主要是耕地税和土地法。然而，两者有重要的分别：在紧急状态下，欧洲农民捍卫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政策却危及市场体制。虽然是保护主义运动的双翼引发了先天不稳定的市场体制的危机，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阶级倾向对市场体制妥协，而广大工人阶级却毫不犹豫公开挑战，打破市场体制规则。



[359] March on Rome。墨索里尼不满法西斯党在 1921 年国会选举中只取得两个议席，号召三万名支持者在 1922 年 10 月 28 日进入罗马，成功令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党的势力。

第十六章
市场和生产组织

即使资本主义商业本身也不得不寻求保护，免受市场机制毫无节制运作的伤害。这应会消除「人」和「大自然」这两个术语有时激发老于世故的人的怀疑，因为他们往往指责有关保护劳工和土地的言论是陈腔滥调，即使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掩饰之词。

实际上，就生产企业而言，这种危险是一如人和大自然的情况一样真实和客观。需要保护，是因为货币供应是由市场体制组织。现代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没有保护，市场会摧毁亲儿：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然而，最终正是由于这种保护形式最直接导致国际体制的崩溃。

虽然市场大动乱威胁着土地和劳工的危险是相当明显，货币制度对商业的各种威胁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为「有危险」。如利润是视乎价格，那么价格依赖的货币安排必然对受利润驱动的任何体制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从长远看，销售价格变动并不影响利润，因为成本会相应上落；但从短期看，销售价格的变动影响利润，因为改动合约的固定价格必然有时间滞后，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和许多由合约订立的其它价格。因此，如价格水平由于货币原因在相当长时间下降，企业可能陷入破产清盘以及随后生产组织分解和资本极大破坏的危机。麻烦的根源不在于低价格，而是价格下降。David Hume 始创货币数量理论[360]，发现如货币总量减半，企业仍然不受影响，因为价格也会减半。他忘记了企业可能在这过程已解体。

这就容易理解诸如市场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时形成的商品货币与工业生产不匹配的原因。**商品货币**[361]只是商品，凑巧起了货币的作用，因此原则上除了减少不发挥货币作用的商品总量外，商品货币的总量不可能增加。实际上，商品货币通常是黄金或白银，其总量短期内可能增加，但不会太多。生产和贸易扩大，但货币数量没有增加，必然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这正是本书提到的破坏性通货紧缩。十七世纪的商人经常郑重埋怨货币短缺。早期已发展出**符号货币**[362]，保护贸易免受强迫性通货紧缩的影响；当贸易量增加，使用铸币就有通货紧缩。没有这种人造货币，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

[360]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361] commodity money。商品货币是法定货币（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以外的另一种货币类型，在政府的保证之外货币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基本价值，例如家畜、珍珠等。

[362] token money。符号货币的自身价值与其代表的价值差距甚大，自身价值甚至是为零，例如世界各国各地区发行没有黄金保证的货币都是符号货币。

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因为要稳定外汇交易和随后引入金本位制，真正的困难出现。稳定外汇交易是英格兰经济的基础；伦敦成为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只有商品货币能够满足这目的，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符号货币（不管是银行货币还是法定货币）不能在国外流通。因此，**金本位制**[363]走上历史舞台；这是大家公认的国际商品货币体制的名字。

就我们所知，如不算及国内使用，铸币是有缺陷的货币，因为铸币是商品，总量不能随意增加。黄金总量每年可能会增加几个百分点，但随着交易突然增加，黄金总量不可能在几星期内增加十多个百分点。缺少符号货币，商业不得不缩减或以非常低价格成交，从而导致不景气和失业。

用最简单形式表达问题：商品货币对国外贸易至关重要；符号货币对国内贸易至关重要。两者之间有多大配合？

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外贸和金本位制比国内贸易需求是无可争议更为重要。金本位制的运作要求当兑换率受到贬值威胁时要降低国内价格。因为信贷收紧导致通货紧缩，这即是商品货币的运作干预信贷体制的运作。这对商业而言是持续的危险。但完全丢弃符号货币，把货币限制为商品货币根本上是不可能，因为这疗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

中央银行大大纾缓信贷货币的缺陷。通过集中国家的贷款供给，可以避免与通货紧缩相关商业和就业的全面混乱，可以有效控制通货紧缩从而吸收冲击以及在全国范围分散负担。正常运作的〔中央〕银行纾缓提取黄金对钞票流通以及钞票减少流通对商业的实时影响。

银行可能采取不同方法。短期贷款可以弥补黄金短期损失的缺口，避免全面限制贷款。但即使限制贷款是不可避免（情况往往是这样），银行的行动起了缓冲作用：提高银行利率和开放市场运作把限制的影响分散到整个社会，把限制的负担转移到最强壮的肩膀。

设想一个重要案例：单方面从一国转账到另一国，情况可能是食品需求从国内品种改变为国外品种。原来可用于国内支付的黄金现在要运往国外支付进口食品，因此黄金缺货一定导致国内销售下降，随之而来是价格下降。本书称之为「交易型[364]」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是追随着偶发的生意交易在企业之间扩散，最终影响出口企业，因而实现代表「真正」转账的外贸顺差。但这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将会远远大于实现这样外贸顺差的必要，因为总是有企业没有出口生意，要有稍

[363] gold standard
[364] transactional

微减少成本的些许诱导使这些企业「小休后重投战场」；最经济的减少方法是把通货紧缩薄薄分散到整个商业社会。

这正正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之一。央行的贴现和开放市场政策的广泛压力迫使国内价格或多或少均匀下降，让「可以出口」的企业恢复或增加出口，只有最没有效率的企业不得不破产。因此，「真正」转账的代价是较少混乱；如通过狭窄的「交易型通货紧缩」传播随意又往往具灾难性的冲击以达致同样的外贸顺差，代价大得多。

虽然有这些减少通货紧缩影响的方法，但结果仍然是企业一次又一次全面混乱，随后是大量失业；这是对金本位制最有力的指控。

货币的例子与劳动和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一项成为**虚拟商品**后，实际上是有效纳入了市场体制，也同时成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生产企业受到货币的威胁，因为使用商品货币引致价格水平的任何下降危及企业的生存，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结果是市场的自我指导机制停摆。

中央银行把金本位制的自动作用贬低为虚伪借口，这意味着由中央管理货币；操纵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即使这手段不总是故意和有意识。越来越多人理解到如国际金本位制能够自发调节，各国先要放弃中央银行。Mises 是纯金本位制的一贯支持者，实际上鼓吹这孤注一掷的措施；如他的建议落实，国家经济会变成废墟。

货币理论的大多数混淆观点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是市场社会的显著特点。百多年来，货币被认为纯粹是经济范畴，是用于间接交易的商品。如人们偏爱以黄金为商品，就有了金本位制。（把金本位制与「国际」属性联系起来是毫无意义，因为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并不存在；交易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个体之间进行，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一如他们的发色一样不关宏旨。）Ricardo 向十九世纪英格兰灌输这样的信念：「货币」这术语的意思是交易媒介，钞票只是为了方便，其效用在于比黄金更方便使用，其价值来自确信拥有钞票即是任何时候可以拥有商品本身（黄金）。因此货币的国家特点是不重要，因为各国货币只是代表着同一商品的不同符号。如政府想拥有黄金的想法是不明智（因为一如其他商品，这商品在世界市场会自发调节其分布），以为不同国家的符号货币与有关国家的福祉和繁荣有任何关连是更不明智。

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制度性分离从来没有彻底完成，在有关货币方面这正正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铸币厂似乎只是证明铸币的重量，但国家实际上是符号货币价值的保证人，也接受符号货币支付税款和其它。这种货币不是交易媒介，而是支付

媒介；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效用，而是包含可购买物品的赔偿支付的量化计算单位。显而易见，分配取决于拥有这种购买力符号的社会，其结构是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

当然，本文不是研究实例，而是以概念模式来解释。市场经济不可能与政治领域分离；然而 Ricardo 以来的经典经济学正是以这结构为基础，而且概念和假设都是难以理解。按照这「设计」，社会是由以物易物的个人组成，各自拥有商品的装备（货品、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组合）。货币只是以物易物较常用到的一种商品，因此是为了交易目的才取得。这样的「社会」可能是不真实的；然而这包含了古典经济学家启始结构的基本架构。

购买力经济体系提出更不完整的实况[365]，但有一些特点比市场经济范式更贴近我们的实际社会。想象「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具体数量的购买力，可以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在这经济体系中，货币不是商品，本身没有任何用途，唯一用途是购买贴有价格卷标的货物；这非常类似我们现在的商店货物。

商品货币定律要比十九世纪的敌对理论优胜，其制度符合市场模式的许多基本要素；二十世纪初以来，购买力概念逐渐得势。随着金本位制解体，商品货币基本消失，货币的购买力概念很自然取而代之。

从机制和概念发展为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认识到统治阶级本身是支持通过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当然，这样的管理没有被认为是干预金本位制度；相反，这是金本位制应发挥作用的部份游戏规则。因为维系金本位制是不言自明，绝不容许中央银行运作令国家脱离黄金；相反的是央行最高指示是在任何情况下保留金本位制，这似乎没有涉及任何原则，但只适用于以下情况：价格水平波动最多只是**黄金输送点**[366]上下的琐细 2-3%。保持汇率稳定要看国内价格水平，如国内价格水平波幅非常大，例如急升至 10%或 30%，形势完全不同。价格水平以这幅度下调会散播苦难和破坏。货币管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措施是政策问题，政治体系要作出决定。中央银行的制度性重要意义见诸货币政策被扯入政治领域，后果非常深远。

后果有两方面。在国内范畴，货币政策只是干预主义的另一形式，而各经济阶级的冲突往往聚焦于这与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有紧密联系的问题。下文会提到1930 年代的国内冲突往往集中在这问题，影响日益增长的反民主运动。

[365] 原注 1：F. Schafer, Wellington, New Zealand 有论述基本理论。

[366] 黄金输送点(gold point)是指汇价波动而引起黄金从一国输出或输入的界限。汇率波动的最高界限是铸币平价（含金量）加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出点（gold export point）；最低界限是铸币平价减运金费用，即黄金输入点（gold import point）。

在国外方面，国家货币有重要作用，虽然当时知之不详。十九世纪的统治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上」，所有受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者，而在一些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义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确是如此。这观点的源头当然是经济方面；以物易物和贸易领域萌生了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人的自私欲望验证慷慨的冲动，这是最大的悖论。但自 1870 年代以来已留意到情感有变化，但主导思想没有相对的中断。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赖，但行事却是凭着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冲动。自由民族主义正发展为国家自由主义[367]，对国外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国内倾向垄断式保护主义。在货币范畴内矛盾最为尖锐而且也是最少为人知。人们依然无限忠诚武断地相信国际金本位制，而与此同时以各中央银行制度的主权为基础建立了各种符号货币。在国际原则的庇护下，新国家主义以中央发钞银行的形式无意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说实在的，新国家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国际金本位制本来是服务各国，所以不能由各国承担，除非各国得到保证，确保不会因为遵守国际金本位制而受到威胁的危险。完全货币化的社会不能承受因为要稳定汇率导致价格水平突然改变的破坏性效应，除非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可以舒缓这些冲击。国家符号货币是这相对安全措施的可靠保护，因为这容许中央银行在内部和外部经济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如**国际收支平衡**[368]受到**流动性不足**[369]的威胁，储备和外国贷款可暂时克服困难；如需建立与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有关的全新经济平衡，信贷限制可以利用最合理方式分散负担：清除无效率企业，由有效率企业承担。没有这样的机制，任何发达国家如保留金本位制都不能避免对国家福祉（无论是生产、收入或就业）的破坏性影响。

如商贸阶级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银行家就是这阶级的天生领导者。就业和利润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性，但这又取决于稳定汇率和健全的信贷环境，两者都由银行家主事，银行家的信念是二者不可分离。健全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贷环境是稳定汇率的先决条件；国内信贷安全，国家财政平衡，汇率才会稳定。简而言之，银行家的双生信托任务是内部有健全金融，外部有稳定货币。所以如两者失效，银行家阶级往往是后知后觉。1920 年代国际银行家有主导影响力，30 年代影响力消减，这都不应是出人意表。在 1920 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认为是回到稳定和繁荣的先决条件，因此只要专业监护人（银行家）承诺确保汇率稳定，他提出的要求都不会被认为麻烦；1929 年之后，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当时急切要求国

[367] 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 也称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政治哲学家相信不排外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宽容，平等，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兼容。国家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是自由主义的流派，结合民族主义和一些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有关教育，政教关系以及现代化，高效率，官僚化的管理。

[368] balance of payment，国家的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额。

[369] illiquidity，商品难以转为现金，或有关公司欠缺现金。

内货币稳定，而银行家是最没有资格满足这要求。

市场经济崩溃，货币崩溃最为突然。农业税干扰了国外农产品进口，破坏了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萎缩和受管制，谈判被限制在法律容许各方自决的范围。但劳动力或土地的市场机制没有货币领域那样全面和突然转变。其它市场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 1931 年 9 月 21 日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甚至也比不上 1933 年 6 月美国随后的同样行动。美国经济大萧条始于 1929 年，当时已冲走了大部份世界贸易，但这没有影响方法，也没有影响主导思想。但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就是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起始于百年前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受到保护主义的抵制，后者正攻打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一套新的管治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魅力领导和主张独裁的孤立主义各种势力出乎意料突然出现，把社会铸成新的形式，令大多数当代人感到吃惊。



第十七章
自发调节被削弱

在 1879-1929 年这半个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成为组织严密的单位，内部潜藏着极具破坏力的紧张关系。这发展的较为直接源头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由于社会要顺从市场机制的需求，所以这机制运行的各种缺陷对社会本体产生了累积性紧张关系。

自发调节功能受到削弱，是保护主义的效应。当然，有认为市场总是自发调节，因为市场往往产生**市场出清**[370]的价格；然而这适用于所有市场，无论市场是否自由。但上文已指出，自发调节市场机制有非常不同的含义：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市场。由于这些市场运作具有破坏社会的潜在危险，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阻碍了这些市场的建立，或即使市场建立后也会干扰其自由运作。

经济自由主义者引用美国作为市场经济有能力发挥作用的例证。百年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可以在美国完全自由地交易，似乎不需要社会保护措施；除了关税，政府没有干预工业生活。

解释当然是简单：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是自由的。一直到 1890 年代，边疆开放，无主权土地取之不竭；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低水平劳动力供应自由流动[371]；一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保持汇率稳定的承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继续有自由供应；因此不存在有自发调节的市场体制。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人、大自然和商业组织都不需要政府干预才能提供的保护。

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社会保护介入。由于无穷无尽的移民不能再自由填补下层劳工，高层劳工不能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有，必须节约；由于为了把货币从政治中分离和把国内贸易和世界贸易联系而引入金本位制；美国赶上了欧洲一个世纪的发展：保护土地和耕种者、通过工会主义和立法为劳工提供社会保障，以及中央银行；以上都以最大规模逐一出现。货币保护主义首先现身：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372]，目的在协调金本位制的和地区需求；随后是劳工和土地的保护主义。1920 年代的繁荣足以导致严峻的经济萧条，要由「**新政**[373]」为劳工和土地建立起护城河，其范围要比欧洲更广泛。因此，美国为

---

[370] market clear 是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即价格波动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量和厂商的生产量，并使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

[371] 原注 1：Penrose, E. F., *op. cit.* 马尔萨斯定律只在土地供应受限的假设才成立。

[372]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73]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是指 1933 年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核心是三个 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和复兴(Recovery)，因此也称为三 R 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

本书的理论提供了鲜明的正反证据；本书认为社会保护是所谓自发调节市场的附属物。

同时，保护主义四处产出社会生活新单位的外壳。新的实体以民族国家形式铸造，但与以前的逍遥自在民族国家只有少许相似。新的甲壳类民族国家以国家符号货币表达身份，这类型主权国家是前所未见的处处提防和绝对专横。符号货币受到国家保护，也受外间世界关注，因为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建基于这些货币。如金钱已公然支配世界，这种金钱是打上了国家的印记。

自由主义者不可能理解对民族国家和货币的重视，因为他们习惯性忽略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征。如民族国家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不合时宜，国家货币更不值得关注。自由主义时代的任何自重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怀疑钞票只是不同政治界限对不同纸制品的不同称谓，并不是重要的事物。利用交易市场把一种货币面额兑换成另一种货币面额，只是简单操作；交易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很幸运交易市场是不受国家或政治家控制。西欧正经历新启蒙运动，其怪诞事物包括国家的「部落式[374]」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部落式」主权国家是狭隘思想初露苗头。一直到 1930 年代，经济入门手册陈述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因此是无关紧要。市场思想的盲点同样漠视了国家和货币现象。自由贸易者对这两方面是以**唯名论**[375]观点视之。

这联系非常重要，但当时为人忽略。时不时有人批评自由贸易学说和货币的传统学说，但几乎没有人理解两种学说是用不同术语陈述相同的事情，如其中一种学说是错误，另一学说也是错误。Cunningham[376]或 Wagner[377]揭露了国际自由贸易的谬论，但没有与货币联系；另一方面，Macleod[378]或 Gesell[379]攻击经典货币理论，但又遵守时尚的贸易制度。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作家完全忽略了货币在建立国家作为当代决定性经济和政治单位时的建构重要性，一如十八世纪的前人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存在。从 Ricardo 到 Wieser，从 John Stuart Mill 到 Marshall 和 Wicksell

---

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

[374] tribalistic

[375] 唯名论（Nominalism），中古欧洲的哲学学说，认为现实事物没有普遍本质，只有实质的个体是存在的。与此相对的是「实在论，Realism」。

[376] William Cunningham (1849 – 1919) ，英国经济学家和著名经济史学者，鼓吹经济学要用上史学方法，反对自由贸易。

[377] Adolph Wagner（1835- 1917），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先驱，他主张保护主义的论点是这样：任何有剩余食物和原料的国家都渴望发展国内生产和禁止外国制造商进入；世界各国正踏上自给自足之路，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国家注定要饿死。

[378] Henry Dunning Macleod (1821 – 1902)苏格兰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信贷理论，从货币理论创建信贷理论，而不是通常的反向路径。他认为货币和信贷本质上是相同；货币是一般形式的信贷的最高形式。

[379] Silvio Gesell (1862-1930), 成功的德国商人，后研读经济学，对货币和利息理论有卓见。凯因斯惋惜他是沧海遗珠。

这些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支持这立场，而一般受教育的人被教导全神贯注国家或货币的经济问题是次等人的烙印标记。把这些谬论合并为荒诞的命题：即国家货币在文明的社会的制度机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会被认为是空洞的悖论，毫无意义。

实际上，新的国家单位和新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分离的。正是货币为国家和国际体制提供结构力度，并引入一些导致突然崩断的特点。信贷所建基的货币制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保护主义是三方面的驱动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各自发挥作用，但土地和劳动力是与有限（虽然广泛）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农民）联系，货币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因素，往往把不同利益合并为整体。即使货币政策也可以分开和合并，但客观上货币制度是组合国家的最强大经济力量。

劳动力和土地分别主要导致社会立法和谷物税。农民反对让劳工受益和增加工资所带来的负担，而劳工反对食品价格的任何上涨。但一旦落实谷物法和工匠法（自 1880 年代以来的德国），很难废一法而不废除另一法。农业税和工业税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自卑斯麦在 1879 年把全面保护主义的思想变得普及，地主和实业家政治组成联盟以争取对大家有好处的关税保护措施；这是德国政治的特征；从关税中得到个人好处，一如建立垄断联盟占便宜一样普遍。

国内和国外的社会和国家保护主义往往会融合。[380] 由谷物税引起的生活成本上涨导致生产商要求保护性关税，而且利用作为垄断政策的补充。工会自然坚持要求高工资以补偿生活成本上涨，因此不能反对这些关税，因为雇主要靠此应付工资上涨。但一旦社会立法的计算方法是基于受限于关税的工资水平，要求雇主承担这种立法的负担是不公道，除非雇主确信将来会继续受到保护。顺提一下，指责集体主义阴谋论要为保护主义运动负责，这说法的事实依据不是很充份，只是把结果误解为成因。保护主义运动的起因是自发性而且扩散范围广泛，但运动一旦开始就必然会建立致力维持保护主义运动的并行利益团体。

比利益集团口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的综合结果所建立的实际环境是均匀地扩散。如不同国家有不同生活（实情总是如此），这种差异现在可以追溯到有保护目的的具体立法和行政法规，因为生产和劳工的环境现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税收和各项社会法律。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领土限制移民之前，虽然英国失业严重，英国移民出国的数目已减少，显然是因为祖国的社会环境已大大改善。

但如关税和社会法律营造了人为气候，货币政策营造名副其实的人为天气，天天

[380] 原注 2：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40.

不同并且影响社会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保护主义的整合力量，因为后者缓慢笨重，而货币保护是永不停止和风起云涌。商人、工会工人和家庭主妇左思右量，农夫计划耕种、父母为子女打算、筹备婚礼的恋人等等在考虑当时取舍时，与其它任何单一因素相比，他们全都直接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稳定时情况确是如此，货币不稳定时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必须做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大决策。政治方面，国家身份是由政府建立；经济方面是授权中央银行。

国际方面，如可能的话，货币制度更为重要。非常荒谬的是货币自由是对贸易限制的结果。由于商品和人员过境流通的障碍越来越多，所以必须更有效保护自由支付。短期货币一瞬间在全球点对点传递；政府之间、私企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国际支付方法有划一监管；即使落后政府拒付外债或企图窜改预算保证，会被认为是暴行，没有信用的〔国家〕被扫到黑暗角落。就世界货币制度的各种问题，各地建立了类似制度，例如代表团，成文宪法定义了国家司法管辖以及管理发布预算，颁布法律，批准条约，承担财务责任的方法，公共会计法规，外国人权利，法庭司法权，汇票本籍，因此也暗喻发钞银行、国外债券持有人以及形形色色债权人的地位。这涉及划一使用银行纸币和铸币，邮政法规，证券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要一致。或许除了最强大国，没有政府能够承担忽视货币禁忌的后果。从国际角度看，货币就是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时段脱离国际体系。

与人员和商品对比，货币不受任何措施阻碍，继续发展其全地域全天候的交易能力。实物流通变得越困难，传达实物的支付变得越容易。当商品和服务贸易放缓以及贸易平衡非常危险地来回摆动，在全球流窜的短期贷款帮助国际收支平衡几乎自动保持流动，也为与可见贸易几近没有关系的作业融资。对商品交易建立的障碍没有影响支付、债务和索赔；国际货币机制的快速增长的灵活性和普遍性，在某程度上正在补充一直在萎缩的世界贸易管道。到了 1930 年代早期，世界贸易量只是小溪流水，国际短期贷款取得前所未闻的流动性。只要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和短期贷款发挥作用，实际贸易的不平衡不会超出会计记账的能力。有了信贷流通的帮助，得以避免社会混乱；金融手段纠正了经济不平衡。

作为最后手段，市场自发调节被削弱导致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未能周转和恢复就业，当进口不能产生出口，当银行储备监管法令威胁商界陷入恐慌，当国外债务人拒绝还款，政府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在紧急情况下，社会整体通过干预措施表达本身。

促使国家采取多大程度的干预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和经济困难的程度。只要投票〔权〕受到限制和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影响力，干预主义的紧急程度不及有普选权的国家；有了普选权，国家成为百万人民的工具——这百万人民在经济领域中

往往要承担被统治者的痛苦。只要就业充分，收入有保障，生产持续，生活标准可信赖，价格稳定，干预的压力自然是少于当持续低潮使工业成为闲置工具和徒劳努力的废墟。

国际方面，以政治方法补充市场自发调节的不完善功能。Ricardo 的贸易和货币理论可惜忽视了由于各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出口设施、贸易、运输和银行经验之不同，各国地位有差异。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英国只是贸易宇宙中的小小原子；准确地说，英国的地位与丹麦和危地马拉属同一水平。实际上，世上的国家为数不多，分类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和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国家，进口和外国贷款依赖多种出口商品国家和单一出口商品（小麦或咖啡）的国家。理论可以忽视这些差异，但实际上不能同样忽视这些差异的后果。海外国家往往没有能力清偿外债，或货币贬值危及偿付能力；有时这些国家决定以政治手段恢复平衡和干预外国投资者的财产。经济自我恢复的过程不能依赖任何这些情况，虽然经典学说指出这过程必然能够偿还债务、恢复货币和保护外国人免受重复的类似损失。但这要求有关各国多多少少是世界劳动分工体制的平等参与者，但必须强调情况并非如此。预期货币暴跌的国家会自动增加出口从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或对国外资金的需求会迫使该国赔偿外国人和重新还债，以上都是空想。例如，咖啡或硝酸钾的销售增加，可能使整个市场混乱不堪，而拒付高利率的外债似乎比国家货币贬值更可取。世界市场机制不能承担这样的冒险。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派遣炮舰；拖欠债务的政府，不管是否欺诈，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遭受炮轰，要么偿清债务。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有效强制支付，避免更大损失和保持体制运转。如殖民地土著不掌握贸易对双方有利的无懈可击理论，类似的方法会劝导殖民地人民理解贸易的好处。如当地碰巧有欧洲生产商需要的丰富原材料，而之前没有和谐关系确保土著会改变完全不同的口味追求欧洲产品，情况明显需要干预措施。当然，所有这些困难不会在所谓自发调节体制出现，但越是要有武装干预的的威胁才迫使对方支付，越是要依靠炮舰保持贸易路线畅通，贸易越是跟随国旗之后，而国舰是服务入侵国政府的需要；越加明显的是必须使用政治手段以维持世界经济平衡。



第十八章
破坏性的紧张关系

这些一致性基础制度安排衍生了 1879-1929 年那半个世纪各种事件模式的有趣相似性。

许多国家有无尽的各种人物和背景、思想和历史经历，各国的变迁各有本国特色和局部重点，但世界文明的更多部份却具有相同结构。这种密切关系超越了人们使用类似工具、享受类似娱乐，以类似奖品奖励成就的共同文化特性。类似性反而是关乎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具体事件的作用，关乎集体存在的有时限组成部份。分析这些典型的强大压力可以揭示在当时产生独一无二历史模式的机制。

这些强大压力可以按照主要的制度范畴分类[381]。国内经济方面，「失业」这典型的苦难根源是失衡的最多变征兆：如减产、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减少。国内政治方面，压力来自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和僵持，本书归纳为「各阶级的紧张关系」。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环绕着国际收支平衡的各种困难，包括出口减少、不利的贸易条款、缺乏进口原材料以及外国投资减少；本书把这些特点形式的压力定名为「汇率压力」。最后，国际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分类为「帝国主义敌对」。

设想一个国家处于商业萧条又遭受失业打击；很容易看得出银行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可能决定的措施是受限于稳定汇率的紧急情况。除非求助中央银行，银行不能向产业界扩大或延续信贷，而中央银行由于货币安全，需要相反方向的政策，不会满足银行的需求。另一方面，如压力从产业界蔓延到国家，任何救济政策或公共工程的范围受到要求预算平衡的制约，预算平衡是稳定汇率的前题；而工会也许促使相关政党在国会提出问题。因此，金本位制会一如发钞银行一样制约财政部的行动，而立法机构要面对产业界面对的相同制约。

当然，国家范围内的失业压力可能由产业界或政府部门承担。如在特定情况下，工资的通货紧缩压力克服了危机，即是主要由经济领域负担压力。但如借助税款资助公共工程从而避免这痛苦措施，紧张压力的主要负担将落在政治领域（如政府措施漠视已有权利而强令工会削减工资，情况也是一样）。在工资承受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压力依然保留在市场领域内，以价格变化传达收入变化；在公共工程或限制工会的情况，法律地位或税收有变化，主要影响相关集团的政治地位。

此外，失业的压力也许会蔓延至国界之外，影响外汇；无论是以政治或经济措施应付失业问题，这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下（本书假定一直有执行金本

[381] unemployment, tension of classes, pressure on exchanges and imperialist rivalries.

位制），任何导致预算赤字的政府措施都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另一方面，如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解决失业问题，国内价格会上升，打击出口，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无论是哪种情况，汇率会暴跌，国家感受到货币压力。

或许失业的压力会引发与外国的紧张关系，可能损及弱国的国际地位：地位转弱，权利被忽视，受外国强加控制，国家欲求被挫败。强国的压力可能转变为争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帝国主义敌对的其他形式。

源于市场的压力就是这样在市场和其他主要制度范畴之间来回移动；视乎情况，这有时影响政府运作，有时影响金本位制或势力均衡体系的运作。各领域相对地独立于其他领域，倾向追求自身的平衡；如不能达致均衡，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正是这种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压力积聚和产生紧张状态，最终以多多少少的刻板形式爆发。十九世纪在想象中建造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而实际上是在把事情交给一定数目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的机制正是当时的统治势力。

1933 年，一位经济学家在修辞上指责「**绝大多数政府**」的保护主义，可能是最接近现实现的说法。他质疑如政策被所有专家一致谴责为完全错误、非常不合理以及违背所有经济理论，这样的政策会否正确？他的答案是绝对的「不」[382]。不过大量文献没有什么可以说明对这些明显事实解释的本质；唯一的答案是各国政府、政治家和政客不停滥用职权，他们的无知、野心、贪婪以及目光短浅的偏见恐怕要为「绝大多数」国家一贯追随的保护主义政策负责。就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有充分理由的论点。自中世纪学院派蔑视科学的实践事实以来，从来没有以这样可怕的方式表达偏见。唯一的理性反应是以帝国主义狂热的神话来补充保护主义阴谋论的神话。

自由主义论点表达清晰时，声言在 1880 年代早期帝国主义热情开始在西方国家蠢蠢欲动，而且情绪化利用种族歧视破坏了经济思想家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情绪化政策逐渐积聚力量，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启蒙运动的力量有另一次机会恢复理智的统治，但是帝国主义意想不到的爆发，打翻了前进的马车，特别是新兴小国以及其后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无产」国家。狡滑动物（政客）击败了日内瓦（国联）、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这些人类的大脑中心。

通俗的政治神学把帝国主义视为没有慈悲的人类本性的象征，认为国家和帝国天性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吞灭邻国而毫无道德内疚。论点后半部很正确，前半部份不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帝国主义出现，扩张不是服侍理性或道德的理由，这是与国家和帝国从来是扩张主义者的事实相反。地域性协会不是必然急于扩充边界；城市、国家或是帝国都没有这样的冲动。反对意见只是把某些典型情况错认

[382] 原注 1：Haberler. G.,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1933, p. vi.

为普遍原则。实际上，与流行的成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有颇长时期的**紧缩主义**[383]，只是到了发展后期才转向帝国主义。

亚当•斯密首先反对帝国主义，他不仅预见美国独立战争，还预见下世纪的「小英格兰运动[384]」。期间中断是因为经济原因：市场从「七年战争[385]」迅速扩大，使帝国变得过时。欧洲各国接连在海外「发现」新地方，但海运缓慢、遂偏向在海外成立种植园；快速通讯使殖民地成为昂贵的奢侈品。不利于种植园的另一因素是出口远比进口重要；买方市场的理想被卖方市场取代，为求达到目的，卖方比竞争对手更低价出售，最后甚至比殖民者更低价。一旦英国丧失了大西洋的沿海殖民地，加拿大在 1837 年也脱离大英帝国；Disraeli 甚至鼓吹放弃西非领地；奥兰治自由邦[386]提出要加入大英帝国，但没有成功；如今被视为世界战略枢纽的一些太平洋岛屿始终被拒诸大英帝国门外。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激切的保守党人都普遍深信殖民地是消耗性资产，注定要成为政治和财政负债。在 1780 至 1880 的百年中，谈论殖民地的人都被认为是旧制度拥护者。中产阶级谴责战争和征服是王朝的诡计，迎合和平主义（Quesnay 是为自由放任主义争取和平桂冠的第一人）。法国和德国紧随英国之后；前者稍微放慢其扩张的速度，而法国的帝国主义是更专注欧洲大陆而非殖民地。卑斯麦不屑为巴尔干半岛付出一条人命的代价，而且全力支持反殖民宣传。当资本主义企业渗进整个大陆，当东印度公司在急切的英格兰棉纺业出口商坚持下被解散，当藉藉无名的布匹商取代了驻印度的英国总督和行政官时，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态度：各国政府故意避开。Canning 嘲笑代表赌徒投资者和海外投机者进行干预的想法。政经分离正扩散到国际事务。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很不情愿要清楚划分她的私人收益和私掠船的收益，而 Gladstone 首相[387]斥责认为英国外交政策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说法是诽谤。政权和通商利益融合，不是十九世纪的观念；恰恰相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政治家声言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是国际行为准则。只有在一些狭窄定义的情况，外交代表才会代表国民的私人利益而积极活动，但又公开否认这些偷偷摸摸的活动；如一旦被证实，相关人员会受到相应谴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维护国家不干预私营商业事务的原则。国内政府不应干预私营贸易，驻外机构要遵守国家方针，也应同样处理私营利益。投资绝大部份投放在国内农业；人们仍然认为对外投资是冒险，投资者常常血本无归，更被视为可耻高利贷条款的应有

[383] contractionism。
[384] 十九世纪中叶，英格兰自由贸易运动出现「小英格兰主义 Little England movement」思想，主要内容是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批评英帝国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小英格兰主义者要求反思殖民地的作用，但本质上并不否定英帝国，而是从英国实际利益出发，主张建立政治文化帝国。这种思想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录自王本涛简介)
[385]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63 年间，欧洲主要国家组成两大交战集团（一方是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德国），另一方是奥地利和俄国），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开战，争夺殖民地和领土。
[386] Orange State，美国佛罗里达洲的别号「柑橘之乡」。
[387]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 1868-94 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

报应。

改变突然而来，而且在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同时发生。先有英格兰的国内发展，德国只滞后半世纪，世界的外部事件必然同样地影响所有贸易国家。这事件就是指国际贸易节奏加快和数量增加，以及土地完全流通，意思是以极小成本大规模把谷物和农业原材料在全球流通。这场经济地震扰乱了欧洲农村数千万人的生活。在几年内，自由贸易成了昔日黄花，而在全新情况下市场经济有进一步发展。

这些情况本身由「双重行动[388]」制定。国际贸易模式正加速铺开，但遇上旨在遏制市场多方面行动的保护主义制度阻扰。农业危机和 1873-86 年间的大萧条动摇了经济自行恢复的信心。之后，市场经济的典型制度通常只有在保护主义措施伴随下才有可能推行，因为自 1870 年代后期和 1880 年代初期以来，各国正组建成为有组织单位，容易因为任何外贸或外汇交易需求导致各种混乱的痛苦影响。金本位制是市场经济扩大的最重要载体，因此也通常伴随着同时推行的典型保护主义政策，例如社会立法和关税。

集体主义合谋论的传统自由主义形式在这一点也与事实不符。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体系不是被自私的贩商和仁慈的社会法律任意破坏；相反的是金本位制的到来加速了这些保护主义制度的扩散；制度越受欢迎，固定不变的汇率就越难以承受。从这时开始，关税、工厂法和积极的殖民政策都是稳定**外在通货**[389]的先决条件（英国是例外，因为该国有巨大工业优势，正好证明这规则）。只有具备这些先决条件才可以安全引进市场经济的方法。如在缺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这些方法强行加诸无助的民众（例如在外国和半殖民地区），难以言喻的灾难接踵而来。

于此是帝国主义表面矛盾的关键：各国拒绝在没有任何限制以下彼此一起贸易，这在经济上难以解释而且不理性；各国反而要争取海外和外国市场。各国如此行事，原因只是一如无能为力、无法避开的民众的一样害怕；差别只是可怜殖民地的热带地区人民陷入无边痛苦和退步，濒临灭绝，而西方国家受到程度较少危险的影响，但仍然足以不惜代价回避和拒绝。以殖民地为例，威胁的本质并非经济，但结果是一样；除了偏见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以各项经济量度[390]计算社会混乱。实际上，面对失业的灾难、行业和职业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与心理折磨，预期社会漠不关心和孰视无睹，以为这只不过是长期而言可以忽略的经济效应，这种认识其实极之荒谬。

国家既是被动的承受压力，但又主动施加压力。如一些外部事件重压于国家，其

[388] double movement
[389] external currency，在发钞国境外的该国货币。
[390] economic magnitudes

内部机制以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将经济领域的压力转移到政治领域，反之亦然。战后时期曾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对一些中欧国家来说，战败建立了高度人为环境，包括赔偿形式的强大外部压力。在十多年间，主导德国国内情况的是外部重担在工业和国家之间转移：一方面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转移，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转移。全国都要承担赔偿，国内形势根据国家（即政府和企业结合）处理赔偿的方式而改变。国家团结于是紧扣金本位制，因此维持该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最重要的责任。Dawes 计划[391]是为了保护德国货币特意设计。Young 计划确定相同的条件。如不是因为有责任维持德国马克对外价值不受损害，不可能理解这时期德国国内事务的走势。因为对货币有共同责任，企业和各政党建立不可动摇的框架，工业和国家在这框架内适应这压力。战败德国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后果，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愿承受：即是在固定汇率的压力下，人为地整合国家，自豪地默默背上十字架，唯一的解释是顺从市场的必然规律。

可能有人反对以上的概要是过度简化。市场经济不是在一天之内起动，三个市场不像三头马车在竞跑，保护主义也不是对所有市场都有相同影响等等。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只是这遗漏了争论的要点。

诚然，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从颇为发达市场中创造了新机制，统一了已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市场，把各自的功能协调成为单一整体。而且，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在那时进展顺利，金钱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也如此。在整个过程中，现在与过去联系一起，而且没有断点。

然而，因为制度的本质，其变化是突然而来的。关键阶段是英格兰建立劳工市场，如这市场的工人不遵守雇佣劳动的规则，他们就要面对挨饿的威胁。一旦采取了这种激烈的措施，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就乘时而起，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猛烈，以致在舆论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有力的保护性反应几乎实时发动。

此外，虽然产业各种元素的市场各有不同本质和起源，但发展状况是平衡前进，不可能有其他情况。保护人类、大自然和生产性组织等同干预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交易媒介）等市场，因此事实上是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既然干预的目的是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环境，给予一些地位安全感，那么干预必然要减少工资弹性和劳工流动性、使收入稳定、生产持续、推动国家资源由公共控制以及管理货币，以避免价格水平有令人不安的变化。

[391]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军要求德国按照条约赔偿 66 亿英镑，令德国经济严重衰退。1923 年，由于德国未能及时赔偿，法国与比利时军队占领德国盛产煤和钢铁的西部工业重镇。这不但令德国人民震怒，而且增加其经济负担。为了解决困局，盟军赔款委员会任命美国人 Charles G. Dawes 主持会议，寻求各方同意的方案，但后来德国还是没有能力还款。盟军赔款委员又任命美国 Owen D. Young 筹划新方案，在 1930 年 1 月施行。

1873-86 年期间的经济萧条和 1870 年代的农业困境永久地增加这种压力。在经济萧条开始时，欧洲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全盛期。新德意志帝国强迫法国接受两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后者承诺免除生铁关税和推行金本位制。萧条期结束，德国已树立各种保护性关税，建立全面的垄断组织，设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正在实行高压殖民政策。普鲁士主义曾是自由贸易的先驱，显然对转向保护主义的少许责任不是多于引入「集体主义」的责任。美国的关税比德国更高，而且有自己方式的「集体主义」，大力津贴远程铁路建设和发展庞大的垄断集团。

不论其民族精神和历史，所有西方国家都遵循相同趋势。[392] 有了国际金本位制，最具挑战性的市场方案付诸实施，意味着市场完全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世界贸易如今意味着在自发调节市场下，全球的生活组织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构成，又有金本位制作为这庞大自动系统的监护人。在这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表演中，各国和各民族只是傀儡而已，借助中央银行和关税以及移民法的帮助，保护自身免遭失业和动荡的伤害。这些措施旨在抵消自由贸易和稳定货币的破坏性作用，为求达到目的就要干预那些机制的运作。虽然每项限制措施有其受益者，其超额利润或超额工资是向其他所有公民征税，但通常只是税额不合理，而不是保护措施本身。从长远看，价格曾全面下降，人人受益。

无论保护是否合理，干预的作用暴露了世界市场体系的虚弱。一国的进口关税妨碍另一国出口，迫使后者在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寻找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是强国之间为了争夺把贸易扩大到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的特权。由于狂热生产导致抢夺原材料供应，这加大了出口压力。各国政府支持在落后国家做生意的国民，彼此为了贸易和国旗竞赛。各强国的志向是帝国主义和不经意为独霸天下做准备，但发现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严格保持国际金本位制的完整又是势在必行。这是磨擦的制度性根源。

国境之内也有类似的矛盾。保护主义帮助把竞争性市场改变成垄断性市场。市场越来越不能形容为有竞争性成份的自主与自动机制。越来越多个体被协会取代，劳动力和资本联合结成非竞争性集团。经济调整变得缓慢和困难。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受到严重阻碍。最后，未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经济萧条，未调整的设备阻碍了无利可图的投资离场，未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社会紧张。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或资本市场，这种压力会溢出经济领域，要由政治手段恢复平衡。无论如何，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制度上的分离是市场社会的构成，不管涉及什么紧张状态都要维持。这是破坏性压力的另一根源。

本文的叙述快近尾声，然而还未揭示部份论点。因为即使本书确确实实证明了巨变的核心是市场理想国的失败，本书依然有责任展示这成因是如何决定现实事

[392] 原注 2：G. D. H. Cole 认为 1870 年代是「整个十九世纪中社会立法最活跃的时期。」

件。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历史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塑造。虽然历史极为丰富和多样性，历史长河有其周而复始的各种情况和选择可以说明一个时代各类事件的脉络。如在某程度上可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主宰潮流和逆流的规律，大可不用理会不可预测的边缘乱流。

在十九世纪，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国家和国际活动要满足这些条件的需要。那机制产生了两项文明特性：严格的决定论[393]和经济特征。当代观点往往把这两项特性联系，认为决定论源自经济动机的本质；这动机认为人会追求金钱利益。实际上，两项特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许多细节上很突出的决定论只不过是有各种可预测方案的市场社会机制的产物，其严谨被错误归因于唯物论动机的力量。无论个人动机为何，经济动机本身对大多数人来说远不及所谓感情动机来得有效，供求价格体系仍会始终维持平衡。

人是被新机制掌控，不是新动机。简而言之，压力来自市场领域，再扩散到政治领域，从而构成整个社会。只要世界经济继续运作，一国之内的紧张状况依然隐而不露。一旦金本位制这个最后存在的制度消失，各国内部的压力最终会释放。各国对新情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但这些反应基本上是对传统世界经济体系消失作出的调整；当体系分解，市场文明本身也被吞没。这解释了难以置信的事实，即是文明正被无情制度的盲目行为破坏，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自动增加物质福祉。

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实际上是如何发生？如何转化为历史核心的政治事件？阶级力量的冲突决定性进入了市场经济垮台的最后阶段。



[393] Determinism，决定论是哲学命题，认为事件的发生，包括人类的认知、举止、决定和行动都是因为先前的事件因而发生。决定论相信宇宙完全由因果定律的结果支配，经过一段时间，有一连串事件从未中断地发生，任何一点只有一种可能的状态，不可能有自由意志。

第三部

巨变

第十九章
民选政府和市场经济

国际体系在 1920 年代瓦解，几乎被人遗忘的早期资本主义问题再次出现。首要问题是民选政府[394]。

法西斯主义攻击全民民主，只是重提在市场经济历史中常见的政治干预主义问题，因为这问题只不过政经分离的另一名称。

干预问题在劳动力方面首次变得尖锐，一方面是由于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干预主义对土地和资本问题的重要性不逊前者，即使各种冲突不是那么壮观。欧洲大陆同样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类似问题，但时间滞后，受各种冲突影响的环境在工业上较为现代化但社会却不再是那么一元化。相同类型的发展导致处处政经分离。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一样，起点是建立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国家民主化。

人们把史宾汉兰制度恰当地描述为预防性干预主义行动，阻止建立劳动力市场。工业化英格兰的首次战役是为史宾汉兰制度而战，但暂时失败了。在争斗中，古典经济学者创造了「干预主义」的口号，史宾汉兰制度被标签为对实际并不存在的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Townsend、Malthus 和 Ricardo 在济贫法条件的脆弱基础建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这是对陈腐秩序最令人可畏的毁灭性概念工具。然而这补贴制度保护了下一代人的农村界限，免受城市高工资的诱惑。到了 1820 年代中期，Huskisson 和 Peel[395]扩大对外贸易的途径，容许机器出口，解除羊毛出口禁令，废除海运限制，放松移民出境，正式废除有关学徒期和工资评估的〈工匠法〉和〈反企业联合法[396]〉。但令人沮丧的史宾汉兰制度仍然在各郡推行，阻碍劳工从事正当工作，使独立劳工成为不协调的观念。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

---

[394] popular government，中译没有统一，其他译本有：民治、庶民统治、民众政府、大众政府、全民政府。译者以为「民选政府」符合法律定义：「人民通过选举行政和立法机关而控制的政府」。（参见 Black's Law Dictionary）

[395] William Huskisson PC (1770-1830)，英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历任国会议员。他有一项另类世界记录：1830 年 9 月 15 日，他参加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的启用典礼，被火车撞至重伤致死，是为世界首例。Robert Peel (1788- 1850)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两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废除〈谷物法〉。

[396] Anti-Combination Laws

经来临，但被乡绅「法令」阻止，未能顺产。

议会改革派立即着手废除补贴制度。下议院通过达到这目标的〈新济贫法〉，被称为是最重要的社会立法。然而法案核心只是简单废除史宾汉兰制度。这最能决定性证明当其时完全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整个社会结构有结构上的重要性。紧张状态的经济根源大概如此。

政治方面，1832 年的议会改革完成了和平革命。1834 年的〈济贫法修正案〉改变了国家的社会阶层，以激进的新政策重新诠释英国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新济贫法〉废除被 Burke 猛烈抨击的「穷人」一般类别：「正直穷人」或「劳动穷人」。以前的「穷人」现分类为不能养活自己并且居住在济贫院的「赤贫民」和通过劳动挣工资谋生的「自给自足工人」。这创造了全新的穷人类别：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失业者」。为了人道，赤贫民应得到救济；为了产业，失业者不应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对本身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此无关紧要。重点不是如失业者认真找工作是否能够找到工作，而是除非他面临挨饿，别无选择只能呆在令人厌恶的济贫院，工资制度就会崩溃，从而把社会推入悲惨和混乱的境地。这即是理解到无辜者受到惩罚。这种变态的残酷一方面解放劳动者，而其自认的目的是利用饥饿使破坏的威胁发挥作用。古典经济学者著作直陈荒芜苍凉之郁闷情绪，使我们能够梳理这过程。为了对被困在劳动力市场范围内的超出编制人员安全地锁上大门，政府陷身于自我否定的法令，用 Harriet Martineau's 的说法：国家救济无辜受害者是「侵犯公民权利」。

当宪章运动要求被剥夺权利的入民进入国家的范围，政经分离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成为社会现有制度不容否定的条件。把〈新济贫法〉连同其精神折磨的科学方法交付这套疗法是为彼等设计的同一对象，这是精神错乱的行为。Macaulay 勋爵在上议院发表伟大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最雄辩的演说，要求以一切文明建基的财产制度之名无条件拒绝宪章运动的提请，他只是贯彻始终。Robert Peel 爵士称「宪章」侵犯「宪法」。劳动力市场越恶毒扭曲工人的生活，他们更执意叫嚣要求投票权。要求有民选政府，是张力的政治根源。

在这些情况下，宪制主义有了全新意义。迄今，宪法保护产权免受非法干预只是针对来自上层的武断行为。Locke 的远见没有超越土地财产和商业财产的界限，目的只是阻止王权的横暴行为，诸如亨利八世的世俗化措施[397]、查理一世掠夺皇家铸币厂[398]、或查理二世时期财政部「止付」[399]。1694 年，独立的英伦银行取

[397] 亨利八世在 1536 和 1541 之间以行政和法律程序解散英格兰（不包括当时不是英国部份的苏格兰）形形色色的修道院，收入拨归国有，出售其资产。
[398] 1638 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没收伦敦商人存放在皇家铸币厂价值二十万的金币和金条；后来归还物主，条件是商人要借出四万英镑。
[399] 英格兰皇室经常入不敷出，以国王名义发行债券，但信用不佳。1702 年，查理二世即下命财

得特许状，是达成 John Locke 促请政府与商业分离的典范。商业资本赢得反对王权的胜利。

百年之后，要受到保护的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对手不是王权而是平民。把十七世纪的意义套用在十九世纪的情况，只是错误的观念。孟德斯鸠在 1748 年发明的权力分立，现被用于分离人民与自身的经济生活。美国的领导层受到英格兰工业景况的预警，在农民与工匠的环境中塑造了美国宪法，把经济领域从宪法的管辖范围完全分离，从而把私有财产置于最可能设想的保护，创造了世上唯一有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虽然美国选民有普选权，但对物主是无能为力。[400]

「工人阶级不得有选举权」成为英格兰宪法[401]的不成文法。宪章运动领导人入狱；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受到代表极少数人的立法机构嘲弄，而要求选举权的卑微要求经常被当局视为刑事罪行。所谓英国制度特征的妥协精神，当时不见迹象，只是最近的发明。工人捱过了「饥饿的 1840 年代[402]」，温顺的一代人涌现和享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好处，上层技术工人壮大工会，与人数众多的贫穷劳工分道扬镳，工人默认〈新济贫法〉强加诸他们的制度；在这之后收入较好的阶层才容许他们参加国家议会。宪章运动是为了停止压榨人们血汗的市场工厂的权力而斗争，但是只有在可怕的调整之后，人们才获得这些权力。在英格兰内外，从 Macaulay 到 Mises，从 Spencer 到 Sumner[403]，好战的自由主义者全都表达全民民主威胁资本主义的信念。

劳工问题的经历重现在货币问题。1790 年代预示了 1920 年代的情况。Bentham 首先指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对产权的干预：前者对商业征税，后者扰乱商业。[404] 自此之后，劳工和货币，失业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同属一个范畴。Cobbett 谴责金本位制和〈新济贫法〉，而 Ricardo 支持两者；两人的论点非常相似：资本和劳工都是商品，政府无权干预。例如 Atwood[405]是反对推行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其立场与社会主义者 Owen 一样。百年之后， Mises 仍然重申劳工和资本和市场

政部停止支付债券，只偿还利息，许多商人因而破产。这是后来光荣革命的远因。

[400] 原注 1：Hadley, A. T., *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 1896.

[401] 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因此称为「不成文宪法」。所谓英国宪法是一套包含基本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

[402] Hungry Forties。1840 年代初期，英国经历经济萧条，穷人受苦。1839 年，严重贸易不景气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农业收成又不好。随后两年农业依然歉收，人口迅速增加，更糟的是〈谷物法〉似乎人为提高面包价格，人民的生活更苦。马铃薯晚疫病在 1845 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其后蔓延到爱尔兰，破坏大部分作物。马铃薯晚疫病在 1846 年重回，导致爱尔兰饥荒。

[403] Charles Samner (1811-74)，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争取人类平等的政治家，废奴运动的战士。

[404] 原注 2：Bentham, J.,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4, 称通货膨胀为「强迫的节俭」; p. 45 称之为 「间接征税」Cf. also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15.

[405] Thomas Attwood (1783–1856)，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是伯明翰经济学派的领导人。

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与政府无关。在十八世纪，美国在建立联邦之前，便宜的货币等同史宾汉兰制度，即是政府面对大众叫嚣时作出经济上令人泄气的让步。法国大革命和当时发行的纸币表明人民会打烂货币，而美国各州的历史也未能驱散这种怀疑。Burke 把美国民主联系资本问题，而 Hamilton[406]不仅担心派系斗争还担心通货膨胀。不过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民粹主义的人民党和美钞党与华尔街巨头的争吵只是地方性，而在欧洲，对通货膨胀的指责是在 1920 年代成为反对民主立法机构的有力论据，对政治有深远影响。

社会保护和干预货币不仅是类似而且是经常相同的问题。自金本位制建立以来，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和直接的通货膨胀都几乎同一程度危及货币：两者可能导致减少出口和最终压低汇率。这两种干预的基本形式之间的简单关系成为 1920 年代的政治支点。关注货币安全的各方抗议预算赤字，也反对廉价货币政策，因而反对「国库通胀」和「信贷通胀」，或实际一些谴责社会负担和高工资，工会和工党。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不应怀疑不受限制的失业福利会扰乱预算平衡，而利率过低导致价格通胀对汇率有同样的可恶影响。因为 Gladstone，财政预算成为英国民族的良知。在较落后民族，稳定货币或许代替预算。但结果都是近乎相似。究竟是否削减工资或社会服务，市场机制已无可避免定下不削减的结果。从这分析角度看，1931 年的英国国民政府[407]以适度方式发挥与美国实行「新政」的相同作用。这两件事都是在巨变时期个别国家采取的调整行动，但英国的情况有优势：没有诸如民间争吵或意识形态转变等复杂因素，因此更清晰显示决定性特征。

自 1925 年以来，英国货币的地位一直不稳固。回复金本位制的同时，英国货币明显高于世界同等水平的价格水平没有相应调整。很少人意识到政府与中央银行、各党派与各工会共同发起这进程是如何荒谬。首届工党政府（1924 年）的财政大臣 Snowden 是金本位制的瘾君子，他不知道如要恢复英镑的地位，工党或是要承担工资下降或是下台。七年后，正是 Snowden 本人迫使工党做了这两件事。到了 1931 年秋季，经济萧条的持续流失影响了英镑。1926 年总罢工失败未能阻止工资水平进一步上升，未能防止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上升，特别是无限制的失业福利。无需银行家的「敲诈」（虽然这确实是敲诈）令国民明白无论贬值是由于高工资和出口减少所引起，可靠的货币和财政预算是鱼，改善社会福利和货币贬值是熊掌；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必要削减社会福利或降低汇率。工党犹犹疑疑：削减社会福利有违工会政策，脱离金本位制被认为是冒渎。工党被赶下台，各传统政党削减社会福利和最终离开金本位制。有资产审

[406] Alexander Hamilton(1757- 1804)，美国军人，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与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华盛顿管治时期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构思者，其中重要的有：重建国家信用的计划、建立国家银行、建立关税系统、与英国建立友好贸易关系。

[407] National Government，在英国政治层面泛指由部份或所有主要党派合组的联合政府，但历史上主要指由各政党在 1931-40 年的联合政府，主要由保守党领导。

查的失业福利取代了无条件福利。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传统经历重大的转变。两党制暂停，而且没有任何冲动要恢复，十二年后依然黯然失色，所有迹象都反对早日恢复两党制。国家离开金本位制，没有为福利和自由带来悲剧性损失，在走向变革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决定性步骤还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有改变。然而，后者并不意味着国家永久脱离危险地带。

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有推行类似的机制，后果大致相同。1923 年在奥地利、1926 年在比利时和法国、1931 年在德国，各国工党为了「拯救货币」都不得不下台。Seipel[408], Francqui[409], Poincare[410]和 Bruning[411]这些政治家都把工党排除于政府，减少社会福利，努力打破工会对调整工资的阻力。货币总是面对危险，而且相当有规律把负担集中在工资膨胀不平衡预算。如此简化是没有公正处理涉及的各种各样问题，几乎囊括了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每一议题，包括外贸、农业和工业。越仔细考虑问题，越清楚货币和财政预算把悬而未决的问题集中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而其他国民转向支持这个或那个领导组群。

法国的所谓 Blum 实验[412]（1936 年）是另一实例。工党主政，但条件是不得禁止黄金出口。由于法国政府被货币这极其重要问题束缚，所以「法国新政」从未有机会实施。这实例有结论性，因为法英两国同在劳工问题淡化后，中产阶级的政党痛快地放弃捍卫金本位制。这些例子表明健全通货假设的效应对民粹政策造成甚么破坏。

美国经验以另一种方式给出同样的启示。虽然如果不脱离金本位制就不可能发动「新政」，但外汇交易实际上是重要，但重要性不大。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理所当然是由金融市场领导人负责维护稳定汇率和健全国内信贷；政府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两者。因此银行机构可阻碍经济领域中不为其所喜的任何国内行动，无论理由是好是坏。就政治而言，政府在货币和信贷方面必须听取银行家的建议，因为只有银行家才知道任何金融措施是否会危及资本市场和汇率。由于美国及时脱离金本位制，所以在这事例中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导致僵局。虽然这举措的技术优势轻微（而一如既往，政府给出的各种理由是十分拙劣），但这举措的结果是华尔街夺取政治权力。金融市场以恐慌为管治。1930 年代挽救了华尔街免遭欧

---

[408] Ignaz Seipel (1876–1932)，奥地利主教和政治家，在 1920 年代两度出任总理。
[409] Émile Francqui (1863–1935)，比利时军人，外交家和商人。
[410] 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国政治家。五度出任总理，又曾任总统。
[411] 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 1930 至 1932 年期间出任总理，已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
[412] Léon Blum 带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赢得 1936 年法国大选，随即启动各种社会改革。工人同年 6 月发动总罢工「欢迎」胜利，谈判达成 Matignon 协议，成为法国社会权利的基石。协议包括罢工权，集体谈判权，每年两星期带薪年假，每周工时四十小时，上调工资等等。然而，随着经济继续停滞，Blum 被迫停止改革，法郎贬值。法国保守派重回政坛，Blum 和人民阵线在 1937 年 6 月下台。这为期一年的社会改革称为 Blum 实验。

洲大陆式的社会大灾难。

然而，由于美国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和其货币地位十分强势，所以金本位制在美国主要只是国内政治问题。在其他国家，脱离金本位制涉及的远不止只是退出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英国，英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是如此之大，可以订立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运作的各种方式，从而把金本位制的负担颇大部份推给别人。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国家的货币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脱离外部世界，从而牺牲了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工业、打乱就业依赖的对外贸易，以及没有任何机会强迫征购商作出相似程度的贬值，以规避货币的黄金价值下跌的国内后果；英国做得到，这些国家做不到。

汇率是强加诸工资水平的极有效杠杆。在汇率把事情推到最后关头之前，工资问题通常在表面之下令紧张状态升级。市场规律经常不能强迫加诸不情不愿的工薪阶层，外汇机制却能最有效做到。货币指标公开展示干涉主义的工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所有不利影响（包括贸易周期这些市场机制的固有弱点，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实际上，要更好解释市场社会的理想国本质，莫过于有关劳工这虚拟商品必然涉及小区这样的谬论。罢工是工业行动常用的谈判工具，越来越多人认为罢工不负责任干扰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同时减少最终产生工资的社会红利。人们埋怨同情性罢工，总罢工被视为对社会存在的威胁。实际上，重要服务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罢工以国民为人质，把国民卷入劳工市场真正功能的错综复杂问题。劳工应在市场寻找本身价格，以其他方式建立的任何其它价格都是不合乎经济。只要劳工承担这份责任，其行为会一如其他商品，「劳工」商品会拒绝以低于买主仍然付得起的价格出售。如这样的一贯坚持，这意味着劳工的主要责任就是几乎不断罢工。这主张极之荒唐，其他说法无出其右，但这只是劳工商品理论的逻辑推理。理论和实践不调和，根源当然是劳工并不是真正商品，而劳工拒绝工作只是为了要确定其确切的价格（正如其他商品被压止增加供应的情况一样），那么社会很快会因为没有生计而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罢工问题时少有提到这论点。

回到现实：以罢工方法来确定工资，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都是灾难性，更不要提我们这个以效益理性而自豪的社会。实际上，在私营企业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没有保障，工人地位严重恶化。再加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大多数人要维持最低标准，工会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功能变得至关重要。但很明显任何保护工人的干预方法必然阻碍自发调节市场的机制，最终减少消费者可用的资金，而这正正是工资的源泉。

因内在必要，市场社会的根源问题重浮表面：干预主义和货币成为 1920 年代政治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性干预主义改变了本来答复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

经济自由主义极力消除干预土地、劳工和货币市场自由的所有干预主义政策，以恢复体系的自发调节，并试图在紧急情况下解决涉及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自由运作这三个基本原则的长期问题，实际上成为恢复世界贸易、排除对劳工流动的所有可避免障碍以及重建固定汇率的无畏先锋。最后项目优先于其他。必要恢复对货币的信心，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期待政府不要使用所有可能措施保护人民的生活是不现实的想法。就事情的本质而言，这些措施主要是关税和社会立法，以确保食品和就业，这些措施正是使自发调节体系无法运行的那种干预主义。

首先恢复国际货币体系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理由：面对混乱市场和不稳定汇率，国际信贷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资本流动（除了长期投资）仅仅是帮助国际收支平衡保持流动性，但即使这功能也受到经济考虑的严格限制。只有商业上似乎值得信赖的客户才获得信贷。现在情况颠倒过来：政治原因造成债务（诸如赔款），出于半政治原因而发放贷款，以方便赔款。发放贷款也是因为经济政策的理由，以稳定世界价格或恢复金本位制。不管生产和贸易的情况，世界经济相对健全的地区正利用信贷机制弥合相对混乱地区之间的鸿沟。人们借助被认为是全能的国际信贷机制在许多国家人为地平衡国际收支、财政预算和汇率。这机制本身建立在期待回复稳定汇率的基础，而这等同回复金本位制。经济体系在消失中，但有无比力量的松紧带帮助维持表面上的一致；但松紧带能否承受压力是取决于金本位制及时恢复。

就其本身而言，国联的成就可观。如不是因为目标的本质是不可能的话，可能达成目标，因为投入是如此持续和专注。就目前情况，不作干预会比国联的努力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只是因为这看起来总是几乎成功了，反而大大加重了最终失败带来的影响。1923 年，德国马克在几个月内瓦解；1930 年年初，世上所有主要货币都使用金本位制；在 1923-30 年间，国联运用国际信贷机制把东欧未完全稳定经济体系的负担首先推给西方胜利国，随后又推向更有能力的美国[413]。美国的崩溃发生在正常的商业周期；当崩溃来临时，国联和西欧银行界建立的金融网络纠缠着全球经济，陷入可怕的倾覆。

但这涉及更多事情。在 1920 年代，根据国联，社会组织的问题必须完全服从恢复货币的需求。通货紧缩是第一需求；要尽可能调整国内制度，甚至暂时推迟恢

[413] 原注 3：Polanyi, K., "Der Mechanism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1933 (Supplement).

复自由的国内市场和自由的国家。（国联财务委员会）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414]抨击通货紧缩未能「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因而未能造就稳定的新平衡。」政府不得不干预以降低垄断商品的价格、减少已约定的工资，以及削减经济租[415]。通货紧缩的理想状态是「强势政府下的自由经济」；「政府」这词就是字面的意思，即是有紧急权力和暂时中止民众的自由，「自由经济」实际上是字面意思的相反，即是政府调整价格和工资（虽然调整的借口是恢复汇率自由和自由的国内市场）。自由资本主义的两个基石是利伯维尔场和自由政府，「汇率第一」意味着两者都要牺牲。因此，国联代表目标已改变，方法没有改变：国联谴责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府使稳定货币臣服于收入和就业稳定，而国联扶植上位有通货紧缩倾向的政府用上一样多的干预措施使收入和就业稳定臣服于货币稳定。1932 年，金本位制调查代表团的报告宣称：随着汇率不稳定状态再现，过去十年货币方面的主要成就已经丧失殆尽。报告没有提到这些徒劳的通货紧缩努力没有恢复利伯维尔场，但牺牲了自由政府。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上反对干预和通货膨胀，但还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把健全货币的理想高高置于不干预主义的理想之上；这是遵循自发调节经济的内在逻辑。然而这些行动往往把危机扩散，为金融添加大规模经济混乱无法承受的压力，各国不同经济体系的赤字被推至高点：国际分工的残余部份无可避免瓦解。在这关键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服务通货紧缩政策，顽固地支持独裁的干预主义；这只是导致决定性削弱民主力量，否则是有可能避免法西斯大灾难。英国和美国是货币的主人，不是奴仆，齐齐脱离金本位制而逃过此劫。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社会的内在倾向，自觉服从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产业工人的自然解决方案，他们觉得直接调节生产和市场应是自由社会的有用但是附属的特征。从社会作为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延续使社会成为众人之间独特人际关系的努力；在欧洲，这种人际关系始终与耶教传统联系。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这正好相反是突然与过去决裂，中断了试图使私人挣钱成为生产活动刺激因素的努力，也不承认个体有权处置生产的主要工具。这解释了最终由社会主义政党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困难，即便决意不干预产权制度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只有极少可能性会这样做已经破坏自由经济体系至关重要的信心，即是对产权持续的绝对信心。立法可能重新定义产权的实际内容，市场体系要发挥作用，必要官方确保产权持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项变化影响社会主义的地位。首先，市场体系被证

[414] Gold Delegation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于 1928 年成立，调查「因为黄金购买力波动对工业、农业和就职情况的致命影响」。文章引述的结论是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有少数委员不同意。（网页资料）

[415] rent。颇为混淆的经济学术语，详尽说法是「经济租 economic rent」：生产过程中要付出的生产投入成本高于某个供给的价格弹性下本来应该付出的价格，这中间的差额就是经济租。经济租会带来寻租（rent seeking，占便宜）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经济租。经济租与寻租的出现，代表市场失灵。

明是不可靠，几乎完全崩溃，即使批评者也从未期盼有这种缺陷。其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新的改变。虽然发生这冒进改变的环境不适用于西方国家，但苏联的真实存在证明这有深刻影响。西方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有三个前提条件：工业、有教育的人民以及民主传统；苏联确实在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这些差别使苏联经验不适用于别处，但这没有妨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强权。在欧洲大陆，各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一直是社会主义观点，无疑使人们怀疑他们希望完成的任何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平和的年代，这样的怀疑可能是不正确；总的来说，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矢志改革，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但在紧急状态下，情况就不一样。如正常方法不中用，就会试用非正常方法；工人阶级政党的非正常方法也许会漠视产权。在危险迫在眉睫的压力下，各工人政党也许会重拳出击、搞出社会主义的措施；至少民营企业的好战追随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这种暗示已足以令市场陷入混乱，酿成全面恐慌。

在这样的情况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惯常利益冲突有了不祥的特征。经济利益的分歧通常以妥协解决，而社会的政经分离却往往为这样的冲突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雇主是工厂和矿山的业主，直接负责组织社会的生产（除了他们的个人的利润得益）。原则上，他们维持产业运转的努力应得到所有人支持。另一方面，员工代表社会大部人，其利益很大程度上与整体社会利益吻合。员工是唯一阶级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公民利益、人权；在享有普选权的情况下，员工的人数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占优势。不过立法机构像产业界一样在社会中要履行正式功能。议员负责形成公众意愿、公共政策的方向以及制定国内外的长期规划。任何复杂社会都不能没有政治类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运作。如任何组群利益的冲突导致产业界或政府机构瘫痪（影响任一界别或两者），对社会会构成直接威胁。

然而这正好就是 1920 年代的情况。工党在议会有人数优势，藉此巩固自身的地位，而资本家把产业界构筑城堡，在内管治国家。民间组织的反应是无情地干预商业，漠视产业界特定形式的需要。产业领袖策反民众背弃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而民主组织继续反对人人生活依赖的产业体制。最终，经济和政治体系同样受到完全瘫痪的威胁。人人恐惧，那些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轻易摆脱困境的人会夺取领导权。法西斯解决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第二十章
社会变化齿轮中的历史

假如有政治运动不是各种偶然因素的产物，而是对客观形势的要求作出反应，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解决方法的退化特征也是显而易见，为许多国家基本相似的制度僵局提出逃离的方法，然而一旦试用了这些补救办法，就会在各处造成不治之症。文明就是这样地毁灭。

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僵局的法西斯方法，可描述为以毁灭包括产业和政治领域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改革市场经济。处于瓦解危险的经济体系因此要重振活力，而人们自身要接受再教育，旨在使个人失去本性，无法以政治实体中个人单位发挥作用。[416] 再教育包含否定所有形式的人类手足情谊观念的政治信仰原则，以科学性折磨反抗者的方法令群众改变信仰的行为来实现再教育。

这样的运动出现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在许多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决不应归因当代人坚持认为的当地原因、民族精神或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的关系，就如同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没有太大关联。这运动出现在保加利亚这些战败国和南斯拉夫这些战胜国，北方性格的芬兰和挪威以及南方性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英国、爱尔兰或比利时这些雅利安种族国家，日本、匈牙利或巴勒斯坦这些非雅利安种族国家，耶教旧教传统的葡萄牙和新教的荷兰，普鲁士的军人社会和奥地利的平民社会，有古老文化的法国和新文化的美国和拉丁美洲。事实上，一旦条件成熟，没有任何类型的背景（宗教、文化或民族传统）的国家可以不受法西斯主义影响。

此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效能与其物质和数量优势之间明显缺乏关联。「运动」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暗示有很多人投入和参与。如法西斯主义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与民众的表达无关。虽然法西斯主义希望有大量信徒，但它的潜力量不是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影响掌权者，掌控当权者的的良好意愿，在革命失败后得到他们的保护，从而根除革命的风险。

接近法西斯阶段的国家有各种症兆，但不必然包括法西斯运动的存在。重要迹象至少还有非理性哲学的传播、种族主义的审美观、反对资本主义的哗众取宠、非正统的货币观点、批评政党体制、普遍蔑视「政权」或任何名称的现有民主组织。各走极端的先行者有奥地利 Spann[417]的所谓普世救说哲学、德国 George[418]的诗作

[416]原注 1：Polanyi, K.,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

[417] Othmar Spann (1878-1950)，奥地利保守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激烈反对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通俗著作和讲座推广他的观点。

和 Klages[419]的浪漫宇宙论、英国 Lawrence[420]的性爱生机论、法国 Sorel[421]的政治神话宗派。德国的希特勒最终被兴登堡总统[422]身边的封建集团推上台，正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 Primo de Rivera 被各自的君主推上台的情况一样。但希特勒有强大的运动支持；墨索里尼的支持较小规模；Primo de Rivera 什么都没有。法西斯的策略没有发动反对合法当局的真正革命，而是与假装被彻底击败的当局有默契安排伪装革命。这只是复杂大局的粗疏轮廓，还要腾出空位给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物，例如工业化的美国底特律市说话随意的耶教旧教煽动者、落后路易斯安那州的 Long[423]、日本军队的阴谋家以及乌克兰的反苏联破坏份子等。自 1930 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每个工业化社会的既定政治可能性，一种几乎是实时的情绪化反应，称之为「动作」而不是「运动」更能显示症兆往往是不清楚和不明确危机的客观本质。人们时常无法确定一场政治演讲或演出、布道或公众游行、一种玄学或艺术时尚、一首诗或一项政党计划是否法西斯主义。没有公认的法西斯主义标准，也没有常规的原则。然而法西斯主义所有有组织的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出现后突然消失，在不定期潜伏后又突然爆发。所有这些都符合社会力量依着客观形势而增强和减弱的图画。

所谓「法西斯形势」只是法西斯主义轻易和取得全面胜利的惯见情况。大批劳工的产业和政治组织和宪制自由的忠诚支持者同时消失，而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势力扫除民主政府、政党和工会当时看来是压倒性的势力。如「革命形势」的特点是所有抵抗力量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瓦解的程度，只有少许武装的少数暴徒已可以攻陷和突破反动份子的所谓坚固要塞，那么「法西斯形势」可说是与此完全匹配，不同之处是民主和宪法自由的壁垒受到同样壮观的攻击。1932 年 7 月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政府坐在合法权力的宝座，反而屈从 Herr von Papen 违反宪制的暴力威胁。大约六个月之后，希特勒以和平手段攫取最高的权力地位，立刻发

---

[418] Stefan Anton George (1868 -1933) 德国诗人，编辑和翻译者。

[419] Ludwig Klages (1872-1956)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性格分析和笔迹的研究，也成为他的学说基础。他构想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单位，肉体是灵魂的「现象」，灵魂是肉体的「意义」，先民依照生命原则活得开心和有韵律，但「精神」这「非宇宙 acosmic」力量阻碍和破坏了灵魂生命的和谐整体，也破坏了人类的生活，因为精神使人类走向文明，在文明的后来阶段生活变得机械化，因此破坏了生活。理性主义、形式主义和机械性思想，科技和数学的发展等等都是精神的产品，干涉和限制人类的生活。他认为精神越尝握人类的生存，最后人没有了灵魂，破坏自然世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最终死亡。世界末日后，新的生命周期开始，精神不再占主导地位。他极度悲观认为文明是摧毁生命的「精神」统治。（网上参考）

[420] 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20 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极具争议。主要成就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和书信。他的创作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由于他的作品坚持不懈的描述日常生活中无休止的心灵抗争，他的许多小说都弥漫着忧郁的情调。其诗歌作品则通常描述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小说的风格截然不同。

[421] 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422] 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423] Huey Pierce Long(1893-1935)，美国政治家，1928 年当选易斯安那州长，执政期间越过州议会行使权力，大大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加强福利事业帮助穷人，获得优秀政绩，但被一些反对者指为独裁。

动革命袭击，全面破坏了魏玛共和国制度和宪制政党。想象是运动的力量造就这样的形势，而没有看到是这种形势造就这运动；这是过去几十年被忽略的重要教训。

一如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扎根于未能发挥作用的市场社会，因而其范围遍及全球、普世皆然；有关问题超越经济范畴并引发特殊社会类型的巨变，触及几乎人类活动每一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艺术或宗教，而且在某一刻与当地和典型趋势结合。要理解这阶段的历史，必要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法西斯行动和与之结合的短暂趋势。

1920 年代的欧洲有两种这样的趋势显得特别重要，遮掩了较微弱但更全面的法西斯主义模型：反革命和民族修正主义。这些趋势的直接起点是各款条约和战后的革命；虽然各种趋势有严格的条件并局限于其特殊目的，但是很容易与法西斯主义混淆。

政治钟摆来回摆动，反革命通常是对事态被激烈扰乱的响应。至少自英联邦成立以来，这样的行动常见于欧洲，与当时社会进程的关连只是有限。1920 年代颇多这样的情况：动荡时势已赶走了中欧和东欧十多位君主，部份是由于战败的逆流，不是由于民主的行动向前。反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且势所必然是由诸如皇室、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有关联的政党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阶层和集团所推动。在此期间，保守份子和法西斯份子的联盟与冲突主要涉及反革命事业中法西斯份子应分享的份额。法西斯主义现已是革命趋势，对准保守主义也对准社会主义的竞争性革命力量。这没有阻止法西斯份子向反革命提供服务而在政治领域寻求权力。相反的是他们取得支配地位，主要是因为保守主义所谓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如社会主义被禁，这是无可避免。保守派很自然试图独占反革命的荣誉，而德国实际上独自实现了这目的，在没有向纳粹份子让步的情况下剥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力和权力。同样，奥地利的保守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在 1927 年在没有向「右翼革命」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解除了工人武装。即使法西斯主义参与反革命是无可避免，还是建立了「强势」政府把法西斯主义驱逐至权力边缘；1929 年的爱沙尼亚、1932 年的芬兰和 1934 年的拉脱维亚就是这样的情况。1922 年的匈牙利和 1926 年的保加利亚，伪自由政权削弱了当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只有在意大利，保守派在恢复产业界的工作秩序时未能阻止法西斯份子有机会取得权力。

军事上战败的各国以及「精神上」战败的意大利，民族问题沉重而且紧迫。最严峻的问题是永久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在国际法、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组织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的世界，有一些国家变得无能为力，但没有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因为没有势力普遍扩散的先决条件，国际联盟充其量只是略有改进的势力均衡制

度，实际上还没达到以前欧洲协同体的水平。初生的法西斯运动几乎到处都身先士卒要解决民族问题；没有这「搭便车」行为，法西斯运动不可能生存。

然而，法西斯运动只是利用这问题作为跳板，在其它时候敲出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音符。在英国和美国，这与绥靖政策[424]联系一起；奥地利的保安团[425]与耶教旧教和平主义者合作；而耶教旧教法西斯主义原则上是反民族主义。Huey Long[426]无需以州界冲突为借口发动法西斯运动。荷兰和挪威的类似运动无关民族主义，甚至达到叛国罪程度；Quisling[427]也许是优秀法西斯份子的名字，但肯定不是爱国者的好名字。

法西斯主义为政治权力斗争时，完全随意漠视或利用当地问题，其社会性目标超越政治和经济框架，在退行性过程中置入政治宗教，在崛起中它的乐队只排斥极少数情绪；但一旦胜利后就严格限制乐队只能表演极少数但有极端特色的乐章。一些法西斯主义在革命时期展现伪民族主义，革命后发展一套有具体帝国主义色彩的非民族主义；要理解两者之间的细微但关键性区别，先要区分法西斯运动在通向权力之路时伪装心胸狭窄和掌权时的真正心胸狭窄。[428]

一般而言：保守派的国内反革命是成功的，但很少能解决国家与国际之间的问题。Bruning 在 1940 年坚持他在「兴登堡身边小集团」决定把他赶下台和把权力交给纳粹份子之前，已经解决了德国赔偿和解除武装的问题，只是敌人不想把荣誉归于他。[429]在有限的意义上，这似乎是无关宏旨，因为正如 Bruning 暗示，德国的平等地位问题并不局限于技术性解除武装，而是包括同样重要的去军事化问题；此外，实际上也不可能漠视德国外交力量有来自誓要执行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的纳粹群众。事件最后证明德国要取得平等地位，不可能没有革命性起点，因而纳粹主义把自由而平等的德国陷入邪恶轨道的可怕责任变得明显。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夺得权力，是因为能够利用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作为手段；在法国和英国，法西斯主义因为它的反爱国主义而明显被削弱。只有在本质上依赖他人的小国，屈从强国的精神才有助法西斯主义。

1920 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是无意中与民族倾向和反革命趋势联系一起。这是有独立源头的各种运动互生的情况，相互补充且造成基本上类似的印象，实际上彼此之间并不相干。

---

[424] appeasement
[425] Heimwehr：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方组织。由保守农民组成，代表右翼势力。
[426] Huey Pierce Long (1893-1935)，美国政治家，
[427] Vidkun Quisling (1887-1945)，挪威军人与政治家；在挪威被德军攻占之后出任新政权的总理。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捕，因叛国罪成立被枪决。「Quisling」一词成为英文字汇「卖国贼」的同义词。
[428] 原注 2：Heymann, H., *Plan for Permanent Peace,* 1941. Cf. Bruning's letter of January 8th, 1940.
[429] 原注 3：Rauschning, H.,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1940.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角色是由一个因素决定：市场体系的情况。

在 1917-23 年间，各国政府偶尔寻求法西斯份子帮助恢复治安秩序：市场体系运作没有其他要求。法西斯主义仍然处于未发展的境地。

在 1924-29 年间，似乎已确保市场体系恢复，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就淡出。

在 1930 年之后，市场经济普陷入全面危机，几年以内法西斯主义成了一股世界性力量。

1917-23 年的第一阶段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在许多国家，诸如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等，发生了农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国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产业界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力。最终反革命势力恢复了国内的势力均衡。在大多数国家，农民转而反对城市工人；在一些国家，法西斯运动由军官和乡绅发动，为农民提供榜样；在其他国家，例如意大利，失业人士和小资产阶级组成法西斯军队。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公共秩序和法治，没有提出激进的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法西斯革命的任何明显迹象。这些运动只是在形式上是法西斯主义：所谓不负责任的异议份子组成民间伙团，在当权者纵容下使用武力和暴力。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理论已诞生，但还未成为政治因素。托洛茨基[430]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意大利形势发表的长篇报告没有提到法西斯主义，虽然法西斯已存在一段时间，要到十多年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确立在该国的地位之后才进一步发展成为有特色的社会制度。

1924 年及以后，欧洲和美国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繁荣景象，淹没了对稳固市场体系的所有担忧。人们宣布恢复了资本主义。除了一些边缘地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被肃清。共产国际宣告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争的事实；墨索里尼颂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英国，所有主要国家都处于升级阶段。美国享有传奇式繁荣，欧洲大陆也不遑多让。希特勒的政变被镇压；法国撤出 Ruhr 地区；德国货币（马克）奇迹地恢复；Dawes 计划在赔偿中除去了政治因素；〈Locarno 协议[431]〉在商议；德国即将开始七年的兴旺年代。在 1926 年年底前，从莫斯科到里斯本再度回归金本位制。

在 1929 年以后的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意义变得明显。市场体系的停滞

[430] Leon Trotsky (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

[431] Locarno Treaties 罗加诺协议；欧洲多国在 1925 年于瑞士罗加诺签订七项协议。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

状态已是明显事实。直至那时，法西斯主义只是意大利独裁政府的一种特性，与那些较传统类型的政府稍有不同，但现在成为解决工业化社会问题的方案。德国在欧洲范围的革命带头而起，与法西斯主义结盟为本身的权力斗争提供动力，很快就席卷全球。历史处于社会变化的齿轮中。

一次偶然但不是意外的事件开始毁坏国际体系。华尔街股市暴跌扩大范围，紧随其后是英国决定脱离金本位制，两年以后美国也采取相同行动。期间，裁军会议中止，德国在 1934 年脱离国际联盟。

这些象征性事件把世界组织推入惊人变化的新纪元。日德义三个强国反对现状，破坏处于崩溃状态的和平制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真正机构也未能发挥作用。创造金本位制的英美两国至少是暂时让它失效；一些国家以违约为幌子，拒付外债；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萎靡。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同时崩溃。

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也是一样彻底。两党制被一党政府取代，有些还是民族主义政府。然而，独裁国家和保留民主舆论的国家之间有外部相似性，但只是用来强调讨论和决策这自由制度的重要性。苏联转向独裁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德日义这些为战争作准备的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消失了，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同样情况，只是程度较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政」彼此相似，都是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

启动历史进程的是独立于各国的事件，各国根据决心走向何方而对挑战作出反应。一些国家规避变化、一些主动应付、一些漠然处之；各自在不同方面寻求解决方案。然而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些往往南辕北辙的方案只是既有的解决方案。

一些不满足的强国决心利用这全面混乱来促进自身利益；势力均衡体系的消亡（甚至是国联这样的虚弱形式）是难得的机会。德国急于为国际秩序提供立足点的传统世界经济加快崩溃，期待经济崩溃方便该国争取先机。德国故意摆脱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国际体系，目的是为了该国他日拒绝承担政治责任时减少外部世界对该国的控制。德国鼓励经济专制以确保其长远计划所需的自由，又滥用黄金储备，无故拒绝承认责任而毁坏该国的国外信贷，甚至还一度清除了对自身有利的外贸收支平衡。因为无论华尔街、伦敦金融界或国联都没有觉察到纳粹份子实际上是指望十九世纪经济最终崩溃，德国很容易掩饰其真实意图。〔英国财政大臣〕John Simon 和〔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 Norman 坚信最终〔德国央行行长〕Schacht 会在德国恢复传统经济；如德国得到金融资助，目前受压的德国会浪子回头。直至慕尼黑事件及以后，唐宁街一直有这样的幻想。德国凭借适应传统体系混乱的合谋计划得到极大支持，而英国却因为坚持传统体系而受到严重阻碍。

虽然英格兰暂时脱离金本位制，其经济和金融依然建基于稳定汇率和健全货币的原则，因此重整军备是有受限。一如德国的经济独裁是源于其防范全面变革之军事和政治考虑的结果，英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受限于其保守的金融观念。有限战争的战略反映了岛国市场的观念，认为只要强大海军可确保其健全货币和能够在全球购买的物资供应，英国就可以安然无恙。1933 年，希特勒已上台执政，死硬派的〔英国陆军财政大臣〕Duff Cooper 辩解 1932 年削减军队预算是因为「国家面临破产，这比没有效率的军队更为危险。」三年多以后，〔英国陆军大臣〕Halifax 勋爵主张经济调整会导向和平，所以不应干涉贸易，因为这使得调整更为困难。就在〔1938 年〕慕尼黑协议[432]那一年，他和张伯伦首相仍然根据「这些独步单方」和美国给予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实际上，甚至在希特勒已越过边境线占领〔捷克〕布拉格之后，〔英国财政大臣〕Simon 勋爵还在下议院站在〔英伦银行行长〕Montagu Norman 一边，赞同他把捷克的黄金储备移交希特勒。Simon 深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比所有其它考虑更为重要，他的治国之道就是要恢复金本位制。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既定绥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对金本位制精神的尊重，一直主宰伦敦金融界领导人对战略或政治事务的观念。在战争爆发那星期，〔英国〕外交部答复希特勒给张伯伦的口信时，还是依据美国给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政策。[433] 英国在军事上未作好准备，主要是因是坚持金本位制经济。

德国最初获得「毁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的优势。只要清除十九世纪过时体系能够让德国保持优势，德国就可以继续领先。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制和绝对主权通通被破坏，是德国抢劫掠夺的无意后果。德国在适应本身追求的自我孤立及随后奴隶贩子式远征过程中，对变革的一些问题形成了试探性的解决方法。

然而，德国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能够迫使世界各国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德国成为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因为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这种解决方法看来在长时间赢得有产阶级无条件效忠，而实际上不单单只是这些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假设阶级经济利益优先，在这情况下希特勒注定会胜出。但最后证明国家的社会单位其意义比阶级的经济单位更为切合。

俄罗斯崛起也与其在变革中的作用有关连。从 1917 至 1929 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只不过对混乱的恐惧，混乱可能致命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恢复，而市场经

[432] 1938 年 9 月 29 日，〔德国元首〕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Edouard Daladier，〔意大利〕墨索里尼签署〈慕尼黑协议 Munich Agreement〉，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 割让给德国。没有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谈的捷克元首 Eduard Benes 抗议，张伯伦告知他英国不会为苏台德问题开战。英国民众普遍欢迎〈慕尼黑协议〉似乎避免了与德国开战，但被一些政治家抨击英国政府的行为不光彩，包括丘吉尔。1939 年 3 月，德国军队进军捷克，希特勒撕毁了〈慕尼黑协议〉。张伯伦才意识到不能信任希特勒，英国的绥靖政策走到尽头。

[433] 原注 4：*British Blue Book,* No. 74., Cmd. 6106, 1939.

济只有在绝对信任的氛围中才能运转。在随后十年，社会主义在苏联成为现实。农庄集体化意味着以合作社形式取代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土地因素。苏联一直只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煽动革命场所，现已成为可以取代市场经济的新体系代表。

很少人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是热诚的社会主义份子，但顽固拒绝「在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已阻止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除了 1920 年所谓「战时共产主义[434]」这完全意外的事件外，领导人坚持的立场是世界革命必须在工业化的西欧开始，所以认为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当这情况变成现实时，老一派的布尔什维克份子全都反对。然而正是这种变奏证明是惊人成功。

回顾俄罗斯二十五年的历史，似乎所谓俄罗斯革命实际是由两次单独的革命组成。第一次革命体现了传统的西欧理想，而第二次革命构成 1930 年代全新发展的一部份。1917-24 年的革命实际上是欧洲仿效英联邦和法国大革命模式的最后一次政治剧变；大约在 1930 年以集体农庄开始的革命是那年代改变世界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第一次俄罗斯革命消灭了绝对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种族压迫，真正继承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而言，第一次革命只是俄罗斯事件，在俄罗斯土地实现了西方发展的漫长过程；第二次革命则是全球同时变革的一部份。

从表面看，1920 年代的俄罗斯远离欧洲，忙于解救自己。进一步分析也许证明这表面现象是不真实。因为在两次革命之间，强迫俄罗斯接受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是国际体系失败。至 1924 年，「战时共产主义」已为人忘却，俄罗斯已重建国内谷物利伯维尔场，但国家仍然控制对外贸和基础工业。俄罗斯一心想增加外贸，而这主要取决于谷物、木材、毛皮以及其他一些有机原料的出口，这些产品的价格在贸易全面中断之前农业萧条时下跌很厉害。俄罗斯没有能力发展有利的出口贸易，这限制了机械产品的进口，因此束缚了建立民族工业；这再一次不利影响城乡之间的所谓以物易物的「剪刀」交易，从而令农民更抗拒城市工人阶级的统治。世界经济瓦解就是这样为俄罗斯农业问题的权宜之计增加压力，也加快了集体农庄的来临。欧洲传统政治体系未能提供安全和保障，在同一方向起著作用，因为这导致军备的需要，从而加重高压工业化的负担。没有了十九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加上世界市场无法吸纳俄罗斯农产品，迫使该国不情愿地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联系所有国家，导致一个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俄罗斯的经济独裁只不过是资本性国际主义的消逝。

国际体系的失败释放了历史的能量：为市场社会的各种内在趋势铺设轨道。

---

[434] War Communism，战时共产主义是苏俄在 1918 年至 1921 年国内战争时期推出的经济措施，旨在最大限度保障非常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城镇和军队的粮食与武器供应。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中的自由

十九世纪文明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部或内部攻击，其生命力逐渐衰竭既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中下层阶级叛乱；其失败不是一些诸如利润率下降或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的所谓经济规律的结果。十九世纪文明瓦解缘于一组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不被市场自发调节的行为湮灭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除了北美开拓疆域时代的例外情况，市场和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为这世纪提供动力和产生了最终破坏那社会的特有张力和压力。外部战争只不过加速了它的毁灭。

经过一世纪的盲目「改进」，人类正恢复其「栖息环境」。如果工业化不是要消灭人类，就必须服从人性的要求。对市场社会的正确批评并不是这是以经济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而是其经济是以私利为基础。从严格的「例外」意义来说，经济生活这样的组织完全是不自然。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假设人的经济活动是为利润而奋斗，人的唯物倾向促使他选择付出较少而不是较多努力，又期望劳动有回报；简而言之，人的经济活动是遵从所谓经济理性，而所有相反的行为都是因为外部干预。因为市场是自然制度，只要人类不干扰市场就会自发形成。因此，最自然不过的是经济体系由市场组成只受市场价格控制；因而基于这样市场的人类社会应该是所有进程的目标。无论这样的社会在道德上是否可取，其可行性（这是不言自明）是建立在人类不可改变的特性。

实际上，如我们所知，在原始状态以及其后的历史过程中，人类行为几乎与这观点暗喻的行为截然相反。〔美国经济学家〕Frank H. Knight 认为「没有具体的人类动机是出于经济原因」，他的说法不仅一般适用于社会生活，甚至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亚当•斯密对原始人倾向以物易物交易是颇有自信，但这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倾向，而是极为罕见。现代人类学的证据揭穿了这些纯理性建构的虚伪，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社会学家和谐教诲的设想。经济史揭示国家市场出现，绝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逐渐和自发性解放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有意识和经常粗暴干预的结果，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把市场体制强推给社会。仔细研究，十九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与之前的市场已有区别，因为调节是依赖经济私利。**十九世纪社会的先天性弱点不是因为这是工业社会，而是因为这是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市场这理想性实验只是回忆之时，工业化文明将会继续存在。

但是，工业化文明转向新的非市场基础，这任务的危急是难以想象：害怕制度的真空，或者更糟糕的是失去自由。这些危急情况是否必然？

与这过渡期形影不离的深重苦难已是事过境迁。

社会和经济混乱，经济萧条的痛苦变迁、货币波动、普遍失业、社会地位变化以及历史状态的惊人破坏，这一代经历了最糟糕的局面，无意中为这种变化付出代价。人类还没有适应使用机器，即将到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恢复到过去就如同把麻烦事转移到外星那样不可能。与其消灭侵略和征服的邪恶势力，这种徒劳的企图反而实际上确保那些力量即使军事上彻底失败还能幸存下来。邪恶的成因被赋予在政治上果断的优势，代表着事事可能；与此相反的是无论意图有多良好，诸事不成。

传统制度的崩溃没有使我们处于真空。历史上并非首次见到权宜之计可能包含重要而永久性制度的病菌。

各国的事态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社会奠定规则，确保了社会的地位优胜于经济制度。这种情况可能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宪制主义和专制主义，甚至还有迄今完全没有预见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是其它国家的现在，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仍然体现着其它国家的过去。但各国都有共同后果：即使在原则上市场体制不再自发调节，因为市场不再由劳工、土地和货币组成。

从市场中抽出劳工，与当年建立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是同样激进的变革。除了次要和附加的细节，工资合约不再是私人合约。不仅工厂条件、劳动时间和合约样式，连基本工资本身都是在市场之外决定；因此，工会、国家和其它公共团体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这些机构的特点，也取决于管理生产的实际组织。实情是工资差别必然（也应该）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除了与金钱收入有直接联系的动机，其他动机可能比劳工的财务方面更为重要。

从市场中抽出土地，等同把土地结合明确制度，例如家园、合作社、工厂、城镇、学校、教会、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广泛的农场个人所有权将会保留；既然市场不再管辖〔土地〕的要点，土地使用权合约只需处理一些附属条件。同样情况也适用于主粮和有机原料，因为这不再由市场定价。大量不同品种产品的竞争性市场继续发挥作用不必然会干预社会制度，犹如在市场之外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定价不必然会干预不同产品价格的成本功能。当然，由于这些措施，财产的本质有了深刻变化，因为不再仅仅为了确保就业、生产和使用社会资源而让财产所有权的收入无限制地增多。

当今所有国家已经实现从市场中抽出货币控制。存款的设立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货币控制，但 1920 年代的金本位制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与代用货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断开。因为在所有主要国家都推行「职能财政[435]」，因此指导投资和调节储蓄率已成为政府的任务。

市场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视为商品，因此从市场中抽出看来是一致的行为；这是市场的角度。从虚拟商品分离而恢复人类现实的角度看，这遍及社会全方面范围。实际上，统一市场经济的解体已形成不同的新社会。而且，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完全没有各种市场。市场仍以不同方式继续，以确保消费者的自由，显示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发挥财务会计的作用，但已完全不再是经济自发调节的工具。

十九世纪社会的国际手段，一如其国内手段，是受到经济的束缚。固定汇率的领域是与文明一致。只要金本位制和几乎是其必然结果的宪制政权依然运作，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载体。这体制发挥作用是通过强国的工具性，首先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迫切要求欠发达国家建立代议政制政府，以核查债务国的财政和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有控制的财政预算；只有负责任的组织才可以做到以上的一切。但一般而言，政治人物不是有意识考虑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只是因为金本位制的要求是不言自明。货币和代议政制的全球统一模式是那时期严紧经济体系的产物。

十九世纪国际活动两项原则的关联源自这情况：无政府主义主权国家和对别国事务的「合理」干预。虽然两者明显自相矛盾，但却相互关联。当然，「主权国家」纯粹是政治术语，因为在没有监管的外贸和金本位制下，各国政府对国际经济无能为力，既不能也不想在货币事务上各国连手——这是法定的立场。实际上，只有由央行控制货币体制的国家才算是主权国家。在西方强国，这种不受限制和约束的国家货币主权与完全相反的事物结合，即是持续不断传扬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结构。因此，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人民在制度上的标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种体制受到本身的精确性和普遍性牵制。国际联盟的历史已明显证明无政府主义的主权国家是对国际合作所有有效方式的阻碍；强制实施国内体制一致，是国家发展的自由面对的永久性威胁，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有时甚至是在发达但财政疲弱的国家。经济合作只是限制在私营机构，一如自由贸易那样杂乱和没有效率；各民族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是各国政府的实际合作，想都没有想过。

[435] functional finance。英国俄裔经济学家 Abba Ptachya Lerner 在二战期间开发「职能财政」理论：政府的财政预算要有目的，是为了满足明确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税收不是为了开支或投资。

这形势很可能对外交政策提出两个明显矛盾的要求：友好国家要更紧密合作，甚至比十九世纪主权〔观念〕更紧密，然而因为受管制市场的存在使各国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警惕外部干预。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自动机制消失，各国政府可以放下绝对国家主权最具阻碍作用的特点，即是拒绝在国际经济领域合作，而同时较为容忍其他国家依照各自意愿来设计其国内机制，从而超越了十九世纪要求在世界经济轨道内的各国政权必要一致的有害教义。新世界的基石出现在旧世界的废墟：各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又有随意组织国家活动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约束性体制下，两者都近乎不可能，从而排除了国家合作的许多方法。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有充分理由认为「邦联[436]」的概念是中央集权和一致性的噩梦，市场经济体系的终结很可能意味着与国内自由的有效合作。

在两个不同层面出现了「自由」的问题：制度层面和道德或宗教层面。在制度层面，这是增减「自由」的平衡问题，没有全新的问题。在更基本的层面，「自由」的可能性犹豫未决。似乎维护自由的手段在搀假和破坏自由。我们这年代的「自由」问题的关键，必须在后一层面寻找。各种制度是体现人的意图和目的。除非能够理解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真正重要意义，否则不能够获得所寻找的自由。

在制度层面，监管既扩大也限制自由；只有「自由」之得与失之间的平衡才是重要；对于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都是同样正确。生活舒适的阶级享受有安全保障的自由，比诸那些收入不足、只能满足于最低限度自由的人，很自然不急于扩大社会的自由。随着有人提出以强制措施更公平分配收入、安逸和安全，这变得明显。虽然人人受到限制，但特权人士往往反对，犹如约束只是单单针对他们。他们谈论奴隶制度，实际上只是想把自己享受的既得自由伸延到其他人。最初可能不得不减少他们的安逸和安全，因而也减少了自由，结果会是提高全国的自由层面。但「自由」这样的转移、重塑和扩大，不应是断言新情况必然比旧情况较少自由的理由。

然而要维护一些自由是最重要的。一如「和平」，「自由」是十九世纪经济的副产品，我们已学会珍惜自由，只是为了自由本身。政治和经济在制度上的分离，证明对社会本体是致命的危险，几乎以公义和安全为代价换取自由。公民自由、私有企业和工资系统合并成为有利于精神自由和独立思想的生活模式。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于此再合并成为共同储备，不可能清楚区分其中的各种要素。一些要素附属于失业和投机者利润这些不幸；另一些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最宝贵的传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从已崩溃的市场经济中传承而来的高层次价值观。这无疑是艰巨任务。这种经济制度的目的是创造利润和财富，不是创造和平和自由，所以自由或和平都不可制度化。如要二者兼得，必须有意识地争取，两者必须成为向前迈进的各种社会所选择的目标。这很可能是当今世界的要

[436] federation

旨，以确保和平和自由。一旦源自十九世纪经济体系对和平的兴趣停止运作，和平的意愿能够如何展示本身将取决于我们成功建立国际秩序。个人自由之存在是视乎我们刻意建立保护和甚至扩大个人自由的程度。在已建立的社会，不墨守成规的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受到保护。个人必须自由凭良心做事，无惧在社会生活一些领域中刚好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务的权势。科学和艺术应受文学监护。强制不应该不受限制；「反对者」应该有退隐的合适环境，让他可以选择「次优」的生计。这样可确保不墨守成规的权利是自由社会的标志。

社会整合的每一步骤，应该提高自由的程度；规划的步骤应包含强化个人在社会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之下可以行使他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即使抵触个人或匿名的最高权势。要真正解决官僚滥用权力的威胁，是建立由牢不可破规则保护的主观自由；因为虽然大量向下级授权，中央权力会加强，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民主社会组织本身如是，旨在保护个人会员权利的专业和同业工会也如是。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大我有不良意愿，渺小的小我也会觉得茫然无助；如个人观点或行为伤害了权势中人的脆弱感情，这情况就更甚。只是有权利宣言是不够的，要有制度使权利生效。人身保护令不应是以法律固定个人自由的最后宪法手段。迄今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必须加进〈人权法案〉，必须是高于所有权势当局，无论是国家、市政府或专业〔团体〕。〈人权法案〉应把个人的工作权利列为首位，无论男女的政治或宗教观点，肤色和种族。这意味着保证〔公民权利〕不受哪怕是轻微的损害。众所周知，产业审裁法庭一直保护公众个人免遭即使有专横势力的企业集团迫害，例如早期的铁路公司。审裁法庭面对可能滥用权力的其他例子是紧急时期英格兰的〈骨干工人令[437]〉或美国的「劳工冻结」，极尽歧视。凡是公众舆论一致支持公民自由，审裁法庭或法院一直能够维护个人自由。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代价，即使影响生产效率、消费经济或行政管理的理性。工业化社会有能力承担自由。

市场经济逝去，可能是史无前例自由时代的开始。法律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可以比之前的范围更广阔和更普遍；监管和控制不应只赋予少数人享有自由，应该是人人自由。自由不是从属于特权，在源头已有缺陷，而是有规定的权利，突破政治范围的狭隘局限，伸延到社会本身的直接组织。因此，旧有自由和公民权利要加入工业化社会借着安逸和安全为人人提供的新自由储备。这样的社会能够同时承担公义和自由。

但前进之路受阻于道德障碍。规划和控制被抨击为否定自由，宣称自由企业和私有制是自由的必需要素。建立在其它基础的社会不应称为自由社会。因监管而建立的自由被指责为「非自由」，所提供的公义、自由和福利被谴责为伪奴隶制度。手段决定目的，因此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自由范围只是空言：苏联利用规划、监管

[437] Essential Works Order

和控制作为手段，一直没有落实宪法承诺的自由；评论家补充很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但反对监管意味着反对变革。自由主义者因而把自由的概念退化为纯粹提倡自由企业；到了今天，严峻现实是庞大的垄断集团把这概念转化成虚言。收入、安逸和安全已达最高地位的人享有完全的自由，其他人民只有一丁点自由，徒劳试图利用本身的民主权利向财产所有人寻求保护。事情还没完。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从未成功重建自由企业，有内在原因注定这必然失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几个欧洲国家建立了大型垄断企业，也无意中建立了各种流派的法西斯主义，例如奥地利。这些「自由」的公认敌人认为规划、监管和控制都危及自由，反而利用这些手段彻底清除自由。然而，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是由于自由主义阻挠任何涉及规划、监管或控制的改革。

诚然，自由全面受挫于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结果；自由主义哲学主张权力和强迫是邪恶，「自由」要求人类社会排除这些邪恶。这是不可能的；在复杂的社会，这情况变得明显。两种情况只能选其一，没有其他：要么仍然忠诚于对自由的幻想概念和否定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现实和拒绝自由的概念。前者是自由主义的结论；后者是法西斯份子的结论。似乎不可能有其他结论。

无可避免的结论是「自由」的真正可能性存疑。如在复杂社会中扩大和增强自由的唯一手段是监管，但利用这手段是与自由本身相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自由。

显而易见，这困境的根源是「自由」本身的意义。自由经济体系把我们的理想导向错误方向：这近乎实现本质上是理想性质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迫，不可能有社会；世上的势力不可能没有功能。假设社会只是由人类意志和愿望形成，这只是幻想。然而这是社会的市场观念，把经济等同合约关系，把合约关系等同自由。因此衍生了激进的幻想：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是源于个人意志，因此不能以意志除掉。市场限制了人的视野，把生活「细分」为**生产者范畴**其最终部份是产品到达市场，以及市场产品源源而至的**消费者范畴**。前者从市场「自由」赚取收入，后者在市场「自由」消费。作为整体，社会是无形的。国家的势力并不重要，因为势力越小，市场机制越能顺畅发挥作用。失业和贫困现象出现时会无情地限制自由，但选民、物主、生产者或消费者都无需为此负上责任。任何自认是「自由」的正直人士，无需对本人否定的国家强迫行为负上责任；或是为他本人没有从中得到好处的社会经济困苦负上责任。他「自食其力」，「没有欠谁人的债」，没有卷入权力和经济价值的邪恶。他对这一切都没有责任，似乎也见诸他以本身自由之名否定了这些事物的现实。

但权力和经济价值是社会现实的范式，并非源自人的意志，不可能不与之合作。权力的作用是确保团体生存所需一致性的手段；其最终源头是「意见」——任何

人都有一些意见。经济价值确保商品的实用性，必然早于决定生产这些商品之前已存在，界定了劳动分工；其根源是人类的消费欲求和稀缺——任何人都是得一想二。意见或欲求驱使人参与建立权力和建构经济价值。难以想象不以「自由」行事的其他方式。

本书的论证到了最后阶段。

放弃市场理想国使我们面对社会的现实，分界线一方是自由主义，另一方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方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经济方面，而是道德和宗教。即使两方都承认经济有相同之处，但这不仅有区别，而且实际上体现了相反的原则，最终的区别还是「自由」。法西斯份子和社会主义者都接受社会的现实，现实的终局是对死亡的理解塑造了人类意识。权力和强迫是那现实的部份；禁止社会有权力和强迫，是不能成立的理想。两方有分歧意见的问题：有了这样的理解，能否维护「自由」的概念；「自由」是否旨在毁掉人和他的成果的空洞词汇、一种诱惑；或是人类可以面对这种理解，重申本身的「自由」，努力在社会实现「自由」而不致陷入道德幻想？

这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总结了人的状况。本书研究的意识和内容应可提出答案。

本书引用西方社会构成「意识」的三项基本事实：对死亡、自由和社会的理解。根据犹太人的说法，《旧约全书》揭示了对死亡的理解；《新约全书》的耶稣教义发掘了人的独特性，这是对自由的理解；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为我们揭示了对社会的理解。没有大人物与此有关；也许 Robert Owen 是最接近的媒介。这是现代人意识的组成元素。

法西斯份子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答案是拒绝对「自由」的假设。法西斯主义否定耶教发现人的独特性，这是法西斯主义退化转向的根源。

Robert Owen 是承认耶教经文忽视了社会现实的第一人，他称之为耶教把人「个体化」，似乎认为只有全体合作，「耶教中的一切真正有价值事物」才不会与人分离。他理解从耶稣教义得到的自由不适用于复杂社会。他的社会主义主张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护人的自由。西方文明社会的后耶教时代已开始：耶教经文已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不过仍然是西方文明社会的基础。

因此，社会的发现不是自由的结束，也不是自由的再生。法西斯份子任由自身放弃自由和赞美社会现实中的权力，社会主义者无奈接受这现实，但依然维护对自由的主张。人变得成熟，能够在复杂社会中作为「人」生存。再引用 Robert Owen 的警言：「如人类即将得到的新权力不能消灭邪恶的任何起因，他们会知道这些

是必然而且是无法避免的邪恶；不会再有幼稚而无用的抱怨。」

「无奈接受」曾是人类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接受了死亡的现实，把物质生活的意义建立在此之上。人无奈接受的事实是他的灵魂会迷失，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他的自由是建立在此之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无奈接受社会现实，意味着这种自由的结束。不过生命再次从最终的「无奈接受」中萌生。毫无怨言接受社会现实，让人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灭一切可以被消灭的不公义和不自由。只要人类确实致力为所有人创造更多自由，就不必害怕权力或规划会对他不利和破坏他以这两者为手段建立的自由。这就是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给予我们所需的全部确定性。※



附录一：评论选译

Gregory Clark：再思《巨变》
Fred Block：没有「利伯维尔场」这样的东西（响应 Gregory Clark）
Murray Newton Rothbard：打倒原始主义：彻底批判 Polanyi



再思《巨变》[438]

Gregory Clark

Polanyi 对他的信徒表明：利伯维尔场是人类的敌人…是陌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创建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只因有理论家推动国家行动。利伯维尔场取代了自然的社会状态（一个约束和保护个人的田园诗般的相互义务制度），为公正与和平的社会带来不平等，战争，压迫和社会动荡。

《巨变》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分支是经典文献，是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但在经济学少为人知，或是偶有讨论时被痛骂。这是所谓「社会科学」的冷酷嘲讽。

Polanyi 认为利伯维尔场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崩溃，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于 1886 年维也纳出生，在布达佩斯长大；在 1944 年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家乡匈牙利的革命和恐怖，1920 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大萧条时期，纳粹主义兴起，「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现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这本书开笔就说：「十九世纪文明已崩溃。」

Polanyi 确定了这垂死文明的四大支柱：国际势力均衡、金本位制、自由国家以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至 1944 年，这些似乎都一扫而空。不过，说实话，前三项都是衍生自第四项：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才是这文明的真正根本。Polanyi 认为，书目的《巨变》是这些支柱催生了利伯维尔场，这反过来又吞噬了这些制度，导致十九世纪文明的崩溃。Polanyi 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都是利伯维尔场的怪婴。

[438]原文：Reconsider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Review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Gregory Clark, NY Sun: by Gregory Clark, June 4, 2008（节译）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简体中译本《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9 年。

历史没有证实这些预言。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英语国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是有弹性和稳定的系统，是许多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威力无远弗届。最近已征服中国，东欧和印度的广阔新领域。国际贸易壁垒已大幅减少。金本位制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更好的货币管理大大降低了商业周期的严重程度。

此外，虽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有本身的烦恼，但不见有激进的替代品。凯恩斯的改革式自由主义经济已证明比 Polanyi 的救世主重临热情更健全。以市场的成功来衡量，十九世纪的文明似乎在复兴。

因此，Polanyi 著作的预言和现代的现实脱节，实难理解这本书何以经久不衰。他的信徒似乎要响应他的一般信念，认为市场令社会腐败，利伯维尔场经济离经叛道舍弃了过去的和谐社会。他大肆批评市场打破了个体之间的社会连系，各自成为孤立的原子，因而造成以前不存在的不平等。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Polanyi 也是一如他的预言不称职。事实上，越了解历史，越是明白利伯维尔场不是十八世纪的创新，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例如，中世纪的英格兰有精细的各种利伯维尔场：货品，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暂且忘记呻吟的农奴，过早断奶的地主，皮鞭的抽打；考虑私有财产，领工资的劳工，市场激励和社会流动。至 1200 年，大批失去土地的劳工转为受雇，在市场买食物，租用住所。利伯维尔场确实是一些现代人的自然栖息地，不是倒行逆施和非自然创新。（有证据显示很久之前，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已有广泛市场。）

英格兰工业革命并不意味着财阀得益是以穷人的贫困和失业的惨状为代价。相反，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没有技术的劳工；这真正伟大的「巨变」减少了至少在中世纪已存在的可怕不平等。现代信贷的精细联系最终产生了周期性失业，但工业革命也减少了前工业时代工人因为农产每年丰收或歉收带来的巨大冲击。

正如 Polanyi 断言，可能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的社会比之后的市场社会更加平等，但这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世界：《巨变》把市场之前的社会描绘为田园诗般的优美，教会兄弟齐齐唱诵，永远伸出帮助之手。

自 1944 年以来，人类学家更冷静的分析表明，这类型的小区一般是暴力和性别歧视，有显著的地位差异，通常包括系统化奴役。紧密的小区联系没有阻止司空见惯的袭击，谋杀，暴力和性暴力。某些社会深信巫术迷信，人人活在谴责和死亡的恐惧。最近的研究对象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山地部落，巴拉圭的丛林部落等

等，显示这些都是残暴和仁慈，同情和冷漠的复杂混合社会，绝不是市场时代之前的伊甸园。

Polanyi 之普及，是向往和浪漫主义超越科学（例如社会学）的胜利。《巨变》最终是更深入解析教授阶级的本质而不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作为娱乐，《巨变》有其优雅的时刻，但缺少了其他批评市场社会文献的的威严和文学的火花，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是的 Naomi Klein 近作《震撼主义[439]》的不疲不惫和不堪的狂热。但这堆等待大学生的书籍证明货物的利伯维尔场效果优于概念的利伯维尔场。



没有「利伯维尔场」这样的东西（响应 Gregory Clark 书评）

Fred Block[440]

新保守主义的《纽约太阳报》发表 Greg Clark 对 Karl Polanyi《巨变》的书评，不足为奇。Polanyi 是上世纪最善于批评「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的思想家。时至今日，美国布什政府的经济管理是大灾难，「利伯维尔场」概念被大力抨击。古训有云：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Clark 的策略是改变主题，攻击利伯维尔场的批评者被蒙蔽，幼稚，极力拒绝「历史现实」。

Clark 的书评有够多的错误，他似乎没有审稿。例如，他错误声称《巨变》的标题是十八世纪崛起的市场，但 Polanyi 清楚在书的第一段落点明他谈论的是 1930 年代全球经济崩溃可追溯至十九世纪初市场经济的兴起。

Clark 的指责是以另一种方式攻击他真正的目标：那些较次要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发现在分析过去三十年的破坏性市场原教旨主义，Polanyi 的作品显得格外有用。他写道：「《巨变》在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分支是经典文献，是大学生的必读参考，但在经济学少为人知，或是偶有讨论时被痛骂。这是所谓「社会科学」的冷酷嘲讽。」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Stiglitz 可能对最后的一句话失笑。他为《巨变》的最新版本撰写前言。没有嘲弄，反而认为「经济科学和经济历史已经认识到 Polanyi 主要论点的有效性。」[利益申报：他的前言是我写的。]

---

[439]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by Naomi Klein. 中译本《震撼主义》吴国卿、王柏鸿译；时报出版社（2009）。这是译者的短短阅后感言。

[440] 原文：Fred Block: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Market*

Clark 的书评没有把握 Polanyi 的最重要的区分。据 Clark:「事实上，越了解历史，越是明白利伯维尔场不是十八世纪的创新，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Clark 插入「自由」这个单词很有问题。事实上，Polanyi 多年来一直在记录市场的确是人类最古老的制度之一，但历史中的市场蓬勃发展，是因为受社会制度，如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所控制。所谓「创新」是十九世纪初发明的「利伯维尔场」；Malthus（马尔萨斯）和 Ricardo（李嘉图）大力推广：人类社会组织应围绕着自发调节的市场，其集成系统包括不受任何社会控制的土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

Polanyi 坚持（Stiglitz 许多其他人同意）「利伯维尔场」的社会是理想国的想法，因为这假设人类可以一劳永逸解除所有形式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强制，市场的供求力量会自发和自由产生最佳后果。历史事实已一次又一次证明：以市场为基的社会只有在嵌入法律和政治规则才发挥作用，防止投机和掠夺性行为，也保证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其他关键商品的供求大致平衡。依据 Polanyi，过去两百年市场社会的实际历史是有系统地增加国家的经济作用，从而使市场发挥作用。

Polanyi 的框架有助区分最近的两个时期：战后初期（1945-1970 年）和列根—戴卓尔年代（1980-2008 年）。在较早时期，「利伯维尔场」思想撤退，政府义无反顾发挥作用，规范营商和金融以及提供必要服务。这是世上最伟大的经济持续增长期。在较后时期，「利伯维尔场」思想方兴未艾，政府监管和服务已向后退，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低迷。在这较近时期，美国的不平等急剧上升，世界经济已被一系列金融危机动摇；更最近，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因监管失败而启发危机。

但 Clark 拒绝这些区别。他坚持认为:「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英语国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是有弹性和稳定的系统，是许多世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其威力无远弗届。最近已征服中国，东欧和印度的广阔新领域。」

总之，Clark 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如此广泛和没有细分，甚至包括共产党专政的中国。无论他是否想充当这角色，Clark 事实上成为经常利用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和反对必要监管措施的最反动全球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冲基金经理和大石油公司坚持政府增加任何监管都是违反「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只有当市场不受干扰独自分配资源时，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才能发挥作用。令人费解的是时至今日，Clark 还是不明白：盲目庆祝利伯维尔场是以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环境衰败作为代价。



打倒原始主义：彻底批判 Polanyi [441]

Murray Newton Rothbard

Polanyi 的《巨变》是混乱，荒谬，谬论的大杂烩，对利伯维尔场的歪曲攻击。我几乎想逐句反驳，现在决定先解释一些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缺陷，然后详细批评。

Polanyi 的基本哲学缺陷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常见缺陷：自鲁索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这缺陷一直猖獗：这就是**崇拜原始人**[442]。Polanyi 记述 Kaffirs 族人时，实际用了伤感短语「高贵野人」;「崇拜原始人」的想法贯穿本书。现代浪漫主义的重大动力来自文化人类学家（许多是共产党员或极左翼）；他们热切参观现存的原始部落，报告部落 X 的快乐生活：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束缚。

这样的崇拜原始人，有几件事情可以谈谈。首先，像 Polanyi 那样从分析现存的原始部落而推论西方世界之前的文明历史是绝对不合法统。永远不要忘记**现存**的原始部落恰恰是那些**从没进步**的部落，一直保持原始状态。现在观察他们，以为先民也是这样，确然是无稽之谈，往往是真相的相反；可以设想是先民的行事方式致使他们在几千年前跨出原始阶段。参照现今原始部落的魔术和游戏，以此嘲弄先民在原始部落状态时以物易物，然后是金钱交易…是无以伦比的失误。

第二，《巨变》或明或暗假设原始部落的行为方式是更「自然」，比人为的设计较为适合人的生活。这是鲁索浪漫主义的根源。原始人的野蛮行为是无知，充满恐惧和兽性，是更为「自然」，因为比文明方式更接近「本能」。鲁索和许多其他左派认为人本来是「自然的好人」，只是被制度变坏；「自然的好人」是他们的基本思想，这基本上其实是「反人文」的概念，因为这否认人性和人必然行事的方式。动物天生已有「本能」，本质上是由感官决定的反应。动物没有自由意志和理性意识，因此只能依循感官的感觉而适应身处的环境。但在另一方面人是可以凭着他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去改变身处的环境。

---

[441] 原文：*Down With Primitivism: A Thorough Critique of Polanyi*。Murray Newton Rothbard (1926-1995) 是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政治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支持自由意志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这是作者在 1961 年 6 月撰写的备忘录，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至 2004 年，Ludwig von Mises 学院在网站发表。译文略有删节。

[442] *Worship of the Primitive*

人之初，白板一块，必须**学习**，学习如何选择适合他的目标，学习如何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所有这一切他是以理性为之。

文明恰恰是记录人利用理性，发现建立他环境的自然规律，利用这些规律来改变环境以符合和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因此，崇拜原始人必然是反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致使有人声称文明是「反自然」，而原始部落较接近自然…。因为人是超级「理性动物」（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崇拜原始人是极度反人文教义。

反人文反理性主义热切请教目不识丁，野蛮粗野，心怀恐惧的原始人，要求我们这些二千多年最优秀文化的继承人应以他们为榜样。如现存的原始部落没有私有财产，或男女滥交，我们更有理由从头来过。

于是有了「快乐野人」的神话：原始人是真正的幸福和满足。这神话贯穿着 Polanyi 的著作。让我们戳破浪漫的神话，看看这些野人的真面目。首先，他们是环境的奴隶。如果树盛开，他们也许可以采摘果实为生，但假设果树有叶枯病，这「开心快活」的部落会发生什么事？全都死了。难怪原始部落都只是小数目。

其次，原始人的生活几乎时刻面对恐惧的生活：面对周边世界的恐惧，面对一无所知和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恐惧，因为他对世界的运作没有任何形式的科学和理性的探究。我们知道雷暴是什么回事，因此不用害怕，又可以采取合理的避雷措施；野人一无所知，因此猜测是雷神不满，要奉献供品（有时牺牲活人）以息雷神之怒。因为野人不理解有自然规律（要用到理性和科学的概念）把世界编织在一起，他相信世界是由一帮喜怒无常的神灵恶魔统治，魔法仪式或专职祭司巫医只能有时取悦个别神灵恶魔。野人陷于恐惧却无能为力，致使他无法发展个人的个性，因为个别野人几乎没有利用他的理性和思维。因此，野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全被习俗控制：一成不变，完全非理性，禁忌或命令。

Polanyi 吹捧这恐惧缠身，半人的野兽是真正的「社会」生物，快乐地不受利伯维尔场的「非人」专制主义影响；反而要求我们这些利用智慧「征服」大自然的现代人效仿这些野人。

Hobbes 形容野人的生活是「肮脏，野蛮，短暂。」野人短命，一生被各种形式的疾病蹂躏，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向巫医奉上食物祈求解咒。疾病后来被征服，是通过文明的进步：利用理性，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市场。

Polanyi 钦佩部落和其他种姓社会，因为「没有人饿死。」诚然，他承认每个人都可能只是仅堪糊口，但没有人饿死。大家一起挨饿，是否值得安慰？这是怪诞的

说法。原始人的世界，即使是工业革命前的所有世界，从来饱受饥荒和瘟疫。 工业革命之前，「饥荒」不断；之后没有听说过有饥荒（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治下以及较早前在苏联有饥荒）。饥荒出现，是因为没有本地之间的贸易；一处地方的粮食作物失收，因为与其他各地几乎没有贸易，大部分人饿死。自从利伯维尔场渗透世界各地，地区之间有了贸易，几乎已经没有饥荒。Polanyi 却严辞指责这市场是几乎所有罪恶的使者。

Polanyi 钦佩所有种姓和地位的社会：部落，重商主义，或诸如此类。他坚持种姓社会提供「保障」。饥荒和瘟疫是否「保障」？任何限制主义都不能提供任何经济「保障」的必然基础：**生产**；事实上是正好相反，因为所有种姓的限制，所有对市场的限制，只会削弱和阻碍生产，从而把人人压抑在糊口水平。事实上，亚洲的「大家庭」制度，几百年来一直把中国，印度尼西亚压制在原始的贫穷和苦难。Polanyi 钦佩的「共享和以相同方式共享」的习俗迫使任何人多赚了一点钱就必须按比例分配全体远亲近戚。因为这「高贵」制度，没有中国人有多劳多得，多产多赚的动机；因此，（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人没有这样做，没有进步。在印度尼西亚，瓜哇的（绝对 Polanyi 色彩）村公社制度意味着饥饿，大规模人口过剩，人民被更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岛屿（如苏门答腊）剥削和欺压。

种姓制度的「保障」是家庭监狱的保障。（顺便说一句，谁想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保障」，只须犯罪入狱，就会得偿所愿得到 Polanyi 式保障。）这种「保障」意味着种姓社会处处弥漫的绝望。面包师的儿子必然最终是面包师，虽然他有别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人能向上提升，没有人可以改变职业或做任何事情，人人必须承继祖业。这毁灭了任何人一生中是最重要，最有目的，最有活力的一切。

Polanyi 忽略了任何种姓社会另一基本缺陷：人口增长。巫医，部落的习俗，酋长或国王和 Polanyi 教授可以自定义 X 和 X 的儿子必然是面包师，Y 和 Y 的儿子是农民等等，但人口必然不可避免地增加，那么小儿子可以做什么？Polanyi 嘲笑 Malthus，但种姓社会很明显总是面对 Malthus 的问题。当饥荒和疾病未能「自然地」发挥作用，会发生什么事？斯巴达种姓社会的「暴露试验」把他们的婴儿暴露在森林，不是因为斯巴达人本质上是残忍的民族，而是因为他们要面对在他们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破坏了欧洲的重商主义。十八世纪英格兰初现身强力壮的乞丐和盗贼，人口增长是原因。他们找不到工作。有待资本主义兴起和资本向前迈进为这些待业人士提供就业机会，拓展市场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廉价商品，不仅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这些日益「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再者，Polanyi 继续反资本主义的老谣传：工业革命之成功是得助于圈地行动迫使自耕农离开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圈地行动只是圈围了

「公地」，不是人；农业生产率大大提升，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收入。圈地行动没有迫使人们离开土地。农村人口过剩是因为**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迫使绝望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如 Polanyi 所言悲剧性破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温暖，有爱心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照顾社会的弃儿：乞丐，强盗，过剩的农村人口，爱尔兰移民，给他们就业和工资，从而帮助他们脱贫，达致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很容易为英国新工厂的劳动童工惋叹，更容易忘记在工业革命之前，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以及在新资本主义尚未渗透的众多英格兰农村中，这些孩子像苍蝇一样死去，生活远比童工悲惨。这时期的英、美著作赞美新工厂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工作！我们现在觉得这种赞美是莫名其妙；这些作者不是不人道的怪物，而是在有这些劳动之前，或是在没有这种劳动的地区，妇女和儿童生活得更差更苦。妇女，儿童，移民，毕竟不是被皮鞭驱赶进入工厂，他们是自愿和乐意去做工，这就是原因所在。

Polanyi 忽略人口问题更广泛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世界人口的庞大增长要归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活水平提升，使资本主义能够解放 Malthus 的困境，破解人口过多的严峻弊端，容许更多人有比以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当 Polanyi 实际上要求我们彻底消灭市场和回到种姓或小区或部落社会，他不仅要求我们放弃文明的奢侈品和回到原始部落的糊口水平，他也要求清算和消灭世上的大部份人口。因为如种姓或部落系统能「正常运作」，甚至只是在糊口水平，这只能养活极少数人口，其余的我们会**集体**饿死。因此，以上有关原始部落极少数人口的事实有了新的和更可怕的意义。（W.H.B. Court,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443] (1954) 驳斥圈地行动的迷思，指出关键是人口增长。）

Polanyi 抱怨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但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可能是这体制最重要的方面：自由。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迫使 Polanyi 或任何其他人加入利伯维尔场。如 Polanyi 或任何其他批评家如此敌视所谓的暴政，市场的「不稳定」等等，自由社会**任由他们自由离去**。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以离开市场：可以到丛林去，以山洞的浆果为口粮；或是可以买下自己的农场，完全自给自足，与世界隔绝；或是随本身意愿自由而为之。在自由社会，任何人可以甚至参加自愿性质的公社或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享受追求的幸福共产主义生活。既然大家依然有这样的选择，可以选择去荒岛或加入公社，**为何 Polanyi 苦苦责骂市场？**

事实上，自由社会给大家有这样的选择。既然如此，人们享有自由，为何利伯维尔场蓬勃发展，直至带来资本主义文明？原因恰恰是在过去，在现在，绝大部分人不同意 Polanyi：他们极为倾向市场的所谓不稳定，不快乐等等，而不是公社

[443] 中译本：《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译， 商务印书馆，1992 年。

野人的所谓的幸福糊口生活。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很喜欢，他们不会加入市场，他们会情愿为了部落或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而牺牲金钱收入。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最能彻底反驳 Polanyi 哭诉「社会」失去的辉煌，莫过于观察千百万人已选择市场的方式。

事实上，恰恰是 Polanyi 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黯然神伤慨叹世界其他地方「可口可乐化」，哀叹不发达国家的「民俗文化」据说已失去辉煌。因为世界各地人民，无论文化传统，一有机会都放弃他们所谓心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的方式，西方的衣服，争取西方型式的工作，或为西方游客服务，赚取西方的金钱——喝可口可乐和看好莱坞电影。例如，只是几年光景，日本人放弃了本身千年的旧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热切接纳这些所谓西方腐朽市场带来的商品。为何如此？这是否西方「帝国主义」？美国军队是否下迷药强迫大众喝可口可乐？（P.T. Bauer, *West African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对西非当地文盲人民的市场和交易经济的庞大增长有发人深醒的学术讨论。）

即使在敌视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如印度，加纳等，这些国家没有代表本国看似快乐的部落传统而全部拒绝西方文明的成果。相反，他们想要西方的产品和方便，只是他们不理解要有资本主义才能得得。

若然有选择，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市场经济和它的先进文明，奇怪的是 Polanyi 教授自己最明显没有急于奔向一些部落或公社。

那么，为何我们不是如 Polanyi 轻蔑质疑的认为利伯维尔场是「自然」的？原因是（1）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时，已纷纷转向利伯维尔场，（2）若然人们要充分享受人的地位，满足本身的需求，改造「大自然」以适应本身目的，人们应转向利伯维尔场。因为是市场给我们带来文明的生活标准。

Polanyi 在书中不断向我们保证他心爱的原始土著不会为个人「得益」做什么，只为了魔术，为了他所谓的「互惠」等等。「得益」有什么坏处，致使 Polanyi 几乎假定是恶毒的词语？利伯维尔场的原则是为了互惠互利而自愿交易。这种互惠互利构成得益。利伯维尔场其实是确保各方互利的人际关系。Polanyi 为何这样讨厌利伯维尔场？为何他在每一点似乎更喜欢只有一方得益的人际关系？如一方之得必然是另一方之失；因而 Polanyi 的理想人际关系不是相互增益，而是剥削：为求自身的得益而牺牲对方的利益。这是否我们应为之抛弃市场经济和文明的「道德」，「社会」关系？为何社会主义痛恨和谴责双方得益的交易关系，称之为「计算」，「不人道」的关系？他们是否认为交易的任一方被剥削是更道德？没错，社会主义谴责甲方没有在交易中无条件给钱乙方，不期望有物质或精神上的回报，实质上是呼吁甲方为了乙方的剥削作出牺牲。

Polanyi 教授讨论他心爱的原始部落时说他们不是以（唉！）互利的基础对待对方，而是以「互惠」和「再分配」为基础。「再分配」原则当然即是「剥削」的原则。「再分配」是部落或国家胁迫生产者要分配给首领青睐的寄生阶级。Polanyi 肯定不清楚「互惠原则」究竟是什么。在少许程度上，如这过程是理性的，这只是从概念后门偷偷走进来的简单交易或以物易物。如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理性的，这只是游戏或运动（几乎无需进一步评论）或仪式性魔术（上文已有评论）。Polanyi 吹捧的「互惠」显然是后一部分，因为他显然是陶醉于 Kula 贸易：岛民向另一岛屿的居民送赠物品，只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从另一岛屿的岛民收到类似（或相同）的物品。Polanyi 特别喜欢这回事，因为这没有真正的相互得益，或是这明显的没有意义？再次点明，我们是否必须遵循魔术缠身的野人的路径？

我提到自由社会容许 Polanyi 或任何同路人放弃市场，追求适合他们的任何其他形式。但是，自由社会不会容许 Polanyi 做一件事：胁迫我们这些其他人。市场容许 Polanyi 加入公社，但不会让他逼使你或我参加他的公社。这是唯一的区别，我因此必须总结 Polanyi 反对自由社会和利伯维尔场的唯一基本投诉：不容许他或同路人以武力强迫他人以遂 Polanyi 或同路人心中所想。自由社会和利伯维尔场不容许武力和暴力，不容许依本行事，不容许盗窃，不容许剥削。我必须总结：Polanyi 迫使我们回到的世界正是胁迫，依本行事和剥削的世界。而这一切是以「人文」之名？诚然，Polanyi 和他的同路思想家是「带着断头台的人道主义」。（Isabel Paterson 的 *The God of the Machine*, 1943 是深刻讨论政治理论的杰作。）

当然，赤裸裸公开宣传暴力和剥削不会走得很远，所以 Polanyi 回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谬论，把「社会」本身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于个别成员利益之外和之上。Polanyi 怒吼市场扰乱和分拆「社会」，「社会要保护自己，必然要」限制市场。说得很好，直至我们质疑：谁是「社会」？「社会」在哪儿？有什么可识别的属性？如有人开始谈论「社会」或「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和个人利益」，一个良好的操作规则是：看紧你的钱包。保护自己！因为「社会」门面背后总是有一群亟求权力的教条主义者和剥削者，准备拿走你的钱，操控你的行动和生活。因为，不知何故，他们「就是」社会！

界定「社会」的唯一理性方式是自愿性人际关系的数组，其中最卓越的正是利伯维尔场！简而言之，市场和市场产生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或至少是「社会」的大部份和核心。事实上，Polanyi 和其他人的陈述认为社会性和伙伴关系是在市场之前，真相几乎是相反；而这是因为市场及其劳动分工容许众人互有增益，从而可以有与人交往和与人为善的能力，友好关系随之而来。丛林中的部落和种姓社会没有互利，只有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事！

奇怪的是，Polanyi 对部落生活的田园诗般画面似乎从来没有提及无处不在的部落战争。这样的战争几乎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是为稀缺资源而战：水源，打猎等等。部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丛林规则」，因为一些部落活命的唯一出路是战争和灭绝弱势部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用互惠互利从而增加资源，能够绕过丛林规则，人类才可以超越动物般的存活状况，提升至先进文明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因此，市场是极为明显的「社会性」，而「社会」的其余部分是由其他自愿，友好，非市场关系组成；然而，这些关系最好是建基于精神交流和互利。（双方友好相濡以沫，是不是优胜于只是单方面示好？）那么，市场从来没有破坏社会；市场就是社会。那么，Polanyi 用什么取代市场？自愿性关系之外的唯一其他关系就是强制性关系；简而言之，Polanyi 会以武力和暴力，侵略和剥削取代市场的「社会」关系。但这不是「非社会」，而是深刻的「反社会」。剥削者以暴力寄生于生产者，这是「反社会」；因为他的生计不是按人的最好本性：本身有生产，又以产品和他人交换。他以暴力为生，单方面寄生于生产者。这是深刻的反社会，反人性关系，破坏社会市场，导致和连同文明和文明的生活水平灰飞烟灭。

Franz Oppenheimer 的大作《国家论[444]》说得非常好：有两种可能的致富之路：一种是生产，通过个人能量把物质转化，然后与其他人的产品交换；他称之为「经济手段」。另一条路是以武力和暴力夺取他人已经生产的财富，他称之为「政治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哪种方法是「社会性」，哪种是深刻而具破坏性的「反社会」。Polanyi 声称要从市场中挽救社会，在破坏市场的过程中正正是在破坏社会本身。他的著作是神化的政治手段。

从他对自由劳动力的讨论可见这就是 Polanyi 会带来的货色。对 Polanyi 而言，劳动力「商品化」是利伯维尔场最严重的罪行；Polanyi 因此建议从利伯维尔场拿走劳动力。但是，自由劳动力有什么其他选择？非自由劳动力，即是农奴制。劳动力失去自由的人就是农奴。事实上，Polanyi 在歌颂（所谓典型原始部落）的无薪工作过程，他正是歌颂奴隶制度。无偿的不自由劳动就是奴隶劳动。

像所有社会主义者，Polanyi 苦口婆心教导我们，没有市场的新「社会」不可避免会到来。因此，对他来说，近百年对市场的每一项限制都是「承认」社会的需要，而**不是**某些想法和利益团体深思熟虑的选择。为了保持这神话，Polanyi 愤怒地批评像 Mises 那些人相信是某些社会主义和限制主义的概念和利益团体带来政府对市场的这些干预。Polanyi 设置了稻草人，命名为历史的「阴谋论」，实情并非如此。不同的国家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无需合谋主张在两个不同领域实施

[444] 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国家论》萨孟武译，台北市东大出版，1995 年。

中央集权措施。（当然，Polanyi 还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实际阴谋，像 Fabians[445]）。这结果是无可避免和「自然地」源自两派人士的论点。Polanyi 不愿意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的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概念，于是试图把全部事情放在社会决定论[446]的平面，从而人类的意志没有在[过程]中发挥作用。

Polanyi 拒绝理性，从而可以推论他也拒绝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是「社会」采取行动，决定，保护，识别等等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决定因素：忘掉了个人采取和实行的意念，而聚光灯集中在所谓「社会力量」，「社会」等等。

像所有决定论者，Polanyi 最终陷入严重的矛盾。谈到十九世纪采用了利伯维尔场，Polanyi 声称这不是由社会决定，而是反映由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的错误观念，他们「干预」了「自然」（种姓？部落？）的国家调控过程等等，暂时带来了利伯维尔场。

我可以几乎无限地详细批评 Polanyi，但再多说已是没有意义。Polanyi 一再警告「现实社会」必然涉及武力和暴力，意思是「社会」是暴力和「政治手段」。（但为何暴力不能只限于打击攻击性暴力，从而把社会中的暴力减至最少程度？）Polanyi 刻薄地拒绝自由贸易的理想，没有意识到他因而是拒绝国际和平，因为世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的规划不可避免会有冲突，引发利益冲突和战争。

看看这段引文：「（在十九世纪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合作只是限制在私营机构，一如自由贸易那样杂乱和没有效率；**各民族之间的实际合作，也就各国政府的实际合作，想都没有想过。**」（留意对「民族」和「政府」的极权性识别）。Polanyi 认为旧金本位制的商品货币是真正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轻蔑地谴责。一如那些反金本位制，支持法令钞票的人士，Polanyi 也同时声称金钱不仅是商品（不仅是「面纱」），也是远远低于商品（金钱「只是票据」）。另一矛盾，实际上金钱确实是商品，没什么争议。Polanyi 谈到企业「需要」通胀的持续剂量以加强购买力，而纯粹的金本位制不能满足这需求的说法是完全错误；他荒谬地认为中央银行不是和没有央行的纯金本位制那样有时通胀有时通缩，这也是错误的。央行本质上倾向通货膨胀，但是当最后审判的日子来临，（在金本位制度下）它必须收缩，而且往往超过本来必要的收缩。

进一步，Polanyi 似乎认为他已成功突袭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他说贸易最初是在国际和区域间的渠道发展，而不是先在当地发展，然后国际。这又如何？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反驳利伯维尔场经济。这并不奇怪，在农场和庄园自给自足的世界，最早的贸易应该是与远方交易，这是当地农场能获得某些农产品的唯一地

---

[445] 费边主义者；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政论团体，促进非马克思主义的进化社会主义。
[446] social determinism，这套理论认为社会互动和建构决定个人行为（不是生物或唯物因素）。

方。（例如，西欧只能从近东取得香料。）事实上，这表达了贸易和分工以及市场增长的好处，而不是相反。

最后，Polanyi 在最后一章试图向我们保证，他预计的集体主义社会会真的保留许多「自由」；他不情愿地承认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自由」。这一章以近乎教科书式最混乱表达「自由」的概念，以及混淆了「自由」和「权力」之间极为不同的概念。

（F.A. Hayek（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447]》指出集体主义经常模糊这关键区别。）许多「自由」得到保留，甚至最大化（毕竟，钱包有更多钱的工人是更「自由」，谁在乎豪华富人的钱被拿走？），包括「工作权利」这样的「自由」，不因为种族，信仰或肤色受到歧视。Polanyi 不仅徒劳地想象或断言我们至少在他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可能有足够的「自由」，他也同样徒劳的相信我们能够保留工业化和西方文明。两个希望是是徒劳；在这两种情况下，Polanyi 认为他可以破坏「前因」（利伯维尔场，私有产权等）而又保留「后果」（言论自由，或工业文明）。他的想法不仅接近〔印度〕尼赫鲁和〔加纳〕Kwame Nkrumah，也类似他极度颂扬的野人的想法。

总结一下：我看过的书，只有极少数是更凶险更荒谬。



[447] *The Road to Serfdom*

附录二

经济行为及社会结构：镶嵌之困惑[448]

Mark Granovetter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和制度，是社会理论的传统问题。本文探讨在现代工业社会，经济行动在何种程度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结构。虽然一般的新古典学派提出「低度社会化」或原子化行动者[449]来解释这行动；改革派经济学者试图以「过度社会化」重弹社会结构旧调，被 Dennis Wrong 批评。相互矛盾的「不足论」和「过度论」都忽略了社会关系的持续结构，在细致解释经济行动时没有考虑这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结构。Oliver Williamson 研究「市场和阶层」，他的评论很能说明论点。

引言：镶嵌的问题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和制度，是社会理论的传统问题。因为这些关系一直存在，没有「关系」的情况只存在于思想实验，一如 Thomas Hobbes 的「自然状态[450]」或 John Rawls「原初立场[451]」。效益主义的传统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多假设社会关系对理性又私利的行为影响不大，因而导出的理想性状态与上述的思想实验相差不远。「镶嵌论」是与此相对的极端观念：行为和制度是如此持续受限于社会关系，要独立建构这两者是严重的误解。

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镶嵌情况；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学者和历史学者大多认为这些行为在「市场前」社会中是极大程度中镶嵌在社会关系，但在现代社会是颇为自主独立。这观念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是越来越分离的范畴，经济交易不再是由交易人士的社会或亲属关系定义，而是各自出于私利的理性计算。有一些进一步的说法是传统情况已倒转了：经济生活不再镶嵌于社会关系，而是市场现象。一般认为「镶嵌论」关连到 Polanyi 及同道中人的人类学

[448]原文：Mark Granovetter :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93。译文略有删节。

[449] atomized-actor

[450] state of nature：社会形成之前的无政府、原始政治情境；人受到自身情欲支配，相互之间可谓是平等的，但因为没有公共权威，人们乃处于彼此对立的战争状态，肇因在于人人不确定自身的安全。自然状态不会有工业、文化、和贸易等，因为「持续担忧和对死亡恐惧，人们的生活将是孤独、穷困、险恶、粗野、和短暂」，因此自然状态即是战争状态。（参考）

[451] original position。假设社会上人人处于无知之幕，以理性的选择方式建立社会契约，以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合理分享社会的利益（参考）。

「实质论[452]」学派以及历史学和政治科学的「道德经济体系」；这明显与马克斯思想有关连。

但只有少数经济学者同意「现代化」中断了「镶嵌」；大多数反而声言早期社会的「镶嵌」程度不是大大高于现代市场的低水平。亚当・斯密的定调说法是「人性有一定的倾向…以实物代工资，以物易物和以物换物」，又假设因为原始社会的唯一生产因素是劳动力，货物交易必然以劳动力的成本比例计较。自 1920 年代以来，一些人类学家也有同样立场；被称为「形式论[453]」：即使是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保持相当独立，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没什么可以派上用场。近年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重拾对社会制度经济分析的兴趣，对这问题有了新见解：在早期和现今社会中被认为是「镶嵌」在一起的行为和制度，可更好以有理性的原子化个人追求私利来解释。

我的个人见解有别于这两派学说。我要强调「非市场社会」的经济行为其镶嵌程度是低于实质论和发展理论的声言，而且受「现代化」的影响也不是他们所说的强烈；但我也认为受影响的程度是多于形式论和经济学家所设想。我提出「镶嵌」概念的理解，以现代社会的问题为例阐述其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交易是在市场中进行，而又沉淀在层级结构的企业之内？

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社会化或是低度，或是过度的概念

Dennis Wrong 在 1961 年抱怨「现代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社会化的概念是过犹不及」；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人们对其他人的意见极为敏感，因而顺从了大众同意的习俗和价值（经社会化而内部化），并不以为服从是负担。他同意个人镶嵌于社会的概念弥补了 Hobbes 的「人人各自为事」概念的不足，但强烈指出不应过度强调「镶嵌」的程度，以为这可以排除纠纷矛盾。

在另一极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从功利角度看人类行为，形成「原子化，低度社会化」的概念。这概念排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有任何影响：在竞争性市场中，任何生产者或消费者对总合供求的影响不可能显著，因此对价格或交易的其他条件的影响也不可能显著。Albert Hirschman 已指出：「数目众多的买家卖家，各自有完整信息，在双方没有见面或社交接触的情况下发挥着承价的功能。完美的竞争没有讨价还价，谈判，抗议或相互调整的空间。参与契约的各方无需涉及彼此要持续认识的关系。」

完美竞争的理想化市场一直承受多方学界的抨击而不倒，是因为「自发调节的经济结构」有政治吸引力，但少有人提到和理解另一理由：经济分析如不涉及社会

[452] substantivist
[453] formalist

关系，至少在经济范畴不用顾及社会安宁。Hobbes 的论点认为社会交流和经济交易如没有冲突，人们必需有互信，社会没有不法之事；但如「自然状态」中人们没有社会关系或制度背景，这愿景是不可能之事。他的解决之道是在这之上设置独裁权威。古典自由主义（因而古典经济学）的对立说法是竞争性市场排除了压制性政治结构，因此无需用到武力或不法手段。「竞争」决定了不由个人操纵的贸易条件。如生意人遇上彼此猜疑或不法之事，大可以另觅愿意以市场条件做交易的生意人；社会关系和相关枝节因此带来摩擦。

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拖了竞争性市场的后腿。亚当・斯密抱怨「行家之间少有来往，但每有对话都是针对大众的阴谋，或是合谋抬价。」他的放任自由政治观未能对这问题提出很多解决办法，但有反对要求行业人士登记在案，因为这方便了行业人士从不相识到彼此有联络。这样的办法颇见儿戏，但看得到他了解完美的竞争必先要社会原子化。

一些经济学家最近评论「社会影响」建构了人们习得自动和机械式追随的习俗、习惯和常态的过程，没有理会这会如何影响理性的抉择。James Duesenberry 取笑「经济学研究人们如何理性选择；社会学研究他们如何没有选择。」Wrong 认为这是「过度社会化」。

「低度社会化[454]」与「过度社会化[455]」之间明显有差异，但应留意两者有共通之处：行动和决定是取决于原子化的行动者；这在理论上至关重要。「低度社会化论」认为「原子化」是因为私利主义狭隘地追求功利。「过度社会化论」认为行为模式已内部化，社会关系对行为的影响只是有限；即使行为内部化有其社会性根源，但这论点其实与功利主义大同小异。功利功能的源起没有定论，因此大众同意的习俗和价值完全指导了行为；这与「过度社会化论」雷同。两个论点解决社会秩序的办法都是把行动者在周边背景中原子化。Hobbes 的名著《巨灵[456]》描述「自然状态」中的人民在原子化后深受社会秩序失控之苦，乐意向权威巨灵奉献本身的权利，以后快乐地过着顺民的生活；人民以「社会契约」为名，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过度社会化」的状态。

现代经济学家解释「社会影响」时，一般提出「过度社会化」是如何和怎样的论点，即是扭转了「社会影响只是边缘」的说法。Michael Piore 强调在分级的劳工市场中，不同劳工市场有不同的决策风格：理性选择、习俗以及匹配各自背景的命令结构。Samuel Bowles 和 Herbert Gintis 指出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认知过程，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教育。下层劳工学会要遵守法纪，精英份子的四年大学课

[454] under-socialized
[455] over-socialised
[456] *Leviathan*. 有中译为《利维坦》。

程强调「与生产高级阶层匹配的社会关系…之后或是更上层楼，或是走进适当的生产阶层。」

这些社会影响的「过度社会化」概念颇为机械化：一旦知道个人的社会阶级或劳工市场阶级，一切行为都是自动化，因为行为已经深度社会化。这论点认为社会影响是诸事安排妥当的外部力量，一如有神论的上帝，深入人们的心灵和肉体，改变人们如何决定的方式。一旦知道人们如何被影响，社会关系和结构已是无关重要。所有社会影响都是在个人的脑袋，因此在作出决定时，他是一如任何「经济人」一样原子化，或许遵守不同的决策规矩。较为深入（也较少社会化）的文化影响分析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一次性，而是持续的过程，在互动中持续建立和重建。文化影响人民，人民也重塑文化，部份原因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策略原因。

即使有些经济学家重视社会关系，但必然纠缠于这些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定位，可称之为「关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镶嵌」。其论点描述的人际关系是极为一成不变和平均而言，没有具体内容、历史或结构性定位。行动者的行为是出于他们的角色的定位和规范；因此论点阐明夫妻之间、顾佣之间、罪犯与执法者之间如何互动，但没有假设这些关系有角色以外的个别内容。结构社会学批评这是把个人关系的具体内容贬低为整体概念的次要角色；比对从最终价值取向得出的规范性角色描述，这只是偶发现象。在经济模式中，如此看待社会关系有其自相矛盾的效果：即使决策似乎不止涉及个人，但依然承认原子化决策。因为被分析的个体群集（一般是二人关系，但有时是较大的组群）是提取自社会背景，个人的行为被原子化，脱离其他组群的行为和本身关系的历史。这没有清除原子化，只是转移到分析的二元或较高层次。留意这是利用「过度社会化」概念（行动者的行为只依据本身的指定角色）补充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概念。

要有用分析人们的行为，就要避免这两极端论点隐含的原子化。行动者的行为或决策不是在社会背景之外，也不是亦步亦趋依循他们刚好身处社会类别的特定阶层写下的剧本。他们的有目标行为是镶嵌于具体和持续的社会关系。下文说明「镶嵌」概念如何改变研究经济行为的理论性和实证性方法。首先要收窄范围集中在经济生活的信任和不当行为，然后以「市场和阶层」的问题说明如何利用「镶嵌」概念来分析问题。

经济生活的镶嵌、信任和不当行为

自从 1970 年，经济学家对以往忽略的信任和不当行为问题重拾兴趣。Oliver Williamson 指出现实中的经济行动者不仅追求私利，也利用「机会主义」：即是以诡计追求私利，懂得掩饰的行动者取得交易优势。因此，经济人不是一般假设的追求私利，而是更为细致和转弯抹角。

这是现代经济学一项特别的假设：追求经济利益只是以相对比较文质彬彬的手法而为之，避开了 Hobbes 揭示的问题，即是为何人们不多以暴力和欺诈追求本身利益。Hobbes 已清楚指出「私利」的本质意义没有排除暴力和欺诈。这项假设得以成立，部份原因是可以想象自发调整市场的竞争力量能压制暴力和欺诈。这样的概念足以说明「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概念彼此互补：竞争性市场的原子化行动者已把行为的规范性标准内部化，得以保障交易有序。

近年来，这份信心有了动摇，因为对不完全竞争市场有较精密的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少数参与者有已支付成本和具体人力资源投资；在这些情况，所谓竞争性市场的纪律未能压制欺骗行为。因此，日常经济生活有没有被暴力和欺诈捣乱这老问题重浮上面。

经济学文献提出两项基本答案，各自关连「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概念。「低度社会化」论认为以前认为借助法律、历史、社会或政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措施应被视为针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以前认为这些制度没有经济功能，但因为安排得法，不当行为要付出成本，因此不当行为受到压制。但这只是「信任」的功能性代用品，不能产生「信任」。这类型的主要措施有旨在减少偷懒、怠工或盗窃专利机密动机的明明暗暗合约（包括延迟支付和法定退休计划），以及以法令这些权威制度压抑机会主义。这些是「低度社会化」的概念，因为这不容许具体的个人关系及其内含的裙带关系鼓励不当行为。以这些措施取代信任，实际上是 Hobbes 式难题：任何理性的个人会有动机逃避措施，很难想象这些逃避行为不会祸及日常经济生活。

其他经济学家理解到「信任」必然有发挥作用，因为只靠制度措施不足以完全阻止暴力或欺骗。「信任」从何而来？有学者提出「一般道德」的解释：社会演变，会产生某些隐性协议，关系到社会存活或至少有助社会运作。大家都接受「一般道德」的存在，这可见于日常经济生活的大小事情；但若称之为普及和自动的反应就有些「过度社会化」的特色，因为经济生活中的道德行动根本不是自动或普及。

经济学家在远离家居的餐厅用餐，结账时留下小费。这在三方面违反了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一）双方并不认识；（二）彼此以后有交易的机会极为渺茫；（三）不留小费这回事也不会传到双方以后可能有交易的其他人。这例子不涉及暴力或欺诈，只能以「一般道德」来解释。但如涉及昂贵成本，「一般道德」是否发挥作用？

「镶嵌论」反过来强调具体个人关系和这些关系的结构（网络）产生信任和压制不当行为。人们普遍偏重与有信誉的人交易，可见大多数人实际上不放心只是信

赖一般道德或制度措施。经济学家已指出：不弄虚作假，其中一项动机是不想伤及本身名誉；但这是把名誉视为一般商品的「低度社会化」概念，把弄虚作假作为机会的机率计算。实际上，人们只是在没有更好信息的情况才接受这些一般性信息；如有可信任的人曾与对方交易，他的评语比一般信息更好更可信；如之前曾与对方交易的经验，那才是最好最可信。个人经验是较好信息，因为（一）成本低，（二）更相信本人的信息：内容较丰富，较多细节和较准确；（三）为维持长期交易关系，对方有动机赢得你的信任；（四）持续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动机之上添加了社会内容，加强了对信任和不占便宜的期望。

没有人怀疑在亲密关系中会有上一句的效果；亲密关系让行为变得更容易预见，免除了陌生人彼此怀疑的恐惧。电影院失火，人人匆忙逃生，往往造成惨剧。群众心理学研究认为这是不理性，但 Roger Brown 指出这情况是涉及 n 人的「囚犯困境」：每个逃生的人都很理性，因为没有什么担保人人会冷静逐一步出灾场。家中失火不会导致人踩人的惨剧，因为家中各人彼此有信心。

在商业关系中，信心的程度更为参差，但个人关系的力量往往可以避免「囚犯困境」；这力量不是交易者的特质，而是建基于彼此的扎实关系。一般的标准经济分析忽略了个别交易者的身份和以往的关系，但理性的个人清楚知道可以依赖这些关系。较之于一般信誉，他们更依赖以往的交易经验来预期对方会否忠诚交易。

至此为止，本文指出经济生活中的信任源自社会关系，不是制度性措施或一般道德。但这可能是以一项乐观功能主义取代另一项；关系网络在前者发挥了维持秩序的功能，不是道德或措施。要减少风险，一是要理解作为解决秩序的办法，镶嵌式立场不是强于其他论点，因为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命的不同范畴有不定期、不同程度的渗透，因此一些劣根性，例如不信任、机会主义有机可乘；所以总会有失序的时刻。

二是坚持社会关系可能确实是信任和可信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确保这两者，甚至可能比没有社会关系更有可能为不当行为和冲突提供机会。理由如下：

（一）基于其本质，人际关系衍生的信任有更多不当行为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大家都知道会「伤害心爱的人」，而对方因为对你的信任可能更容易（比对于陌生人）受到伤害。（在「囚犯困境」的场景，甲方知道合谋者乙方肯定会否认控罪，就更有动机认罪。〔这样，甲方从轻发落，乙方处以重刑。〕在这情景，利用人际关系解除困境是利用了受害一方的不对称讯息。）社会生活中这简单事实是信心的基础；「信心」为了隐藏的目的，培养了一些关系，有时是长期关系。在商业世界，有些罪行（例如骗案）是要先培养信任关系才有机可乘。信任程度越高，不当行为做成的损害越大。这些不当行为并不常见，足以说明人际关系和信

誉的重要性；但不当行为偶有发生，也说明人际关系和信誉不是完全可信。

（二）暴力和欺诈往往是小组行事，小组各人要有一定程度的内部信任，这一般承传自现有的关系。例如，收受回扣和合谋围标不是个人罪行，一旦东窗事发，大家都奇怪涉及这么多人的罪行怎能长期以来不被揭发。执法人员要费尽心思打开缺口：先找住一个人，然后凭借他的供辞揭露其他人的罪行，之后雪球越滚越大。

人际关系导致信任，也导致不当行为。制度经济学的功能学派强调正当的一面，指出「因为持续关系，即使追求私利，不择手段的精明之士也会有看来是愚蠢或纯粹利他的行为。钻石市场的大额交易只是双方握手就成交。」这种交易可以成立，是因为交易行为不是原子化，而是镶嵌于钻石商人的紧密群体，他们紧密监察彼此的行为。一如其他紧密群体，行内人有清晰定义的行为标准，容易监察；不当行为很快传遍群体。但这样的信任程度有很大的诱惑；钻石交易往往有「内鬼」大案。

（三）暴力和欺诈造成失序的程度相当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构成。Hobbes 过于强调原子化自然状态中可能的失序程度：在没有持续社会关系的情况，只会有断断续续的二元关系。范围较大的失序是因为捣乱鬼合谋，他们不可能之前没有关系。不同的结盟导致各自归边；如双方没有足够的跨界联系，未能形成足以防止冲突的利益，这就是「战争」。商业世界也是如此：除非冲突双方能够召集颇大数目的同路人，否则冲突不会一发不可收拾；例如偶尔发生的敌意收购事件。

即使没有社会关系，不必然会有失序和不当行为。上文提到社会关系防止不当行为。在真正原子化的情况，不当行为的程度往往是低度，只会是偶发，互不关连和小规模。Hobbes 提出的问题确实是问题，但若是以社会结构来理顺这问题，那就要承认可能触发比「自然状态」中更大规模的失序。

镶嵌论解说经济生活的信任和秩序问题，是在「过度社会化」的一般道德和「低度社会化」的非人性制度措施之间分析和追随社会关系的具体模式。有别于 Hobbes 的立场或其他论述，镶嵌论没有对普世秩序或失序一锤定音，而是假设社会结构的细节决定会发现的事物。

市场和层级的问题

Oliver Williamson 对经济生活的镶嵌论提出有力的论点；他质疑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在层级式企业界限内发挥，而不是在跨越这些界限的市场程序中发挥。他的答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一致：在任何情况观察所见的组织形式是最能有效应付经济交易的成本。层级式组织的企业常见有一些组织形式未能保证最后成

果，时常重复，经常要为专项交易投入未能用于别处的金钱、时间和能量。反之，市场界面的企业之间的交易一般是简单，不重复和不需要专项交易的投入，例如一次性购买标准货品。

在这样的说法，前一种的交易是在层级之内已内部化。理由之一是「受限的理性[457]」：经济行动者未能预测可能适用于长期契约的复杂偶发事态。如交易已内部化，就无需预测复杂偶发事态，无需繁复的谈判，交由企业的管治结构解决就可以了。另一理由是「机会主义[458]」：经济行动者为了私利的理性行为，会用尽可能的手段，包括诡计和诈骗。如在同一企业，容易找到对方，这种权威性关系能较有效防止机会主义行为。

以权威性关系克制机会主义似乎是重提 Hobbes 的分析论点，但只是限于经济范畴。Williamson 论点的 Hobbes 式分析是这样的：内部组织不用面对自主企业之间自动契约有冲突时萌生的经验，企业内部的争执一般不用上法庭解决；这是解决歧见的有效方法。复杂和时常重复的交易，双方要有长期关系，而机会主义危及长期关系。市场环境经常改变，其中关系既复杂和不能预测，一些初期契约根本不能全面顾及，又没有强制执行契约的权威性关系。推崇权威性关系是反映 Hobbes 的「过度社会化」国家政权的分析，「市场」类似 Hobbes 的「自然状态」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和匿名市场，但缺少了全面竞争性环境的规律。Williamson 也理解他的诠释有不足之处，承认市场的群体压力培养可信任的行为，而且预期客人可能回头会打消占便宜的念头，以不当手段谋私会被行家和社会孤立；「公平交易」的商誉是企业的资产。有很多实际例子说明社会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但 Williamson 以为这些只是例外，未能认识到这些二元关系是镶嵌于较广泛的社会关系。

本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匿名市场在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而任何交易都关连社会关系。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比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和长期，而企业之间交易的社会层次也使人质疑 Williamson 的说法：复杂市场类似 Hobbes 的「自然状态」，只有层级性组织的内部化才可以解决问题。

常见社会上的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互有关连。Adam Smith 不喜欢的商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而大大小小的企业透过高层管理人员「交换式」出任对方的董事职位而维系着紧密关系。这些商业关系渗入了社会元素，反之亦然，尤其在商场精英阶层。很多商业纠纷以「人情」解决，不是上法庭，甚至无需依合约办事。

人际关系不只限于精英高层，交易涉及的多重层次都有人际关系。有研究发现买

[457] bounded rationality
[458] opportunism

手绝少如古典理论所说的在「现货市场[459]」购买，而是光顾有长期关系的卖家。只有严重突发事情才会打乱这买卖关系。这样的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理由：寻找新卖家和建立新关系要花成本，人是惯性动物，与相熟的卖家交易风险较低，以及买卖双方已建立个人关系，或许从中得到市场信息。商业行为镶嵌于社会关系，致使较容易解决纷争。如交易有阻延或出错，双方不会立即拿出合约，找律师出头，而是直接联络解决问题。

某些社会文化尤其注重社会关系，例如日本。日本人经常在公余时间与同事和外人聚会，形成个人关系。一旦关系巩固，就不容易动摇。外商到日本做生意，经常埋怨这些关系促使日本商人的决策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首先考虑人际关系。

类似的人际关系亦常见诸许多行业的分判制度，特别是建造业。总承办商与分判商保持密切关系，致使工程分判无需竞争性投标，不受制度性规则监管。Eccles 认为这种「半企业」组织是在纯粹市场和纵向式结构企业之间。本文认为这「半途模式」不完全成立，因为实证而言，纯粹市场极为罕见。比诸许多买卖关系，分判制更近乎纵向式结构，因为分判商通常与总承办商一起在同一工地作业。况且分判合约一般是固定价格契约，因此有明显动机想办法降低表现要求。

虽然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没有衍生一些纵向式整合企业的层级结构来解决「问题」。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总承办商与分判商有长期关系，大家都在同一行业，这样会保障行为标准，因此无需权威性关系已可阻吓不当行为，而且更为优胜。有研究亦发现即使行业中有很多企业，总承办商同一时间只会聘用两三个分判商。这可以用「投资」角度解释：双方从持续工作关系中得到不同寻常的好处，也可能是参与双方的人员从日常社交和工作中得到满足。若然双方都是现货市场中交易，每次要建立关系，这很累人的。一如经济生活的其他部份，社会关系的界面可能衍生自纯粹经济交易，日后渐趋重要。

在劳工市场方面，Williamson 断言层级式企业优胜于市场交易，是在于能够向员工传达准确讯息。与单一企业比较，市场企业之间的沟通往往没有丰富的共识语言。在层级管理中，如上司熟悉员工脾性，传达讯息尤其准确。员工的个人资料和评价不是只局限在企业之部，也会传到外间。除了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个人关系，（以美国为例）员工跳槽是闲事，方便了人事数据的流通。

本文认为 Williamson 过度强调组织之内的层级权力。例如，他以为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较容易得到企业员工的合作；但内部审计可能避重就轻，流于表面。Dalton 和 Eccles 的研究也指出企业之内的人际关系和办公室政治屡屡影响表面看

[459] spot market

来是纯粹的行政管理措施，例如成本会计，内部价格转移。纵合式管理本应解决问题，但因为上述原因，有些管理人员埋怨内部交易比外部交易更为困难。

这些「过度社会化」实证研究有力反驳了企业内层级式管理的所谓「优点」：员工更为服从、雇员先顾全企业而抑制本身的利益等等。况且有深厚个人关系的中层管理人员会「合作」逃避总部的审计。大企业的员工流动性较低，内部劳工市场职级分明，各有进升渠道，致使这些逃避性合作行为变得更为容易。Weber 提出的理想官僚架构明确职位之间的关系，不受人事调动影响，本来可以避免这类问题。但 James Lincoln 的研究指出如员工流动性低，官僚架构的人际色彩越浓烈，最终改变了网络和组织的方向。

至此为止，本文强调要为经济生活带来秩序，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比企业之内的权威更为重要；这论点不同于市场论和层级论。较为持平的看法是要同时顾及企业之内的「市场」关系和社会连系，要留意权力关系，否则本文的论点是忽略了社会关系在市场发挥解决冲突的平顺功能。冲突是现实，从大众津津乐道的法律诉讼到偶尔发生报章报导的「割喉式」减价竞争。因为企业之间有效行使权力可防止公开争端，可以假设公开争端只是企业争端的小部份。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争端才会公诸于世。Hobbes 曾提出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全民开战」就有着这粗略均势的意味。但如争议双方有一方有明显势力优势，另一方会早早投降减少损失。

强势企业的论题还有许多论述之处，但有关互任董事、工业企业的财务安排等等的研究文献已足以说明不能忽视权力关系。这也间接引证要解决复杂的谈判，把双方置于同一层级组织并不是万应良方；解决这些复杂谈判往往借助企业之间的明明暗暗权力关系。

最后要提到工业和组织社会学认为在企业内部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献着重要区分企业的「正规」和「非正规」组织：天真的社会学者才会相信官方的组织结构。层级式组织和企业内部化有关连，但不是最好的解释。内部化的效应可能催生比之前独立的市场实体有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

Williamson 的市场及层级论和本文提到的镶嵌论对解释和预期有什么区别。对经济生活中抑制机会主义或不当行为和社会一般有序和彼此合作，Williamson 的解释是纵向式层级的企业已接掌复杂的经济活动。但上文提到的实证指出即使是复杂交易，跨越企业的市场也能维持高度有序，反而企业之内会高度失序。这是否会发生（而不是 Williamson 预期会发生）取决于人际关系以及企业内外关系网络的性质。本文主张「有序和失序」与「忠诚不欺和不当行为」是与这些关系的结构有关，而不是组织形式。

市场企业可能纵向组合而不是相互交易，这情况有某些后果。如其他因素相同，但交易企业没有连系彼此的个人关系或最终导致矛盾、失序、机会主义或不当行为的网络，可以预期有偏向纵向整合的压力。在另一方面，如有稳定的关系网络调解复杂的交易和导致企业之间的行为标准，这些压力应不会发生。

Williamson 的假设隐喻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当前的企业形式，为了避免机会主义，企业必然依随上文描述的纵向整合方向；本文则视之为压力而矣，因为 Williamson 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必然要有追求效率的强大选择压力；以及（二）有些行动者必然要有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可以建构纵向整合式企业的能力和资源。

Williamson 没有清楚交代确保交易有效组织的选择压力。新制度经济学无言默认，似乎是隐含达尔文的论点：无论源头为何，有效方案得以持续，亦类似生物世界的「天择[460]」。因此虽然不是全部商企家能够准确掌握和利用商机，但纵向整合方案在交易成本和经济规模效应方面有较理性的特性，因而有更好的生存特性；这是 Williamson 的论据。但如此引用达尔文观点也可适用于任何制度分析：所谓「选择压力」的运作既不是研究主题或可证伪的命题，这只是自家之言。

即使能够解释「选择压力」有助某种组织形式有较高生存机会，但依然不能说明如何造就这些形式。引用生物演化论解释这些情况是「突变」、只是避重就轻；一如其他功能性说法，这也是不能自动假设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必然可行的。纵向整合要有资源，包括一些市场力量、取得资本（通过利润投资或资本市场），以及与法律和监管机构的适当联系。

如「选择压力」薄弱（尤其是 Williamson 声称会导致纵向整合的不完美市场），资源不足，上文提到的社会—结构性组合依然关连到交易成本的效益，但不足以保证必然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与效率没有关连的综合动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为重要，例如高层企管的个人决心。

本文提出的论点指出未来对市场和阶层组织的研究，要仔细和有系统研究促成经济交易的个人关系实际模式；这样才能更好理解纵向整合的动机，更能明白在原子化市场和完全整合企业之间的各种整合形式，例如上文提到建造业的半企业形式。这类型的中间形式与个人关系网络息息相关，如不重视则不能充份理解个人关系网络如何影响组织形式。这方面的数据数据比科技和市场组织的相关数据难找得多，也因为经济框架的主导形式是原子化的个体参与者，因此以为个人关系网络并不重要。

[460] natural selection，亦称「自然选择」。

讨论要点

本文提出大多数行为紧密镶嵌于人际关系网络，避开了人类行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极端论点。本人认为这适用于全部行为，但本文只集中经济行为，理由有（一）一般专业研究极大程度集中于行动的原子化理论，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二）社会学极少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主题，无形中默认经济学者假设「市场过程」不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因为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只有磨擦性作用，不是核心作用。即使少数社会学学者有研究以市场为核心的过程，其后的分析也会避而不谈。例如社会学文献描述个人的背景和收入，但不分析决定工资的劳工市场。

本文指出全部市场过程都可付诸社会学分析，这些分析可揭示这些过程的核心作用。本文以「信任」和「不当行为」为例，也提出 Williamson 的「市场与阶层」论点，说明「镶嵌观点」如何不同看待经济学者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视制度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法，避免从社会、历史和法律角度分析制度；如此功能性分析忽视了社会结构的仔细分析，而本文则认为这是现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研究重点。

「理性选择论」只是狭隘地集中于原子化个体和经济目标，与本文的「镶嵌观点」截然不同。若是广义地看，两者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上文有多处抨击经济学的社会化「过度或低度」论点其背后的基础是「心理修正主义[461]」，试图不以理性选择来解释经济学理论。我反而认为虽然「理性选择论」总是麻烦多多，但依然是很好的假设，不应随手放弃。要分析一些看来是「非理性行为」，如能置之于环境的局限（例如镶嵌论），就可以容易明白。全面分析「非专业劳工市场」的社会局限，可以明白他们似乎不完全是对「文化」规则的自动反应，而是对所处环境的理性反应。从严格的经济动机来看，管理人员参与「默许定价」的行为损及企业利益，是愚蠢的行为；但如从个人位置和网络关系分析，这种行为有适当的意义。如暂且放下经济目标，另外从社交、认可、地位和权力层次考虑，这些行为是否理性或只是工具性就有了另一方面的解读。经济学少有认同后列的因素是理性，因为他们往往把「利」与「情」划分得清清楚楚，只考虑「利」这一个经济因素，又假设其他动机只见诸不同和「非理性」组织的范畴，因而经济学者传统上对经济活动没有社会分折，没有引用心理学。我认为经济不止忽略了心理学，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社会结构。

最后必须指出「镶嵌论」的因果分析是颇为粗疏；「镶嵌论」对宏观历史和宏观结构的含义及其社会—结构特色，我知之不多，因此对现代社会或政、经改变的源头如何可以解答大问题，愚见未及这水平。我一再提到「镶嵌论」的近因关系，

[461] psychological revisionism

因为要了解大改革，必先要了解改革的机制，而最少为人了解的就是这些改变对经济活动镶嵌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不了解这些关系就无从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连。

「市场和层级」案例最能说明「镶嵌论」分析宏观利益模式的因果关系。纵向组合的规模和市场充斥小型企业，不仅是研究业界组织的小课题，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现况制度的大课题，例如对二元经济、依赖发展和现代商界精英的研究。对小企业是否被大企业「泰山压顶」的研究，一直是以泛泛而言的宏观政治和宏观经济论点出之，没有引用社会结构的成因。

例如，对二元经济的研究往往以为大量小企业是生存在大企业的「边缘」，承担了后者面对不稳定商业循环和科研的风险，小企业失败不会影响大企业的利益。我认为小企业得以生存是因为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之上还有紧密的社会关系，减少了整合的压力。这没有抹杀转移风险的解释，但「镶嵌论」可以解释有这么多没有卫星和附属地位的小企业，尤其是有紧密关系的小企业，但不足以解释为何市场有这样多类型的社会结构。这问题涉及较宏观的分析，因此先要理解市场中社会结构的重要性。

「市场和层级」的分析固然重要，而本文提出只是作为说明例子。我深信「镶嵌论」广泛适用于其他范畴，而经济学不应忽略社会学观点，社会学家也应参与经济研究，不应固步自封，以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特例。。

（译文省略了引文，请参见原文。）



附录三：参考阅读

（推薦）顧昕〈中國大轉型之自由主義之路〉2010 年

湯志傑：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上）（下）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30 期 2009 年 9 月

許甘霖：健康虛構與生活形態醫療市場：一個博藍尼取向的嘗試
許雅淑：臺灣金融研究的下一步：經典研究的啟發——尋找金融市場中的靈魂

本文整合 Braudel 與 Polanyi 兩者的經典論述，指出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巨觀圖像，在看似變化萬千的國際資金流動中，勾勒出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與資本主義的多樣性、並且發掘臺灣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與能動性、揭露失去靈魂的自律市場運作機制對社會造成的摧毀性力量並對其提出持續性的批判。最後提出未來社會學的金融研究必須朝向兼顧整體性、巨觀視野的歷史分析；具體的制度性討論，然而這個「制度」意義並非狹隘的國內單一政策意義，而是更廣泛國際性的金融體制問題之探討；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把制度結合抽象的概念與理論分析，那是賦予制度價值與意義的關鍵所在。

靜止時刻：讀 Polanyi 的《巨變》和 Foucault 的《規訓與懲罰》
Polanyi 的「社會鑲嵌」觀
再讀巨變
三讀《巨變》

顾昕：中国大转型的自由主义之路 2010 年

王绍光：大转型：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上）（中）（下）
磊爷：何去何从？——我们时代的走向——喜读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王小钢：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
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
毛勒堂："经济时代"与经济正义
杨雪冬〈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解读博兰尼〉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博兰尼的《巨变》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视频）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从哈耶克与波兰尼说起。

王绍光有专著：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 年）。

（视频）邓正来“市场，社会与法律” 2012 年 11 月 25 日（录音整理讲稿）

市场和市场规范的价值交涉，侵蚀了广大的公共领域、道德、法律，甚至人们的生命;市场侵蚀了人们的生命的态度;市场侵蚀了公民观念；市场把穷人和富人分开，阶层关系没有调和的机会和领域。市场逻辑侵蚀的政治逻辑，导致买官盛行，共产的官位，成了投资的驿站，公仆观念已不复存在。邓正来在演讲中特别指出波兰尼提出的“双向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此一思想对中国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